拉康研讨班 · 第十五期

精神分析行动

L'acte psychanalytique

1967—1968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五期研讨班《精神分析行动》（L'acte psychanalytique，1967—1968）共18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acte psychanalytiqu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he Psychoanalytic Act；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7年11月15日 5
第2课 · 1967年11月22日 27
第3课 · 1967年11月29日 54
第4课 · 1967年12月6日 81
第5课 · 1968年1月10日 108
第6课 · 1968年1月17日 131
第7课 · 1968年1月24日 153
第8课 · 1968年1月31日（闭门研讨班） 176
第9课 · 1968年2月7日 205
第10课 · 1968年2月21日 232
第11课 · 1968年2月28日（闭门研讨班） 258
第12课 · 1968年3月6日 293
第13课 · 1968年3月13日 316
第14课 · 1968年3月20日 339
第15课 · 1968年3月27日 364
第16课 · 1968年5月8日 394
第17课 · 1968年5月15日 395
第18课 · 1968年6月19日 402

第1课 · 1967年11月15日

今年，我选择的主题是“精神分析行动”。这两个词的搭配颇为奇特；说实在的，此前并不通用。

当然，那些已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我在这里所作陈述的人，也许不会惊讶于我用这两个词来引入去年话语结束之处所谈的问题：它处在我曾试图在这里勾勒出全部轮廓的“幻想的逻辑”内部。

那些听过我以某种语调、在两个层面谈论“性行动”这一同样由两个词组成的说法能够、又应当意味着什么的人，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精神分析行动所代表的这个维度。不过，我仍须假定在座有一部分人对此一无所知，并在今天引入我所提出的这一用法究竟关涉什么。

精神分析——至少原则上这是大家承认的；你们到这里来听我讲话这一事实也预设了这一点——精神分析会产生某种作用。“它会有所作为”，这样说还不够。这一点至关重要，处在事情的中心；严格说来，它是对此事的诗性看法。诗也会产生某种作用。顺便说一句，近来我对诗的领域略感兴趣，因而注意到：人们很少追问诗做了什么、又对谁做了什么，尤其——为什么不呢？——它对诗人做了什么。也许，提出这个问题会成为进入诗中之行动的一种方式。

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事，因为这里谈的是确实会产生某种作用、却绝不是在诗的层面、范围或意义上产生作用的精神分析。如果我们必须——而且极有必要——在精神分析的层面引入行动的功能，那是因为精神分析的这种“作为”深深牵涉主体；说实在的……

正是凭借主体这一维度——它为我们彻底更新了关于主体本身可以作出的陈述，而它的名称就是无意识——这个主体在精神分析中，正如我已经表述过的，在行动中被实现出来。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我提醒诸位，这一公式我已经在谈论转移时提出过。在更早的时候、在表述尚且近似的层面上，我曾说：转移无非是无意识在行动中的实现[注]。

> [注] 校勘：米勒定本的公开节选分别保留 mise en acte de l'inconscient，并把 passage à l'acte作为另一术语展开；ELP 校勘本也保留这一区分。这里的 mise en acte 是使无意识"在行动中取得现实性"，不是 passage à l'acte〔付诸行动〕，也不是 acting out〔行动化〕；全卷据此分译为"在行动中实现 / 行动实现"。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我再说一遍，这还只是一种接近。今年我们将围绕精神分析行动的功能向前推进，而这会使我们能够为上述说法带来一种精确性，配得上此后我们已经迈出的许多步伐——我希望，这些步伐是确定的、决定性的。现在先从某种显而易见之处靠近它。

如果我们只取"行动"这个词所含的一层意思，即它相对于某物——先不管是什么——构成一次跨越，那么可以肯定，我们会在进入一场精神分析时遇到行动。一个人带着这一决定所包含的一切，下定决心去做所谓精神分析，这毕竟完全当得起"行动"之名。这个决定包含某种承担。通常用法赋予"行动"一词的一切维度，我们都在这里遇到了。

还有一种可以加以限定的行动，即精神分析家据以确立其精神分析家身份的行动：这完全当得起"行动"之名，甚至包括这样一个事实——天哪——它可以在某处登记下来："某某先生，精神分析家。"说实在

的，像谈“医疗行为”那样谈“精神分析行动”，似乎并不荒谬、夸张或不合时宜。就此而言，精神分析行动究竟是什么？我得说，它可以按这个名目登记在社会保障机构的记录里。那么，精神分析行动比如就是一次会谈吗？

我们可以追问它究竟由什么构成、属于哪一种介入，因为说到底，精神分析家并不开处方。

严格说来，精神分析行动的一切在于：

- 它是解释吗？
- 它是沉默，还是你们愿意在这一功能的工具中指出的任何别的东西？

说实在的，这些说明并没有让我们前进多少。为了转到我们可以用来呈现并引入精神分析行动的另一个支点，我们要指出：精神分析理论恰恰谈到了它。

不过，我们还无法以某种方式明确规定这一行动，从而能够把它同一个更一般的概念划清界限；这个概念在精神分析理论中——老实说——十分通用，叫作“活动”。

人们大量谈论“活动”。它还扮演着一种奇特的参照角色，因为……

就拿人们特别强调地使用它的情形来说，也就是需要在理论上、而且就相当广的领域说明某事的时候……那些以精神分析术语来表达的理论家，为了解释思想，仿佛出于某种安全需要，不愿把这种思想——

理由以后再谈——变成一个显得过于形而上学的实体，于是试图在一个他们希望更为“实在”的基础上说明思想。

于是，人们会告诉我们：思想之所以受到激发并得到说明，是因为它同活动有关系；例如，思想是一种缩减的活动、受到抑制的活动、初具雏形的活动，是活动的一个小模型，甚至思想中仿佛含有对它所预设或使之内在的活动可能是什么的一番“品尝”。这类论述十分常见，我无须引文来说明；但若有人想更仔细地查看我所暗示的内容，我不仅要提到一篇著名论文，还要提到纽约精神分析学会的精神分析家戴维·拉帕波特先生就此写下的整整一卷著作[注1]。

> [注1] 戴维·拉帕波特：《论精神分析的思维理论》（“On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Thinking”），《国际精神分析杂志》，1950 年，第 31 卷，第 161—170 页；另见《戴维·拉帕波特论文集》，Jason Aronson 出版社，1996 年。

引人注意的是：对于任何不带成见地进入“活动”这一维度的人而言，这里的参照在我看来并不比它所要说明的对象更清楚。要“以活动阐明思想”，也许首先得对什么构成一项活动有一个不那么混乱的观念；因为只要我们稍加思索，活动的中心似乎正预设着行动这一概念。

我很清楚，还有一种做法，也正是那些试图在我刚说的层面上表述问题的人所紧紧抓住——我是说强力依托——的做法，那就是把活动等同于运动性。现在，在我们开始引入这一问题时，必须做一次操作：随你们把它称作简单的澄清还是清扫，它都至关重要。

事实上，有一种公认的、也许已成惯例的做法——天哪，为什么不呢？——人们愿意应用它，或者哪怕只是装作遵守它：不要继续用所谓“较高者”来解释“较低者”，尽管这两个词的使用并不总有多大根据。既然人们说——如今已经不太知道为什么——“思想是较高的”，那就

从那个被视为有机体最基本反应形式的“较低者”出发，即那个著名的回路；它以“反射弧”为名，为我们提供模型。

也就是那个依情形被称为“刺激—反应”的回路；说得谨慎些，它被等同于“感觉刺激”——无论是什么——同作为反应的“运动触发”这一组配。且不说在这个著名的“反射弧”中，反应绝不必然、也绝不一定是运动性的：如果它比如是排泄性的，甚至是分泌性的——反应就是弄湿了——那么援引这一模型……

……来定位、取得我们可以称作“活动”的功能之起点和基础，显然就更加靠不住了。

此外还可以指出：如果我们只通过反射弧所界定的联系来标定运动反应，它实在几乎没有资格为我们提供所谓“活动”的模型。因为从你把运动成分纳入反射弧的那一刻起，它同样显得是一种被动效果，是对刺激的纯粹反应；而这反应除被动性效果之外不含任何东西。

还有一种构想方式，把反应设想为“紧张的释放”；这个说法在精神分析能量学中也很常见。这样一来，活动在这里便无非是某种感觉——广义地说就是刺激，因为我们还会让其他成分参与其中：你们知道，就是分析理论以“内部刺激”之名引入的那些成分——变得或多或少难以忍受以后出现的一段后续，乃至一次逃逸（原文以 suite / fuite 构成谐音）[注]。

> [注] 拉康借 suite（后续）与 fuite（逃逸、泄漏）的近音，把“紧张释放”的连续过程同时说成逃离刺激；这一词音关联还会在本课结尾借 futilis 的“漏”义再度出现。版本异文：本项目 Staferla 底本作 d’autres éléments que ceux que la théorie psychanalytique introduit…，可读成“不同于精神分析理论所引入者的其他成分”；ELP 校勘本与 Valas 本依速记作同位结构 d’autres éléments, ceux, vous le

> savez, que la théorie analytique introduit…。译文采用后者，并把底本异文保留在此。

因此，我们显然不能凭运动性或释放来定位行动。相反，从现在起必须追问：为什么理论过去如此、如今仍如此强烈地倾向于借它们作为支点，从中找回一个原初秩序；思想的秩序仿佛是这个秩序的衬里，由它建立、从它出发并安置起来。

显然，我之所以重提这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将要用到它。

在理论建构的层面发生的一切，无论从某个角度看起来多么悖谬，仍会让我们想到：这里有某种动机支撑着这个悖论，而从这个动机本身……

……这正是精神分析从来不会放弃的方法……我们可以从这个动机本身有所收获。

- 因此，理论有时会依托某种东西，而精神分析理论恰恰最适合认识到：相对于它不得不确立为“精神装置”地位的东西而言，这不过是一条短路；

- 不仅弗洛伊德的文本，而且整个精神分析思想，都只有在反射弧的传入成分与传出成分之间放入早期弗洛伊德著作中那个著名的 Ψ（psi）系统，才能成立；

- 然而，它仍感到有必要把重音放在这两个成分上；这显然见证了某种东西，促使我们相对于一种更广义的、关于精神装置的生理主义理论，标明精神分析理论的位置。

显然，我们在这里看到若干心理构造显现出来：它们原则上以诉诸经验为基础，并试图使用、利用这个被当作最基本模型的初始模型……

无论我们是在一个微生物整体的层面上考察它——例如变形虫层面的刺激—反应过程——还是把它当作某种同源形式，加以具体化，从而用于一种装置：在已经分化的神经装置里、在反射弧的层面上，这种装置至少会在若干有力组织着有机体之现实的点上把它集中起来。

我们必须从这个视角说明：这一参照何以仍存在于一种技术——精神分析——的层面上，而精神分析严格说来似乎最不适合诉诸它，因为精神分析所牵涉的是一个全然不同、事实上同这一参照彻底对立的维度；正是这一参照造成了关于行动究竟是什么的那种明显跛足的构想……

可以说，它在内部就无法令人满意……与此完全相反，我们面对的是我一开始曾以其显而易见的面貌唤起的行动功能的位置；我们很清楚，在精神分析中，我们感兴趣的正是它。

刚才我谈到了投入，无论是受分析者的投入还是分析家的投入。但说到底，为什么不提出“精神分析的出生文书”[注]这个问题？因为在行动的维度中，我刚才提到的那种说法所牵涉的东西立即显露出来：即在某处的铭写，以及能指这一相关项；凡是构成一项行动的东西，能指这一相关项说实在的从不缺席。

> [注] Acte de naissance 的常规法律义是“出生文书 / 出生证明”，与下文的 inscription〔铭写〕、acte notarié〔公证文书〕以及“人的存在被载入文书”相接；但 acte 又回响本课“行动 / 文书”的双义。译文以“出生文书”保住明义，并在此注明行动义。ELP 校勘本与 Valas 本均保留同一短语。

我可以一边对你们讲话，一边在这里来回走动，但这并不构成一项行动；可要是有一天，我这样做是为了跨过某道门槛，使自己置身法律之外，那一天我的运动性就会具有行动的价值。不久前，我就在这间教室里提出过这一点。在我看来，这不过是诉诸一种公认的显明秩序：关于行动所关涉之物，它具有严格说来属于语言的维度；它使我们能够令人满意地汇拢这个词从范围一端到另一端所呈现的一切歧义。正如我一开始所说，这一范围不仅包括我所谓的医疗行为，也完全可以在某些场合包括“公证文书”。

我刚才提到了“精神分析的出生文书”这个说法。为什么不呢？它就是在我的话语转到某处时这样冒出来的。不过，只要略作停留，我们同样会看到：关于精神分析自身地位的行动维度很容易就敞开了。因为说到底，既然我谈到“铭写”，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不要贴这则隐喻太近。不过，一个人的存在在他降生时被载入出生文书，而他在文书出现以前已经在那里。当我们谈“精神分析的出生文书”时，精神分析并不是一个婴儿——这个说法确有意义，因为精神分析有一天出现了——问题恰恰由此被唤起：精神分析所组织、并或多或少统辖着的这个领域，在它以前是否已经存在？谈到这样一项行动时，这个问题很值得提出；这是此一转折处必须提出的根本问题。

当然，这个领域很有可能先已存在。我们显然不会否认：在精神分析的出生文书以前，无意识就已经让人感到它的效果。但只要十分仔细地看，我们便会发现，“谁知道它？”这个问题或许并非无关紧要。

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否仅限于 ἐποχή（epoché），即唯心主义的“悬置”？唯心主义把作为表象之根基的观念当作一切认识的基础，继而追问：

“在这个表象之外，现实在哪里？”

可以完全肯定的是，我以“谁知道精神分析的这个领域？”这种形式提出的问题，同唯心主义赖以建立的虚假二律背反毫无关系。显然，这绝不是要否认现实先于认识。现实，是的；可知识呢？知识并非认识。为了让那些最没有准备去怀疑这一区别的人也受到触动，我只须提到“处世之道”（savoir-vivre）或“做事本领”（savoir-faire）。

在这里，“先前是什么情形”的问题就有了全部意义。处世之道或做事本领，可以在某个时刻诞生。

此外，倘若我一向放在语言上的重音，终于在你们某些人那里取得了它的分量，那么这里的问题显然就具有全部重量：严格说来，在人们开始动手以前，我们可以称作“对文字的操弄”——例如依照一种所谓逻辑学家的形式化——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情形？

代数发明以前的代数领域——在我们懂得操弄某种必须直呼其名的东西，即数字符号、而不只是数以前——这个问题具有它的全部分量。

我说的是数字符号，但无法在此展开。我诉诸的是我假定你们中间存在的少数人：他们在某个杂志角落或通俗读物里读得足够多，知道康托尔先生怎样向你们证明，数中的超穷维度绝不能还原为整数序列的无穷性。也就是说，无论这在你们看来多么惊人，我们总能造出一个

原则上不曾包含在该整数序列中的新数；而这一切只须以一种叫作“对角线法”的方法，对数字符号的序列作某种操作即可。

简言之，这个无疑可以控制、并且完全同任何别的秩序一样有权被称为真实的秩序，在康托尔先生的操作以前就在那里、从亘古以来等着他吗？

这个问题确有价值，而且同现实相对于其表象的先在性问题毫不相干。它是一个分量十足的问题。

这里有一种组合运算，真理的一个维度由此展开；它以最真切的方式让这样一个问题涌现：在知识诞生以前，由这种组合运算所规定的真理究竟是什么情形？正因为如此，这种组合运算的一个元素才可以前来扮演“表象的代表”的角色。

这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坚持把弗洛伊德的德语术语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 译成“表象的代表”。这不是出于个人的敏感：每当我看见“代表性的代表”这一译法在某条边注里再度冒出来时，我都有充分理由从中揭露、指出一种意图；所要追问的，恰恰是为什么精神分析领域中处于某些位置的人会支持这种制造混淆的意图。

在这一秩序中，形式之争并非徒劳，因为它们会随自身一起确立一整套严格说来正受到质疑的主体性预设。以后我们还须添上若干标定，使我们能够在这一点上辨明方向。这并非我今天的主题；正如我已经说过，今天只是要引入我将在诸位面前展开的功能。

不过，我已经指出，只须标出三个参照点……

- 其一，是“集合”这样的术语在数学理论中的功能；
- 其二，是显出它同使用历史悠久得多的“类”这一术语之间的距离和区别；
- 其三，是把它们接到一种分节关系中；这关系表明，我将要说的东西以某种分节清楚的差异嵌入其中，却又同属一个秩序。这个秩序就是“存在的主体性位置”；那其实是我在这里——乌尔姆街高等师范学校迪萨纳教室——以“关键问题”为名所作第二年教学的真正主题、秘密标题……所有这些都表明：把“对象作为 (a) 的功能”同“集合”与“类”的区分联系起来，便会使它作为主体性位置取得全部价值；到时候我们将这样做。

我在这里只是像竖立界标一样把它标出来；等我们必须再次从这里出发时，你们会重新找到这项标示，并同时找到它的意义。

因此，今天在标明问题所在以后，我要从生理主义的参照重新出发，向你们展示某种东西；它也许会极为有效地阐明我在“精神分析行动”这一术语下所指的东西。

既然我们已经如此轻易地批判了把“活动”同“运动性”等同起来的做法，也许我们就会更容易察觉这个虚假模型究竟是怎么回事。

因为人们用日常实践中的某种东西来支撑它，比如触发一次腱反射……

我想，从现在起，你们也许会更容易看出，它构成一种我们不知道为何称之为“自动”的运作，因为 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在其本质上确实关涉偶然，而反射维度所牵涉的恰好相反——不过先不谈这个……难道不明显吗：若要以理性的方式设想反射弧是怎么回事，我们只能把运动成分定位在用来触发反射的那把小锤上；至于我们所采集到的，无非是一个征象——在这里，是我们可以称作脊髓装置某一层次之完整性的征象。必须说，这一征象最具指示性的时刻，恰恰是它缺席的时候，即它揭示该装置并不完整的时候；因为关于这种完整性究竟如何，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多少。反过来，作为缺陷和损伤的征象，它却具有积极价值；正是在那里，它才取得全部价值。

某种东西之所以具有实体和意义，只因为它是在有机体运作中分离出来的，并且是根据某种我们可以称作“临床询问”——再推进一步，谁知道呢，甚至是“临床医生的欲望”——而被分离出来的；把这样的东西当作我们所谓“反射弧”，并不能给予这个整体任何特殊资格，使它成为某种被视为有生命有机体反应之根本形式、基本形式或原初还原形式的概念模型。

但我们再往前一步，转向一个比这种基本模型精细得多的东西，也就是反射在某个层面上的构想；既然我所关注的正是它，请允许我把它称作“巴甫洛夫意识形态”。这就是说，我要在这里质询它；当然不是从任何绝对批判的观点出发，而是为了让你们去看，它就精神分析位置究竟如何向我们提供了什么“启示”。

我当然无意贬低铭写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的全部工作。我也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说它出自一个“唯物主义”的建构计划——他们自己也承认

这一点——而这个计划要处理某种功能，所要还原的恰恰是可能作出的那种参照……

仿佛这里仍是一片必须作战的疆场……即对某种精神秩序中的实体的参照。

就此而言，巴甫洛夫意识形态的目标，比我刚才用反射弧指出的第一层参照——我们可以称之为“器官—动力学参照”——适配得好得多。它的目标之所以适配得更好，是因为它以征象对一种功能的掌握为秩序，而这一功能本身是围绕某种需要组织起来的。

我想，你们全都受过足够的中等教育，知道教科书用来引入它的通常模型；我们现在也要用这个模型来支撑想说的话。举例来说，人们事实上把号声同在一只动物——当然是肉食动物——面前呈上一块肉联系起来；经过若干次重复，这种联系据说会触发胃液分泌，前提是这只动物确实有胃。甚至在解除、松开这一联系以后，情形仍然如此——解除的方式当然是只保留号声。通过永久安置一根胃瘘管，很容易显出这种效果；我的意思是，可以从中收集排出的胃液……于是在若干次重复以后……只要号声响起，胃液便会分泌。

如果可以这样说，巴甫洛夫的这一“事业”，就其目标而言，我敢说是极其恰当的。

因为，当问题在于说明精神运作的高级形式如何可能时，所要奠定的显然是：某种东西对生命组织的这种掌握；而在这里，它之所以具有说明价值，恰恰因为它并不是同事情所涉及的需要相适配的刺激。

严格说来，它甚至只凭真正脱离任何可能的“享用对象”这一点，才在知觉领域中获得标记。我说“享用”（fruition），意思是“享乐”；但我不愿直接说“享乐”，因为我已经给“享乐”这个词加上某种重音，不想把它连同全部语境引入这里。Frui 是 uti 的反义词[注2]。

> [注2] Frui 来自拉丁语 fruor，uti 来自 utor。西塞罗《论诸神的本性》1, 103 中有 aliqua re uti et frui，意为“使用并享用财物”。

这里涉及的甚至不是一件供使用的对象，而是一件以生物的基本需要为基础的食欲对象。

正因为号声同任何可能引起一只狗兴趣的东西毫无关系，例如……

至少在它的食欲被眼前那块肉唤醒的领域里毫无关系……巴甫洛夫才有正当理由把号声引入实验领域。

不过，如果我说这种操作方式极其恰当，那恰恰是因为巴甫洛夫在其中显出了——如果可以这样说——自己是：

- 从一开始就是结构主义者，在实验起点上就是结构主义者；
- 而且是在“结构主义”一词出现以前的结构主义者；
- 最严格守戒的结构主义者，也就是遵守拉康戒律的结构主义者，因为他在那里所证明、并且以某种方式认为已经包含在其中的，恰好就是构成能指的这一点：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我刚才提出的东西可以这样说明：号声在这里所代表的无非是科学的主体，也就是巴甫洛夫本人。它为谁、为什么代表他？显然只是为这

样一个东西而代表他：它不是征象，而是能指；也就是胃液分泌这个征象，而这个征象恰恰只因下列事实才取得价值：

- 它并不是由人们期待会产生它的对象所产生的；
- 它是一种欺骗效果；
- 相关需要被掺假了，而胃瘘层面上发生之事所进入的维度就在于：事情所涉及的有机体在这个场合受到了欺骗。

这里确实证明了某种东西。只要看得更仔细些，当然会发现它并不限于狗：你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动物来做。如果这里要确立的并不是某种东西取得掌握的根本可能性，那么整个巴甫洛夫实验便毫无意义……

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只能被界定为能指效果……它掌握的是生命领域。它在理论上的唯一影响，就是使人能够设想：凡是有语言的地方，都完全无须到某种精神实体中寻找参照。

可如今谁还会想到这样做？这又会让谁感兴趣？不过，仍须指出巴甫洛夫实验所证明的东西：不存在任何以能指本身为对象、却不牵涉主体在场的操作。这并不完全是庸众最先会想到的东西。提供这项证明的绝不是狗，甚至对巴甫洛夫先生而言也不是狗，因为巴甫洛夫构造这个实验，恰恰是为了表明：我们完全可以不对狗在想什么作任何假设。

那个其存在得到证明的主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提供其存在之证明的——绝不是狗，而是任何人都不会怀疑的巴甫洛夫先生本人，因为

吹号的是他；是他还是某位助手都无关紧要。我曾顺带指出，这些实验所牵涉的，当然是某种可能性：它证明能指的功能及其同主体的关系。

但我又补充说，当然没有人打算由此取得任何属于改变这种动物天性的东西。我的意思里有一点颇为有趣：我们甚至没有取得这样一种变化，而我们不得不假定，当人们使这种动物进入驯养状态时，曾经发生过这一类变化；必须承认，狗并不是从地上乐园起就已经受到驯养！

因此，曾有一个时刻，人们懂得把这种野兽变成一种动物；当然不是一种具有语言的动物，但它也许是一种——在我看来，探究这个问题或许很有意思——可以说以某种方式知道我们在说话的动物；种种迹象都表明确实如此。那么，这里的“知道”一词应当取什么意义？

至少在我看来，这同建立条件反射——或者说受条件制约的反射——所提出的问题一样有趣。

更让我惊讶的是：在这些实验过程中，实验者从来没有为我们提供哪怕一点见证，让我们知道动物与实验者之间——如果可以这样说——显然必定存在的个人关系究竟如何。我不想拨动动物保护协会那根弦，但你们得承认，这毕竟很有意思；关于在动物层面可以称作“神经症”的东西，也许我们能从那里比从实践记录中多学到一点。

因为，在这些实验刺激的实践中，人们把它们推进到产生种种紊乱的程度；这些紊乱从抑制一直到失序的吠叫，并且只凭以下理由就被称作神经症：

- 第一，它是被诱发的；
- 第二，它相对于外部条件变得完全不适切——仿佛动物不是早已置身所有这些条件之外似的。无论如何，它当然没有任何资格同精神分析恰好能够界定为“在一个言说存在那里构成神经症”的东西相等同。

总之，我们看到了：正如我说过的，不仅巴甫洛夫先生在其试验的根本建制中显出自己是最守戒的结构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他所收到的回应也真正具备我们界定为“言说存在同语言的关系”之根本特征的一切，即他以颠倒的形式接收到自己的讯息。

我大约十年前就已提出的这个公式，在这里确实完全适用。因为发生了什么？起初，他把号声挂接在自己于胃器官层面建立的生理序列之后，置于次要位置；而如今，他得到了什么？一个颠倒的序列：动物的反应反过来挂接于号声而出现。

这一切对我们而言几乎没有什么奥秘；当然，这并不抹杀这类实验可能在大脑运作某些局部带来的成果及其意义。但我们感兴趣的是它的目标，以及这一目标只有以某种误认为代价才能实现；遭到误认的，正是实验在起点处的结构。这一点理应使我们警觉：这个实验作为一项行动意味着什么？

因为这个主体——在这里、这个场合就是巴甫洛夫——完全只是在自己没有察觉的情况下，以最为恰当的形式收获了一种构造的成果；而一旦涉及言说存在同语言的关系，这种构造就同强加于我们的构造完全可以等同。无论如何，这一点值得揭示出来，哪怕只是为了把它从整个操作所宣称的证明锋芒中扣除。

对于某个历史时期中被称为“科学”的一整片活动领域，这个所谓“唯物主义”的还原目标，完全值得作为它本来的样子来看待，也就是作为一种症状来看待。

“它得多么相信上帝啊！”我要这样喊道。说实在的，这话如此真实，以至于这整个所谓“唯物主义”或——就医学而言再说一次——“有机主义”的构造，深受精神权威欢迎。归根到底，这一切把我们引向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以某种方式缩减神圣领域，最终、归根结底，十分有利于把各种鱼群终于收进同一张大网。

这个明明白白铺展在你们眼前的可感事实，应当使我们在面对某种语境中同真理的关系时，仍保持某种距离：

- 如果逻辑学家——即“经院哲学家”——的种种构想，尽管在思想价值的秩序中被贬到一个叫作“中世纪”的过时年代，仍能招致极其严厉的判决；

- 如果在我们所处理的领域中，围绕某些教义要点，也就是所谓的“选择”、换言之“异端”，人们很快便会互相扼住喉咙、彼此残杀……那么，为什么要认为这些不过是所谓狂热主义的效果？

天哪，为什么非要援引这样一个层面？也许，我们只须从中得出结论：在那个时代，关于同知识之关系的某些陈述，可能同真理效果相通，并且能在主体那里引发远为敏锐的感受。

如今，我们从那些被称为——不管有理无理——“神学的”争论中，只保留下了一些我们多多少少会读的文本；很多时候，它们绝不该被称作“布满尘埃”。我们以后还须回到神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

我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是：那些争论或许曾在市场上、校门口，必要时甚至在家庭生活和性关系中，产生即时而直接的后果。

为什么这不可设想？只须引入一个不同于狂热主义的维度，例如严肃性这个维度。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对于在我们教学职能以及所谓“大学”的框架中所陈述的东西……事情总体上怎么会变成这样：如果有人说 Universitas litterarum，即文学院，分发给我们的一切……这种说法竟不会令人感到彻底震惊？

文学院仍然把持着人们高贵地称作“人文科学”的东西……它所分发的是一种经过如此调配的知识，以至于它事实上在任何情形下都不会产生任何一种后果。

确实，还有另一边：Universitas litterarum 已经不太坐得稳，因为另一个叫作理学院的东西闯了进来。我要请你们注意，在理学院这一边，事情也许并没有相距很远；这是因为科学本身的发展所采取的铭写方

式已经表明：科学进步的条件，就是对科学知识在真理层面所包含的后果一无所知、不愿知道。至于这些后果，人们任其自行发展。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那些已经完全当得起“学者”之名的人，在让他们已经看得十分清楚的某些装置、某些知识形态投入流通以前，都会再三思量。

比如我要举高斯先生为例——他毕竟相当有名——他在这方面就有过颇具先见的看法。

尽管这些东西早已写在他的私人笔记中，他却让其他数学家在大约三十年以后才把它们投入流通。在他看来，真理层面的后果或许值得纳入考量。

这一切是为了告诉你们：巴甫洛夫理论在理学院享有最高声望，那里对它的迁就——总之，对它的看重——也许正在于我所强调的这一点，严格说来，也就是它的“徒然”维度。

“徒然”（futile）是什么意思，你们也许不知道；其实我自己到某个时候以前也不知道，直到偶然在奥维德作品的某个角落遇见 futilis 一词的用法：严格说来，它意指一只会漏的容器。

“漏”——我希望已经把它充分圈定——正位于巴甫洛夫大厦的基础上；也就是说：

- 所要证明的东西根本无须证明，因为它在起点中已经被说出来了；
- 巴甫洛夫先生只是在那里表明自己是结构主义者，差别仅在于他自己并不知道；但这显然取消了此处任何可以自称证明的东西所具有的意义。

此外，所要证明的东西实际上只有极其有限的意义，因为“上帝究竟如何”这个问题藏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总而言之，只要仔细看，巴甫洛夫式运作所包含的信仰基础、认识希望和进步意识形态，全都只落在这一点上：巴甫洛夫实验所证明的各种可能性，被假定已经存在于大脑中。

在这种能指分节的语境里，通过操弄狗而取得某些效果和结果，暗示这些反应可能达到更高的复杂程度；这毫不惊人，因为正是我们把这种复杂性引了进去。

这里所牵涉的一切，都包含在我刚才着重指出的问题中：我们揭示的那些东西，在此以前是否已经在那里？凡是涉及神圣维度、乃至通常所谓精神维度的问题，全都围绕着这一点旋转：在我们发现它以前，我们假定什么已经在那里？

如果在整个领域中，把这种知识想成在我们使它涌现以前就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结果证明并不是“徒然”而是轻率的，那么这很可能使我们进行远为深刻的重新质询；而精神分析行动所要处理的正是这一点。时间迫使我只在这里标出我今天向你们所作陈述的主旨。下一

次，你们会看到我把精神分析行动同这个意识形态模型相互靠近；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模型的悖论性构成在于：一个人可以把一场实验建立在他自己深深不知道的预设之上。那么，说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一场实验得以建立的那些结构性预设而言，需要纳入运作的不只是无知这个维度；还有另一个远为根本的维度，我早已提到过它，下一次我会进一步把它引入。

第2课 · 1967年11月22日

我不能说，你们今年这样蜂拥而来没有给我造成问题……对于一种话语而言，这意味着什么？这种话语——倘若还有人怀疑，我已经重复得足够多，大家理应知道——从根本上是对精神分析家说的。

确实，我在这里向你们说话的位置，已经充分见证了某件已经发生的事；它使我相对于精神分析家们处在一个偏心位置。总的说来，多年以来，我正是在这个位置上不断质询今年选作主题的东西：精神分析行动。

显然，我上次所说的只能迎来一阵满意的低语；如果可以这样说，这就是我所听到的在场听众的普遍意见。事实上，其中有一部分人……

从人数看来，必定有些人是第一次来这里……他们尽管有人、甚至正因为有人告诉他们什么也听不懂，才来到这里。好吧，他们得到了一个惊喜！

说实在的——我曾顺带指出——像上次那样谈巴甫洛夫，确实等于向“理解感”伸出了一根竿。正如我说过，没有什么比巴甫洛夫的事业更受推崇，尤其是在文学院；而总体说来，你们正是从那一边来到我这里。这是否意味着，这种“嘉许”会以任何方式令我满足？你们猜得到：当然不会！因为说到底，这同样不是你们到这里来寻找的东西。

直截了当地说，在我看来，如果有什么可以恰当地说明这种蜂拥而来的情形，那么无论如何，它不会建立在那种我不常助长的误解上；我

刚才提到的某种期待正由此而来。这里毕竟还有某种并非误解的东西，它促使我竭尽所能，应对我所谓的这种人潮。

那就是：总体而言，来到这里的人无论程度高低，都是因为他们感到，这里正在陈述某种很可能——谁知道呢？——会带来后果的东西。

显然，如果确实如此，这种人潮就有了理由。因为我们姑且粗略地称作“学院教学”的教学，其原则恰好是：凡是触及最为灼热、甚至最具现实性的问题——例如政治——的一切，无论是什么，都要以一种不会带来后果的方式加以呈现、投入流通。

至少近些时候，在所谓发达国家，大学教学所满足的就是这一功能。

也正因为如此，那里的大学才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因为在它不满足这一功能的所谓欠发达国家里，就会出现紧张。因此，它在发达国家确实履行着自己的功能；它之所以可以容忍，是因为无论在那里说出什么，都不会造成“失序”。

当然，我们不会从失序的层面考察我在这里所说之事的后果；但听众怀疑，在某个层面——恰恰是我所面对的精神分析家这一层面——有某种东西正处于紧张之中。

精神分析行动所涉及的确实正是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要再向前一步，看看那些实践这一行动的人究竟如何；也就是那些——正是这一点界定了他们——能够作出这种行动，并且能够以某种方式将自己归入其中、像人们在其他行动类别——体育或技术——中所说的那样成为专业人士的人。

当然，一旦把这种行动当作职业，便会由此产生一个位置；人们自然会凭自己所知道、凭自己从经验中获得的东西，而在这个位置上感到有把握。不过——这正是我今年所提出之事的一个侧面、一重意义——这种行动本身的性质会造成……

这个领域——无须说，我上次连它的边缘都还没有触及……会对一个人因有能力施行这种行动而必须持守的位置，产生严重后果。

正是在这里，出现了一件奇特的事——你们会看到——即我能够让精神分析家以外的人、让非分析家设想这一行动究竟是什么，而它毕竟同他们有关。精神分析行动十分直接地关涉那些并不以此为业的人；我要说，它首先关涉的正是他们。

这里是否只须指出：如果事情确如我所教导的那样，所涉及的是主体因其同知识的关系而处的位置发生某种转换，那么我们怎能不立即承认，倘若只有某些人对这种主体的“颠覆”——我就是这样称呼它的——取得充分认识，一道真正危险的裂口就必然会形成？

主体的颠覆并不是某个人一生中这个或那个被选定的时刻；甚至可以设想，它只在这里或那里发生，乃至只发生在某个聚集点上，让所有经历过这一转折的人彼此安慰吗？

当然，主体可以在每个人那里实现；但这丝毫不影响它恰恰在结构中的地位。

因此，已经可以看出，让人听见……

不是在精神分析共同体之外，而是在同它的某种关系之中……这项关涉所有人的行动究竟是什么，只会使人们在这个共同体内部更清楚地看到：那些以这种行动为实际职业的人，希望赋予自己何种地位。

这就是我们今年从其边缘入手的进路。正如上次所见，我们先推进那项必然要求：把行动——翻阅一些著作，有时会看到它被这样呈现——同运动性区分开来。

接着，我们立即试图跨过几级台阶；这种推进绝不以一种必然证明式的步骤呈现……

它不能、尤其不愿声称，自己是通过某种深浅不一的心理学尺度来作引入……相反，我们要到围绕这一行动所作陈述的种种意外中，寻找位于不同位置的闪光，使我们得以察觉问题真正处在哪里。

所以，当我谈到巴甫洛夫时，并不是要为此寻找某种经典参照，而是要指出许多人记忆角落里已有的东西：达尔比耶兹的一部经典著作曾标出巴甫洛夫实验与弗洛伊德机制之间的汇合[注1]。

> [注1] 罗兰·达尔比耶兹：《精神分析方法与弗洛伊德学说：“巴甫洛夫与弗洛伊德”》，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1949 年。

当然，尤其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总会造成一点效果。你们难以想象……

考虑到精神分析位置背后的情形——人们感到它何其不稳……在那个所谓“当年”，也就是大约 1928 或 1930 年，一些人听说索邦大学里谈起了精神分析，曾经多么欣喜。

无论这部著作有何价值——必须说，它写得十分用心，也充满切中要害的评论——达尔比耶兹先生十分中肯地指出，巴甫洛夫的心理学、生理学同无意识机制之间并无不相容之处；然而，从这个事实中获得的那种安慰极其微弱。

为什么？就因为我上次请你们注意的事情：能指同能指的联结——我们知道它在本性上使主体化——已经由巴甫洛夫引入实验的建制本身。因此，由此建立的东西会汇合于我们在精神分析经验中发现的类似结构，丝毫不值得惊讶；因为你们已经看到，我能够把主体的决定表述为以这种能指同能指的联结为基础。

尽管如此，除去这一点，它们彼此之间当然会比各自同皮埃尔·雅内的构想更为接近；而达尔比耶兹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可是，这种靠误认其自身基础而建立的相互靠近，并不会让我们收获多少。

但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巴甫洛夫对我或多或少带着诙谐意味称作这场历险之“结构主义”牵涉的误认……

- 就它确实属于结构主义而言，完全不是诙谐说法；
- 诙谐之处在于，我把它称作“拉康式结构主义”。

我上次就停在这里，把问题悬置在周围：从某个视角看，我们可以把这里的情形称作什么？某种无知的形式吗？这够不够？不够！

我们毕竟不能……

仅仅因为一位实验者没有质询自己引入实验领域之物的性质——他这样做完全正当，只是没有进一步追究这个多少带有先决性质的问

题……就在这里引入无意识的这些功能：我们还需要某种别的东西，而说实在的，它正是我们所缺少的。

也许，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会以更易把握的方式把这个“别的东西”交给我们观看。我们不妨立刻来个粗重的例子：一位精神分析家在听众面前……

我们总得考虑任何说法是对哪一双耳朵说的……一位精神分析家提出了这样一句最近转述给我的话：

- “任何精神分析概念，只要我没有在老鼠身上验证过，我都不接受！”

即使对一双已有准备的耳朵……

当时正是这种情况。这句话是大约十五年前、一个已经相当遥远的年代说的，是对一位共同的共产党员朋友说的；十五年后，正是这位朋友把它转述给我……即使这双耳朵可能从中看出某种悔悟之类的东西，这话仍显得有些过头。

因此，这件事最近被转述给我时，我非但没有怀疑，反而当场出声遐想起来；我对那次聚会中坐在我右边的人说：“某某完全有可能说过这句话！”

我说出了他的名字——这里就不说了——就是我在《著作集》中称作“那个笨蛋”（benêt）的人。[第 335 页]

我经常向你们提到那本极好的布洛克与冯·瓦特堡词典。据它所载，benêt 是 benoît 的晚出形式，后者源自 benedictus（受祝福者）；它的

现代义是一则精妙的暗示，来自《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的这句话：“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愿他们蒙福。”

说实在的，这正是我用“笨蛋”这个名称标定此人的原因。我的对话者立即告诉我：“对，就是他对我说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只有他可能说出这种话。

我并不必然轻视一个能在精神分析理论陈述中说出如此惊人话语的人。我宁愿把这个事实看作一个结构事实；严格说来，它并不带有“心灵贫乏”这项资格。把据说为“心灵贫乏者”保留的福分归给他，倒更像是我的一种慈善举动。

我几乎可以肯定，采取这样的立场并不牵涉任何“福分”——无论好运还是厄运，无论主观还是客观。说实在的，他必定觉得自己置身于一切福祸之外，才会走到这种极端。

而且，只要翻到我《著作集》中“罗马报告”的某一页[注2]，便会看到他的情形远非独一无二。我在那里提到一位名叫马瑟曼的人；在美国，他处于阿兰所谓“大人物”的位置[注3]。这位“大人物”无疑出于同一种寻求安慰的需要，骄傲地列举了赫金斯先生的研究；当年我曾就此停留过……

> [注2] 雅克·拉康：《著作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 年，第 272 页。

> [注3] 阿兰：《公民反对权力》，第 85 页，“疏忽者与大人物”，日内瓦 Slatkine Reprints 出版社，1979 年。

那已经相当久远，恰好就是刚才所转述话语出现的年代……他骄傲地列举人们如何在一个人类受试者那里建立另一种条件反射，使其在听到“收缩”（contract）一词时，瞳孔便会有规律地收缩。

当年为了哪怕能让人听见，我不得不用整整两页篇幅来讽刺这一点……

也就是追问：如果把 contract 换成 marriage-contract（婚约）、bridge-contract（桥牌定约）、breach of contract（违约），甚至把这个词压缩到只剩第一个音节，他所假定的身体同他以为是语言之物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否还会在他看来同样稳固……这显然表明，此处存在一道值得守住的突破口，因为另一些人恰恰把它选作理解问题的关键点。说到底，此人也许会告诉我：他只能把这看成一个补充证据，支持我赋予语言在精神分析决定作用中的主导地位。因为从某些视角出发，混乱确实可以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们看到，精神分析行动可以在于质询……

首先当然必须从我们认为应当排除的东西出发……质询精神分析圈子实际上怎样构想行动，并批判这种构想可能包含的东西。

不过，“精神分析行动”这两个词的结合，也可以使我们想到某种全然不同的东西：行动如何以精神分析的方式发生作用，精神分析家在精神分析运作中把自己的活动导向何处。这样一来，我们当然就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

- 它是解释吗?
- 它是我们由此被引向的转移吗?
- 精神分析家作为操作者，其行动之所为行动的本质是什么?
- 他在这场游戏中占什么份额?

精神分析家彼此之间确实从不会不质询这些问题。感谢上帝，他们也提出了一些更为切要的命题，尽管这些命题并不单义，甚至也没有随着岁月推移而逐步进展。

还有另一件事，也就是我要说的、在精神分析中被读出的行动。对精神分析家而言，一项行动是什么？

我想，只须在这个层面上表述并提醒你们一件人人都知道、在我们时代无人不晓的事情，就足以让人听懂我的意思：人们所谓的“症状性行动”，尤其以言语口误为特征；它也出现在大体可以归入日常活动层面的那种范围中。因此，《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这个标题十分不妥，因为严格说来，问题的中心始终是行动的一面——即使涉及言语口误也是如此。

正是在这里，我曾提醒诸位注意精神分析概念基础中遗留的运动性与行动之间的歧义；这项提醒取得了它的价值。弗洛伊德显然正是由于这些理论起点，才会在这个时刻助长这一位移……

也就是在我稍后也许有时间谈到的那一章……那里所涉及的是“失误”，即他所谓的 Versehen。他提醒说，经过前面七八章以后转到这里——也就是转到行动领域——十分自然，因为如同语言一样，他说，我们在这里仍停留在运动层面。

然而，可以清楚看到，在这一章以及下一章——即偶发行动或症状性行动那一章——所涉及的始终只是我们已经设为一切行动之构成部分的维度，也就是它的能指维度。这些章节关于行动所引入的一切，无非是把行动设为能指。不过，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它相对于弗洛伊德当时引入的无意识，取得一种有意义行动的价值和分节，但并不是

因为它把自己宣示、摆放为行动；情况恰恰相反。它在那里作为活动几乎遭到抹除。正如当事人所说，那是一种用来堵住某个空当的活动；这个空当只在不去想它、不予留意时才存在。它显现在当事人的整整一部分活动中，仿佛为了占住那双被假定同一切心理关系分了心的手。

又或者，这项行动会把自己的意义放在……

恰恰是事情所针对、所要攻击和撼动的东西上……把自己的意义藏在笨拙和失败的掩护下。这就是精神分析的介入：也就是行动。

这里有一种同上次相似的翻转。上次我们谈到巴甫洛夫所谓"绝对反射"的运动面：这一运动面并不在于你们敲击一条肌腱时小腿伸展，而在于人们握着锤子去引发这个反射的地方。同样，如果行动存在于对行动的读取之中，这是否意味着这种读取只是后来添加上去的，行动只有在事后（nachträglich）被还原以后才取得价值？

你们知道，我长久以来一直强调这个词。如果不是我率先从弗洛伊德文本中抽取出来，而且说实在的，此后相当长时间内也只有我这样做，它本不会进入弗洛伊德术语表。这个词确有其价值。它也不只属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也使用它，尽管目标不同；他用它来质询存在同 Rede（言说、语言、话语）的关系。

症状性行动本身必定已经包含某种东西，至少使它准备进入这样一个通道：从我们的视角看，行动将在事后通过它实现自身的圆满。我强调这一点，而且现在就标出这一点很重要：这种行动的地位是什么？必须说，它是新的；如果给予"行动"这个词以它的完整意义——即我们出发时所取的、历来适用于行动地位的意义——它甚至闻所未闻。

然后又是什么？继这三种含义之后，还有精神分析家在自己的断言行动中所说的东西，也就是当他特别需要说明行动的这种地位对他而言究竟如何时，他所公开宣称的东西。

恰好，事情近来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

在一个名为“罗曼语精神分析家大会”的框架中……有人须从获认可的精神分析家的观点出发，就“付诸行动”与“行动化”提交报告和说明。

说到底，为什么不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在我们手边；而我也确实取用了它。

我打开其中一人的报告；他叫奥利维耶·弗卢努瓦[注4]，出自一个著名的名字，是伟大精神病学家的第三代；第一代是泰奥多尔，第二代是亨利……

> [注4] 奥利维耶·弗卢努瓦：《从症状到话语》，《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32 卷第 5—6 期，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 807—889 页；论文提交于 1967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 日举行的第 28 届罗曼语精神分析家大会。

你们知道，使泰奥多尔在精神分析传统中不朽的著名案例：那位有着奇妙名字、陷入妄想的女灵媒；他为她写了整整一本书。若这本书落到手边，你们再怎么利用都不过分；我想目前它并不常见[注5]……到了第三代，这位年轻人向我们提出某种东西。他至少选取了另一位报告人没有选的那部分领域；另一位报告人谈的是“行动化”[注6]，他则转向“行动”。人们认为——并非毫无根据——转移中存在行动，于是他围绕转移提出若干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具有命题的价值。当然，我不会给你们全文朗读，因为在如此庞大的听众面前，没有什么比朗

读更难维持。不过，为了让你们感受其语调，我取第一段，大意如下：

> [注5]　泰奥多尔·弗卢努瓦：《从印度到火星：一例伴有舌音现象的梦游症研究》，巴黎，Alcan 出版社，1900 年。

> [注6]　另一位报告人为朱利安·鲁阿尔，报告题为《行动与精神分析过程》，载同一期刊，第 891—988 页。

- “从这篇关于近期观念演变的综述中……我们始终留下某种晦暗而不能令人满意的印象——我略过几行——……可是，为什么退行会牵涉转移，也就是不再回忆、转而行动，以投射和内摄来改变分析家？为什么它不只牵涉一种退行行为？”

《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856 页。

也就是它自身的结构，对不对？换句话说，为什么它会唤起转移？

- “为什么一种使人幼儿化的情境会牵涉转移，而不只是以儿童—父母行为为模型的一种幼儿行为……”

他在这里暗指另一个层面；这个层面强调发展和发展的前因，不再强调退行本身的范畴——后者暗指精神分析中所标定的阶段——

- “……乃至重复一种冲突情境，甚至从中汲取力量。”

  “这足以让这种行为获得‘转移’这一形容吗？”（《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856 页）

我以这种语调向你们宣读这些问题，想说明什么？显然——整个后文也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一种质询转移的语调和方式；我的意思是，要十分有力地抓住问题，并尽可能彻底地质疑转移概念本身。

我自己恰好在九年以前——更准确地说，是九年又将近半年以前——就做过这件事，见我题为《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的文章。说实在的，你们可以在第三章第 602 页找到“转移现在怎样了？”这一节，以及在那里提出的那些问题。

那些问题得到的提出和展开远为广阔；而且在当时，那种方式绝对没有同类。

我的意思是，此后某种东西已经开辟出自己的道路……

我当然不是说这有赖于我的开路，而是由于时代的某种汇合……例如，一位名叫萨斯的人提出了关于转移地位的最为彻底的问题。我甚至要说，这些问题彻底到这样一种程度：说实在的，转移被视为如此听命于精神分析情境本身的地位，以至于它被直接设为那个会使精神分析受到质疑的概念。

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一位最严格守戒、在美国精神分析等级体系中地位很高的精神分析家，为了界定转移，找不到比这更好的说法——转移是分析家的一种防御方式。分析家借它同精神分析情境中取得的各种反应保持距离，因为这些反应可能显得过于直接地牵涉他、同他有关，严格说来可能属于他的责任；正是为此，精神分析锻造、发明了“转移”这个概念。分析家借此作出裁断和判断，从而在这个概念的根本基础上实质性地说：他本人丝毫没有参与上述反应，尤其不是凭自己作为分析家在场而参与；他只是能够从中指出，它们如何重拾、

再现主体过去的行为和生命阶段——主体没有回忆这些阶段，而是把它们再度行动出来。

这就是弗卢努瓦所面对的问题。无疑，他有所节制，但也给这种构想、或者说给那些自认有资格理论化精神分析的人在精神分析内部似乎被逼到的极端立场以充分位置。这个极端立场一旦引入，便会走向它的后果：我的意思是，对萨斯而言[注7]，归根到底，一切都会建立在分析家保持严格客观性的能力上。既然这无论如何都只能是一项公设，那么从这一边看来，整个精神分析便注定要受到彻底质询，注定在它介入的每一点上遭到根本怀疑。

> [注7] 托马斯·萨斯：《转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ransference”），《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44 卷第 4 辑，1963 年，第 432—443 页。

天知道，我从未把对精神分析的质疑推进得这么远，而且自有其理由。同样值得注意而又奇怪的是：在一个最执着于维持自身社会地位的圈子中，问题竟能在这个圈子内部被推进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所涉及的不下于追问精神分析本身究竟有根据还是一场幻象。如果我们没有在同一语境中同时找到所谓“信息”的基础，这会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现象；而“信息”正建立在“完全自由”的基础上。

不过别忘了，我们身处美国语境。人人都知道，无论思想自由、判断自由以及它们的一切表达形式范围多么广大，实际情形是什么：总之，什么都可以说，真正要紧的是已经稳稳确立的东西。

因此，从精神分析学会牢牢坐稳自身基础的那一刻起，人们同样可以说转移概念纯属胡扯。那不会影响任何东西。事情恰恰就是如此。

同样是在这里，我们的报告人循着另一种语调一头扎进去；转移概念从此被交给一种参照任意处置，而这个参照毕竟只能称作一则小故事。转移无疑表面上就源自这则故事，即布洛伊尔、弗洛伊德和安娜·O. 的故事；私下说来，这个故事显出的东西比人们在这里拿它来做的文章有趣得多。

而人们在这里拿它做的文章走得很远。我的意思是，人们会突出第三方关系，当然还会突出这个事实：弗洛伊德一开始就能保护自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为自己设防；他借转移这种方式得到庇护，因为正如他对未婚妻所说……

未婚妻自然也进入了这番解释，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下于我前些天所谓“精神分析的出生文书”……他会告诉未婚妻，这类事情当然只可能发生在布洛伊尔这样的人身上。

某种看似切中要害、甚至廉价大胆的风格，会走到把转移完全系于这些偶然会合的地步。甚至如一位催眠专家所宣称的，后来当同样的事件发生在弗洛伊德本人身上时，“……就在那时，女佣走了进来”。

谁知道，如果女佣没有走进来，当时会发生什么？在那里，弗洛伊德也得以重新建立第三方情境：“女佣式超我”发挥了作用，让他重新确立了事情的本来面貌。有人告诉我们——因为报告中确实这样写着——当一个女人从催眠中醒来便扑到你怀里时，自然的防御就是告诉自己：

- “可我是把她当女儿接待的。”

这种闲话和琐事，显然越来越支配我刚才所谓分析家的断言行动：一个人越是以琐事来断言自己，就越会生出敬意。不过，仍有一点颇为奇特……

无疑，这可以从许多迹象看出来；正因如此，我请你们有机会就去了解一下。这会提高下一期《法国精神分析评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的机关刊物——的销量……可以看看，这番大胆沉思同我九年前所陈述的东西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

说实在的，这个问题会永远悬而未决，因为作者没有在这些文字中提供任何见证。但几页以后，他遇到了一件事：当他谈论相关问题时——因为这是一项个人推进——他为事情赋予的语调，在于突出他高贵地称作"主体间关系"的东西。人人都知道，如果匆匆阅读《罗马报告》，可能会以为我谈的就是它。

不过，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我以外的媒介发现主体间关系的维度。当时我身边许多人都犯过一个错误、一种误读，以为我重新带回到精神分析中的，就是精神分析此前太过忽视的这种关系；一个人若由他们培养，确实完全可能把主体间经验提作在这个语境中应当重申的参照。

-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主体间语境在精神分析中具有原创性：它撑破了所谓'精神疾患'诊断的紧身衣。

这并不是说精神病理学只是一个空洞的词……在这场经验之外的个人之间进行交流时，它无疑不可或缺；但在治疗期间，它的意义就消失了。"（《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883 页）

你们看到这种语调了……但在“这并不是说精神病理学只是一个空洞的词”与“它无疑不可或缺”之间，突然冒出一段插话；我要问你们，它凭什么出现在那里？

- “说到这里，我重读拉康的一篇《著作》时，惊讶地看到他谈到‘病人’；而他首先朝向的明明是语言。”

你们马上会看到，这句话出现在我的论述中。我得说，我不知道自己在哪一篇《著作》里谈到“病人”；这确实不完全是我的说法。无论如何，我不认为这会构成反对意见，但为了寻找自己在哪里谈到病人而重新翻遍《著作集》的 950 页，我肯定想不到这样做。反倒是在第 70 页，我可以读到[注8]：

> [注8] 指《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32 卷第 886 页。

- “……欲望，是对自己所不是之物的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甚至是拉康在同一篇所引文章中借女屠夫轻快呈现的那种对不满足的欲望……”——松一口气，我们可以去查了！——（《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886 页）

旁边还有一条小注……我谈女屠夫的段落相当有名，因为那是颇为出彩的一段，人们本可期待注释指向那里。完全不是：它指向的是弗洛伊德著作中的女屠夫！

好吧，但这对我有用，因为我可以去查找的，不是你们在第 620 页会找到的女屠夫段落[注9]，而是相关的这段话：“这一理论”——我指转移的第二种理论——“近来在法国无论已经遭到何等程度的贬抑……”

> [注9] 《著作集》第 620 页，《治疗的方向》第五节：“必须逐字看待欲望”。

所涉及的是“对象关系”；正如我解释的，所指的是莫里斯·布韦……“它同发生学一样，有着高贵的起源。亚伯拉罕开辟了它的领域，而部分对象这一概念就是他的原创贡献。”

“这里不是证明其价值的地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指出它同亚伯拉罕从转移中分离出来的那个侧面的片面性之间的联系；亚伯拉罕在其晦暗中把这个侧面提升为爱的能力——仿佛这种爱的能力是病人的一种体质禀赋，可以从中读出他的可治愈程度……”（《著作集》，第 604—605 页）

后文我就略过了。因此，“病人的”这个说法记在亚伯拉罕账上。请原谅我在诸位面前展开了如此冗长的一则故事；我是为了把刚才所谓“精神分析家在其断言行动中”同我片刻前强调的症状性行动连接起来。

因为，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弗洛伊德恰好就错误——严格说来就是这一类错误——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告诉我们——而且讲得很有学问——这里涉及他在《梦的解析》中犯下的三个错误。

他明确把这些错误同一个事实联系起来：当他分析相关梦境时，他把自己解释的推进中的某种东西扣下并悬置起来；某种东西恰恰在这一点受到扣留。

你们会在第十章——关于错误的一章——看到这一点[注10]。其中明确谈到三个错误：

> [注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巴黎，Payot 小丛书，1968 年，第 233 页。

- 那个著名地点的错误：本来是马尔巴赫，他却写成马尔堡；
- 他把汉尼拔变成了哈斯德鲁巴；
- 还有某个我不记得名字的美第奇家族成员，他把此人归进了威尼斯史[注11]。

> [注11] 参见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26 年。这里所说的错误中，只有两项取自《梦的解析》，并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受到分析：一是马尔堡 / 马尔巴赫（第 389 页）——席勒出生地并非马尔堡而是马尔巴赫；弗洛伊德说，任何德国中学生都知道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这是作为另一处有意篡改之对价而潜入梦中的错误；二是哈斯德鲁巴 / 哈米尔卡·巴尔卡（第 175 页）——第一版误写为哈斯德鲁巴。拉康在这里自己也犯了错误：弗洛伊德提到的不是汉尼拔，而是汉尼拔之父；他把父亲哈米尔卡·巴尔卡误写成其兄弟哈斯德鲁巴。该章所谈的第三项错误是宙斯 / 克洛诺斯 / 乌拉诺斯，同样涉及代际关系。

确实奇特的是，每当他扣下了某种真理时，他就会被引向犯下一个错误。就在提到那位漂亮的女屠夫以后出现这种情形，尤其值得注意；因为紧接着的一小段这样写道，使这一参照很难避免：

- “想要拥有他者所有的东西，以便成为自己所不是的东西；想要成为他者所是的东西，以便拥有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甚至想要不再拥有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等等。

也就是说，这几乎直接摘自我恰恰围绕《治疗的方向》所写的有关阳具功能的文字；必须说，它略有扩充，而这种扩充并没有使它变得更好。

这是否触及了一个奇特事实：人们通过这个明显的错误向我表示了感谢——如果不是通过无法压抑地提及我的名字……

即使人们把它归到某种难以理解的失足之下，说一个把语言放在一切之先的人竟然会这样，诸如此类……这里是否仍有某种东西迫使我们质询？

质询什么？质询这个事实：面对精神分析的某种分析方式、某一领域，一个人即使明确依托我所提出的东西，也只能以否认它为条件才能这样做——我要说，必须一边依托，一边否认。

仅凭这一点，难道不已经提出一个问题吗？它无非是这个整体问题：一种连贯组织——目前正是这种组织统治着处理精神分析的共同体——给予精神分析行动什么地位？作出这项评论，让一种机制在一个肯定并非无意识的层面上显现出来——弗洛伊德正是相对于行动突出这种机制；我不会说它最具特异性，但它确实属于精神分析所引入的行动新维度——进行这种相互靠近，并由此提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项行动：我的行动。

我只请求你们原谅：为了结束这项行动，我花费了一段在你们看来也许过长的时间。但我想在这里引入的东西，恰恰很难在如此庞大的听众面前引入，因为话语可能以千百种错位的方式产生回响。不过，我不愿让自己想引入的概念发生错位。无疑，我还须重新谈它；你们马上会看到它的重要性。

我早就以自己惯用的这些关键词，预告过它有一天会到来：《愚蠢颂》。我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项计划、这部可能的作品，并说在我们的时代，它很可能取得真正惊人的成功。还有一件事同样令人惊讶：在每个人——医生、药剂师或牙医——的书架上，伊拉斯谟的《愚人颂》至今仍然存在[注12]，尽管——天知道——它已经不再触及我们。《愚蠢颂》无疑会是一项更为精细的事业，因为说实在的，“愚蠢”（connerie）究竟是什么？

> [注12]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愚人颂》，Actes Sud 出版社，Babel 丛书，2001 年。该书希腊文题名为 Mōrias Enkōmion（Μωρίας Εγκώμιον），拉丁文题名为 Stultitiae Laus；1509 年，伊拉斯谟寄居托马斯·莫尔在巴克勒斯伯里的宅邸时，仅用一周写成，1511 年首次印行。作品献给托马斯·莫尔，原题因而兼有“愚人颂”与“莫尔颂”的双关。伊拉斯谟猛烈抨击当时的权贵，凭借位高权重的朋友并藏身于一副面具之后才逃过火刑；这副面具就是“愚蠢”本身，他以拟人法让它用第一人称说话。另参见《著作集》《弗洛伊德之物》第 409 页：“我，真理，我说话。”

如果我在向精神分析行动迈出关键一步时引入它，是为了指出：它不是一个概念——要说它是什么很难——而像是一个结；许多东西围绕这个结建立起来，各种权力也围绕它得到委派。它无疑具有层次，不能被看作简单之物。可以说，达到某种成熟程度以后，它不止值得尊敬。它也许不是最配得到尊敬的东西，却无疑是收获尊敬最多的东西。

我要说，这种尊敬属于一种特殊功能；它完全同我们必须在这里突出的一种“去认识”（déconnaissance）功能相关。请允许我略作文字游

戏，提醒你们：人们会说“他在犯蠢”（il déconnait）。这里难道不藏着一个隐秘语素吗？[注]

> [注] 拉康把自造词 déconnaissance 同 déconnait 的声音叠合起来：前者从 connaissance（认识）中拆出一种“去认识”，后者则是 déconner（犯蠢、胡扯）的未完成过去时。下文围绕时态、无人称结构与 connerie 展开这组双关。

会不会只有把它当作现在时来取，“愚蠢”牢固确立的地位才会涌现？人们总以为那是未完成过去时，例如“他当时正大犯其蠢”。但说实在的，这个说法同“我说谎”一样，在现在时使用时总会遇到障碍。无论如何，很难不看到：相关“愚蠢”的地位建立在“他在犯蠢”之上，却并不只覆盖这个动词所包含的主体。

在这种进路中，存在某种我说不清的、不及物而又中性的意味，像“下雨了”那样；上述语素的全部意义正来自这里。

重要的是：它究竟“犯蠢”出了什么？好吧，我所谓“愚蠢的真正维度”正是由此区分出来。

它“犯蠢”出来的，正是某种说实在的配得上这个词、配被称作“愚蠢”的东西。愚蠢的真正维度，必须被把握为精神分析行动所面对的东西。

因为只要仔细查看，特别是查看弗洛伊德归在“失误”以及“偶发行动与症状性行动”名下的那些章节，便会发现其中每一项行动都以一种高度纯粹性彼此区别。

不过，请看那个著名故事：一个人在某扇门前掏出钥匙，而这把钥匙恰好不合适。我们来取琼斯所谈的案例[注13]。由于弗洛伊德已经显明

这件小小行动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琼斯便向我们讲了一个最后归结为“我真希望在这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的故事。

> [注13] 欧内斯特·琼斯：《精神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巴黎，Payot 出版社，1969 年，第 63—64 页：“使用钥匙是这类事实的丰富来源。我举两个例子。在家中，我因必须去医院处理一件例行工作而从全神贯注的工作中分心时，常会发现自己正试图用书桌钥匙打开实验室的门，尽管两把钥匙毫不相像。这个错误无意识地表达了我宁愿待在家里而不是别处的愿望。几年前，我在一个机构担任下级职务，那里的大门总是锁着，必须按铃请人开门。我几次发现自己试图用家门钥匙去开那扇门。机构的每一位正式同事——我希望自己也成为其中一员——都有一把专用钥匙，可以免去等候开门的麻烦。我的错误表达了我想同其他人受到平等对待的愿望，也就是想被当作自己人。”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第 175 页重述钥匙事件时，也引用了琼斯的这两个例子。

十行以后，我们来到另一个解释同一行为的故事结尾：“待在家里会更好。”

这毕竟不是一回事！

一边是准确标出钥匙使用中的口误功能和失败功能，另一边是飘忽而含混的解释；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提示……

只要考察汇集在这一领域中的另外千百个事实，你们很容易重新找到这一提示，尤其是弗洛伊德为我们搜集的最初二十五或三十个事实……行动向我们传递的东西，以一种能指方式为我们勾勒出某种事物；要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它，可以说它“并没有那么蠢”。这正是那两章令人着迷的意义。可是，一切试图以解释性限定去适配它的东西，都已经代表了某种“去认识”，代表了一种坠落，并唤起——必须说，此处不止一个案例都彻底如此——某种只能被感受为愚蠢的东西。

即使行动中有某种东西……对此我们毫不怀疑，因为当症状性行动中原创性的东西在此涌现时，毫无疑问那里有一道开口、一线光亮，有某种奔涌而入、此后很久都不会再封闭的东西。这个讯息具有何种性质？弗洛伊德向我们强调，它同时是：

- 他不知道自己把它给予了自己；
- 可他又坚持不让它被人知道。

这个奇特领域归根到底窝藏着什么，使它似乎只有从自身层面跌落，才能在精神分析行动中被重新接过？正因如此，今天离开诸位以前，我想引入这个滑溜而棘手的词。面对如此广泛的社会语境，它确实不容易操弄，因为法语中这个奇特词语 con 带有辱骂、侮辱和贬抑色彩；顺便说一句，无论在《利特雷词典》还是《罗贝尔词典》中都找不到它，只有布洛克与冯·瓦特堡词典——仍应向它致敬——给出其词源：拉丁语 cunnus（女阴）。

……这个 con（蠢货 / 女阴）在我们的语言和交往中如此根本；若要展开这个词在法语中如何运作，这恰恰是结构主义应当凭词与物之间的联结来分节说明的场合。

但该怎么办？难道要在这里引入某种“十八岁以下禁止”的规定——除非该禁止的是四十岁以上的人！然而，问题正是这个。有一个人的言语保留在一本书中，而这本书以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著称——我想，

从来没有人作过这项评论——即全然没有愚蠢；这本书就是《福音书》。他说过：

-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注14]

> [注14] 《新约》：《马太福音》22:21，《马可福音》12:17，《路加福音》20:25。

当然，请注意，从来没有人发现，说“把上帝投入游戏的东西归还给上帝”是何等惊人的话。不过这不重要！对精神分析家而言，法则不同。它是：

- “真理的归真理，愚蠢的归愚蠢。”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二者彼此重叠；如果这里存在精神分析特有的一个维度，那么与其说它是“愚蠢的真理”，不如说是“真理的愚蠢”。我的意思是，除去我们能够把真理消毒——也就是去性化——的那些情形……

也就是像在逻辑中那样，只让真理成为一个同 F（假）对立运作的 V（真）值……凡是真理掌握着别的东西、尤其掌握着我们作为言说存在的功能时，真理都会因某种东西的作用而陷入困境；这个东西位于我在此称作“愚蠢”之物的中心，意思如下……

下一次我会向你们表明，弗洛伊德在同一章里也说了这一点，尽管人人都把它漏过去了：

- 可以说，给相关属性以其范畴的那个器官，恰好被我所谓“对享乐的一种特殊不适切”所标记；

- 正是由此，事情所涉及的东西才获得凸显：性行动不可还原为任何真实实现；

- 精神分析行动所处理的正是这一点，因为精神分析行动当然在另一个层面上得到分节；而在这个层面上，某种东西回应着真理接近性领域时所经受的这一缺陷。我们必须质询的，正是这个东西的地位。

为了向你们提示问题所在，我举一个例子。一天，我从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口中听到下面这则轶事；人们完全有权称他为“蠢货”。他遭遇了一场不幸：他约了一位年轻姑娘，对方却像把煎饼一翻那样把他甩了。

- “我完全明白了，”他对我说，“这又是一个‘不予受理的女人’（une femme de non-recevoir）。”[注]

> [注] 他误把法律用语 fin de non-recevoir（不予受理的抗辩；也指断然拒绝）听成 femme de non-recevoir（不予受理的女人），以 femme 替换了近音的 fin。

他就是这样称呼它的。这可爱的愚蠢究竟是什么？因为他说这话时全心全意，毫不作伪。

他听见三个词接连出现，便把它们拿来应用。但请假定他是故意这样说的，那就会成为一个机智语，一个 Witz！

说实在的，仅仅因为我把这件事转述给你们、把它带入大他者的领域，它事实上就成了一则机智语。

这对所有人都很滑稽，唯独对他说话时的他本人以及同他面对面听到这句话的人不滑稽。但一旦把它讲述出来，就趣味横生。因此，若以为蠢货没有机智，那就大错特错了；即使这个维度是通过对大他者的参照才添加上去的，也仍然如此。

总而言之，面对这则有趣小故事，我们的位置，恰好就是每当我们试图把自己作为一个维度所把握的东西赋予形式时，总会面对的位置；这个维度并不处在无意识中发生的一切层面，而严格说来属于精神分析行动。

今天，我只是想引入这个显然十分棘手的领域；你们已经看到了。

不过，你们会看到，它很有用。

第3课 · 1967年11月29日

1960 年发表的一篇论“反转移”的文章开头，一位出色的精神分析家——今天我们会给他一定篇幅的 D. W. 温尼科特医生[注1]——写道，“反转移”这个词应当恢复其最初用法；为了同它形成对照，他提到了 self（自身）这个词。

> [注1] D. W. 温尼科特：《反转移》（“Counter-transference”），《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第 33 卷，1960 年；法译收于《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巴黎，Payot 出版社，1980 年，第 229 页。

“像 self 这样的词，”他说——这里我必须使用英语——“naturally knows more than we do：自然知道得比我们所能知道、或者比我们实际知道的更多。它是一个 uses us and can command us 的词：可以说，它会使用我们，也能命令我们。”[注2]

> [注2] 同上，第 229 页：“我认为，现在应该恢复‘反转移’一词与其最初用法相符的使用方式。我们当然可以随意使用词语，尤其是像‘反转移’这样的人工词；但 self 这样的词却不同，它凭自身性质超出我们的认识，可以使用我们并成为我们的主人。反过来，我们能够使‘反转移’一词服从我们；通览科学文献后，我完全有理由认为，它正面临丧失真正意义的危险。”

天哪，从一位并不以特别诉诸语言而著称的作者笔下看到这项评论，确有其意义——你们马上会看到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笔颇为辛辣；等我今天把这位作者的某些内容摆到你们面前，它还会显得更辛辣。

不过，对你们来说，这句话之所以获得价值，还因为——不论你们是否有所察觉——你们已经被纳入一种话语，而你们中的许多人显然无法看到它的全貌。我的意思是，我今年提出的内容只有凭此前发生的

一切才产生效果；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此刻才开始接触它，这并不使你们较少受其效果支配。奇怪之处在于——你们也许会觉得我略微坚持这一点——这番话语并非直接对你们说的。它对谁说？天哪，我每次都重复：对精神分析家说；而且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他们说，以至于必须承认，它从某种“无位置”（atopie）出发——那是我自己的无位置，因而必须说明它的理由。

恰恰是这些理由，将在这里——我是说今天——得到更强的强调。可以说，围绕“精神分析的对象”存在一套修辞；我要主张，它同精神分析的某种教学方式相关，而这正是现有学会的教学方式。这种联系也许不会立即显现——事实上，它为什么非得立即显现？——只要经过某种探究，我们能够感到它的必然性就够了。

我们就从这里出发：取一种规范性知识的例子，看看什么是有用的行为，并连同它可以向“普遍的善”和“个别的善”延伸的一切。我将选取一个样本；它价值如何姑且不论，但它会凭自己的典型性而有价值，因为它出自一位知名作者之手。

只要你们对精神分析方法略有入门，哪怕只是大致知道它所做的是：以每周数次会谈的频率，连续数周、数月地说话，并且以一种特殊而极为松脱的方式说话；这发生在恰恰抽离了任何以规范和有用为参照之目标的条件中——我们也许还会回到这一点——总之，它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摆脱这些参照，使得在重新回到它们以前所走的回路尽可能宽广。

我想，我所选的引文恰好位于原处，也就是一篇文章的开头；这篇文章由其作者在 1955 年发表[注3]，并明确质疑了“生殖器性格”概念。

> [注3] 奥托 · 费尼切尔：《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纽约，Norton and Co 出版社，1945 年，第 496 页；法译《神经症的精神分析理论》第二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3 年，第 595 页。

为了提出一项今天无须由我展开的批判，他大致从下面这段话出发。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风格。这一段出自经典作者费尼切尔先生；而且，正如文章作者本人明确说明的，费尼切尔属于精神分析机构教学的基础：“正常的生殖器性格是一种理想概念，”他自己说道，“不过可以肯定，生殖器优先地位的完成意味着性格形成中的决定性进展。能够通过生殖器性高潮获得充分满足，使性欲的生理调节成为可能，从而终止本能能量的阻塞，也就是筑障和围堵，以及它们给人的行为带来的不幸效果。它也有助于爱的充分发展（括号里还加上‘以及恨’），也就是克服矛盾情感。此外，释放大量兴奋的能力意味着反应形成的终止，并提高升华能力。俄狄浦斯情结以及源自童年的无意识罪疚感，现在可以在情感上真正得到克服。情感不再被保留在储备中，而能由自我加以利用；它们构成完整人格中和谐的一部分。无须再防备那些仍在无意识中发号施令的前生殖器冲动；把它们纳入整个人格——我照文本这样说——……以性格特征或升华冲力的形式纳入，变得可能。不过，在神经症性格中，前生殖器冲动仍保留其性性质，扰乱同对象的理性关系——神经症者就是这样——而在正常性格中，它们作为部分成分服务于生殖器区优先地位之下的前快感或预备快感目标；但凡它们所占比例更大，就会得到升华，并从属于自我和 the reasonableness，即合理性……”

我想，reasonableness 无法另作翻译[注4]。我不知道这幅如此迷人的图景给你们什么感受，它是否诱人。无论是分析家还是别的人，只要对他人和自己稍有经验，我都不相信他能有一刻认真看待这则奇怪的幼稚故事。严格说来，它是虚假的，同现实和经验的教导完全相反。

> [注4] 拉康在这里给出的是自己对费尼切尔原文的译法。上述法译本将这段话译为："正常的'生殖器'性格是一种理想概念。不过可以肯定，达到生殖器优先地位构成性格形成中的决定性进步。通过性高潮获得完全满足的可能性，使性欲得到生理调节，并终止本能能量的压抑及其对行为的不良影响。它也使爱（以及恨）得以充分发展，即使矛盾情感得到克服。此外，兴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退，反应形成因而停止，升华能力则增强。俄狄浦斯情结与童年时期无意识的罪疚感真正得到清算。情感不再受压抑，而由自我加以利用，构成人格中和谐的一部分。仍然活跃的前生殖器冲动不再需要受到压抑；它们可以以升华特征的形式整合进完整人格。在神经症性格中，前生殖器冲动仍被性化，扰乱同对象的理性关系；在正常人那里，它们一部分服务于预备快感，却仍受生殖器性支配。它们几乎全部得到升华，并整合进一个合理的自我。"

我自己也曾在前些天提到的《治疗的方向》一文中，对另一语境下、以一种文学上更为粗俗的形式提出的类似东西加以嘲讽。

在某个时期——恰好就是大约 1958 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期——人们谈论"对象关系的优先地位"以及它达到的完美程度时所用的语调，还有据说达到这一顶峰状态以后流露的内心喜悦，严格说来都很可笑。无论当时这些话出自谁的笔下，说实在的，甚至都不值得在这里重新提起。

奇特之处在于追问：这样的陈述怎么还能保持某种面貌？我不会说是严肃的面貌——事实上，没有人真把它们当真——但可以说，它们似乎回应着某种必要性；这项必要性关涉……

正如人们所说——我得说，是在刚才引文的开头这样说的……某种理想点；这个理想点至少具有一种功效，即以否定形式代表其他各种状态通常会带来的一切弊害均告缺席。就观念本身而言，我们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理由。

这一点自然值得指出，因为我们能够由此把握其根本机制：精神分析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召唤——我说什么呢，甚至受到强迫——为了那些被滥称为教学的目的，持守一种话语；而这番话语总的说来同其经验以最尖锐、最日常的方式向他提出的问题毫无关系。

说实在的，这件事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它可以使人看出：例如，一番话语以若干陈词滥调装饰自身——这样说仍远没有把问题说尽——可它在精神分析语境中消除这些陈词滥调时，仍在某种程度上不起作用；至于教学组织，情况就更是如此。

当然，已经没有人再相信若干旧说，也没有人真能安处于某种经典风格之中；但归根到底，在许多要点、许多应用层面上，这仍然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的意思是，人们同样可以看到，我的话语直接被拿去……

我是说，它的某些形式、某些句子、陈述，甚至转折……被拿进一个根本上几乎没有改变的语境。

相当久以前，我曾问过一个人；在后来较近的一段时期，也有人看见他在这里频繁出席，勤勉追随我试图整理的内容。我曾问他：

- “说到底，考虑到您总体的立场，来听我的讲座能为您带来什么好处？”

天哪！那是一个心里明白——我是说，十分清楚自己话中之意——的人所露出的微笑。

- “没有人，”他回答我，“像这样谈论精神分析。”

当然，多亏了这一点，他获得了材料和选择，可以把若干饰物和小花加进自己的话语；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某些时候，把某种东西彻底归结为……

他假定为某种心理惰性之构成部分的倾向……他把精神分析会谈本身的地位和安排——我是指它的性质，也包括它的目的——彻底归结为一种返回。据说，这种返回由最为自然的倾向和滑移造成，回到那种融合，或者某种在本性上属于融合的东西；这里指的是被假定在起源处存在于孩子与母亲身体之间的所谓融合。

而我那个著名的“它在说话”，据说正发生在这种图形、这种根本图式之内。

你们清楚看到，把一番话语从其语境中切断以后，可以怎样利用它。

天知道，当我就无意识说“它在说话”时，绝对从来不是指所谓“受分析者的话语”——这种说法并不恰当，最好说“分析者”；以后我们还会回到这一点。

可是，除了有意滥用我的话语以外，谁会假定规则的应用本身含有任何属于“它在说话”的东西，会以任何方式暗示或召唤它？

至少你们看到了：如果用母腹的凹形来代表分析家诊室里发生的事情确实有根据，那么我就有幸继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尔之后，再度创造神经性怀孕的奇迹[注5]。

> [注5]　欧内斯特·琼斯在《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与工作》第一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8 年）中转述弗洛伊德关于布洛伊尔中断安娜·O. 治疗的说法。安娜·O. 本名贝尔塔·帕彭海姆；据《癔症研究》，治疗结束于 1882 年 6 月 7 日。相传布洛伊尔宣布终止治疗以后，安娜·O. 出现一次癔症性分娩。弗洛伊德 1883 年 10 月 31 日致玛莎·伯奈斯的信据说证实了这则叙述；同年 11 月 11 日，他又写道，这种事只有布洛伊尔才会遇到。

我会在另一个层面再造这个奇迹，不过是在精神分析家身上！这是否意味着我在分析分析家？

说到底，人们完全可以这样说，而且这很诱人；总会有些小聪明人找到这种概括情势的漂亮公式。感谢上帝，我已经提前在这条路上竖起一道屏障：我想自己曾在某处写过——不知道是否已经发表——当时是在重申某件事……

那是我为去年 1966—1967 年《幻想的逻辑》研讨班所作的一篇简短总结……重申下面两个公式：

- 在我的语言中，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这里的“大他者”以大写 A 书写；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大他者的大他者：担保缺失与空集重写

- 为了回应我在圣安娜研讨班中听见的一句旧日低语，我很遗憾地说，不存在“关于真理的真话”[注6]。

> [注6] 拉康在《科学与真理》（《著作集》第 867 页）中提到这句“圣安娜的低语”。他在那里回顾听众如何接收《弗洛伊德之物》（《著作集》第 401—436 页；亦参见 1966 年 12 月 1 日《精神分析的对象》研讨班），尤其回顾自己借声说出那句令人难以忍受的话——“我，真理，我说话”（第 409 页）——时所引发的误解。题为“物自己说话”的这段话（其中可认出本课上文的“它在说话”）并未被当作它本来的修辞，即拟人法来接收。拉康用一位听众令人动容的话衡量误解之深：“为什么，”有人这样转述，而且这个主题至今仍在流传，“为什么他不说关于真理的真话？”

同样，我们绝不应设想“转移的转移”这一维度；这意味着，转移本身的地位不可能受到任何转移性还原，也不可能由精神分析重新接过。

考虑到今年坐满这间教室的人数，当我提出这样的公式时总有点为难，因为其中可能有些人完全不知道转移是什么。说到底，这是最常见的情形，尤其当他们已经听说过转移时更是如此。你们会在我今天后面的论述中看到，应当怎样看待它。

不过，我们先在这里标出一点——我上次已经提出：转移概念的位置，其本质在于这个概念允许分析家做什么。甚至正如我上次所说，有些分析家认为自己应当为转移概念辩护——天哪，以什么为名？

——他们以某种在自己看来非常脆弱、深受威胁的东西为名，也就是以一种在客体化可能性上的优越性、客体化能力，或者卓越的客观性为名；据说分析家已经获得这种客观性，因而在一个表面上属于当下的情境中，有权把它联系到另一些能够解释它的情境，并认为当前情境只是在再现那些情境，同时带上这当中所包含的虚幻或幻觉意味。天哪，这种辩护何其徒劳。

我已经说过，这个问题看似势所必然；提出这种质询和批判的人，看起来甚至带着某种严谨维度。然而，它纯属多余而徒劳，理由很简单：对转移本身的操弄，即转移维度，是同我今年正以“精神分析行动”之名试图向你们阐明的东西严格连贯的第一阶段。

在我所谓的转移操弄之外，不存在精神分析行动。

需要理解的，并不是凭某种为转移之客观性奠基的参照来赋予它正当性，而是要看见：没有这种参照，就没有精神分析行动。当然，这样陈述并没有消除所有反对意见；但正因为这种陈述严格说来尚未指出构成转移本质的东西，我们才必须进一步推进。

我们被迫这样做、我不得不在诸位面前这样做，这至少暗示：如果我提出的东西正确，那么精神分析行动恰好是精神分析家自己阐明得最少的东西；不止如此，它还是遭到或多或少彻底回避的东西。

为什么不呢？无论如何，为什么不追问：情形之所以如此，是否因为这种行动只能被回避？说到底，为什么不可能？在弗洛伊德以及他对《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质询以前，不就是这样吗？如今我们习惯以症状性行动、失败行动[注]之名谈论它们，连我们有限的理解力也

能掌握；可那时谁想到过——甚至现在谁真正想到——赋予它们“行动”一词的完整意义？

> [注] Acte manqué 通常也译“失误行动”；但本研讨班反复利用 acte 与 manqué 的字面张力，并紧接着说它以“失败”为掩护、又在失败时最为成功。全卷统一译“失败行动”，以保留这一悖论；米勒定本最后一课的公开节选也显示该术语在全卷论证中的延续。

相关知识卡 失败行动：行动在失败中成功

尽管弗洛伊德明确说过，所谓“失败”只是一层掩护，严格说来的行动就藏在它后面，这仍然无济于事：人们继续从症状性失败来理解它们，而不试图给予“行动”这个词更完整的意义。

相关知识卡 失败行动：行动在失败中成功

那么，精神分析行动为什么不会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能够对它说出更进一步的东西，这无疑可以给我们启发。无论如何，如果——正如涉及行动时可能发生的那样——它尤其完全令人无法承受，那么它很可能只能被省略。

相对于什么而言无法承受？这里不是说某种主观上无法承受的东西，至少我没有这样暗示。为什么它不能以通常行动应有的方式令人无法承受，即在某些后果上令人无法承受？

你们看到，我在一点一点地靠近。可以说，我不能一开始就用公开标示的措辞讲这些事——这绝不是说我有时不这样做，而是因为这里的材料十分微妙，首先必须避免的是误解。

你们也许会对我说，精神分析行动的这种后果理应众所周知，理应从训练分析中得知；可我现在谈的是精神分析家的行动。在训练分析

中，那个像人们所说的“使自己服从分析”的主体，并不承担精神分析行动的那一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能怀疑训练分析中所发生之事会为分析家带来什么结果。

然而，到目前为止，事情的安排就是要向他彻底遮蔽：从精神分析家一边看，训练分析的终结究竟是什么。这个遮蔽同我刚才所谓精神分析学会的组织有根本联系。它本可以是一种细腻的羞怯，是把每样东西留在原位的文雅方式，是远东式极端礼仪的最高精致……实际却完全不是如此。我的意思是，我们不应从这个角度看待它，而应看它反过来给训练分析本身造成什么。也就是说，恰恰由于我刚才分节说明的这种关系、这种分隔，同样的全面遮蔽也落在训练分析的终结究竟是什么之上。

关于训练分析，人们毕竟写过若干不能令人满意、也不完整的东西。

关于分析的终止，人们也写过一些因其缺陷而很有教益的东西；但关于训练分析的终结——就“终结”一词的一切意义而言——可能是什么，迄今从未有人成功地白纸黑字写下哪怕任何东西。我不是说从未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是说根本什么都没有写，无论肯定还是否定。我在这里只把“二者是否有关”这个问题留作开放。这个事实，同人们同样从未就精神分析行动究竟是什么作出任何分节说明，有着最紧密的关系。

我再说一次，如果精神分析行动恰好就是精神分析家似乎以最猛烈的误认来反对的东西，那么这并不太是由于某种主观上的不相容……

即分析家的位置在主观上无法持守；这当然可以得到暗示，弗洛伊德也没有不作这种暗示……我要说，问题更多在于：一旦接受行动这一

视角，分析家会怎样估量自己在分析的后续中、严格说来在知识秩序中所收获的东西。

说到底，我这里的听众中似乎有一定比例的哲学家——尽管近两三次以来我已经不太辨认得出来——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太怪罪我……

即使在圣安娜，我也曾获得宽容，而且宽容到这样的程度：有一次，我花了整整一个季度、甚至更久谈论柏拉图的《会饮》，恰好是在谈转移——1960—1961 年《转移》研讨班……那么今天，我要请至少其中一些感兴趣的人打开一篇名为《美诺》的对话[注7]。从前，在我曾经参与创立的一个小组中，我亲爱的朋友亚历山大·柯瓦雷[注8]曾赏光慷慨前来，为我们讲解《美诺》。这件事没有延续很久；我的心理学家同事们在第二年年底对我说："今年这样就够了，现在到此为止！"

[注7] 柏拉图：《美诺》，Belles Lettres 出版社，1985 年；或《柏拉图全集》，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0 年，第 513 页；或 Flammarion 出版社《柏拉图全集》，2011 年。

[注8] 在 1954—1955 年《弗洛伊德理论与精神分析技术中的自我》研讨班第一讲（11 月 17 日）中，拉康评论《美诺》时，参照了亚历山大·柯瓦雷前一天在"星期二特别讲座"小组所作的报告。

"不，不，不！我们都是严肃的人，不靠这种水来取暖。"

天哪，我向你们保证，稍微读一读、重新打开它，你们不会有任何损失。为了抓住你们的注意，我找到依亨利・艾蒂安编号的 85d 节；我们来看：

- Οὐκοῦν οὐδενὸς διδάξαντος ἀλλ᾽ ἐρωτήσαντος ἐπιστήσεται, ἀναλαβὼν αὐτὸς ἐξ αὑτοῦ τὴν ἐπιστήμην

“因此，无须任何教师教导，只凭简单的询问，他就会知道；他会凭自己、从自身之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知识。”

下一句回应是：

- Τὸ δὲ ἀναλαμβάνειν αὐτὸν ἐν αὑτῷ ἐπιστήμην οὐκ ἀναμιμνῄσκεσθαί ἐστιν [⋯]

- Ἆρ᾽ οὖν οὐ τὴν ἐπιστήμην, ἣν νῦν οὗτος ἔχει, ἤτοι ἔλαβέν ποτε ἢ ἀεὶ εἶχεν

“可是，凭自己、在自身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知识，不正是回忆起来吗？……”

“他现在拥有的这份知识，不是必定在某个时刻获得过，就是始终已经拥有，不是吗？”

毕竟，对分析家而言，以这种措辞提出问题，难道不会让人感到：这里有某种东西——我是说，就这篇文本的说法而言——并非极其超自然地适用于我们，而且终究是为了让我们想起某件事情？事实上，这是一篇论德性的对话。

把它称为“德性”并不比别的叫法更坏；几个世纪以来，对许多人而言，这个词以及与它相似的词已经激起不同回响。可以肯定，“德性”如今的回响同《美诺》所说的 ἀρετή（ areté）并不完全一样，因为 ἀρετή 更偏向“对善的追求”，这里的善是人们所谓有利而有用的善。这恰好使我们察觉：我们自己也绕了一圈，又回到了这里。

令人惊讶的是，它并非同经过这番漫长绕行以后，终于在边沁的话语中得到表述的东西毫无关系[注9]。我过去、甚至相当久以前已经提到过功利主义；当时我用一整年时间承担并陈述某种名为《精神分析伦理学》的东西。如果我没记错，那是 1958—1959 年——除非并非如此，实际上是 1959—1960 年——下一年则是《转移》。

> [注9] 杰里米·边沁：《立法与政治经济学原理》（英文原著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823 年），巴黎，1848 年。

Sainte- Anne		E.N.S. ULM		
		XI	1964	Les quatre concepts ...
I	1953-54 Les écrits techniques de Freud	XII	1964-65	Problèmes cruciaux...
II	1954-55 Le Moi dans la théorie de Freud			
III	1955-56 Les Psychoses	XIII	1965-66	L'objet de la psychanalyse
IV	1956-57 La relation d'objet			
V	1957-58 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	XIV	1966-67	La logique du fantasme
VI	1958-59 Le désir et son interprétation			
VII	1959-60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XV**	**1967-68**	**L'acte psychanalytique**
VIII	1960-61 **Le transfert...**			
IX	1961-62 L'identification			
X	1962-63 L'angoisse			
	Les noms du père : 20 Novembre 1963			

我在这里讲话已有四年；这四年中的每一年，都可以同我此前教学中的两年逐一对应——而且按年份顺序对应。因此，来到这第四年，我

们就抵达某种同先前研讨班第七、第八年相应的东西；它以某种方式呼应伦理学那一年。这一点清楚显现在“精神分析行动”这个陈述本身，也显现在精神分析行动同转移运作具有根本而本质的联系这一点上。

这至少会让某些人从我的一种推进方式中辨明方向。

所以，这里涉及 ἀρετή（areté）；这种 ἀρετή 一开始就在一个完全不会使分析家迷失方向的层面上提出问题，因为相关文本首先给出一项模型，说明这个词在苏格拉底文本中意味着什么：对男人而言，它是良好的政治治理，也就是对城邦的良好治理。

颇为奇怪的是，开头马上就出现了对女人的参照，说——天哪——女人的德性就是把家安排妥当。这样一来，两者便同步处在同一个平面上，不存在本质差异；而且，如果这样理解，为什么不呢？

我之所以提醒这一点，只是因为：如果你们愿意从头到尾读完这篇文本，在它向你们提供的千般丰富启示中，你们会在这里亲手触到某种道德——严格说来就是传统道德——的特征。它一向会回避一个问题；这里做得尤其高明：它从最初几句回应起便把问题变没，使人此后无须再谈，甚至根本不提出这个恰好令我们这些分析家如此感兴趣的问题——倘若我们作为分析家确信自己知道，那么男人与女人的道德是否有一个可能彼此不同的点，而这个点是否出现在他们同床或各自独处的时候？

然而，一旦把德性放到一种更公开、更属于周遭环境的场地上，这个问题就迅速被回避了。由此，问题可以按照苏格拉底的方式推进，并

很快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可能通过定义认识自己所不认识的东西？因为知道、认识的首要条件，就是知道自己正在谈什么。

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谈什么……

正如他同对话伙伴——即这里的美诺——迅速交换几句以后所表明的……你们熟悉的东西便涌现出来，也就是我刚才读给你们听的那两三句话中出现的回忆说。你们知道它说的是什么，但我要重新谈它，也许还会稍加扩展和展开，说明它意味着什么、对我们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何以值得我们注意。

如果人们说、或者表述说“灵魂”……

对话里就是这样说的；无论如何，它使用的是这种语言……在接受教导时无非是在回忆，那么无论在这篇文本还是在我们的文本中，这都包含一种观念：就灵魂而言，存在一种无尽的延展，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种没有界限的绵延。

这同我们自己的做法有点相似：当可以援引的论据已经用尽时，我们也会抛出类似的东西……

因为我们看不太清，在个体发生中，事情怎样才能总是以同样而又如此典型的方式重现……于是便诉诸种系发生。二者之间看不出多大差别。

然后呢？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灵魂？为了证明它所能学会的一切无非都是回忆，人们作出一个在当时很有意义的举动，也就是苏格拉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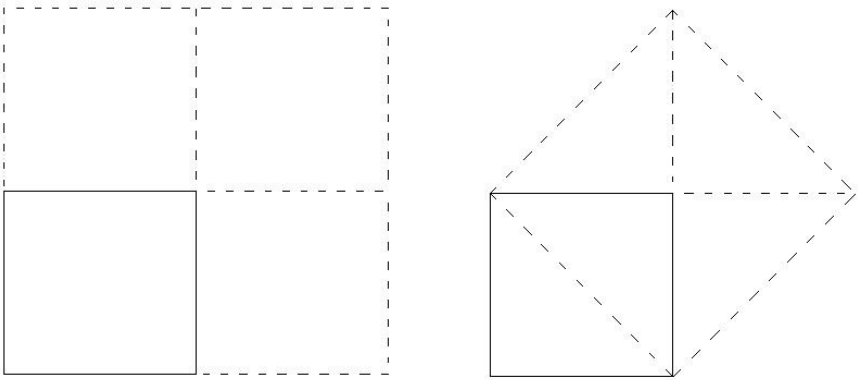
的举动：“看吧，美诺，我来给你证明。你看，你的奴隶就在这里；当然，他从未在你家学过任何东西，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奴隶……”

人们向他提问，并以某些特殊方式提问，结果终于让他说出了一些——天哪——颇为合乎情理、却在数学领域走不了多远的东西。问题是：如果从一个正方形出发，怎样才能得到面积为它两倍的图形？奴隶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只须把边长加倍。

很容易迅速让他感到，边长加倍以后，面积会变成四倍。

接着，以同样的提问方式，我们很快就会找到正确的操作方法：通过对角线来做，取一个以原正方形对角线为边长的正方形。

我们对于这些小游戏、这些最原始的消遣所知道的一切——它们甚至没有推进到当时人们对 $\sqrt{2}$ 的合理性质已经达到的程度——就是：我们取用了一个“不入等级”的主体，一个奴隶，一个不算数的主体。



接下来出现了一个更机敏、更好的问题：德性是否是一门知识。总的说来，这无疑是对话中最好的一部分、最精彩的一段。

不存在关于德性的知识，这一点很容易由经验来证明：那些以教授德性为业的人——指诡辩家——是十分可疑的教师；至于那些可能教授德性的人，也就是自身有德性的人……

我所谓有德性，取的是这篇文本使用“德性”一词的意义，也就是公民的德性和良好政治家的德性……文本通过不止一个例子十分清楚地表明，他们甚至不知道怎样把德性传给自己的孩子，而是让孩子学习别的东西。因此，我们最终得出：德性与其说接近知识，不如说更接近所谓正确意见。那么，正确意见从哪里来到我们这里？从天上来！

这就是某种东西的第三项特征；这些特征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所参照的、也就是能够学习的东西……

你们会感到，它同我以“主体”一词标出的东西何其接近——我仍保持谨慎……能够学习的，是一个首先具有普遍性这一特征的主体。在这一点上，所有主体都处在同一个起点；他们的延展性质使人不得不为他们假定一个无限的过去，因而也很可能假定一个同样无限的未来，尽管这篇对话并没有裁定灵魂存续的问题。

我们还不至于分享“亚美尼亚人厄尔”的神话；但灵魂自始以来、严格说来以一种不可追忆的方式储存了塑造它的一切，以至于使它能够知道——这一点在这里不仅没有受到质疑，而且正是回忆说观念的原则。

这个主体“不入等级”，这是另一个用语；它还是绝对的，因为它不像知识那样——文本明确这样说——带有某种标记……

文本所用的术语真正呼应着我们在这里能够说的一切……正确意见并不带有同我们的知识一样的串接、逻辑分节；它拥有某种更属于诗作（ποίησις，poiesis）秩序的东西。苏格拉底的质询把我们引到了这里。

我如此仔细地作这番回顾，是为了让你们注意某种东西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对知识的质询中，这个点十分古老却始终在场……某种东西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以前，它从未被单独提取出来；我恰恰是在谈转移时这样做的：我所谓"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即使不在一切知识问题的明确分节中，也在它的一切预设中发挥什么功能？

问题从这个前提出发：在某处存在这一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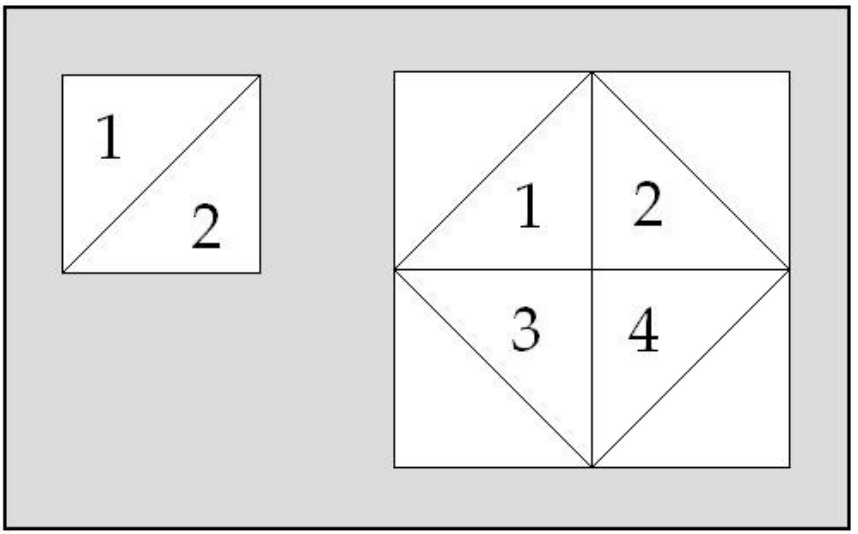
随你们怎样称呼它；这里，它以一切显然属于神话的面貌出现……在某处，有某种东西发挥"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功能。此前，我已经围绕我们科学某一部门的这项或那项推进、突破和冲刺，把这一点提作问题。

问题难道不在于：例如，在数学对无穷的构想中出现这个或那个新维度以前，它在哪里？在这些维度被锻造出来以前，我们能否把它们设想成在某处已被知道？我们能否已经把它们追溯为自古以来就存在？

这就是问题。问题不在于灵魂在化身以前是否存在，而只在于：主体这一作为知识之支撑的维度，是否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关于知识的问题以前预先确立。

请注意，当苏格拉底询问奴隶时，他做了什么？他带来了……

即使他没有在黑板上画，因为图形非常简单……可以说，他从别处带来这个正方形图形，也带来自己作推理的方式，也就是度量几何最初的方式：把图形分解成三角形，再计算等面积三角形的数目。



由此很容易显明，以对角线为边所建的正方形所包含的小三角形数目，恰好同第一个数目形成所需比例：如果第一个正方形由四个三角形构成，那么按这种方式构造的正方形就有八个。毕竟，这里确实涉及一幅图。

而在询问奴隶时，问题……

这并非我们发明的批评；很久以前人们已经指出，这个程序并没有多少证明力。苏格拉底远不能以奴隶从未学过几何、也没有人给他上过课为论据，因为仅仅是苏格拉底组织图形的方式，就已经非常明显地

给奴隶上了一堂几何课……但问题不在这里。对我们而言，可以说，问题应按如下措辞来考察：苏格拉底带来了一幅图。

如果我们说，在对话伙伴的心中已经存在一切同苏格拉底所带来之物相应的东西，这可能有两种意思。我要这样表述：或者那里存在一幅图——我不会说是衬图——就是一幅图；或者，用一个现代术语说，那里存在某种同所谓“函数”相应的东西：也就是把苏格拉底的图映射到他的图上、或反向映射的可能性。

当然，无论在哪一边，都完全无须是规则的正方形。

姑且说，一边是依墨卡托投影形成的正方形，也就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正方形；另一边则是以各种方式扭曲的东西。

尽管如此，逐点对应仍会赋予苏格拉底所带来之物同其对话者据以回应之物之间的关系一种非常特殊的价值，也就是解码的价值。

这同我们这些分析家有关，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对转移的分析所指的正是它。

在解释的维度中，我们的解释之所以运作，是因为它以另一种方式读取一条链……

而那仍然是一条链，并且已经是一条能指分节之链。

接着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想象：我们不去察觉这里有两幅乍看并非彼此摹本的图，而是可以假定另一则隐喻，即没有任何东西可见——我是说在奴隶那一边什么都看不见——但可以像某些情形下那样说：“这里有一幅图。你们什么也看不到，但必须把它放到火上烘……”

“你们知道，有一些所谓隐形墨水……图形就会显现。”这时便出现了——正如人们谈感光板时所说的——显影功能[注10]。

> [注10] 在银盐摄影中，“显影剂”（révélateur）是一种化学药剂，使曝光以后一直潜伏在感光表面上的影像显现出来。法语 révélation 同时含“揭示”与摄影“显影”之义。

对我们而言，精神分析中所涉及的重译，是否就悬在这两端之间……

我说“重—译”，是因为在这种情形中，第一次能指铭写就已经是对某种东西的翻译……我们的解释是来映射那种像语言一样得到结构化的无意识能指组织吗？还是相反，我们的解释以某种方式属于一种全然不同的操作，即揭示一幅此前隐藏的图？

显然，我所教导的既不是这一种，也不是另一种……

尽管这种对立也许已经向某些人暗示了最初答案……事情在于如下这一点，它使我们的任务困难得多：实际问题确实同能指的操作有关；这使第一项参照、第一种模型——即解码是什么的模型——非常可能成立。

然而，主体——姑且说分析者——并不是图画意象所暗示的那种摊平在外的东西；他自己就在图中。主体本身已经在世界中受到决定并被铭写，成为某种能指效果所造成的主体。

由此产生的是：它几乎可以还原为前面某一种情境，所欠缺的只是一点——知识会在某些点上出现裂口；当然，这些点可以始终遭到误认。

而对我们而言，恰恰就是这些点以“真理”之名构成问题。

在这项参照中，主体以某种方式受到决定，使他无法——我们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复原因能指效果而铭写下来的他同世界的关系；在某些点上，他无法使这种关系闭合、完结到一种就其主体地位而言令他满意的程度。正是这些点关涉他，因为他必须把自己确立为一个有性化的主体。

面对这种情形，你们难道看不到，转移一旦像实际那样建立起来，会产生什么结果？

因为这是历来如此的运动，是传统内在性真正制度化的运动：转移根据“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而建立，其方式恰好同历来内在于一切知识质询的方式相同。

我甚至还要说，主体进入分析这一事实，使他参照一个比别人“知道得更好”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这并不意味着——同人们所认为的相反——他把这个主体等同于自己的分析家。但这恰恰是我今天想在你们面前指出之事的要害：它是内在的。精神分析探寻的运动从一开始便有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正如我刚才所说，是被假定“知道得更好”。

于是，分析家服从游戏规则。我由此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对象是苏格拉底的奴隶，而且人们允许这个奴隶随心所欲地开口——当然，《美诺》的实验并没有这样做——分析家回应时，会按照他应当怎样回应的方式回应吗？

分析家的介入问题，确实悬置在我刚才所说的两端之间：

- 两张逐点对应的图；
- 或者相反，一张通过这种或那种操作被显影出来、显出其图之本性的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游戏开端所放入的资料使一切都被这样设想。

人们进行回忆追述，但所回忆的与其说是种种事情，不如说是遗忘本身的构成；或者说，是被压抑者的返回——这完全是一回事——也就是筹码在每个时刻怎样分布到游戏的各个格位上；我的意思是，分布到那些必须下注的格位上。

同样，解释的效果在哪个层面被接收？在解释给主体的创造力带来的刺激层面；我指的就是刚才谈过的那种诗作。那么，分析转移意味着什么？

如果它确有意义，那只能是：消除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对精神分析而言不存在——对分析家就更不存在——任何地方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正是新意所在。

只有某种东西抵抗着知识制造主体的操作，也就是那个可以称作“真理”的剩余。

但恰恰在这里，彼拉多的问题会涌现出来：“真理是什么？”[注11]

> [注11] 耶稣受审时，彼拉多因囚徒的回答而困惑，向他——也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参见《约翰福音》18:37：彼拉多说：“那么你是王吗？”耶稣回答：“你

> 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上，为真理作见证。凡属真理的人，都听我的声音。”彼拉多说：“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什么？”严格说来，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为了引入严格属于精神分析的行动究竟是什么，精神分析行动本身十分奇特地由下列两点构成：

- 分析家凭一种佯装，忘记自己在作为分析者的经验中，曾看见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一功能还原为它本来的样子。因此，每时每刻才会出现种种歧义，把真理究竟如何这个问题转移到别处，例如转向“适应现实”的功能；

- 他也佯装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位置可以持守，因为这是通达一项真理的唯一入口；这个主体将从真理中被抛出，从而被还原为一场走入死胡同的进程之原因功能。

精神分析家的根本精神分析行动包含某种我尚未命名的东西；我以“佯装”为题勾勒了它。如果这种佯装变成遗忘，事情就会变得严重：分析家佯装忘记，自己的行动正是成为这场进程的原因。

这里涉及一项行动，而我们必须在此作出的一个根本区别进一步突出了这一点。

当然，分析家并非没有需要——我甚至要说，是向自己说明分析中所做之事何以正当的需要。

分析中确实“做”了某种东西，而问题正是“做”同“行动”之间的差异。人们把分析者套到一张“做”的工作台上。他做着某种东西——随你们称之为诗作还是转圈——他确实在做；而精神分析技术指示的一部分，

显然恰恰在于某种听其自行。不过，如果这种听其自行在某种程度上使分析家内部的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保持完整，那么它足以刻画分析家的位置吗？分析家明明已从经验中认识到这个主体的衰落和排除，以及这从精神分析家一边产生的结果。

至于这种结果是什么，我今天不立即提出，因为我们接下来恰好必须进一步对它作出分节说明。不过，我最后要指出一项类比：为了推进这条质询行动的新进路，我必须面对由你们构成的这些第三者；这属于我已经以数的功能引入的层面。数不是众多，因为引入数的维度并不需要很多人。

我正是在这样的参照中引入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家的地位究竟可能是什么？他的行动使他相对于这些前提处于根本失衡的位置。我这样做，是为了提醒你们：行动共有一个维度，即在行动发生的当下并不包含主体的在场。

行动的跨越，就是主体在越过以后重新找到自身在场——但这个在场已经更新——的东西，仅此而已。

这一次时间不够，下一次我会给你们一个例证。今天我以 self 这个词引入温尼科特，借他举出了相对于某种能指效果的一种击中要害；这个“温尼科特”将向我们说明：分析家越是对自己的对象产生兴趣，他会遭遇什么。

恰恰因为温尼科特在技术上卓然出众，选择了一个对自己而言具有特权的对象，他会使我们亲手触到：面对某些被他大致界定为潜伏性精神病的案例，他竟会非常奇特地否认整个精神分析技术本身。

然而，这不是一个特殊案例，而是一个示范性案例。

如果分析家的位置只由一项行动决定，那么对他而言，能登记下来的效果就只能是行动的果实。为了使用“果实”一词，我上次提醒过它同“享用”的回响。分析家作为经验记录下来的主要东西，无法越过我刚才指出的这个关于其自身在场的转折。

要凭什么手段，才能收集到由精神分析行动所发动的进程中可以登记为知识的东西？这正提出了精神分析教学究竟是什么的问题。

精神分析行动在多大程度上遭到误认，关于精神分析可以汇总的知识之进展，负面效果就在同等程度上被记录下来……

这些效果我们已经观察到，也可以亲手触及；它们显现在许多其他段落中，并贯穿精神分析文献生产的全部广度……相对于它能够汇总、能够储存的知识而言，这些就是亏欠。

第4课 · 1967年12月6日

- “告诉我，你记得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 “你是什么意思，”另一个人回答，“最先浮现在我脑中的事吗？”
- “不，你拥有过的第一个记忆。”长久思索……
- “我一定把它忘了。”
- “正是说，你没有忘掉的第一个记忆。”长久思索……
- “我把问题忘了。”

[汤姆·斯托帕德：《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吞死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 年，第 15 页]

我为你们摘录了这几句对白——你们会得到我的出处——它们来自一部十分机巧、甚至颇有洞见的小戏。它的标题吸引了我，其中包含两个对我而言意味十分丰富的人物：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吞；标题告诉我们，两人都“死了”[注1]。

但愿这是真的！实际并非如此：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吞会永远待在那里。不过，在我看来，这几句对白很适合唤起三种 μάθησις

（mathesis）层次之间的间隔和距离；我要说，也就是三种“求知式把握”的层次。

> [注1] 汤姆·斯托帕德：《罗森克兰茨与吉尔登斯吞死了》，伦敦，Faber & Faber 出版社，1967 年；法译本，巴黎，瑟伊出版社，1968 年。拉康也在《著作集》《无意识中文字的动因》第 506 页注 1 中提到这两个人物。

第一种以“我读”为中心，经受一次揭示性的试验；上次我借《美诺》重现的回忆说，就是它的例子。

第二种则不同，它显现在我们科学进步的“调子”中——这个词用得恰当——那就是“我写”。

我写，即使只是循着一道已经标出的文字痕迹来写。

把能指作用本身分离出来，标志着我们在这种“对知识之所是的把握”中取得进步。我想用来提醒你们的，并非一则轶事，而是这些锻造得十分精妙、以某种方式自己标出自身位置的对白：它们进入一场对悲剧中那些根本木偶的新操弄，而那场悲剧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也就是《哈姆雷特》。我曾用很长篇幅在这部悲剧中标定欲望本身的位置[注2]；我由此指出一件此前可能显得非常奇怪的事：人人都能在其中读到自己的欲望。

> [注2] 参见 1958—1959 年《欲望及其解释》研讨班关于《哈姆雷特》的各讲：1959 年 3 月 4 日至 4 月 29 日，以及 5 月 27 日。

因此，这三句对白标出了分析所特有的求知式把握方式；它从“我丢了，我把线索丢了”开始。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正从那里开始，也就是……

谁若对此惊讶、在这个场合瞪大眼睛，便充分表明他忘记了精神分析怎样进入世界、迈出最初步伐……也就是口误、失足与失败行动的领域。

相关知识卡 失败行动：行动在失败中成功

今年一开场，我就在最初几句话中提醒你们注意它的在场。你们会看到，我们还须回到它；如果我们不想在面对我今年所谓精神分析行动的最根本形式时自己丢掉绳索，这项标定就必须始终保持在我们目标的中心。

不过，你们也看到我几乎每次、而且一开始就显出某种为难。请原谅，造成这种情形的恰恰不是别的，而是你们盛情出席。我以今天趋于集中的形式，向自己提出了我的教学所包含的问题：我在这里已经进行四年有余的工作究竟意味着什么？

这个问题值得提出：它是精神分析行动吗？这项教学在你们面前进行，也就是“公开”进行；因此，它本身不可能是精神分析行动。那么，我着手讨论这个主题意味着什么？是否意味着我想在这里把精神分析行动提交给一个批判审级？说到底，这个立场完全可以承担，而且此前已经有人多次承担过，哪怕他们严格说来并没有使用“行动”这个词。

颇为引人注意的是，每当外部人士作出这种尝试，得到的结果都相当贫乏。

而我是精神分析家，我自己也被卷入精神分析行动。除了从外部把握精神分析行动以外，我还能有别的意图吗？能；这个意图按如下方式建立。

教学不是行动，从来都不是。教学是一项论题；在人们还知道教学是什么的年代，一向都把这一点表述得非常清楚。在“大学”这个词还有意义的好时候，大学里的教学就是论题。论题预设反题；行动可以从反题开始。这是否意味着我期待精神分析家提出反题？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在精神分析行动内部，我的论题有时会造成一些后果。引人注意的是，这些后果在它内部——我强调是在内部——遇到的反对，既不属于论题，也不属于任何可以表述的反题，而是来自那些以精神分析行动为业者中间通行的习俗和惯例。因此，一番在身处精神分析行动的人中间迄今并不容易受到反驳的话语，竟会在某些情形下遇到并非矛盾反驳的障碍，这很奇特。

指导我继续这番话语的假设如下：当然不是说有必要批判精神分析行动——我马上会说为什么——而是相反，要在这一行动的审级中表明：它所误认的是，只要不离开行动本身，人们原本可以走得远得多。因此，我们必须相信，这项行动中有某种东西对投身其中的人而言足够无法承受、无法持守，使他害怕接近——是否该这样说——它的界限。因为我要引入的，正是它的这种结构特点；这特点毕竟相当为人熟知，足以让人人把握，却几乎从未得到表述。

我们从刚才给出的参照出发：精神分析为我们开创的第一种行动形式，就是症状性行动。可以说，它在成为失败行动时成功得最为彻底；一旦失败行动受到假定和控制，事情所涉及的东西就会显露出来

——让我们用一个我已充分坚持、因而被重新激活的词来标定它——即真理。

相关知识卡 失败行动：行动在失败中成功

请注意，我们分析家正是从这个基础出发向前推进。没有它，甚至根本不可能有精神分析：任何行动，即使不带有失败这个小小指标——换言之，即使它就意图而言给自己打了一个好评——仍然完全落在同一种机制之下；也就是说，人们仍可以提出一个不同于这项意图之真理的“另一真理”问题。

相关知识卡 失败行动：行动在失败中成功

由此产生的，严格说来是一种可以这样表达的拓扑学：只要画出离开它的道路，人们便会重新进入其中，哪怕自己没有想到；说到底，确定进入其中的最好办法，就是彻底离开它。精神分析行动标出一种形式、一层包络、一种结构；它以某种方式把此前作为行动地位而建立、表述和产生的一切，都悬置于它自身的法则之下。

无论以何种名义投入这项行动的人，都站在一个很难插入任何楔子来造成偏转的位置；这也暗示，必须引入某种辨别方式。

从头说起，事情很容易标定：倘若就行动而言，没有什么比失败更成功，这并不意味着一种互反关系随之建立，也不意味着任何失败本身都是某种成功的标志；我是说，行动成功的标志。

并非一切失足都是可以解释的失足，这十分明显。它来自一项简单评论，而这恰恰也是实际运用中唯一曾被提出的反对意见。

只须开始向一个所谓有常识的人引入某种东西……

如果他还是新人、尚未被免疫，而且还保留几分新鲜……也就是引入精神分析思辨的维度，人们就会回答你：

- “可你为什么对我大谈这些我们十分熟悉的蠢事？它们根本没有任何可把握的支撑，只是一堆否定的东西！”

可以肯定，在这个层面上，辨别没有可靠规则；正因如此，我们才会发现，只要停留在这些示范性现象的层面，争论就始终悬而未决。完全可以设想，精神分析行动取得其分量的地方在于：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些以“成为精神分析家”为行动的主体；也就是说，他们围绕这件事组织、聚集并延续一种经验，在某种属于另一个层面而非行动层面的东西——即“做”——中承担责任。但请注意：这种“做”并不是他们的做。

精神分析的功能清楚地具有这一特征：它建立一种“做”，分析者凭它获得某种迄今无人能够清楚确定的终点。只要相信我们一就此询问作者时，指针所发生的真正失序的摆动，就完全可以这样说。现在不是向你们展示这道摆幅的时候，但你们可以相信我，也可以到文献中查证。

人们所谓围定名为精神分析之操作的法则或规则，结构化并界定了一种“做”。

仍有人称作“病人”的人，即我近来以一个新词引入的“分析者”……

这个词迅速流传开来，证明它并非如此不合时宜。而且，很明显，说“被分析者”会让事情的完成保留一切歧义：一个人处在精神分析中时，“被分析者”一词的意义只会表示一种完全不明显的被动性；情形

反而恰恰相反，因为说到底，一直在说话的正是分析者，这已经是一个指标……这个分析者的分析被推进到一个终点；正如我刚才所说，从“终结”这个词的一切意义上看，仍然绝对没有人界定它作为终结的意义。不过，人们仍假定这可以是一种成功的“做”；为什么不以“存在”这个词来标定它？

“存在”这个词对我们而言仍相当空白，却又足够充实，因而可以在这里充当标志。

一项至少在起点上确实同真理有关的操作，如果其地平线上不能唤起“存在”这个词，它的终结会是什么？

对分析家而言，这个词可以被唤起吗？请记住，分析家被假定已经走过这样的历程；它建立在分析家行动所带来的那些原则上。无须追问，精神分析家是否有权以某种客观性为名，解释那个“做”的主体在这场诗性操作中给出的某个图形之意义。

也无须追问，把这个“做”解释为证实转移事实是否合法：“解释”与“转移”都已经包含在那项行动中；分析家通过这项行动为这个“做”提供支撑和授权，而它本来就是为此而做的。

即使分析家什么也不做，这仍然给行动的在场增添了分量。因此，“做”与行动的这种二分，对行动本身的地位至关重要。精神分析行动在什么地方可以被把握为显出某种失足？不要忘记，精神分析家被假定已经来到这样一个点：真理的唤起所包含的那种终结——无论缩减到何种程度——已经为他发生。

从这个存在之点出发，他被假定成为阿基米德，能够转动那种最初唤起的结构中所展开的一切；而我开头用“我丢了”所围定的东西，为这项结构提供了钥匙。

看看这种丧失效果是否会在以精神分析行动为中心的操作之外再次发生，难道不会很有意思吗?

我想，只要这样提出问题，你们立即就会看到：必须从——可以说——精神分析生产的不足中，读出某种回应着失足维度的东西；它出现在一项被假定能够构成终结的行动之后。如果我们想谈论任何与之有关的东西，就不得不假定这个关键点。

而且，当分析家们自己不断唤起这一点时，提到它绝不算滥用……

分析家最可能落入这种“失足”指称的打击之下，而我提议正是在那里寻找那项能够补充、甚至建立我们批判之支撑的作用……谈论分析者转变为精神分析家的这个转折点，丝毫不算滥用，因为分析家自己不断参照我刚才唤起的这件事，并把它当作一切分析能力的条件。

检验这批精神分析文献，可能会是一项无穷无尽的工作；我已经在视野中标出一些例子。今年第一讲，我引用过拉帕波特的一篇文章。它发表于《国际杂志》[注3]，法文标题大约可以叫作《思维活动的精神分析地位》；thinking 在英语中是现在分词。在如此庞大的听众面前，拿这篇文章来细读，既乏味又无效。在其中可以看到一种极其良好的意图——如果可以这样说——即把弗洛伊德陈述本身能够组织起来的一切摊平，从中形成一项关于所谓精神分析经济中思维功能之所是的言说行为。

[注3] 戴维·拉帕波特：《论精神分析的思维理论》，出处同第一课注 1。

引人注意的会是每时每刻出现的断裂：对 thinking 的这种装配——或随你们说，拆解——不可能不从初级过程本身出发，而且是从弗洛伊德所谓“原初幻觉”的层面出发……

这种幻觉同第一次充满痛切的探寻相联；人们假定，仅仅因为运动系统存在，当它没有遇到使自己满足的对象时，就会对那种使所寻对象之幻想图像出现的退行过程负责——这正是解释初级过程的原则……这个领域显然必须列入思想，却同次级过程层面建立的思想完全不相容；后者是一种“缩减的活动”、一种“微型活动”，迫使人们进入一个完全不同于最初所唤起领域的层面，即引入现实检验的维度……当然，作者会在行文中注意到这种不相容，却仍不为所动地继续前行，最终察觉不仅存在两种思维方式、两个思维领域，而是存在无穷多种……

它们大致可以按照早先心理学家所谓“意识的层级”排列……由此，弗洛伊德所带来的突出之处被彻底还原为所谓“一般心理学”，也就是还原到它自身的废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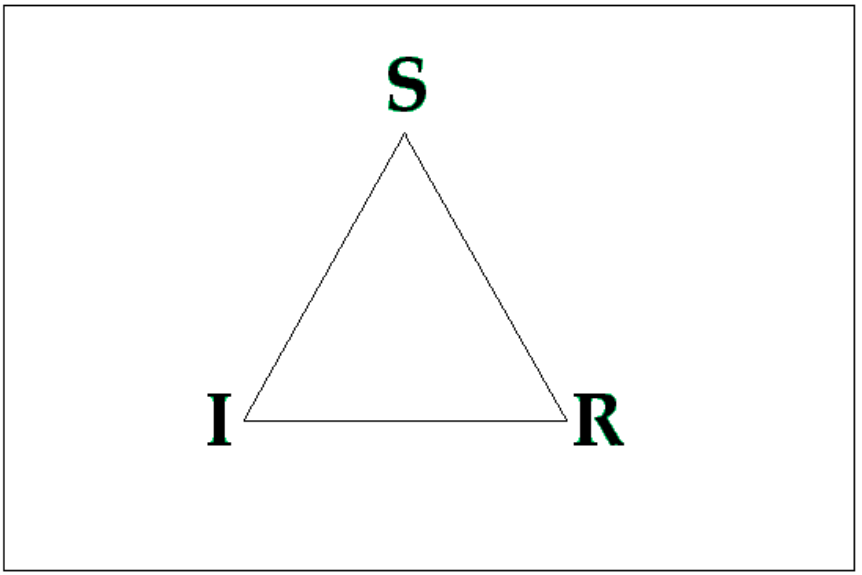
这只是一个轻微例子，你们可以随意去查证。如果另一些人认为值得举办一场研讨班，在细节中追踪类似问题，为什么不呢？在我看来，重要的是：这种还原视角连同它随之而来的失败，彻底回避了初级过程维度中那个引人注目、格外突出、无比巨大的牵涉。这个东西大致可以这样表达：并不是“起初是不满足”——这算不了什么；重要的不是生命个体追逐自身满足，而是享乐有一种地位，这种地位就是不满足。

如果把这一点作为原初之物、作为引入这项理论者的理论所牵涉之物加以回避——他是否用这种方式表述并不重要；但如果他确实这样建立理论，也就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述快乐原则……

因为快乐一向被用来界定“善”，它本身就是满足；但当然，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一点，因为人人自古就知道，处在“善”中并不总能令人满足……如果弗洛伊德引入了这个不同的东西，我们就要看清：这个锋芒同首先在真理维度中显出的锋芒具有什么连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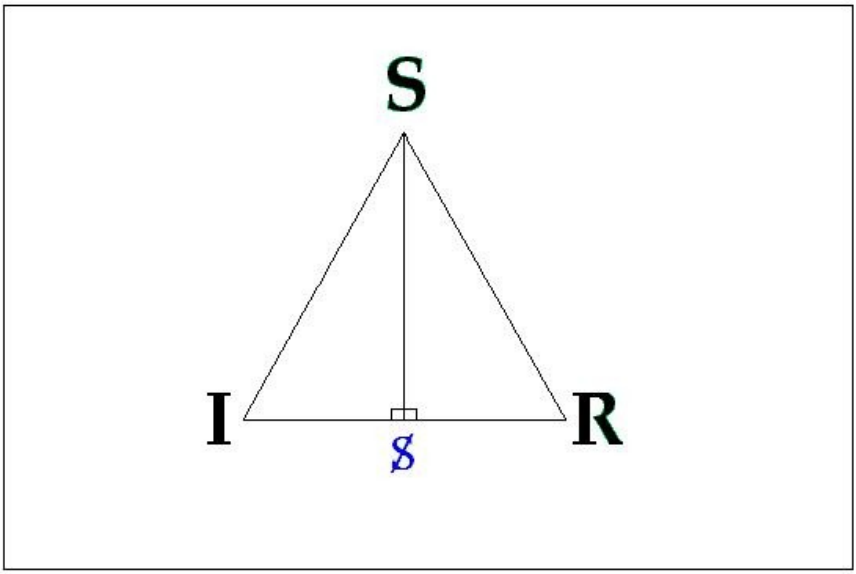
我偶然打开一份杂志——是周刊还是一年三期的刊物——看见一些显赫署名，其中一位来自神圣之战仍如火如荼的地平线一边；这场战争恰恰为“善”而战。我看到一篇文章以某种对“象征界、想象界与实在界”的咒语开头；那个人把这项三分给世界带来的启示归到自己名下——你们看到我该为何负责了——最后还英勇地总结道：“对我们而言，这话的意思就是它的意思：实在就是上帝。”于是，人们便可以说，我为神学信仰增添了一份助力。

这仍促使我尝试做一点东西，给在这里也许人数很多、眼看一切混在一起的人看：只要不把这些术语当作绝对项，我们毕竟可以指出如下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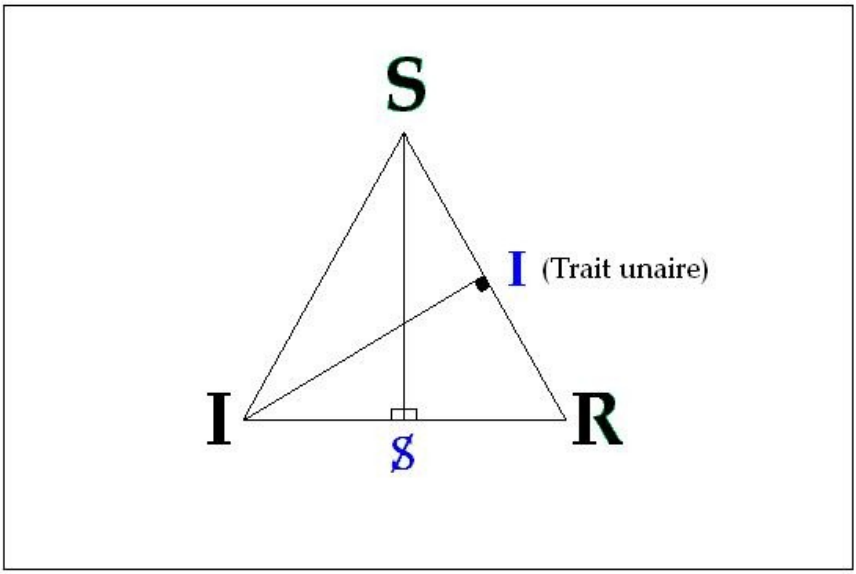
- 象征界，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就这样把它放在上方；
- 想象界放在这里；
- 实在界放在右边。

这样画完全是蠢事。它确实没有任何用处，尤其不能拿来构成直角三角形……不！也许终究有一点用，可以让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但接下来，你们可别拿着我将在周围添上的东西，写在一小片纸上到处走，时时寻找自己落在哪一个方格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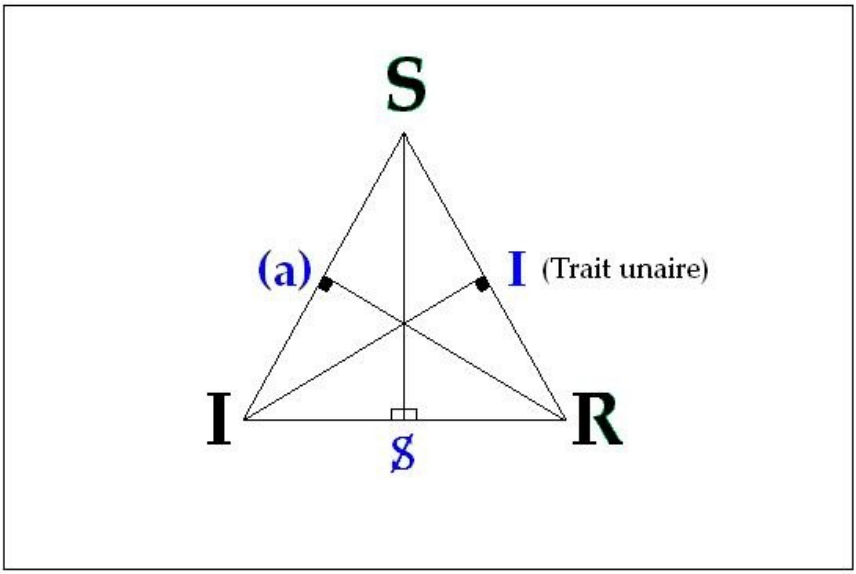


不过，如果我们记得我关于主体的教导——主体由能指决定，始终由两个能指决定；更准确地说，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为什么不把这个 S 放在另一边的投影位置？这也许会让我们追问，主体在想象界与实在界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另一方面，还有一元特征那个著名的大写 I。我们从它出发，考察能指作用的机制怎样在发展中实际发生，也就是第一次认同怎样发生；我们也把它放作另一边的投影。



第三项功能由 (a) 提供给我；它确实像是实在界落在一条从象征界拉向想象界的绷紧向量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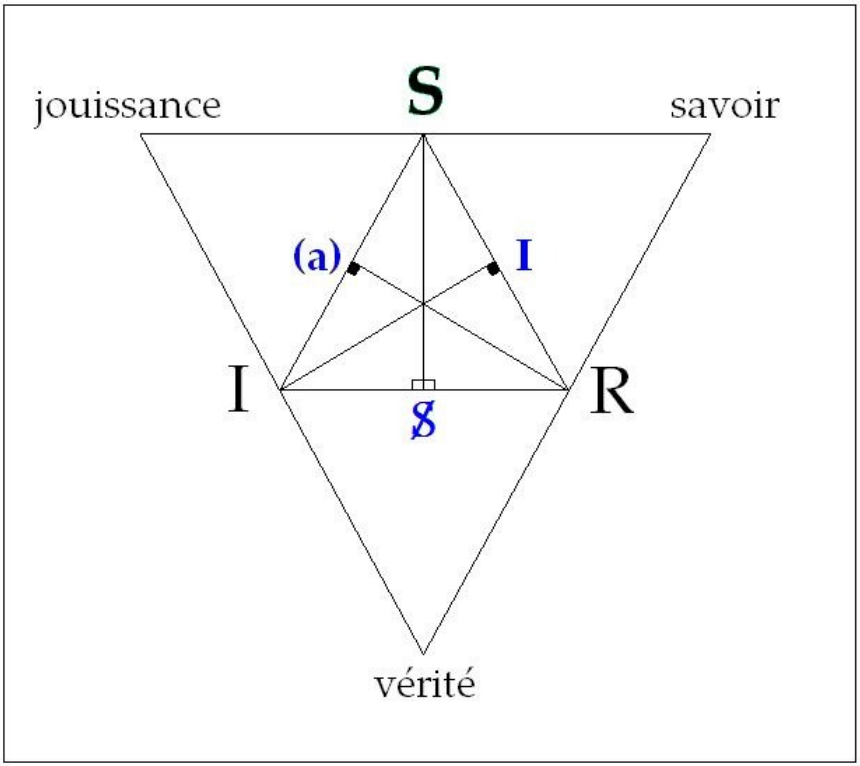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能指完全可以从想象性功能中取得材料——谁会对此设置障碍？——而就人而言，想象性功能是最脆弱、最难把握的东西。当然，并不是说人没有那些注定在自然中为我们引路的原初意象；但恰恰因为能指占取了它们，所以总是很难在其原生面貌中标定它们。

这样你们就看到，可以追问连接每一个已标定点的向量分别代表什么。

这里会出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我正是为此让你们准备做这个小游戏——因为自从我们谈论精神分析行动以来，就不得不再次唤起我们用来标定例如症状功能的那些维度：

- 我们把症状设为可知之物、即知识的失败；
- 它一向代表着某种真理；
- 而我们把构成第三极的享乐放在这里。



考虑到人类精神对想象界的某种根本依附，这毕竟引入了一些可以像方位基点一样帮助你们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说，每当我唤起其中一极时，它们也许都能为你们的绕行提供支点；例如今天，我正在提出分析家行动同真理究竟有什么关系的问题。

在起点上，可以、也必须提出问题：精神分析行动承担真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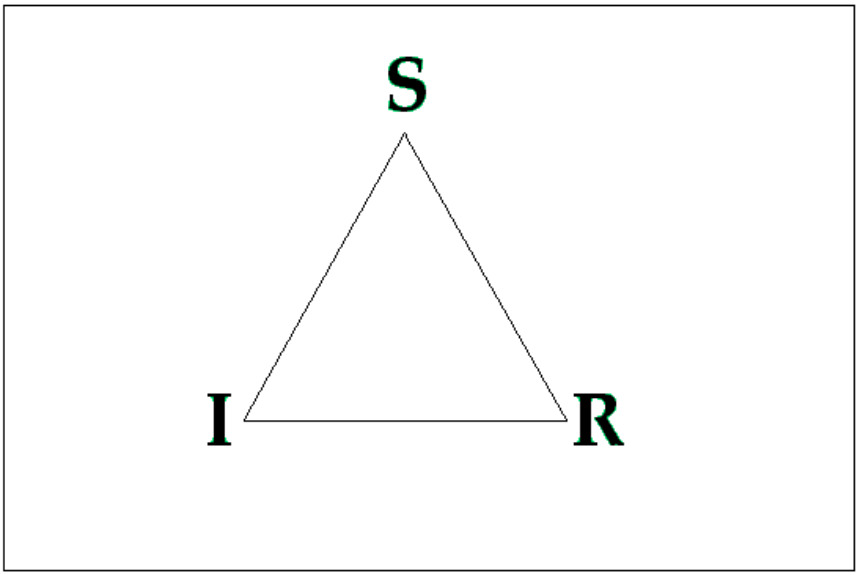
它看起来确实如此；可是，谁敢承担真理而不招来嘲笑？

有些时候，我把自己当作彼拉多。克洛岱尔有一个漂亮的形象[注4]：彼拉多唯一的错，就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时运不济，是唯一一个面对真理本人提出此问的人；这让他多少落在了真理旁边。

> [注4]　保罗·克洛岱尔：《彼拉多的观点》，载《人物与寓言——散文作品》，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65 年，第 91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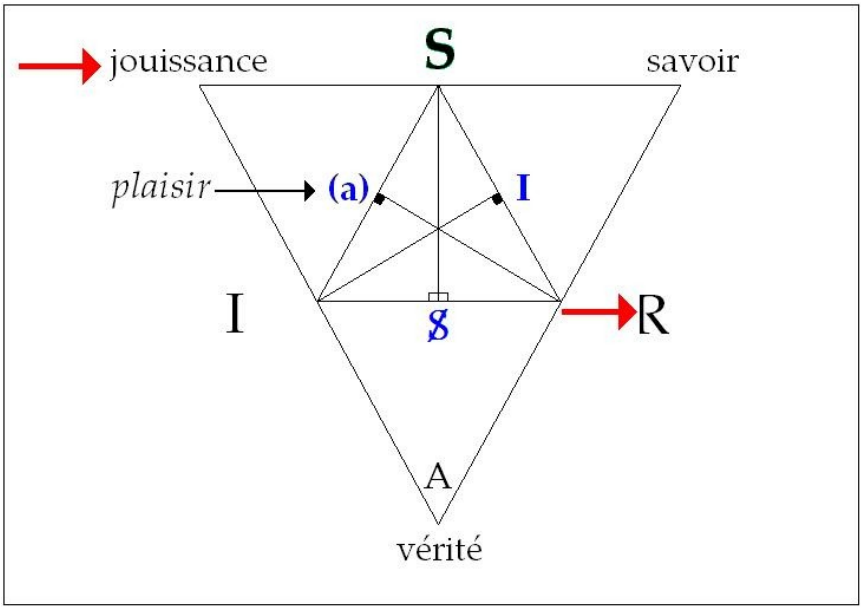
由此产生一个结果——我在这里完全处于克洛岱尔的语域，这是他发明的故事——此后彼拉多每次走过，所有偶像的肚腹都会裂开，像吃角子老虎机那样轰然倾泻。我的提问并不处在这种语境，也没有如此强劲到能取得这种结果；不过，有时也颇为接近。

精神分析家并不承担真理。他不承担真理，恰恰因为这些极点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脱离它对我们最初三个顶点的代表关系来判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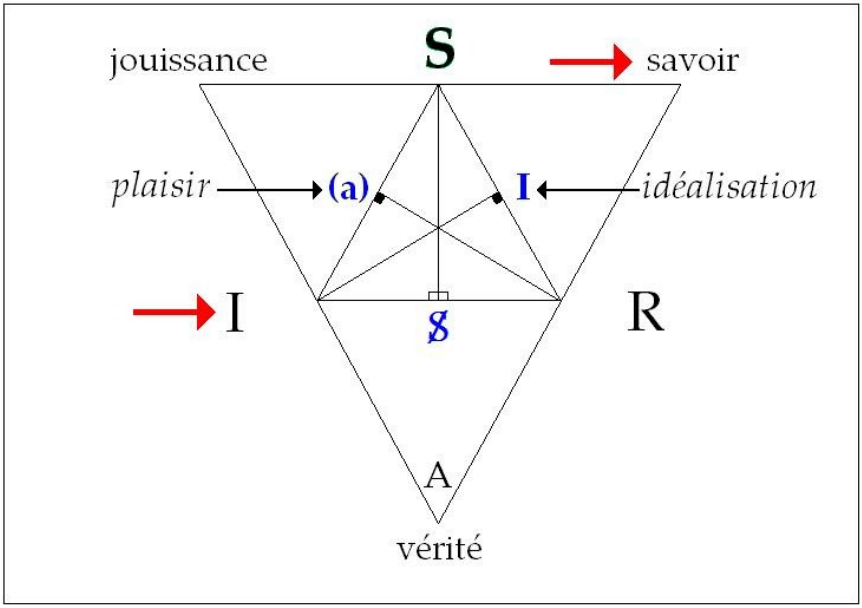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真理是在大他者的位置上对能指的铭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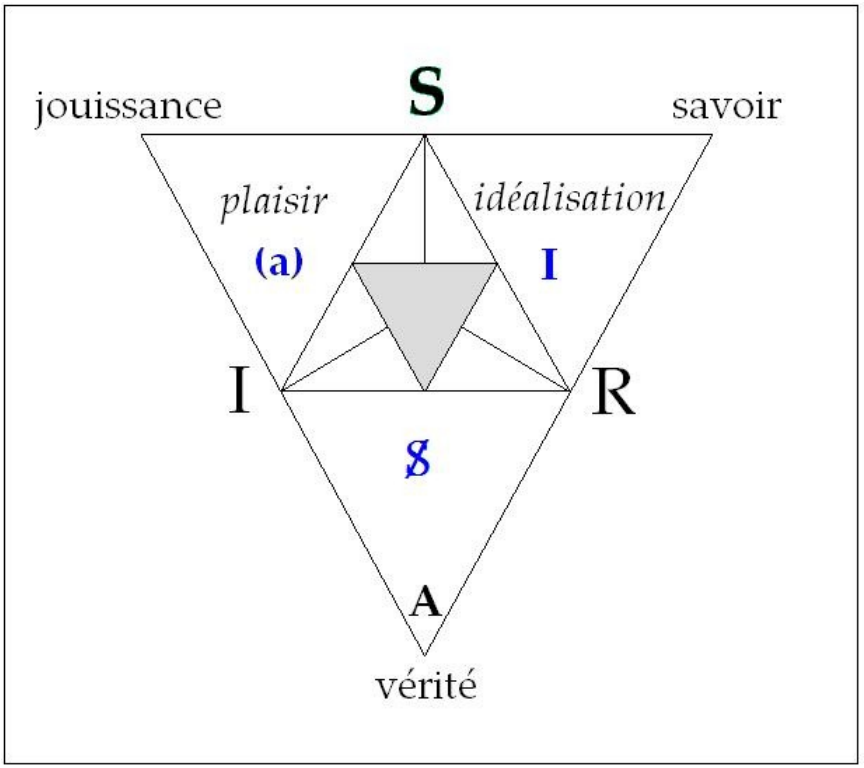
这就是说，真理并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就在那里成为“真理本身”；享乐同样也不是。享乐当然同实在界有关，但快乐原则恰恰是用来把我们同它分隔开的。



至于知识，它无可争辩地是一种想象性功能、一种理想化。



正因如此，分析家的位置十分微妙：他实际上站在这里的中央，那里是空无，是孔洞，是欲望的位置（图中灰色区域）。



不过，这包含若干可以说是纪律上的禁忌点；也就是说，既然我们确实必须回应某种东西……

我指那些前来咨询分析家、希望找到更多安全感的人……那么，天哪，有时人们便会建立一套理论，说明一个正常发展的人应当怎样逐步取得越来越多的安全感。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神话。埃里克·埃里克森有一篇谈“伊尔玛注射之梦”的文章[注5]，就是按这种方式构造的。

> [注5] 埃里克·埃里克森：《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1930—1980 年论文选》，其中《精神分析的梦之标本》，纽约、伦敦，Norton 出版社，1987 年，第 237—27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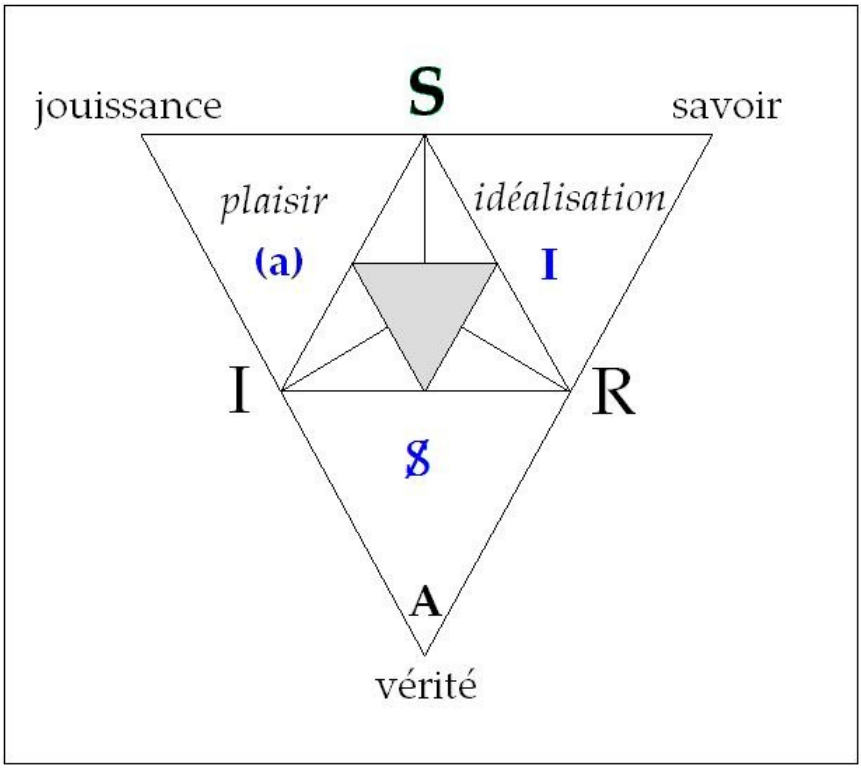
他分阶段向我们列举，那个一开始得到一位合格 mummy（妈妈）的小家伙，应当怎样建立自己的安全感；这位妈妈当然已经在精神分析家的书里好好学过自己的课程。

这种逐级建构到了最顶端，会给我们一个……

我已经偶尔提过它，请原谅，这是一则老生常谈……一个安全感十足的美国大兵。它完全可以建构；用心理学术语，一切都可以建构。

问题在于，精神分析行动怎样同这类废料相容——我们得相信，它同废料确有某种关系——而“废料”这个词在这里绝不是碰巧出现。

也许，只要恰当标定某些理论生产，我们立刻就能在这张图上辨明它们的位置；既然确有一张图，它像苏格拉底的图一样——天哪——不会比我前些天谈《美诺》时唤起的图具有更多意义：它只是一幅练习用图。



不过，可以看看某种生产同图中各点可能有什么关系……这种生产对实践绝无功能；即使最热衷于这些通常充满乐观色彩之构造的分析家，在实践中也仍然不把它们当真。可以说，除了过度或例外，没有精神分析家在介入时会真信这些构造。

这些生产同这里作为自然点的“废料”——即对象(a)——之间的关系，也许能帮助我们继续理解：精神分析生产同这种或那种其他项有什么关系；例如，它同分析家社会位置的理想化有什么关系，而后者可以放在图中 I 的一边。

简言之，我们可以由此开创一种辨别方法，用来考察精神分析行动的生产，以及它所包含的那一份——也许必不可少的——丧失。这不仅能够以强光照亮精神分析行动，以及它在歧义中预设并支撑的地位，还能够展开……而我们为什么要停在任何一点？

……展开这种歧义的全部幅度，直到——如果可以这样说——我们回到自己的出发点。

如果确实没有办法走出去，那么不妨绕它一周。今年我们正要试着为此给出一幅最初的检验性图像。而且，为此我当然不会选取最糟的例子。

可以说，废料与废料各不相同：有些废料不可解释。不过请注意，这里对“不可解释”的指称并非严格按本义使用。我们来取一位卓越作者——温尼科特——他带来过一项极为精妙的发现。我记得，当我试图为所谓部分对象的功能祛除神秘时，他称作“过渡性对象”的东西曾给予我极大帮助；我会永远怀着敬意回到它。人们用部分对象来支撑一种最晦涩、最神话化、最缺乏临床性的理论，谈论所谓前生殖器阶段相对于生殖器阶段的“发展关系”。

只须引入温尼科特先生所谓过渡性对象这个小东西——婴儿甚至在断奶这场戏剧以前就会使用的一小片破布；人们围绕断奶堆积了如此多混乱云雾……

可是我们观察断奶时，它完全不必然是一场戏剧。正如一位并非缺乏洞见的人向我指出的，断奶也许对母亲感受最深……如此一来，就不能再说，在这种情形中，单凭在场本身就仿佛是支撑、是根本方舟，使此后的一切只能以二元关系、即孩子同母亲的关系得到展开。

温尼科特将为我们分节说明的这个微小对象的功能，立即干扰了这种构想。

明年我会重新讨论这些特征；它们的描述堪称示范。只须读一读……

温尼科特先生，就能以某种方式把他翻译出来。很清楚，孩子紧抓住的那一小片破布、床单或弄脏的碎布，同最初的享乐对象有关系；看到这一点绝非无关紧要。这个最初对象绝不是不可能始终在场的母亲乳房，而是那个总在手边的东西：孩子自己的拇指。

分析家怎么会如此彻底地从经验中排除手的功能最先向他们带来的东西？甚至到了这种地步：对他们而言，“人类”（humain）应当在中间加一道连字符，写成 hu-main，把“手”（main）显出来。[注]

> [注] 拉康把 humain（人、人类的）拆作 hu-main，借词尾 main（手）强调手在人之形成与享乐中的作用。

我建议你们阅读这篇容易读的文章。它收在那本曾长期被人看作我的期刊《精神分析》第 5 期，其中有温尼科特《过渡性对象》的法译[注6]。

> [注6] D. W. 温尼科特：《过渡性对象与过渡性现象》，《精神分析》第 5 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9 年，第 21 页；译自 1951 年 6 月 15 日写成的“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34 卷，1953 年。文章据作者作为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于 1951 年 5 月 30 日所作报告写成；法文后来重刊于《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第 109 页。

读一读吧——没有什么比朗读更累人，也更不利于保持注意——不过，下一次若有人愿意来读它呢？谁会听不出，温尼科特为了说出这个对象(a)是什么，付出了多少辛苦？

它既不在外部，也不在内部；既不真实，也非幻象；既非这个，也非那个。它完全无法进入普通精神分析围绕自恋建立的那套人为构造。那套构造没有把自恋看作其本来用途，反而从中看见两个道德侧面：一边是所谓自爱，另一边是所谓对对象的爱。

读一读弗洛伊德关于 Real-Ich（现实自我）与 Lust-Ich（快乐自我）的论述，就非常清楚——我已经在这里这样做过——它要向我们表明：第一个对象就是 Lust-Ich，即我自己、我的快乐法则；而它始终如此。

因此，关于对象(a)的这一整套既宝贵又精微的描述，只缺少一件事：看出对它所作的一切陈述，只意味着一株嫩芽、一个尖端、第一次破土而出——什么东西的第一次破土？对象(a)所支配之物的第一次破土，也就是简简单单的主体。主体本身首先在这个过渡性对象的层面运作。当然，这项检验绝不是为了贬低围绕精神分析行动能够形成的生产。

但你们马上会看到，当温尼科特把事情推得更远时会发生什么；也就是说，当他不再是那位比别人更有能力观察小婴儿的观察者，而是标定自己围绕所寻找之物采用的技术时，会发生什么。正如我上次讲座开头已经向你们指出，他明显寻找的是真理。

因为他所谈的这个 self，是一种自始以来就在那里、处在所发生一切背后的东西，甚至先于主体以任何方式标定自己。他写道：“某种东西能够冻结匮乏情境。”当环境在婴儿最初几天、最初几个月并不适宜时，某种东西可能发挥作用，造成这种 freezing、这种冻结[注7]。当然，只有经验能对它作出裁断；而且，关于它的精神病性后果，温尼科特同样十分敏锐地看到了某种东西。不过，他告诉我们，在这种冻结背

后，有一个 self 在等待；这个因被冻结而构成“假性自身”的 self，温尼科特先生必须通过一种退行过程把它带回来。下一次我的论述将说明，这个过程同分析家的行动有何关系。

> [注7] freezing 这一概念的明确表述，实际见于温尼科特另一篇文章《精神分析情境中退行的元心理学与临床面向》，载《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第 131 页；译自 1954 年 3 月 17 日在英国精神分析学会所作报告“Metapsychological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Regression within the Psycho-Analytical Set-Up”，刊于《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第 36 卷，1955 年，第 135 页。原文措辞为“冻结匮乏情境”。

这个“假性自身”背后有什么在等待？“真实自身”等着重新启动。

谁会看不出来……

当我们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已经有 Real-Ich、Lust-Ich、ego（自我）、id（本我），已经有这些得到足够分节说明、足以界定我们领域的参照时……添加这个 self 无非代表真理；何况文本借 false（假）与 true（真）也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谁又会看不出，在这种情境背后并没有别的 true self（真实自身），只有温尼科特先生本人；他在那里把自己确立为真理的在场？这样说丝毫不贬低这个位置把他引向的东西。

下一次你们会从他的文本本身看到，它把他引向一个公开承认必须采取的位置：他必须以这种身份离开精神分析行动，转而采取“做”的位置；正如另一位分析家所说，他由此承担起“回应病人的一切需要”。这里不是深入细谈这会导致什么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是为了指出：只要有哪怕最轻微的误认……

既然精神分析行动究竟是什么尚未得到界定，这种误认怎么可能不存在？……承担这种误认的人会立即被引向某处；他越有把握、越有能力，情况就越是如此。我之所以引用温尼科特，是因为我认为英语世界没有人能接近他。然而，误认会立即把他明确无误地推向对精神分析位置的否定。

在我看来，仅这一点便足以确认、并至少为我所引入的方法提供开端——即使还没有提供完全支撑：通过理论表述来批判精神分析行动的地位究竟如何。

第5课 · 1968年1月10日

我像人们通常说的那样，向你们致以“新年”祝福。为什么说是“新”的？

年像月亮一样：结束以后又重新开始；这个结束和重新开始的点可以放在任何地方。这一点也许同月亮不同，因为月亮被造出来……

人人都知道，日常说法也会提醒我们……并非是为随便什么人而造的。

在那里，月亮有一段时间消失，因而有理由在此后称它为新月。但对年份和许多其他东西而言，一般说来，对所谓实在而言，并没有可以指定的开端。

然而，从它被命名为“年”的那一刻起，它就必须有一个开端；这是因为人们用能指标定，把我们发现的实在之一部分界定为周期。

这个周期并不完全精确，正如实在中的一切周期都不完全精确。不过，一旦人们把它作为周期来把握，就会出现一个同实在不完全贴合的能指；人们会修正它，例如谈到每年略有变动、直到约两万八千年才完成一个周期的小现象时，便称作“大年”[注1]。总之，人们这样说，也就是把它重新纳入周期。

> [注1] 对古代天文学家而言，“大年”（两万八千年）是各星座回到原初位置所需的时间。另参见叶芝《幻象》第四卷。

那么，譬如一年的开端应当放在哪里？行动就在这里。

至少，这是接近行动的一种方式。如果仔细寻找，你们会发现，人们总的说来很少谈到行动这种结构。因此，新年给我机会从这一端着手。

一项行动同开端的规定相关，尤其出现在必须造出一个开端的地方，恰恰因为那里本没有开端。所以，我一开始向你们致以新年祝福，终究具有某种意义：它进入了行动领域。

当然，这只是一项小行动，是行动的一点极其世俗的残余。但别忘了，我们之所以还会行这些多少已经逐渐过时、却仍然存续的小礼——这恰好值得注意——是为了回应那些被人说成已成过去的东西，也就是仪式性行动。例如，在一个可以称作帝国的框架中，据说到了这一天——人们给你们讲的故事可真不少！——皇帝会亲手操弄一张犁。

这是一项专为标明开端而安排的行动；对某种帝国秩序而言，在每年开头标出这次重新奠基至关重要。我们在这里看到所谓传统行动的维度：它以某种必要性为基础，要在能指秩序中传递被视为根本的某种东西。必须传递它，表面上便预设它不会自行传递；因此，开端实际确实就是更新。

这甚至不是通过对立，而是直接为如下可能打开了大门：可以设想，行动构成——如果可以不加引号地这样说——一个真正的开端；也就是说，存在一项具有创造性的行动，而它就是开端。只须唤起一切行动运作的这个地平线，就会看到，行动的真正结构显然正在这里。这完全清晰可见，也由此显出“创世”神话的丰饶。

有点令人惊讶的是，至今尚未出现这样一种看法……

以如今通行、为共同意识所接受的方式出现……即十七世纪初科学演进所发生的断裂，同“创世”神话之真实意义的实现和降临之间存在确定关系。这个神话足足用了十六个世纪，才在那个时代可以称作基督教意识的东西中取得其真正作用。我再怎么回到这项评论都不过分；正如我每次都会强调，它并非出自我，而是出自亚历山大·柯瓦雷[注2]。

> [注2] 参见亚历山大·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3 年，第 64—65 页。

稍后，歌德说：“太初有行动。”[注3] 人们以为这同《约翰福音》的公式“太初有圣言”[注4]矛盾，因而必须更仔细地看。只要通过我刚才尝试以一种日常形式为你们打开的道路进入问题，就会非常清楚：两个公式之间没有丝毫对立。“太初有行动”，因为没有行动，根本谈不上开端。行动确实在开端，因为没有行动，就不可能有开端。

> [注3] 歌德：《浮士德》，巴黎，Aubier 出版社，1976 年，第 40—41 页：Im Anfang war die Tat! 弗洛伊德以这句话结束《图腾与禁忌》。

> [注4] 《新约·约翰福音》1:1。

如果我们从某条进路察觉一个此前在这里从未按必要程度得到充分突出的事实：

- 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活动不带着一个能指尖端出现；
- 行动的特征正在于这个能指尖端；行动之所以作为行动而生效，同“做”的有效性毫无关系，而是紧邻着这个能指尖端[注5]；那么，我

们就可以开始谈论行动，但不能忘记：竟由一位精神分析家第一次把这种重音放到“行动”一词上，这颇为奇特。

[注5] 原文 attient à 源自动词 attenir，意为紧挨、毗邻于某物；这里强调行动效力紧邻并系于它的能指尖端。

更准确地说，构成这一奇特、因而成问题之特征的，有双重内容：

- 一方面，恰恰是在精神分析领域——即围绕失败行动——人们才发现，一项把自身呈现为“失败”的行动仍是一项行动，而且只因为它是能指；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家恰好主持——我们暂且只用这个词——一种名为“精神分析”的操作，而这项操作在原则上命令人们悬置一切行动。

你们会感觉到，我们现在要踏上这条道路，以比上季度几次导论课程中更精确、更执着的方式质询精神分析行动究竟是什么；而我仍然想……

比最初几个月再多做一点……指出我们的地平线上有一切行动可能是什么。刚才我已说明这种行动的开创性；可以说，对我们而言，它的类型由政治领域中持续进行的那种摇摆沉思传递过来，例如所谓“越过卢比孔河”的行动。在它背后还浮现着另外一些行动：

“八月四日之夜”“网球场宣誓”“十月事变”。

行动的意义在这里何处？我们确实触到、也感觉到，质询最先悬置的点，是这次或那次跨越的战略意义。感谢上帝，我首先唤起卢比孔河，并非毫无理由。

这个例子相当简单，也处处带有神圣维度的标记。对凯撒而言，越过卢比孔河并没有决定性的军事意义；但越过它，就是进入母土、进入共和国的领土，而涉足这片土地就是侵犯它[注6]。这里有某种东西被越过，正如我当然并非无意地在它背后勾勒出的那些革命行动。

> [注6] 卢比孔河（今菲乌米奇诺河）曾是山南高卢——波河平原——与意大利本土的边界。任何罗马将领未经元老院命令，都不得率武装部队渡河。

行动发生在列宁下达某项命令的时刻，还是发生在那些已经释放到世界上的能指，把一项具体的战略成功赋予早已勾勒出的开端意义之时？在后一种情形中，某项战略的后果可以前来占据自己的位置，并在那里取得征象的价值。

说到底，这个问题值得在某个起点提出。因为我今天将在行动这片场地上推进，而唤起革命行动的维度、并以它同一切战争效能的差异——即激起一种新欲望——来标定它，本身也构成某种跨越。

“你的手指在鼓上轻轻一敲，便释放全部声响，开启新的和谐。

你的脚步一迈，便是新人的起立与他们的‘行进’。

你的头转开：新的爱！

你的头转回——新的爱！”

相关知识卡 兰波《致一个理性》：新的爱与行动

我想，你们没有人听不出这段兰波的文字；我没有把它引完，题为《致一种理性》[注7]。

> [注7] 阿蒂尔·兰波（1854—1891），《彩画集·致一种理性》全文：“你的手指在鼓上轻轻一敲，便释放全部声响，开启新的和谐。 / 你的脚步一迈，便是新人

> 的起立与他们的'行进'。/ 你的头转开：新的爱！/ 你的头转回——新的爱！/ '改变我们的命数，把灾厄筛除，从时间开始'，这些孩子向你歌唱。/ '随处提升我们财富与愿望的实体'，人们这样恳求你。/ 永远到来，又将无处不去。"

这就是行动的公式。确立无意识这项行动，能够以别的方式来设想吗？尤其从如下时刻起：

相关知识卡 兰波《致一个理性》：新的爱与行动

- 我重申，无意识是语言的结构；
- 我重申这一点，却没有在相关人士那里记录到多么深刻的震动，于是我重新开始，谈论无意识对 cogito 所产生的断裂效果。

我在这里重新提出并强调：在某个领域中，我能够说"我思"；它具备这句话的一切特征：

- 我昨夜所梦见的；
- 我今晨、甚至昨天因某次不确定的失足而失败的；
- 我在说出所谓机智语时无意触及的，有时甚至并非有意为之。

在这个"我思"中，我在那里吗？

无意识的"我思"得到揭示，确实牵涉……

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不论是否接受过精神分析；只须打开一本书，看看其中谈什么……在笛卡尔的 cogito 使我们触到"所以我在"之牵涉的层面，它带来某种我称作"解除引信"的维度：在我最确定地"思"的地方，一旦我察觉它，就只能说"我当时在那里"。但这里的意思恰好类

似——你们知道我已经用过这个例子；经验告诉我，重复并非徒劳——语言学家古斯塔夫·纪尧姆评论中的一个例子[注8]，即法语未完成过去时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用法；它使这句话充满歧义："片刻之后，炸弹就爆炸了。"

> [注8] 古斯塔夫·纪尧姆：《时间与动词》，巴黎，Honoré Champion 出版社，1970 / 2000 年，第 68—69 页；及《语言与语言科学》，巴黎，A.-G. Nizet 出版社，1973 年，第 215—216 页。纪尧姆原例是："片刻之后，火车就脱轨了。"《著作集》第 678 页也谈到未完成过去时的这一用法。

这句话的意思，恰恰是炸弹没有爆炸。

请允许我把这层德语 Wo Es war 本身不包含的细微差别添上去、贴上去，并由此更新"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的用法[注9]：

> [注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第三十一讲，德文全集第 15 卷第 86 页；法译本，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4 年，第 110 页。

- "在它当时所在之处"：因为我知道自己曾想过它，所以如今只剩"在那里"；
- "soll Ich werden"："在这里……Ich——我早已强调，只能译成主体——……主体应当到来。"

可是，它能到来吗？这就是问题。把"在它当时所在之处"翻作"我应当成为"，然后接着说："成为精神分析家。"不过，既然我已经围绕这个被译作"主体"的 Ich 提出问题，精神分析家怎样才能在这番会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去年，我在《幻想的逻辑》题下，以析取式合取明确表述了这番会合。那是一种十分特殊的析取；我三年多前已在这里引入，并以"异

化”一词作出创新[注10]。它提出一种奇特选择，而我已经说明其后果：这是一项强迫选择，而且必然会有所丧失：

> [注10] 参见 1964 年 5 月 27 日《精神分析的基础》研讨班，第 192—193 页；及 1967 年 1 月 11 日《幻想的逻辑》研讨班。

- “钱袋还是生命！”
- “自由还是死亡！”

我们在这里引入的最后一种选择，我现在重新带回来，以显示它同精神分析行动的关系：

- “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

如果像我刚才在 soll Ich werden 之后所做的那样，把精神分析行动中真正受到质询的“精神分析家”一词加进去，只须让这台小机器运转：显然无须犹豫，如果选择一边，“我不是精神分析家”，结果就是“我不思”……当然，这不只具有诙谐意义；它必定会把我们引向某处，尤其迫使我们追问：不仅去年的经验究竟如何，而且我所谓出发时的假定——“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究竟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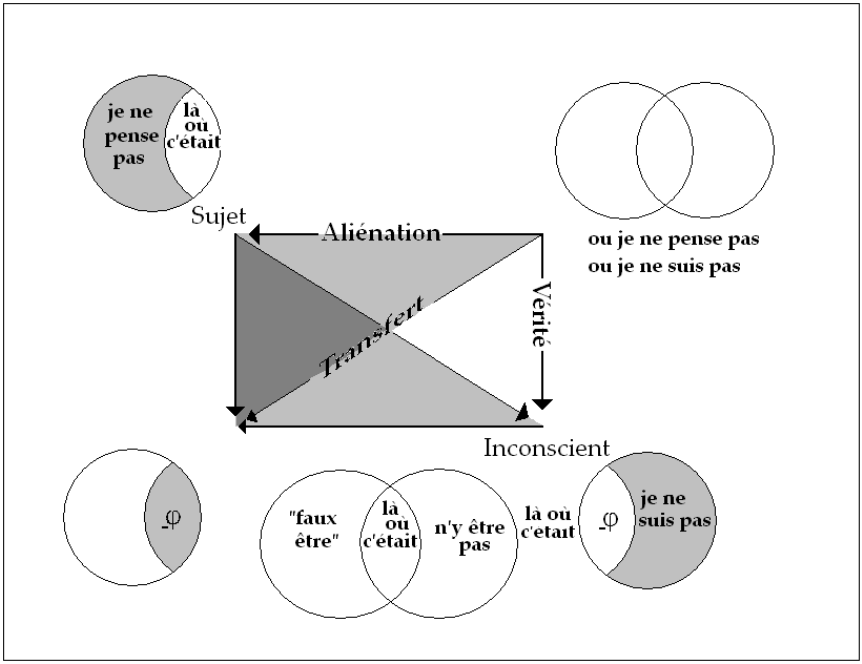
它怎么会不仅证明有效，而且成为我去年所谓“幻想的逻辑”所必需的？也就是这样一种逻辑：它在自身中保留说明幻想以及幻想同无意识之关系的可能性。要让无意识作为无意识在那里，我就还不能把它思作思想。至于我的无意识，可以说，我在那里思它的地方，恰恰就是为了不再待在自己家里。

我确实已经不在那里；就语言而言，我“不在那里”，同让门口应答的人回答“先生不在家”完全一样。那是一个被说出来的“我不在那里”，这

一点正构成其重要性；也正因为如此，我作为精神分析家不能说出它——你们可以想象，这会对客户造成什么效果。

这也把我卡在“我不思”的位置，至少，如果我在这里提出的逻辑能够沿着它的真实线索得到遵循的话。“我不思”，是为了存在，是为了待在那个地方……

我在下方画出两个圆及其交集……并用一切谨慎的引号标出——是为了告诉你们不必过分惊慌——这个“虚假存在”。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存在。人人都知道，只有不思时，一个人的存在才会如此坚实。

不过，我仍想标出我今天提出之物的区别。

这里有两种不同的虚假。人人都知道，当我带着一把名为“镜像阶段”的小扫帚进入精神分析时[注11]，一开始就标定了……

> [注11] 拉康在这里暗指自己 1936 年 8 月 3 日于马里昂巴德大会上被中断的报告。

因为说到底，它就在弗洛伊德那里——已经被说出、重复、反复灌输——我取用镜像阶段，在这里作一只挂衣架；我当时立即作出的强调，甚至比此后那些顾及人们感受的陈述更为强烈……不存在不属于这种自恋维度的爱。只要懂得阅读弗洛伊德，就会知道同自恋相对立的所谓对象力比多，关涉图中左下角的东西，即对象(a)，因为对象力比多正是它。它同爱毫无关系，因为爱就是自恋，而两种力比多彼此对立：自恋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

所以，当我谈“虚假存在”时，所涉及的并不是像贻贝附着船壳一样在上面寄居的东西，并不是想象界那种膨胀的存在。所涉及的是下方某种为它提供位置的东西，是“我不思”的结构化必然性；它被铭写在这个出发位置，而没有它，去年我们根本无法围绕《幻想的逻辑》分节说明任何东西。

当然，这个“我不思”是一个方便的位置。不只我刚才所说的膨胀存在能在那里找到位置，一切都会来到那里：总体上的医学偏见，以及心理学偏见或心理主义偏见，同样如此。

总体上请注意，无论如何，精神分析家尤其容易落入这个“我不思”。因为，如果他居住在我刚才按其起源加以陈述、标定的所有偏见中，那么相对于其他人——例如医生——他还有一项可以说是优势：当医

学偏见占据他时——而天知道它占据得何其彻底，只取这一项就够了——他恰恰不会去思考它。医生还会为此烦恼，精神分析家却不会！

他恰恰就这样接受它，也许因为他仍知道那只是一项偏见；但既然问题在于不思，他同它相处得反而更加自在。除去例外，你们见过哪个精神分析家曾质询巴斯德在医学历险中究竟是什么吗?

这当然本应已经引起某个人的注意。我不是说这从未发生，只是无人知晓。巴斯德并不是一个十分时髦的话题，但他恰好本可以留住一位精神分析家的注意。人们从未见过这种事。以后看看会不会改变吧！

无论如何，这里应当提出一个小练习：这个初始点是什么？如果正如我们在起点上已经隐约看到的——这正是我们今天推进的轴线——行动本身始终同一个开端有关，那么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提出。这个逻辑开端……

我去年有意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说实在的，像《幻想的逻辑》的许多其他要点一样，我们原本不得不让它保持悬置……既然今天我们从开端进入，就用 ἀρχή（arché）来标定它。

它是一个 ἀρχή，一个 initium，一个开端；但在哪种意义上?

它是否只像一件小测量工具——例如一把米尺——上的零点?

以这个问题为出发点并不坏，因为似乎、甚至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样提出问题，已经排除了它是一个“无标记”意义上的开端。我们甚至亲手触到：只因为我们必须质询这个 ἀρχή 点是不是零点，它就已经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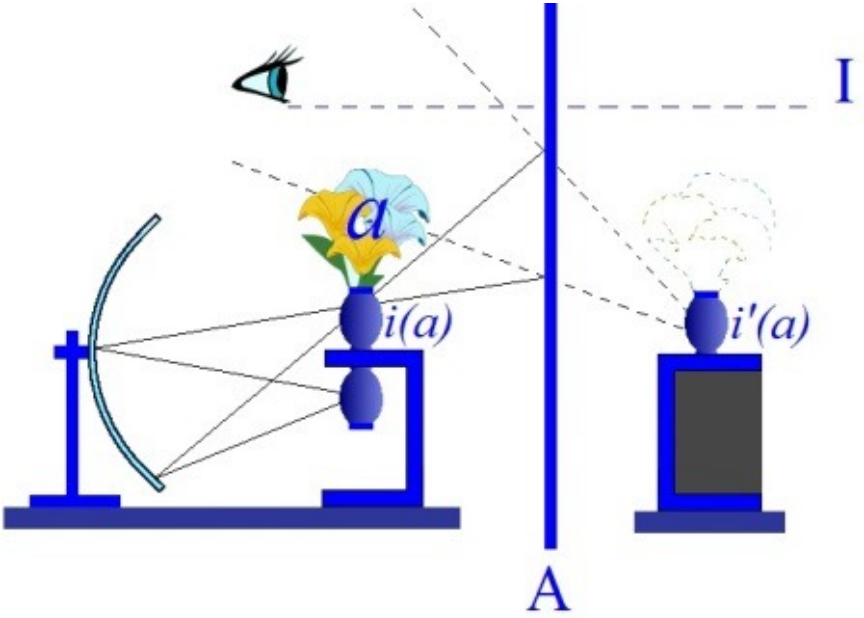
标记。说到底，这同样很合适，因为从标记的效果中推导出“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看起来非常令人满意。

要么我不是这个标记，要么我无非就是这个标记，也就是说，我不思。

例如，这非常适用于精神分析家：他要么有这个标签，要么就不是精神分析家。

不过，不要弄错。正如我刚才立即标出的，在标记层面，我们只看到异化的必然后果：在标记与存在之间并无选择。因此，如果某种东西应当标在某处，恰好就是图中“我不思”左上端的位置。

异化效果已经发生；我们并不惊讶，会在那里以原初形式找到标记的效果。我曾用一个图式推导自恋，把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置于彼此依赖的关系中；希望你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熟悉它，而这项推导已经充分指出上述效果。



因此，逻辑出发点的性质仍然悬而未决，因为它仍处在析取以前“我不思”与“我不在”的合取中。

去年，我们确实正朝着这里推进……

因为那是我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逻辑推导的初始行动——如果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构成开口的东西，我们就无法回到它；而在一切对精神分析领域的呈现中，总有必要重新找到这道裂口。正是它使我们在建立《幻想的逻辑》的这些环节以后，用最后一个季度围绕性行动打转；这项性行动恰恰被界定为构成一个无解难题。

因此，让我们从精神分析行动出发，重新质询逻辑、即幻想逻辑的 initium 究竟是什么；我必须先在这里作一番回顾。正因如此，我今天

在黑板上写下“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去年，我以如下三项来分节说明它：

- 异化操作；
- 真理操作；
- 转移操作。我把它们组成所谓克莱因四元群[注12]的三项；当然，前提是要看见：这样给它们命名时，我们还没有看到每一项各自构成的回返，即：

> [注12] 拉康早在 1966 年 12 月 14 日《幻想的逻辑》研讨班中使用过这个数学“模型”。另须注意，马克·巴尔比的一篇文章《数学中“结构”一词的意义》于 1966 年 11 月刊于《现代》杂志第 246 期“结构主义问题”专号。

- 回返操作。

就这里带着向量指示写出的形式而言，可以说，它们只是一个克莱因四元群的一半。

让我们在精神分析机构中最敏感地看到行动的点上重新把握它，并从开端重新出发；今天，这意味着从“行动建立开端”出发。

开始一场精神分析，是不是一项行动？当然是。可是，谁作出这项行动？

我们刚才已经指出，对投身精神分析的人而言，它恰恰包含辞去行动。这样一来，就很难把行动结构归给那个投身精神分析的人。精神分析是一项任务，甚至有人说“它是一门职业”。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一些毕竟很懂行的人说的：无论你们怎样界定这些遵守或不遵守规

则的人，都必须教他们这门职业。这个圈子里，人们并不称之为“分析者的职业”；不过既然这个词已经流传，他们现在就会这样说，而这个词所指的确实就是它。

那么很清楚，如果这里存在行动，大概必须到别处寻找。我们不必太费力就能自问并回答：如果它不在分析者一边，便在精神分析家一边；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这马上成为一项困难，因为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确立无意识这项行动是否每次都必须重新确立？这真的可能吗？尤其如果我们认为，按照刚才的论述，每次重新确立它，都会再次给我们一个“不思”的新机会。

这里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即任务同尚未得到把握、而且也许不可能得到把握的行动之间的关系。

也许必须绕行。我们立即就能看出，这条绕路在另一个开端、即一个人成为精神分析家的开端时刻提供给我们。我们必须考虑资料中已有的这一点——在这个领域，人们说的话似乎必须相信——即人人都知道，开始成为精神分析家，是从一场精神分析结束时开始的。如果我们想把握某种东西，只须按它被交给我们的样子来接受；必须从这个为所有精神分析人士接受的点出发。

那么，就从事情呈现的样子出发。

一个人“一次”抵达了终点；必须从那里推导这同此后一切次开端之间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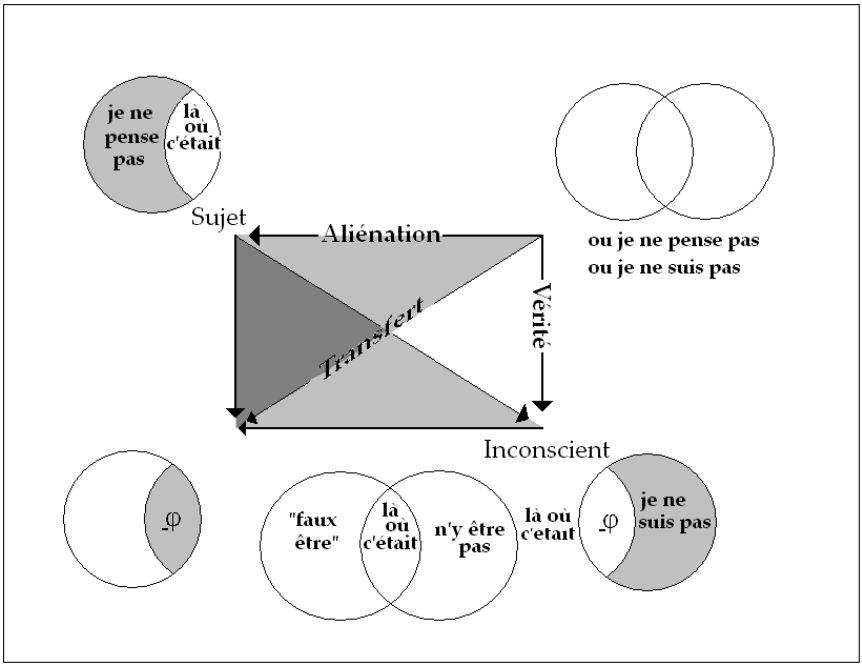
一个人“一次”抵达自己精神分析的终点；而在我们所担保的每一场精神分析开端都如此难以把握的那项行动，必定同这“一次”的终点有关。

那么，我去年提出的东西毕竟必须派上用场，也就是分析的终结在这套逻辑中如何得到表述。分析的终结预设真理操作得到某种实现：如果分析确实应当构成这样一种历程，从安置在“虚假存在”中的主体出发，使他实现一种包含“我不在”的思想，那么他就必须以交叉、颠倒的形式重新找到自己更真实的位置。处在“我不在”层面的“在它当时所在之处”，会在这个对象(a)中重新找到……

我们似乎已经做过大量工作，让你们取得它的意义和实践……另一方面，还有一个仍存续于自然主体、认识主体、主体之“虚假存在”层面的缺失。这个缺失自古就被界定为人的本质，名为欲望；但到了分析终结时，它被转译成一种不仅得到表述而且得到体现的东西，叫作阉割：我们习惯用“-j”这个字母来标记它。

从左到右的这种关系倒转，使异化主体的“我不思”对应于正在发现的无意识之“在它当时所在之处”，又使主体那里欲望的“在它当时所在之处”对应于无意识思想的“我不在”。这个关系发生翻转，恰恰支撑着两项认定：把 (a) 认定为欲望之因，把 “-j” 认定为性行动特有裂口从中得到铭写的位置。

我们恰恰必须在这里暂停片刻。你们看得到，也可以亲手触到：这里有两个 wo Es war，两个“在它当时所在之处”；而且，它们正对应着理论中把无意识同本我分开的距离。



这里有一个“在它当时所在之处”，铭写在主体层面——图中左上方——而且……

我已经说过，现在再说一遍，以免你们把它漏过去……它作为缺失，仍然系在这个主体上。

还有另一个“在它当时所在之处”，位于相反的位置，即右下角、无意识的位置；它作为对象、作为丧失之对象，仍系于无意识的“我不在”。

整个精神分析发生过程开端的那个原初丧失对象，弗洛伊德在无意识诞生的一切环节反复强调的那个对象，就在那里；它就是作为欲望之因的丧失对象。我们还须看到它处在行动的原则上。但这只是预告，

我不立即加以论证。我们还须走一小段路才能确认，因为我们必须在这里停留片刻。一般说来，片刻停留只有一个用处：使人察觉自己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度过了多少时间。

我们该说……为了收回刚才的话，我们真该说“度过”吗？我们说已经把时间“度过”，最好说时间正在“经过”。如果允许我玩弄词语，我想说的正是“并非不知道地”（pas sans le savoir）经过；也就是说，我们是带着知识度过它的，可是……

正因为我在向你们呈现自己去年那些小图式的结果，并假定你们已经知道——如果这样假定不算滥用……我带着这种知识把时间度过得太快，也就是处于匆忙中；而你们知道，匆忙恰恰会让真理逃走。不过，这也使我们能够活下去。

真理是：左上方的缺失，就是右下方的丧失；但丧失本身又是别的东西的原因。我们将把它称作“自身之因”，当然前提是你们不要误解。

斯宾诺莎告诉我们：“上帝是自身之因。”[注13] 他是否没想到自己说得如此贴切？说到底，为什么不呢？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

> [注13] 斯宾诺莎：《伦理学》，《全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4 年；贝尔纳·波特拉新译本，巴黎，瑟伊出版社，1988 年。

可以肯定，他把“自身之因”赋予上帝，由此消除了 cogito 的一切歧义；至少在某些人心目中，cogito 很可能抱有相同主张。

如果精神分析经验提醒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如果“自身之因”这个说法确有意义，它恰恰向我们指出，所谓“自身”、换言之主体——人人都不得不同意这一点，因为甚至在某个盎格鲁-撒克逊领域中……

可以说，那里对这些问题完全一窍不通……也不得不冒出 self 这个词；它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无处可置，没有任何东西与它相应——主体依赖于那个使他发生分裂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叫作对象(a)。

这为我们必须标明的关键之处署上印记：

- 主体不是“自身之因”；
- 他是“丧失的后果”；而为了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他必须把自己放进构成对象(a)的丧失后果中。

正因如此，我才说：当我陈述那条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斜线两端，即第一次分裂中被撕开的两项时，我们走得太快了。在“从主体一边看，‘在它当时所在之处’是缺失”这一陈述中，事情被假定为已知；可只有当主体把自己变成右下方的“丧失”时，它才真正被知道。

然而，主体只有把自己造作存在，才能思考这一点。“我思，”他说，“所以我在。”凭这项名为 cogito 的虚假行动，他不可阻挡地把自己抛回左上方的存在。Cogito 的行动就是关于存在的错误；我们从它所导致的最终异化中看到这一点：身体被抛入广延。把身体排除在思想之外，是笛卡尔那项伟大的 Verwerfung（拒斥）；它的效果为它署名：身体在实在中、即在不可能中重新出现——机器不可能成为身体。因此，知识把机器拆成零件，越来越彻底地证明这一点。

我们正身处这场历险，我想不必作任何暗示。不过，今天先把笛卡尔留在这里，回到后文以及我们今天必须为自己的推进加上的标点。

精神分析行动的主体，只有凭精神分析经验中所谓转移的操作，才能知道从这场经验中学到的东西。至于转移，我已经把它联系到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恢复了它的完整功能。

分析的终点在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坠落，并被还原为对象(a)的降临；对象(a)取代它，成为主体分裂的原因。

那个在幻想中同分析者围绕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进行这场游戏的人，也就是分析家；到了分析终点，正是这位分析家必须承担：自己不再是任何东西，只是这份剩余——已知之物留下的、名为对象(a)的剩余。我们的问题必须围绕这里展开。

抵达分析终点的分析者，如果确有一项行动把他带向成为精神分析家，我们是否必须相信：他只有在那项把被假定知道的主体重新放回原位的行动中，才完成这次跨越？如今我们看到这个位置在哪里，因为它可以被占据；但它只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被还原到这样一个终点时才得到占据：此前以其行动担保它的人——即精神分析家——自己已经变成这个残余、这个对象(a)。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那个在所谓“训练分析”终点、可以说接过这项行动挑战的人，明明知道自己的分析家在这项行动完成时变成了什么：一份残余、一件废料、一个被抛弃的东西。我们不能略去这一点。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当他重新确立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接过分析家本人的火炬时，他不可能不把 (a) 安置到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层面——哪怕没有触碰它；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是他不得不重新取作一切精神分析行动之条件

的。就在我称为“处于通行之中”（dans la passe）的这个时刻[注]，他知道：去存在（désêtre）就在那里，而分析者本人正是以这种去存在击中了分析家的存在。

> [注] La passe 不是泛指“通过”，而是分析者向分析家位置发生的结构性、制度性跃迁；全卷统一译“通行”。米勒定本的公开节选也以 la passe 命名这一“跳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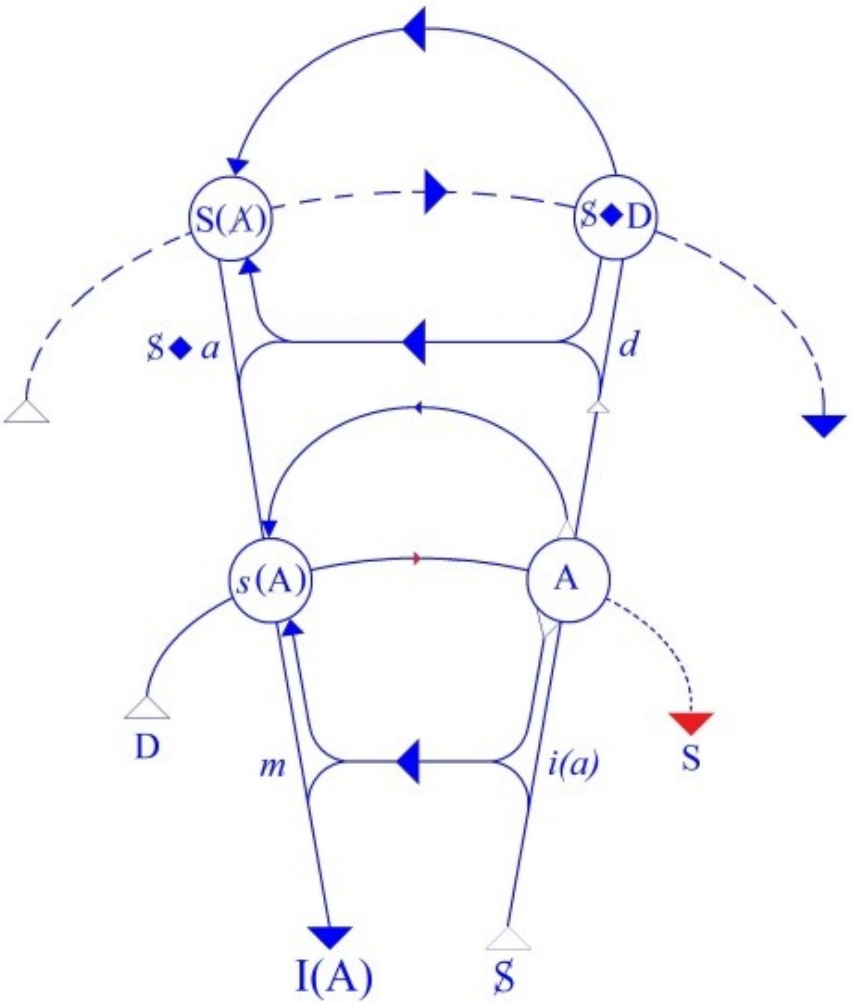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我说“没有触碰它”，因为他正是这样投身进去：去存在被设立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点，而处在“通行”中的主体，在精神分析行动的时刻对它一无所知；恰恰因为他已经成为这份知识的真理。可以说，这是一项“并非没有知识便可抵达”的真理——正如我刚才所说——而这样的真理是无法治愈的：人就是这项真理。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可以说，精神分析行动在起点上凭一个被歪曲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运作。因为如今已经显出——其实一开始就很容易看见——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处在精神分析逻辑的 ἀρχή（arché）上。若那个成为分析家的人能够从自己已经变成的真理中得到治愈，他便会懂得标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层面发生的变化。我们在图表中用能指 S(A) 标出的正是它[注14]。

> [注14] 参见《著作集》《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第 817 页。



必须察觉，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在分析终点被还原为“不在那里”；这同无意识本身特有的“不在那里”相同，而且这项发现属于同一个真理操作。

我再说一次，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质疑，以及一切知识运作所牵涉之物的颠覆——我要说，我已多次在诸位面前以这种形式质询它：

- “那么，无论这份知识是康托尔的超穷数还是分析家的欲望，在人们知道以前，它在哪里？”

也许只有从这里，才能着手使存在重新涌现；其条件是察觉，如果存在的起源以及对它的再次询唤……

这次询唤可以从终于消隐的大他者之能指，转向取代它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即名为对象(a)的对象——正是从大他者的场域中被撕下来的……那么，这也会使人察觉：任何行动中可能涌现的存在，都是没有本质的存在；正如一切对象(a)都没有本质，这正是它们的特征。对象(a)是没有本质的对象；它们可能在行动中，也可能不在行动中，由某种主体重新唤起。我们将看到，这种主体就是行动的主体——我要说，是一切行动的主体——因为正如分析经验终点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一样，它是一个在行动中并不在场的主体。

第6课 · 1968年1月17日

谈精神分析行动时，可以说，我有两重抱负：一长一短；当然，短的那一重更好。

- 长的抱负不可排除，就是阐明行动究竟是什么。
- 短的抱负，则是知道精神分析家如何存在。

我在过去某篇文章中已经谈过“精神分析家”。我不是谈“这个”精神分析家——法语中的 du 也不能拆成 de le——而是说，我只从这一点出发：存在“一些”精神分析家的东西[注1]。是否存在“这个”精神分析家的问题，同样绝不应当悬置；问题是怎样存在“一位”精神分析家，而这同逻辑中所谓存在问题大致以相同措辞提出。

> [注1] 参见《著作集》《终于受到质询的主体》，第 236 页。法语 du psychanalyste 在这里取部分冠词意义，强调“有精神分析家这种东西”，而非预设一个完整、确定的“这个精神分析家”。

精神分析行动如果是一项行动——我们从去年起就由此出发——就会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怎样把它分节说明并说出来。这种做法是正当的；再进一步，它还包含行动的后果，因为行动凭自己的维度本身就是一种说。行动说出某种东西；我们就是从这里出发。这一维度历来都已被人察觉，存在于事实和经验中。

只须片刻唤起一些公式——一些极有分量、曾实际发生作用的公式，例如“依良心行事”——便能把握问题所在。

“依良心行事”，可以说是行动历史围绕旋转的一种中点，或者也可以取作标定行动的出发点。为什么要依良心行事？又是在谁面前？

大他者的维度同样无法消除；行动正是在其中前来作证。

当然，这是否意味着真正的转折点、重心就在那里？从我们当前所在之处——即良心本身正受到质疑之处——出发，我们哪怕片刻能够这样主张吗？良心能够给什么提供尺度，这一点正受到质疑。

肯定不是给知识提供尺度，也不是给真理提供尺度。我们正从这里重新出发，衡量：

- 那个尚未得到界定的东西；
- 那个尚未真正被紧密把握的东西；
- 那个在这里仅仅被引入、甚至还没有得到假定的东西——精神分析行动——从而重新质询行动是什么这一问题围绕的平衡点。

当然，我们知道地平线上有一片广阔低语，从远处传来，从所谓古典时代、也就是所谓我们的古代传来。围绕示范性行动、值得赞颂的行动，乃至随你们说，普鲁塔克主义[注2]，那里说出过的一切，无疑已经使我们感到：进入这场游戏的自我推崇略微过多。然而，我们真同它拉开了那么大距离吗？

> [注2] 普鲁塔克在《道德论集》中界定怎样依良心积极行动。

如果我们认为，今天是围绕一种话语——一种关于主体的话语——重新把握行动，而且我们的优势只能来自这一点：我们把主体的支点缩到更窄，强迫自己接受最严厉的纪律，只把主体作为语法主体的维度

当作确定之物；那么就必须听明白，这并非新鲜之事。去年呈现《幻想的逻辑》时，我们已经在“我不思”的位置，标出了这种仿佛从为主体保留的领域上切去一角的主体形式。正是这个语法维度，使幻想能够在字面上受到一个句子的支配；这个句子只有凭语法维度才能成立和得到设想：Ein Kind wird geschlagen——“一个孩子正在被打”[注3]。我们熟悉它。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被打——对性倒错发生的贡献》，德文全集第 12 卷第 197 页；法译载《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第 6 卷第 3—4 期，巴黎，Denoël & Steele 出版社，1933 年；另收于《结果、观念、问题》第一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 年。

这是最可靠的资料点；围绕它……

我们也以纪律性规定为名提出：不存在元语言，逻辑本身必须从语言这项资料中提取出来……反过来，我们让那套三重操作围绕这种逻辑旋转；通过某种尝试、猜测性试验和冒险，我们给予它克莱因四元群的形式。我们最初按照接近它时的原始路径，把这些操作标为异化、真理与转移[注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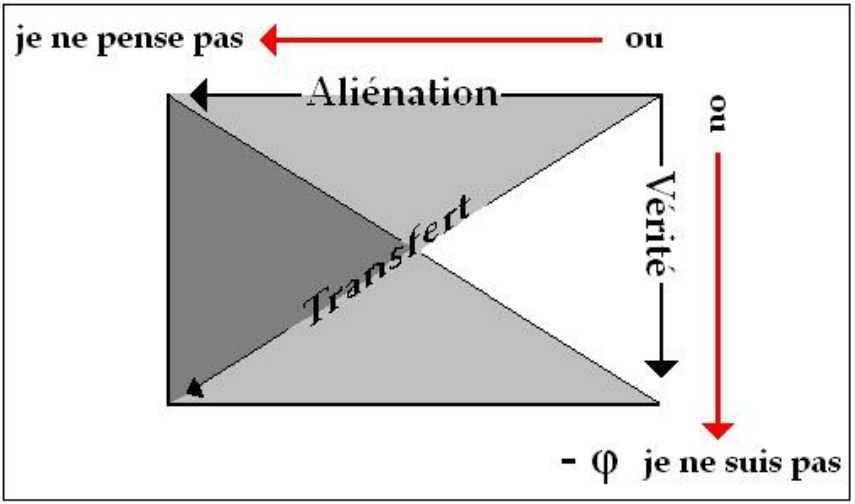
> [注4] 参见 1966—1967 年《幻想的逻辑》研讨班：自 1966 年 12 月 14 日起讨论克莱因四元群；1967 年 1 月 11 日一讲则围绕语法主体参照幻想句 Ein Kind wird geschlagen。

当然，这些只是标定。如果沿某些方向遍历它们，至少为了让自己从中辨明方位、支撑这些操作可能为我们代表的东西，我们不得不给它们另一个名称；但前提当然是察觉，所涉及的仍是同一条路径。

因此，我们要从主体的颠覆出发[注5]……

> [注5]　雅克·拉康：《弗洛伊德无意识中主体的颠覆与欲望的辩证法》，《著作集》第 793 页。文中的图表形成于 1957 年第一季度《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最初几讲；该文也援引了本课稍后将谈到的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大约十年来，我们已经对它作了足够充分的分节说明，使人能够理解“从主体的颠覆出发”这一说法在此刻取得的意义……我们必须从这里重新把握行动的功能，从而看到问题落在两个主体之间：一边是语法主体，它可以说铭写在行动这个概念本身、铭写在行动向我们呈现的方式中，即活动的“我”；另一边是以这些滑动的术语得到分节说明、随时可能通过一次位移、一次向这个“四面体”某个顶点的跳跃而从我们手中逃走的主体。上次我已在这里重画这幅图，提醒过这些功能与术语。



- 这里是原初异化出发的“要么—要么”位置；它通向“我不思”，从而使后者甚至可以被选择——而这种选择意味着什么？

- 那里则是分节说明另一个选项的“我不在”。这些向量——更准确地说，是根本操作所取的方向——就是我刚才以异化、真理和转移这些术语提醒过的方向。它们意味着什么？会把我们引向哪里？

我们把精神分析行动设为由如下内容构成：支撑转移……

相关知识卡 分析行动、acting-out与“回应无意识” ・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我们没有说谁支撑；作出行动的人，也就是精神分析家，已被隐含在内……如果不把这种转移的真正结点重新放回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功

能中，它便只会成为一种纯粹的猥亵——我要说——再加上含混不清的喃喃。

相关知识卡 分析行动、acting-out与“回应无意识” ・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转移将无意识的现实付诸行动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在这里这样做了：我们表明，转移作为效果呈现的全部多样性，只有联系到这项真正根本的功能才能得到整理。凡是知识有所进展之处，这项功能都无处不在；而它在这里恰恰因为无意识的存在使其受到质疑而取得价值。这个问题从未被提出，因为人们总是已经拥有答案——可以说，这个答案是隐含的，甚至根本没有被察觉——即只要有知识，就有主体；必须在知识中出现某些偏移、裂缝、震动和游隙时刻，人们才会忽然注意到它，知识也才会由此得到更新。在此以前，是谁知道？

事情发生时，人们几乎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精神分析领域使它变得无法回避。

既然无意识把一种“没有主体的知识”——这种不可思议之物——放到我们面前，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会怎样？当然，这也是人们不可能不注意到的东西：如果继续认为主体包含在这份知识里，就只是任由压抑

的全部效力流失。压抑只能按如下方式来设想：无意识中在场并且可能返回的能指，恰恰在这一点上受到压抑：

- 它不包含主体；
- 它不再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的东西；
- 它同另一个能指相互分节，却并不在那里代表主体；
- 对无意识的真正功能，不可能有别的定义。因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绝不只是含蓄之物、晦暗之物、古老之物或原始之物；无意识始终属于全然不同的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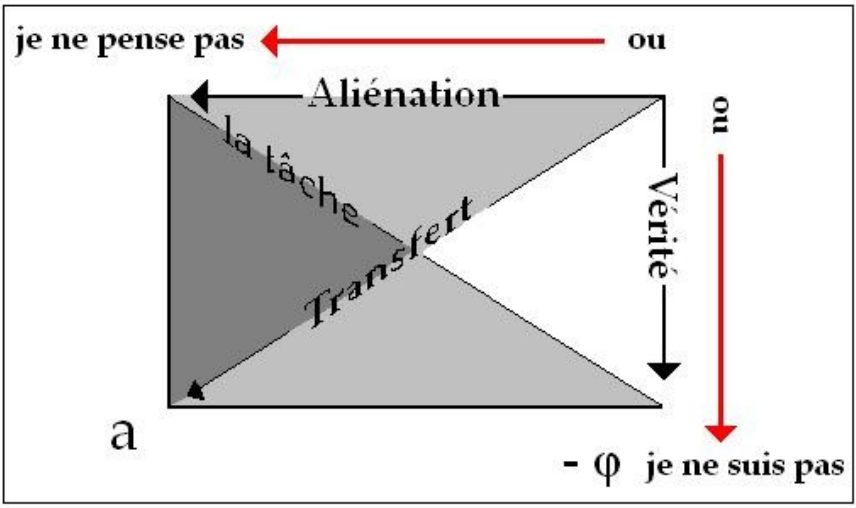
在支撑或接受转移——随你们怎样说——这项行动中被建立为“做”的运动里，问题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变成什么？我要告诉你们，精神分析家原则上知道它变成什么：它当然会坠落。我刚才已经说过，在这项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悬置中，理论上所牵涉的是划去它的一笔，是 S 上象征这种悬置的横杠。在分析家于分析中的生成过程中，这表现为某种东西产生出来，而且产生在一个对精神分析家绝非无关紧要的位置，因为这个东西恰好在他自己的位置涌现。它叫作对象(a)。小对象(a)正是击中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那种去存在之实现。

来到这个位置的正是分析家本身，这一点毫无疑问；它显现在可以说使他感到自身深受牵涉的一切推论中，甚至使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实践思想弯向挫折辩证法的方向。你们知道，这套辩证法围绕如下内容建立：在精神分析的“做”中，他自己作为某种实体呈现，而这实体受到摆弄和操纵。

问题恰恰在于误认这个“做”同使它成为可能、可以说建立它的行动之间的区别。后者就是我刚才从中出发、界定为接受并支撑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行动；可是，精神分析家知道，这个主体注定走向去存在。因此，可以说，这构成一项根本失衡的行动，因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而如果有一个人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那就是精神分析家。

是现在说，还是稍后一点再说？

但为什么不现在说？为什么不立即说，然后再回头讨论问题本身？我希望通过提醒你们其他领域、其他陈述中的坐标，使这一切更为熟悉……我们是否必须提醒：精神分析任务从那个已经异化、并且在自身异化中多少显得天真的主体之点勾勒出来；精神分析家知道，这个主体由“我不思”界定。而精神分析家交给他的任务，是一种“我思”；它之所以取得全部重音，恰恰因为精神分析家知道“我不思”内在于主体的地位：



精神分析家交给他一项思想任务；这项思想在其陈述本身、在精神分析家给他的规则中，就以某种方式承认了“我不思”这项根本真理：

- 他进行联想，而且自由联想；
- 他不试图知道自己是否作为主体完整地处在联想中，是否在其中肯定自己。

精神分析行动赋予地位的这项任务，本身已经包含这种主体的撤黜。

而这会把我们引向哪里？必须记得结果——不要总花时间忘记弗洛伊德明确分节说明的东西。它有一个名字，弗洛伊德并没有含糊其辞……

天哪，这件事越是需要突出，就越是因为它作为主观经验，在精神分析以前从未发生……它叫作阉割，必须在其主观经验的维度中来理解，因为主体只有通过这条道路，才在任何地方都恰好作为缺失实现自己。这就是说，主观经验最终抵达我们以 $-\varphi$ 象征的东西。

不过，如果文字的一切运用，都凭这样一点获得正当性——只要诉诸对文字的操弄就足以避免出错，当然前提是懂得使用它——那么我们至少仍有权试着在这里加入我今天开头谈精神分析家时唤起的“存在某物”。这个“存在某物”，即一项缺失的“存在某物”，必须体现在实际为它命名的东西中：阉割。也就是说，主体在其中意识到，自己没有我不得不选一个术语而称作“唯一的、一元的、使之一体的享乐”之器官。

这里严格涉及的，是在异性主体结合中使享乐成为“一”的东西；也就是我去年坚持的要点：主体不可能在自己想象为性行动中的一体化里，作为元素、作为有性伙伴而得到任何主观实现。

去年，我曾用黄金数来试图在诸位面前紧密把握这种不可通约性[注6]；这个符号让某种东西能够以最宽广的方式运作……

> [注6] 拉康在 1967 年 3 月 1 日、3 月 8 日、4 月 12 日、4 月 26 日及 5 月 10 日各讲中引入黄金数。

这里涉及数学领域的东西，我无法加以细论……这种不可通约性，就是小 (a) 同 1 的关系；我并非无意地重新用小 (a) 来象征黄金数。精神分析任务终点所显现的主观实现，恰恰就在这里发生：即这项缺失、这个“没有器官”。

当然，这并非没有背景，只要我们想到器官与功能是两件不同的事，而且差异大到可以说——我不时会回到这一点——问题在于应当给予每个器官什么功能。这才是生命适应的真正问题。器官越多，生命就越被它们缠住。

不过，先悬置在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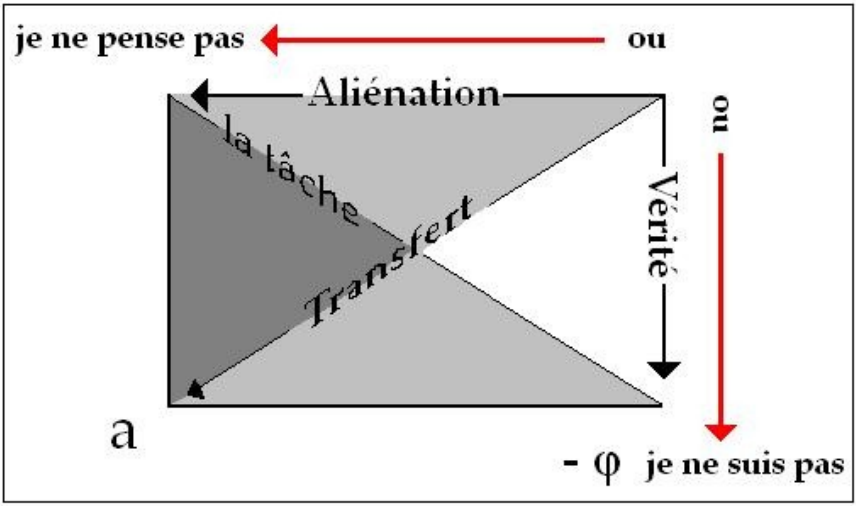
所以，这里涉及一种有限经验、一种逻辑经验。说到底，为什么不呢？因为我们刚才跳到了另一个平面，即生命同自身之关系的平面，而我们只通过这场主观历险的图式来接近它。这里必须提醒：从生命的观点看，这一切毕竟可以被视为一种人工制品；逻辑是真理的场所也不改变这一点，因为最终的问题恰恰是这个——到时候我们会给予它全部重音：真理是什么？

不过，我们此刻必须看见这两条线中的一条。我把它标作任务、分析者走过的道路；他从天真的主体——也就是异化主体——走向对缺失的实现，而正如我上次请你们注意的：

- 这项缺失并不是我们知道处于“我不在”位置上的东西；它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 我们一向知道，这项缺失就是有时称作“人”的主体的本质；
- 人的本质是欲望，这早已有人说过；只是这项缺失在其分节说明中、在它作为 ὄργανον（organon，工具）的功能中取得了进展。这个进展根本上是逻辑进展，发生在阳具缺失本身得到实现之中。

但它也包含：丧失……

在道路走完以前、甚至仅对我们这些知道的人而言，丧失起初就在同一个点上……作为无意识地位之起源的对象丧失——弗洛伊德始终明确这样表述——在另一个地方得到实现。它恰恰实现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去存在层面；我就是从那里出发的。



支撑转移的人——图中黑线下方的人——知道自己从哪里出发；不是说他在那里，他非常清楚自己不在那里、不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但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所经受的去存在会同他会合；最终，正是他这个分析家给该主体所变成的东西赋予身体，其形式就是小对象(a)。

这样一来，正如可以预期、也正如一切结构观念所要求的：异化功能在开端使我们只能从左上顶点的异化主体出发，最终又可以说原样重新出现。通过一项逻辑操作在自身阉割中实现自己的主体，看到那个丧失对象遭到异化、被交给他者、可以说从自己身上卸下；而在发生过程中，我们能够把整个结构的起源设想为来自这个丧失对象——这就是分析家的功能。因此要作出区别：当小 (a) 来到这里时，它的异化同 $-\phi$ 分开；在分析终点，理想地说，$-\phi$ 是主体的实现。这就是相关过程。

我今天在你们面前继续展开的这番表述，还有第二个时刻。我要在这里打开一个括号，安放刚才使我停住的问题。本来可以把它当作导言，现在我把它当作一次提醒：这并非偶然……

不是一种课堂游戏，也不是为了取用一个中学教育曾拿来搔弄我们脑子的熟悉要点……我才援引笛卡尔的 cogito。而是因为它本身含有一种尤其适合重新容纳弗洛伊德式迂回的要素。当然，这绝不是为了论证某种莫名其妙的历史连贯性，仿佛这一切应当逐世纪拼接起来，构成一种进步；因为太明显了，如果它使人想到什么，那倒更像迷宫。不过这并不重要，先放下它……

仔细考察笛卡尔的 cogito，请注意：其中作为存在而被假定的主体，固然可以是思想的主体，可归根结底，是何种思想？是刚刚排除了一切知识的思想。

这里说的不是笛卡尔以后那些人的做法：他们沉思从“我思”到“我在”的直接性，建立一种证据性，并随自己的喜好把它弄得坚实或飘忽。这里说的是笛卡尔的行动本身，因为它是一项行动。关于这项行动，人们向我们转述和说出的，恰恰是：把它称作行动，就是指出一切可能知识的悬置在此告终。那么，保障“我在”的，究竟是它作为 cogito 之思想，还是对知识的排除？

如果想到哲学教科书所谓一项哲学思想的“后继者”“后世”，这个问题很值得提出。教科书讲起来，仿佛只须捡起几块糖浆重新调成另一种混合物；实际上，每一次都有一次更新，有一项未必相同的行动。如果我们把握黑格尔，当然仍会像在别处一样，看到被假定知道的主体遭

到悬置；差别在于，这个主体最终注定要把绝对知识交给我们，这绝非没有缘故。

但要看清这是什么意思，就必须稍微贴近一些考察；为什么不从开端看起？

如果《精神现象学》明确地把自己奠立为从其行动功能中生成的东西，那么，在“为纯粹声望而进行的殊死斗争”这一神话中，难道不明显可见：这项起源处的知识——它必须一路开辟道路，直至变成那个不可思议的“绝对知识”；既然黑格尔自己这样表述，人们甚至可以追问，届时还有什么能够哪怕一瞬占据主体的位置——这项作为起点呈现给我们的知识，就是死亡的知识，也就是说，是把悬置推到另一种极端、彻底的形式，并以此作为知识主体的基础？[注7]

> [注7]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巴黎，Aubier-Montaigne 出版社，让·伊波利特译，1939 年；或巴黎，Aubier 出版社，J.-P. Lefebvre 译，1991 年。

难道我们不应当注意到并从后果上重新质询这一点：精神分析经验所提出的小对象(a)……

在我的话语路径中，这种话语只是概括、标点，给这一经验到处得到的分节以标志和意义，哪怕它生成的是紊乱与混乱……这个对象(a)，我们难道没有看到，它来到了如下东西占据的同一个位置：

- 在笛卡尔那里，是对知识的排除；
- 在黑格尔那里，是作为“死亡之知识”的知识；我们知道，它的功能无疑就在这里。

而这项“死亡之知识”恰恰是在“为纯粹声望而进行的殊死斗争”中得到分节的，因为这场斗争奠定了主人的地位。享乐的 Aufhebung——扬弃，即取消而又保存——正从这里产生，也从这里得到说明：主人通过一项决定性的行动放弃享乐，使自己成为死亡的主体，并由此建立自身。也正是在这里——我当时已经强调过——出现了我们可以提出的反驳：在一个黑格尔未曾解释的奇特悖论中，享乐竟会从这一 Aufhebung 返回主人。[注8]

> [注8] Aufhebung 可译为解除、取消、废除、终止、扬弃或升华。这个词同时意味着“取消”与“保存”，因而难以翻译；可参见《著作集》第 880—882 页《让·伊波利特关于否认的评论》。这个词也见于弗洛伊德；让·伊波利特称它为“黑格尔的辩证法词语”，并译作 levée（解除）。

我们已经多次追问：“为什么？”

- 如果奴隶之所以成为奴隶，是因为他不愿放弃享乐，那么他为什么、为什么不把享乐保留下来？

- 主人的地位恰恰在于放弃了享乐，享乐为什么又会返回主人？除非它以某种形式返回，而要说明这种形式，我们或许有权要求比黑格尔大师手法的障眼戏更多一点东西。

如果我们能够在弗洛伊德的辩证法中，触到一种对第一次异化之后享乐之命运更严格、更准确、也更符合经验的处理方式，那绝不是一项无足轻重的检验。我谈受虐狂时已经作过足够提示，你们应当知道我在这里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指出一条需要重新走过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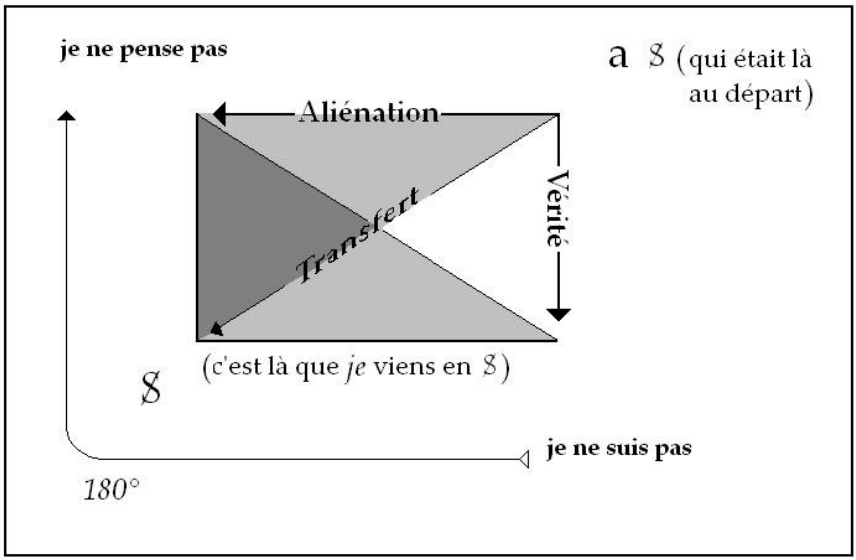
今天我们当然无法在那里久留，但必须在恰当位置标出这个开端。

现在继续我们的道路，并按照精神分析行动的问题继续下去：到目前为止——我是指刚才所说的一切——我们只论证了它通过自己的“做”生成什么。

要再向前一步，就请来到行动唯一可以受到质询的点：它的起源点。

人们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上次已经提到：在一场被认为已经完成的精神分析终点，分析者能够成为精神分析家。这里完全不是要证明这种衔接何以可能。

问题是把它作为已经分节的命题提出来，并用我们的四面体图式检验它。



你们可以注意到，这个主体完成了那项任务，并在任务终点实现为阉割中的主体——阉割就是性结合之享乐的缺损。我们必须看到的，正是这个主体……

如果你们愿意，可以通过一次转动或翻转，转过若干角度；在这张图的画法中，就是一百八十度……我们必须看到，当主体已经在这里实现以后，他经过这里并回到出发位置。不过，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来到这里〔右上方〕的主体知道主体经验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一经验还意味着，可以说，在他左边留下了那个人最终变成的东西，而那个人的行动要为已经走过的道路负责。换言之，对我们此刻看到在自身行动层面出现的分析家来说，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去存在已经是已知之事；按照这一整套逻辑，它又是必然的出发位置。

正因如此，正如上次所说，他的这项行动便成为问题；刚才我们把它界定为一项处于失衡位置的行动。如果你们愿意问：既然他走过了使这项行动成为可能的道路，并且从此以后他自己就是这项行动的真理，那么，他的行动得到了何种程度的照明？

这就是我上次提出的问题。我说，一项“不无所知”地获得的真理，是一种——容我这样表达——无可治愈的真理。因为，假如我们追随整张图翻转所产生的结果——唯有这种翻转能够说明，如何从任务果实即征服，过渡到那个人的位置，而他跨过使任务得以重复的行动——那么，开端处“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这个二者择一中的 S 就来到这里。事实上，只要有行动混入任务并支撑任务，所涉及的严格说来就是一次能指干预。

精神分析家在任务进程中无论行动得多么少，他真正行动之处，都在于能够实施这种能指介入；严格地说，它不能被概括成任何可称为知识的东西。

精神分析解释所生成的，是某种只能以如下形式唤起普遍之物的东西；请你们注意，这种形式同此前所有被称作普遍者的东西多么相反。可以说，它就是人们所谓“万能钥匙”那一类特殊之物：一把能打开所有盒子的钥匙。

究竟该如何设想它？把自己奉献为那个掌握某种东西的人，而这东西起初只能被界定为任意一个特殊之物，这究竟是什么？

关于位于主体 S 这一点的人具有何种地位，我在这里也只是把问题开启：他怎样才能让任务中——而非奠基行动中——存在某种回应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东西。这才恰恰开启了那个问题：要有一位分析家，什么必须成为可能？

我再说一次：在图式左上角，我们的出发点是，要让整个图式化成为可能、让精神分析逻辑存在，那里就必须有“一些”精神分析家的东西。当他在亲自走完精神分析道路之后来到那里，他已经知道，作为分析家重新走一遍这条路会把自己带到哪里：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去存在；并且只成为那个名为对象(a)之物的支撑。

相关知识卡 通行、去存在与分析家的产生

这项精神分析行动给我们勾勒出什么？这里必须提醒，一项恰切的坐标就在于：它从精神分析经验中排除一切行动，排除对行动的一切命令。

人们建议那个所谓患者——尽可能准确地说，就是分析者——等待以后再行动；而如果有什么刻画了精神分析家的位置，那恰恰是：他只在我刚刚划定的能指干预领域中行动。

但这是否也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看到一切行动的地位由此焕然一新？因为任何行动的位置……

而我们将要沿着自己所说之物的痕迹，看清这里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谈行动的地位时，甚至不能擅自在后面加上“人的行动”……如果精神分析家在某个地方既不认识自身又恰好存在，那就是因为他无疑是分裂的主体，甚至在自身行动中也是如此。而他受到期待的终点，即那个对象(a)，并不属于他；它是分析者要求他作为大他者提供的对象，以便同他一起把它从自身排除出去。

这里是否有一幅图形，能够为我们打开一切行动在不同形态中的命运？

自古以来，古代就试图在英雄身上安放行动的全部幅度和全部戏剧性。当然，这并不表示当时的知识没有朝其他踪迹定向；同样在那个时代——提醒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人们为明智行动寻找根据，且说实话，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应当受到轻视。他们在某种“善”中寻找根据：行动的果实，似乎由此给伦理学提供了最初尺度。我曾在评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时重新讨论过它〔1959—1960〕。《尼各马可伦理学》从这里出发：首先存在快乐层面的“善”，而在快乐这一范围内沿一条正确道路前进，会把我们带向“至善”的概念。[注9] 显然，这以自己的

方式构成了一种行动，并且在所谓哲学行动的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如何评判它，在这里毫不重要。这是一个时刻。

> [注9]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巴黎，Garnier 出版社，1940 年，双语版；拉康在其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尤其援引此书。

我们知道，与此同时还装配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质询：对行动的悲剧性质询。不过，即使这项质询把自己托付给幽暗的神性，古代的ἀνάγκη〔ananke，必然〕这个维度、这种力量也绝没有被假定知道；它由那些暴怒疯子一般的众神体现出来。

请衡量一下，从这种行动观到康德的行动观之间走过了多大距离！

如果有什么从另一条路径使我们必须把行动表述为一种说，那正是康德给出的尺度：行动必须由一条能够具有普遍效力的准则来规范。

这难道不正是——我希望你们中有些人还记得——我曾很乐意拿来作漫画式处理的东西吗？我把这样的规则，同萨德幻景中表述的规则接在了一起。

另一方面，在这两个极端——我是说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之间，把大他者本身当作参照，难道不正是至少一种古典形式的宗教指导所给出的、同样十分滑稽的参照吗？

在人们看来，上帝眼中衡量行动的尺度，是所谓“正当意图”。

把这种尺度置于行动价值的原则位置，还有比这更根深蒂固的欺骗道路可供开启吗？

在一项行动中，“正当意图”有可能哪怕一瞬替我们撤销对其果实究竟如何的追问吗？

当然，不是弗洛伊德第一个使我们得以走出这些封闭环路。为了悬置对善良意图之价值的判断，黑格尔关于“心的规律和自负的疯狂”的分节已经给了我们一种十分有效、明确并且可用的批判：仅仅奋起反对世界的无序，并不足以保证人不会恰恰通过这种抗议，成为无序最持久的支撑。[注10]

> [注10] 黑格尔，前引书，第 302—312 页。

在这一点上，恰恰是继 cogito 行动而来的思想，给了我们许多范型。

当《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摧毁了从“心的规律”中产生的秩序时，我们看到的，除了某种回返之外还能是什么？我只能把它称为理性狡计的进攻。

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察觉，这场沉思十分明确地通向了某种名为政治行动的东西。无疑，这并非徒劳：由政治沉思、同时也由政治行动生成的东西——我丝毫不把马克思的思辨同它在革命这个或那个转折处被实现为行动的方式区分开来——是否可能使我们围绕政治行动确定一整条反思路线？这些行动确实是在“说”的意义上的行动，更确切地说，是以某某人的名义作出的说；正是它们带来了一定数量的决定性变化。

难道不能在同一个范围内重新质询这些行动吗？今天逐渐勾勒出的精神分析行动正把我们带向这个范围：它既在那里，又不在那里；凭借弗洛伊德赋予无意识分析的口号，可以这样表达它：

Wo Es war——他对我们说——soll Ich werden。

上次我教你们这样重读它：Wo S war。请允许我把这个 Es 写成这里这个被划杠的字母：在能指曾经行动之处；“曾经”具有双重意义——它刚刚停止行动，又正要行动。这里不是 soll Ich werden（我应当成为），而是 muß Ich：我这个行动者，我这个——如前几天所说——向世界投出某种可供人们诉诸为一项理由之物的人；muss Ich klein (a)，muss Ich (a) werden：就我引入世界的新秩序而言，我必须成为废弃物。

这就是我向你们提出的新形式：以一种新的方式追问，在我们的时代，行动究竟具有何种地位。只要这项行动……

同若干原初开端有如此奇特的亲缘关系，而其中首要的就是笛卡尔的 cogito……只要精神分析行动使我们能够重新提出这个问题。

第7课 · 1968年1月24日

今天，我们之间的约定会稍有变化。当然，按照交换给付的正当法则，你们把自己的在场给我，以换取某种你们期待的东西；它被假定从某一底蕴中产生，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问题恰恰是何种程度——原本就为你们准备。简言之，你们期待一堂课。

我不时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我在向谁讲话，这番话从哪里出发。你们知道，我多么谨慎地坚持这一点。我一刻也不能丢失那个原初坐标：这番关于精神分析的话语，是向精神分析家说的。这里聚集了如此多不是精神分析家的人来听某种东西，这一事实本身就需要一系列解释。

若只满足于历史解释，那就错了：某次或多次相遇，或者人群中的推动效应，使我进入了原先讲话场所以外的听觉范围。这显然不足以解释事情。

正是在这里，可以把历史的参照——毕竟，人们通常所谓历史就是这种拥挤推撞——同结构的参照作比较。显然存在结构上的理由。今年我谈行动，提出关于行动的问题，并且上次走到了我所说的那个点；从几个小小样本来看，我得到了一项证据：至少有些人察觉了上次表述的重要性。那个点标出一个结点，它证明我们有理由、也使我们能够至少在这个结点上汇集我从本学年开始以来逐步分节的一切。开头时，它当然可能给人模糊印象，尤其当人们以为首先说出的必然就是原则。但在许多情况下，即便有结构参照、甚至尤其当有结构参照时，也不得不采取另一种进路：因为结构按其本性无法一开始就被给

出，必须赢得它。否则就看不出，例如，为什么那个克莱因群类型的图式……

我目前正借助它，尝试从精神分析行动打开的视角分节说明行动……为什么我没有在大约十五年前就从这里开始。

所以，今天会出现一种停顿；眼前的场合只是借口，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事情无关紧要。今年关于《精神分析行动》的研讨班邀请卡上写明，1 月 31 日、2 月 28 日、3 月 27 日和 5 月 29 日凭邀请入场；也就是说，我原先安排了几场规模更小、能够展开交谈的聚会。

这项安排总的说来，是要最低限度地提供某种东西；它对我一直很难操持，对所有人也都如此：闭门研讨班的规则，以及其中包含的筛选和选择方式等种种复杂问题。我不能确定，那些主动表示希望出席的人必然就是最合适的人。

这种事情总会形成某种竞争：原本不想去的地方，一旦小伙伴去了，自己便开始想去。这一切不会让那位原则上宁愿接纳、而非拒绝的人更容易办事；不过，目的仍是试着建立一种内部关系稍有不同的交流环境。

我打算这样解决。系列以外的一件事情使我 1 月 31 日不能到场。

这并不构成取消闭门研讨班的理由。原先约定，由所谓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成员——人人都知道我在操持这个学派……

而且理由再正当不过，因为他们也是精神分析家……只要他们表示愿望，就由他们在 1 月 31 日来到这里。

我甚至还没有请梅尔曼医生到场主持这次聚会；我现在请他。我原先定下的原则是，只有那些在这里足够经常地出现、因而知道我迄今说过什么的学派成员，才来参加这次会议。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多么正当，因为我要给这次会议指定如下主题。况且，这个想法远非只属于我；我甚至要说，它是梅尔曼医生给我的。他最近在学派教学内部向我建议：就在这场格外重要的研讨班进程中——毕竟，很难看到还有哪个问题能比精神分析行动本身更触及精神分析家的核心，条件当然是这个词有意义……

我希望，这一意义迄今已经足够清楚地进入你们的视野……至少我已经赋予它一种形式；可以依照若干问题来分节它，并且考察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回答，乃至它们究竟是不是问题。

真正被打开的恰恰是这里；问题毕竟就是这样提出的。我赋予它最初的分节，于是人们可以看到内部显现出一些空白；其他地方已经有些格子被填满，甚至填得过满、溢出并失去平衡，因为没有顾及其余部分。引入所谓结构，兴趣恰恰就在这里。相当奇怪的是，我们竟然仍然……

近来的某些表现迫使我这样说……在精神分析家这一层面上，甚至还把结构原则层面是否能够存在一个问题当成问题。

有些东西我确实没来得及看，甚至也不确定会不会细看，不过当然听到了一些回声。可以看到，一些拥有精神分析权威和某种分量的人，一些人们所谓“可敬的执业者”，以十分奇特的方式显露出事情走到了哪里。

例如，有整个一个圈子——人人都知道——过去甚至禁止人们前来，让自己进入坏话的可听范围。

后来有过一个时代，一个神话般遥远的时代——不过必须说，在这个格外特殊的圈子里，事情进展得非常缓慢。你们想想：1960 年！这里有些人当时才十四岁。博纳瓦尔会议，简直远古、积满尘埃，难以置信！而会议录大约花了六年才出版……为了讨论我的教学，有人发现一个绝妙办法：回到博纳瓦尔会议重新谈起。[注1]

> [注1] 《博纳瓦尔会议录》，载《无意识》杂志第 4 期，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 出版社，1966 年。拉康的发言以《无意识的位置》为题收入《著作集》，第 829—850 页。

我非常感谢本学派的一位成员办了一份评论刊物；很明显，那并不是我的刊物，而是他的，也因此能够产生垃圾场的效果。这些东西不能倒到“别处”，因为“别处”并不是它们的位置：在一份不知为何被称作《法国精神分析评论》的杂志中，不存在讨论我的教学的问题。这也可以理解，因为那里不谈精神分析！

可是在这个地方——旁边的杂物盘——人们就可以倾倒出来。为了讨论我对能指的说法，在我四年来对你们讲的一切早已远远越过这个问题以后，如果还想知道原则上究竟是不是能指，就回到博纳瓦尔会议去。那是一种隧道，黑人在其中混战，没人知道是谁在出手；里面冒出过种种最离奇、最异想天开的杜撰。

那里有一个名叫勒费弗尔的人，还有一些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人！我也必须说，还有些可亲的人：我们亲爱的梅洛-庞蒂当时也作了发言。但那时所有人都完全偏离了问题！事情无非是要第一次公开讨论我当时已经在圣安娜医院向一个小圈子讲授了七年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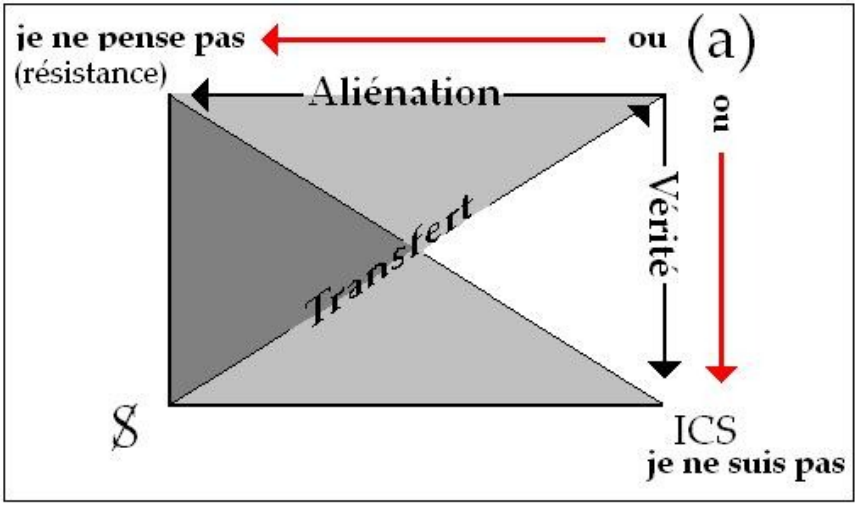
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这也让人感到，在一切话语中都存在行动效应。因为如果只有话语的维度，正常来说，它本应传播得更快。我正试图凸显的恰恰是：我的这番话语无可争辩地具有行动维度；尤其当我正在谈行动时，这一点显而易见。

而且我要说，若仔细考察，这就是在场大多数人来到这里的唯一理由；否则，尤其对年轻听众而言，很难看出他们能来这里寻找什么。

我们不在大学服务给付的层面上：我不能拿什么来交换你们的在场。让你们感到有趣的，是你们察觉这里恰恰正在发生某种事情。

人们并不赞同：这已经是行动维度的一个小小开端。

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当然，我也只是听说——据人们告诉我，刚才谈到的那类作者会反对这种结构；据说，结构会让作为“人”的我们如此不自在，“人格之存在”会因此受损。我担心，这里的东西完全值得分析和考察。精神分析家之“人格存在”究竟如何，恰恰只有把它定位在结构中，才能真正察觉。



我们最近从这个小四面体出发；有一件事必须令人清楚地感觉到：它容许多种转译。这里的“我不思”并不是留给精神分析家的位置。精神分析家揭示了这个位置的必要性，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这样揭示它：一个只同思想打交道的人竟如此明显地有必要不思。那对其他人还能说什么呢！

这个出发点的启发性就在这里；总的说来，它把这一点弄得十分清楚：左上方的“我不思”，是被迫选择之点，是异化的被迫选择。

这是对异化概念的一点完善；在我们以前，异化已经在生产层面、也就是社会剥削层面得到发现和标示。

这个“我不思”，使我们能够把意义还给“抵抗”这个词。迄今为止，它确实被以一种——我必须说——相当卑劣的方式操弄：当分析者——在某些“词汇”中，或对或错地被称为“患者”的人——发生抵抗时，人们便把分析者或患者的位置贬低成一种我会称为“遭贬抑”的态度。

你们看到，这把分析变成了它显然不是、也从来没人想把它变成的东西：一场扭打，一场把兔子从洞穴里揪出来的操作。他“抵抗”。在分析中抵抗的显然不是主体；抵抗的显然是话语，而且恰恰是按照这里所说的选择而抵抗。如果主体放弃“我不思”的位置——我刚刚告诉过你们——他仍会被拉向只剩对立选择的那一极，也就是“我不在”。而严格来说，“我不在”无法得到分节，所以抵抗中首先显现的，必然是话语不可能走向成为某种东西。什么东西？

那些用“人格之存在”来反对结构的人，我们确实很想请他们分节说明：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他们偶尔所谓“存在”究竟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他们把它放在哪里；我是说，他们为自己把它放在哪里。有些把“人格之存在”安放到别人身上的方式，是一种相当方便的摆件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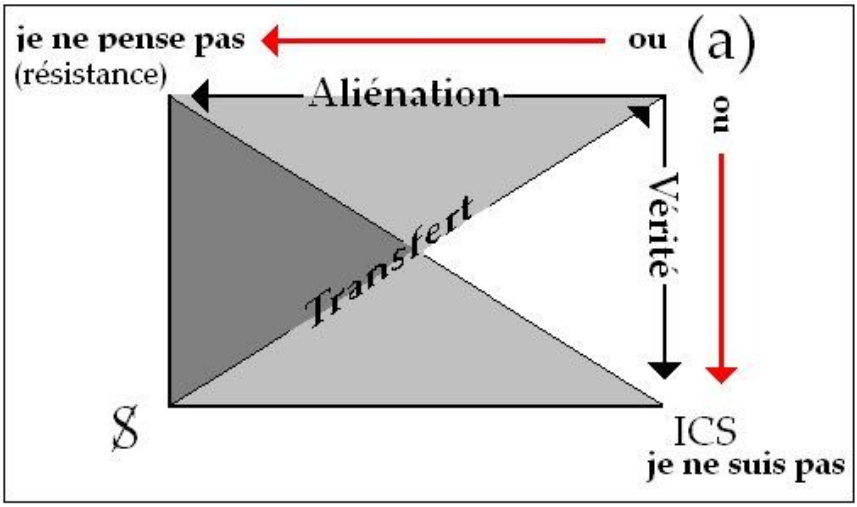
总之，我们仍要尝试说清：精神分析行动具有一种相当例外的结构——今年至少要开启、提示并标出这一点——它或许能够怎样主持一次更新；更新那个始终是我们罗盘定向点的东西，也就是“受到照明的行动”的功能。这里或许可以发生某种更新。

我使用“受到照明”一词，你们自然会想到其中有启蒙运动 Aufklärung 的回声。不过，这也是说：即便我们的罗盘始终寻找同一个北方——而我在这里可以说承担这个北方——它对我们而言，也许可以用结构稍有不同的措辞来提出。

所以，上次我界定并分节了精神分析家位置的两极……

我完全不拒绝他也拥有抵抗的权利；我看不出精神分析家为何会被剥夺这种权利……精神分析家建立精神分析行动，也就是为转移、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提供担保；但他相对于分析者的全部优势、他唯一的优势，只是从经验中知道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究竟如何。也就是说，对他而言，只要我们假定他已经以某种方式走过精神分析经验——在不进一步卷入学说争论的前提下，至少可以说，这种方式应当比普通治疗走得稍远——他就必须知道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究竟如何。

换言之，对他而言——上次我已经说明〔见图〕为什么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来到这里——作为知道精神分析行动究竟如何的人，精神分析行动的轨迹、向量和操作，必须把这个主体——我们已经看到这个 S 如何来到左下方——缩减为对象(a)的功能。



在一场分析中，以一项行动奠定这场分析的人，也就是分析者自己的精神分析家，最终就变成了这个对象。

他之所以变成它，恰恰是因为在终点处，他同自己起初所不是的东西联结起来——我是在分析者的主体性中说这件事。开端时，他不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在分析终点，他才成为它。我要说，这是由假设而来，因为人们进入分析，是为了知道某种东西。

就在他成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时，他也为分析者披上了对象(a)在动力机制中占据的功能——这里说的是作为主体的分析者。这个特殊对象(a) 呈现某种多样性……

而且幅度并不很大，因为我们可以让它四重化，中心则有某种空无……这个对象(a)对于一切涉及无意识结构的东西都具有绝对决定性。

请允许我在这里暂时回到刚才的质询……

它关乎那些仍然在边缘摸索、犹豫的人……他们还在考虑，一套已经充分发展的理论究竟有没有可以接受之处；然而，现在已经不是讨论其原则的时候，只须考察它在这个或那个点上的分节是否正确、是否可以修正。

在这里的任何人……

我甚至要说，假如有人第一次来到这里……难道下面这一点还不足以裁断问题吗?

当然，这并不表示以前也能说得如此简单……它难道不能干脆裁断这个问题：分析究竟是否意味着……

而且我似乎很难相信，听我这样说以后，人们还不能立即看出问题所在……分析究竟是否意味着：无论在你们愿意称作什么的东西中——如他们所谓一种“存在”、一种生成，或任何属于生命秩序的东西——总有某些事件会带来后果？

重音落在“后果”一词上。在能指序列之外，可以设想后果吗？

仅仅是某件事情曾经发生这一事实，就以一种可在无意识中重新找到的方式存留下来；条件是抓住其中一端，使人能够重构一个序列。

有什么发生在动物身上的事情，甚至可以想象会铭写在这种秩序中吗？

分析从一开始分节的一切，难道不都属于这种传记性分节的秩序吗？这种分节以能够用能指措辞来分节的东西为参照；不可能从中抽取或驱逐这个维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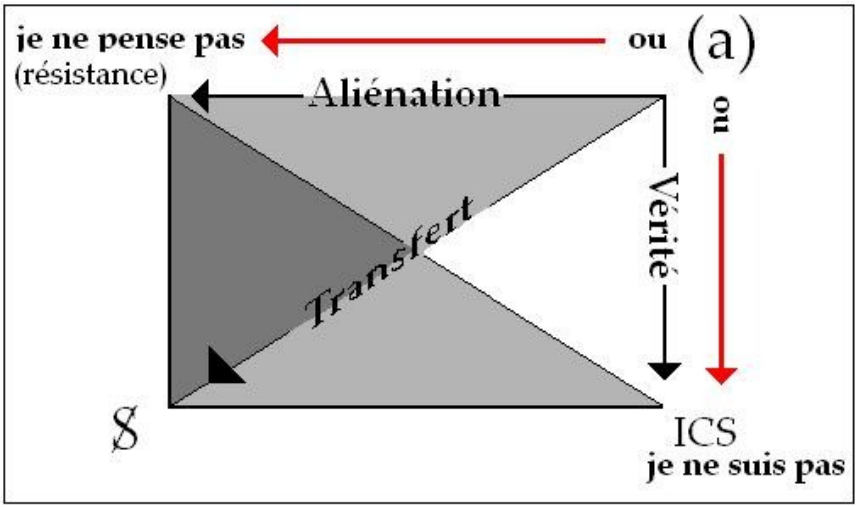
一旦看到了这一点，就再也无法把它缩减为可塑性、反应性或生物学刺激—反应等任何概念。无论如何，这些东西都不属于在序列中得到保存的秩序。任何能够围绕一个装置——最终不过是一个装置，具体说就是神经装置——发生的固着、贯穿、打断乃至装配，都不能单凭自身回应后果这一功能。

结构的稳定性，以及它所铭写的那条线的维持，意味着另一个维度，严格说就是结构的维度。这是一项提醒；它并不处在我已经走到的那个点上——我正是在那里打断自己，插入这项提醒。

现在，我们来到 S 这一点；它标定精神分析行动特有的问题，因为我所谓“精神分析家的抵抗”正悬系在这个点的周围。在这种结构化中，“精神分析家的抵抗”显现为分析关系中一种完全构成性的东西：他拒绝行动。

这对分析功能的地位而言确实是原初的；每一位分析家都知道，最终甚至没有接近过这个领域的人也开始知道。分析家围起一整片区域；在这片区域中，他会被——姑且说——患者召唤，要求他以行动的方式干预：

- 不只是偶尔要求他像人们所说的那样选边，站在患者一方对抗亲属或其他任何人；
- 甚至只是要求他作出确实属于行动的那一类行为：以赞同或反对来干预。提供建议，恰恰是精神分析结构留下空白之处。



我把它们放在同一条对角线上，原因恰恰在这里……

我这样说只是为了形成图像；当然，这条线——“对角线”——上发生的事情，并不比其他线上发生的事情更有权被称作对角线。只须转动四面体，就能把它们变成水平线或垂直线；不过，为了便于想象，这样表示更方便。不要被它迷惑：转移并不比异化更“斜”，也不比我所谓“真理操作”更斜。恰恰因为行动可以说保持空白……所以，这条线——“对角线”——能够被朝另一个方向运行的转移所占据；也就是在分析者之“做”的过程中，向那个地平线、幻象和抵达点迈进。我已经足够清楚地界定了抵达点的约会：它由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界定〔箭头指向 S〕。

分析者一开始就拿起手杖，背上行囊，前去赴同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约会。唯有分析家在行动一侧谨慎地自我禁止，才让这一点成为可能。否则，如果他不对自己施加这种禁令，就纯粹只是一个骗子，因为原则上，他知道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在分析中会变成什么。

我们可以随意把分析称作这项原初经验、这件人工制品或某种东西；或许从历史中的某个时刻以后，它只会显得像一段插曲：一项偶然打开了人与人之间完全不同的行动关系模式的实践，只在极为特殊的案例中正当地成立。不过，即便如此，这也不会构成分析的特权。

我相信，上次已经给了你们足够提示：主体同发生行动的关系会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即便现在仍滞留在道德学或社会学教科书中的东西，也完全不能告诉你们，在我们这个时代，行动关系事实上究竟如何。例如，只凭必须记住黑格尔、记住教授们谈论黑格尔的方式，显然无法真正衡量他相对于行动所代表的转折有多重要。

然而，我不知道在这个转折处该做什么。推荐阅读总是如此危险……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此前清理掉了多少污垢。不过，我仍觉得，人们很难没有清理到足以给一本小书定位的程度——我是说，足以让刚才的表述获得意义和效力。最近出版了一本小书，作者似乎曾在某个时候来过这场研讨班，并以这一身份把书寄给我：安德烈·格吕克斯曼的《战争话语》。遗憾的是，我没来得及在卡片中重新查找他曾向我展示过哪些资质。[注2]

> [注2] 安德烈·格吕克斯曼：《战争话语》，巴黎，L'Herne 出版社，1967 年；Grasset 出版社，1979 年。

例如，这本书也许能在某个层面、某个领域内，向你们展示一种东西能够如何出现；它十分典型也相当完整。人人都漫无边际地谈战争关系，可是战争话语对战争的影响——读过这本书，你们会看到——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这里采取了一种特定方式：把黑格尔的话语看作战争话语，同时也清楚看到，它在技术专家和军人一侧有何限度；而旁边还有一名军人的话语。

一旦军人知道怎样组织话语——这很少见——就不该轻视他；但事情一旦发生，相当惊人的是，他的话语往往比精神分析家的话语更有效！

克劳塞维茨的话语同黑格尔的话语并置，并作为它的对应面受到提醒；对在这里具有敏锐听觉的人来说，它或许能够使他们略微想到：在这条线上，我的话语可能带来何种关系。这样的关系使人可以相信，在我们的时代，战争话语之外还有一种可以接受的话语；它或许

也能说明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话语层面上的某种间距。当然，克劳塞维茨不知道对象(a)。

不过，假如对象(a)恰好能够使我们看清克劳塞维茨引入的某种东西，即战争双方的根本不对称：进攻与防御之间存在绝对异质之处，而且整个局势都受这种不对称支配——你们知道，克劳塞维茨绝不是一个会在进攻的必要性上犹豫不决的人——那么，这也算一点小小提示。[注3]

> [注3] Barguigner：犹豫不决、迟迟不能决定、拖延行动。

我正在以某种仓促方式，填补我所分节内容背景中的若干——该怎么说——缺口。这些内容涉及精神分析行动使我们能够围绕行动的坐标建立或恢复什么，也涉及我们今年正尝试开辟什么。你们看到，这里有几条不同的坡道。

首先，有某种东西必须在最低限度的坐标层面成为既得之物。

也就是说，在由一种完全特殊的东西——精神分析——建立的逻辑结构中，只要精神分析构成行动与“做”的结合，如果我们不用以下两类部分来构成这种逻辑结构，可以说……

- 操作中活着的部分；
- 以及被留在死亡状态的部分……我们就绝对无法在分析操作中定位自己。

所以，这是首要之事；它不只对眼前这项实践本身重要，也能够解释发生在实践周围的悖论：它为何会诱发若干选择性误认，尤其是在参

与其中的人那里。这些误认，恰好对应我所谓“死亡的部分”，也就是为了相关操作本身而被悬置的部分。这样已经有两个侧面。

第三个侧面当然同样令人着迷。上次讲话结尾，我作了某种太容易、太诱人因而很快就会遭到转译的暗示；后来我听到一个回声……

我必须说，我不能赞同它，不过它很有趣……经由我在这个地方掌握的许多声音之一，有人把它传给了我……

我完全不知道是谁，甚至不记得是谁转述给我的……有人说：“今天可真成了切·格瓦拉研讨班。”

这一切只是因为，在谈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谈左下方的 S 时，我曾说，某种东西或许是……

至少这个模型向我们提出了问题……行动本身正常的终结——我指结束、翻转和倾覆——是什么。毕竟，如果精神分析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揭示了什么，那就是，没有任何行动能够让谁自称完全是它的主人。

行动——一切行动，不只是精神分析行动——向发起者许诺的，就是我在对象(a)中指明的这个终点。这并不会把我们从一切基础上拔起，也不会推翻我们从经验、从历史知识和其他无数事物中收集的一切；对这个说法，大家还不至于听得连耳膜都飞出轨道〔原文如此〕，不是吗？

没必要因此以为这是“切·格瓦拉研讨班”。在他以前还有别人。况且，也许这并不完全是我想说的东西，也不是重要之处。我们并非给悲剧性刷上一层油，让它闪亮起来。所涉及的也许是别的东西。

无论如何，只要把它拉回我所说的东西，它显然更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我们必须认识行动的逻辑结构，才能设想，在精神分析这个有限领域里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能够让本学派成员在内部提出问题，并且可以设想，他们能够把我所陈述的东西放回恰当位置，贯穿一项他们已经在不同阶段追随其必要性的构造。

请他们最迟在下周三经由梅尔曼医生交给我某种证言：证明他们能够把转折点、正在转向的事情、铰链和门再向前推进一点；证明他们会在涉及自身之处使用这套装置。

我的意思是，我期待那次会议提供的东西……

请原谅，这里大多数人会预先被排除在外……是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应当向我证明：至少在我今年围绕行动走到的地方，人们能够追问某种东西，或至少提出一种转译，并且可能针对这种转译提出反驳，例如：“如果您这样转译，它预示的就是这个”，或者：“这同我们经验中的某个点矛盾。”简言之，要向我表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我说的话得到了理解。

这些材料随后将供下一次闭门研讨班，也就是 2 月 28 日那场使用。当然，届时只会召集本学派中参加过第一次会议的人；因为，如果他们连改变一下自己的安排都做不到——这也是一项行动——那么，“不改变安排的行动”尤其显而易见。

例如，有时人们可以——而且我要——追问：某位非常熟悉我教学的精神分析家，今年为何恰恰不来听我关于行动的陈述。人们会告诉我：“有人记笔记。”

记笔记的人并不多。顺便指出，记笔记总比抽烟好；而且，抽烟归根结底对倾听我所讲的东西而言不是什么好迹象。我不认为这些话应该隔着烟雾来听。

刚才我已经提到，我认为，让至少一部分听众以在场给我荣幸的，恰恰是眼前发生之事的开路性质。因此，在我谈行动的时刻，分析家不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不是随便什么话语，即便事后有人向他们传递忠实而内行的笔记……我觉得这件事很有启发性，也很有意义；它很可能就栖居在我写下“抵抗”一词的地方。

说到底，我今天原本打算让你们为难，也就是请一个、两个或三个人今天向我提一两个问题，甚至把它变成进入二月底闭门研讨班的一种方式。

这样也不错，对吧？

只是我也知道，首先人数众多，其次如今我很少在讲话结束时要求大家发言，这两件事会产生冻结效果。不过，我仍建议大致确立如下规则，只有少量例外：为了调节 2 月 28 日研讨班的入场，凡给我寄来一份写成文字的问题，并且在我看来正沿着我当前试图带给你们之物的路线前进的人——这也不过是一种选择方式——会直接收到那张小邀请卡。

我手里的卡片会交给梅尔曼，发给在这里的学派成员，让他们下次凭卡入场。属于本学派或以某种名义直接依附本学派的人，请领取卡片

并于 1 月 31 日来到这里；这样我能从中收集一些东西，用来准备 2 月 28 日的闭门研讨班。

我还要在这里那里钉住几样能使我们稍微前进的东西……

即便今天没有采取我平常——唉——使用的讲席授课形式……必须注意：行动与“做”之间始终留有一道裂隙，因为问题正是这个；在数量十分有限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围绕这个活点绞尽脑汁……

我从未计算过，我们只须数到多少位曾祖父，就能立即回到凯撒时代；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多么彻底地卷入了那些只有历史教科书才让你们相信已属过去的事情……如果人们围绕主人和奴隶的区别绞尽脑汁——看看黑格尔吧——无论你们赋予它多么有弹性的意义，只要非常仔细地观察，它所涉及的无非是行动与“做”的区别。当然，我们正试图赋予它另一种身体，不像行动所假定的主体那么简单。

它根本不一定、也不只是发号施令的主体——正是这种理解迄今造成了混乱。

皮埃尔·雅内先生单单围绕这一点建立了一整套心理学。这绝不表示他的方向错误；相反，它很合乎路线。只是它太粗略，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多少东西，因为……

除了埃及浮雕所呈现的事实，即那里有一位领航者；又或者，在普莱耶尔音乐厅或别处，有一位乐队指挥，还有一些人在“做”……当必须把它推进到更大尺度时，这解释不了多少东西。在那里确实有：

- 主人，也就是说，他们与人们所想的那种游手好闲者并不完全相同，而是同发生行动打交道的人；
- 以及同“做”打交道的人。

于是，那里存在一种“做”。也正是从这里，我们可以开始理解这种“做”或许怎样……

尽管它最终具有徒劳、而且应当直说有一部分可笑的性质——我说的是精神分析……这种“做”也许比其他的“做”更有机会让我们通达这个功能。请仔细观察这种“做”中我想强调的一条特征：我无须说它是“纯粹言语之做”，因为为了说明“言语与语言之场的功能”，我从来都在不厌其烦地提醒这一点。

然而人们没有察觉，恰恰因为它是一种“纯粹言语之做”，同普通的“做”相比，它才更接近行动。再看技术层面：在那个看似微不足道、如此简单的著名自由联想中，若仔细考察，我们同样可以把它转译为“在行动中的”能指。也就是说，基本规则的真正意义恰恰在于……

尽可能推进到最远处——这就是指令……让主体从中缺席。因此，让这个能指自行游戏，就是主体的任务，就是主体的“做”。

这里的“在行动中”当然带着引号；它并不是能指的行动。

“在行动中”的能指带着一种涵义，唤起某种在特定语域中可以称作“在潜能中”的能指，也就是说……

刚才那位医生希望人们永远记得的东西……在强调结构的人中，还有如此多的东西随时准备从“人”身上涌出、沸腾；“存在”如此过剩，以至于想把我们纳入这些精确轨道、这套逻辑——况且，他无论如何都无权给这套逻辑贴上“空无”的标志——并不那么容易。这套逻辑很难构造，你们在这里已经充分看到它的重量和艰辛。

为了让那位不知站在我们何种立场上的人安心，我们姑且说：一位精神分析家竟提出“人格”这类词，至少在我听来，是如此离谱……不过，也许还要再过一点时间，这才会对所有人显而易见。但如果他想安心，不妨观察一下这套逻辑——例如，我正努力在你们面前尝试构造的逻辑。我会大致这样界定它……

如果他受过最起码的教育——可谁知道呢？我很久没再见到那个人了，我不知道……这是一套尽可能贴近语法的逻辑。

我希望，这下够让你们吃一惊了！那么，就是安安稳稳的亚里士多德。对，为什么不呢！

只不过必须尝试做得更好。

请你们注意，亚里士多德的这套逻辑之所以历经漫长世纪、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仍打不死，恰恰是由于人们对它提出的那类反驳：据说，这是一套没有察觉自己其实在做语法的逻辑。

我非常钦佩那些知道亚里士多德“没有察觉”某件事情的大学教授！

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自然学家：你们今天仍可重读他的《动物志》，它依然站得住；这毕竟十分惊人！

那也许是生物学中从未有过的最大一步。不能说从此以后逻辑没有取得进展；不过，他恰恰从语法出发建立的逻辑，竟仍是我们能够围绕它绞尽脑汁的逻辑——哪怕后来又加上了某些我必须说十分机巧的东西，例如量词；量词只有一个缺点，就是确实完全无法转译到语言中——这仍值得注意。

我并不是说，这不会提出问题。例如，它会重新揭出一个问题，而我曾对这个问题采取一种教条式立场，给它贴上一张标签、举起一条横幅、喊出一句口号：“不存在元语言。”

你们自然会想到，万一真有一种元语言，这件事也令我困扰。不过，我们姑且从不存在元语言的观念出发，这不会是坏事；至少，它会防止我们误以为存在元语言。

某种无法转译到语言中的东西是否会遭受一种完全有效的缺失，这一点并不确定。

无论如何，接下来的讨论也许会把我们带回量词问题，因为显然需要向你们提出某些问题；这些问题会涉及 S 这个角落中应当发生什么——“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已经从地图上被划掉。

我们必须围绕能指在这个位置上的可用状态作些推演；这也许会把我们带到语法与逻辑的接缝。我只趁此机会指出并提醒：我们一向航行的恰恰就是这道接缝。当时我们身边有个人友善地把这种逻辑称作“一种弹性逻辑的尝试”。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个词，因为严格说，弹性并不

是人们对度量标准最想要的性质。不过，逻辑与语法的接缝也许能够让我们再前进一步。

无论如何，结束时我想说：我再怎样召唤精神分析家沉思自身位置的特殊性都不过分。他们不得不占据一个不同于他们受到召唤之处的角落，即便可以说，他们在那个受到召唤之处被禁止行动。他们仍须从行动这一点出发，把自己对自身功能的沉思集中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如此困难，并非没有缘故。

在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中，依其功能……

我想，这张图已经让它足够可感，不至于被看作冒犯……有某种地毯的成分。正如某处的说法，我们会尝试破译“地毯上的图案”——或者“地毯们”上的图案，随你们怎么说。精神分析家有某种方式把自己放在中心，可以说，品尝某种就在这块地毯位置上消耗掉的东西。[注4]

> [注4]　拉康这里大概是在暗指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地毯上的图案》（巴黎，Pierre Horay 出版社，1992 年；巴黎，Seuil 出版社 Points 丛书，1984 年），英文本题为 The Figure in the Carpet。

他们尽己所能给所涉及的东西命名：

- 他们称它为倾听；
- 称它为临床；
- 用这个场合所能找到的一切晦暗词语称呼它。

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有什么能让人强调一项经验的滋味完全特殊。无论如何，这肯定无法通过任何逻辑操作通达。但人们以这种特殊滋味

为名——我不敢说是孤独的享乐，姑且只说阴郁的自得——竟容许自己声称：天哪，一切理论都具有同样价值，尤其不该执着于任何一种；无论用本能、行为、可爱咿呀学语的发生，还是拉康式拓扑来转译事情，全都一样……我们必须在这种讨论中保持等距位置。这一切都以某种疑病性享乐为名，以一种既蠕动又逆蠕动的居中姿态为名，围绕精神分析经验中某种肠道般的东西运转。

我所应付的确实就是这个；而且已有许多次，它以一种可以说铺展在讲台上的形象化方式出现。

当然，这未必是最容易借助辩证法效应攻下的一点；但它正是关键之点。一切都在这里：克劳塞维茨在进攻与防御之间放置的不对称，正围绕这一点展开。

第8课 · 1968年1月31日（闭门研讨班）

夏尔·梅尔曼

在为弗洛伊德学派设计教学方案的框架内，我曾向雅克·拉康建议，不妨考虑举行一些频率可以变化的会议，例如每月一次，让主要来自学派、对研讨班感兴趣的人聚在一起，并把研讨班恰恰引发的若干问题乃至困难组织成形。事实上，我们围绕研讨班的这些讨论本来就在工作小组、友好或不友好的聚会中进行——友不友好并不重要，讨论反正存在。因此我觉得，大家共同尝试把这些问题组织起来，也许是一种恰当的回馈；当然，前提是这件事证明可行，或者对我们有意义。

因此，我完全没有请任何人事先准备材料，讨论今年头几场研讨班所涉及的关键点：精神分析行动。我今天向你们提议的是，看看我们能否试行这种工作小组形式，尝试把研讨班给我们提出的问题和困难组织起来。

作为导入，我不会对雅克·拉康迄今提出的论证进行筛选。依我看，这种筛选本身就已经带有某种偏向和特定观点的印记。

所以，为了引入讨论，我只会试着逐场回顾这些研讨班……

我们能走到哪里、不能走到哪里都无所谓，到时自然会看到……我会用极其简短的公式，回顾其中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分节。等我这样唤起各场研讨班提出的问题以后，我们就可以看看，手里是否有可投入讨论的要素。

你们知道，雅克·拉康常常指出，他的教学可能遭遇的障碍很少、甚至只有在极例外的情况下，才位于所谓反题的层面。

也许没有理由不在这里尝试把可能作为对话基本要素的东西组织出来。例如，第一场研讨班是 11 月 15 日举行的；其中用若干公式引入精神分析行动的问题，包括重提那条较早的公式：“转移是无意识在行动中的实现。”

另一方面，在一个仍处于精神分析外围的领域中，什么可以被视为行动：

- 例如，进入精神分析是一项行动吗？
- 开始以精神分析家身份执业，应当归入行动范畴吗？

研讨班还提醒，行动常被等同于活动，换言之，被等同于一种主要涉及运动机能和释放功能的东西；又唤起了刺激—反应过程。然而，由此提出第一个问题：

- 精神分析领域在使它诞生的行动之前就已存在吗？
- 它在哪里？
- 或者至少，谁知道它？

因此，这是对行动的实现及其效应的第一次概览，第一次闪现。

同一个例子得到展开：代数学发明以前，代数学领域究竟如何？

这仍是同一个问题，研讨班又给它补上一类回答：“不可能否认，现实先于认识。”

但在同一个范围内：“那么，知识究竟如何？”

第一场研讨班的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巴甫洛夫实验。那里确立，巴甫洛夫采取的是一种结构类型的进路；他虽然没有这样认识自己，却实际上在针对动物的实验中运作着一个充当结构的系统。仅仅因为刺激在这里不像反射那样，而是已经表现为同任何根本享用都不相称，这一点就足以说明。

在同一个范围内，还有这样一条公式：哨声代表……

如果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之物……拉康说，哨声为一个能指代表巴甫洛夫；这个能指就是胃液分泌的迹象，而它从一种欺骗效应中取得价值。

在这个系统中，还有一条颇有趣、而且我想已经成为笑谈来源的评论：巴甫洛夫以倒置形式接收自己的讯息。换言之，是因为胃液分泌，巴甫洛夫才反过来吹响他的小号。

以上就是我从第一场研讨班中摘出的若干要点。

如果你们记了笔记，也许还有其他要点想要提出。

我们现在能否就此展开讨论？

这一切是否在你们看来理所当然，可以原样认可？

吉内特·米肖

在您的陈述中，您说拉康重新提出了“转移是无意识在行动中的实现”这个主题。

但在我看来，此前的表述是：“转移是无意识现实在行动中的实现。”

两句话意思相同吗？还是两种表述之间存在差别？

因为这个位置上的“现实”一词，在使用这条公式时通常不是没有效应的。

夏尔·梅尔曼——您怎么看？

让·乌里

他在《焦虑》研讨班中甚至有一次说过“使无意识投入活动”。

不过我认为，不应当过分纠缠于……

夏尔·梅尔曼

我认为，吉内特·米肖提出的毕竟是一个可能有其价值的问题。

我不能确定这两种表述彼此相悖；在我看来，它们根本不互相矛盾。

保罗·勒穆瓦纳

谈到活动和转移，我想指出：我感到很难把活动同另一方面的精神分析行动联结起来。

因为有这样一种情况：在某些无休止的分析中，患者身上存在某种重复机制，使他们不停地说，却从不行动。那么，怎样在转移中行动，才能使这种“无意识在行动中的实现”恰恰变成意识在行动中的实现，或者至少变成某种行动实现？因为活动究竟属于意识领域还是无意识领域，我并不知道。

可是，抑制又如何？

夏尔·梅尔曼

这确实也是一个完全切合我们主题的问题。您问，在某些无休止分析类型的治疗中……

例如，您是在援引弗洛伊德关于《有终分析与无终分析》的文本……您又提到这些不停说话、却据您说从不行动的患者。

如果我理解正确，您问的是：怎样从这里实际过渡到精神分析行动？

保罗·勒穆瓦纳——不是。精神分析行动同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这才是问题。

弗朗索瓦·托斯凯勒

我觉得，也许您重提的头两种表述——“转移是无意识在行动中的实现”和“进入精神分析的行动”或“成为分析家的行动”——在用词上可能有共同点，但也有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个应当讨论的差异点是“转移的行动实现”。它倒更令人想到一出喜剧的各幕：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第四幕……也就是一种舞台呈现，带有程度不一的切断：第一幕、第二幕，等等。

这同进入分析的行动或开创性行动完全不同；后者首先也许具有另一种结构。在我看来，行动要成其为行动，恰恰不同于您所说的行为；这是行动与行为的比较，而行为并不包含重复。

如果你们愿意，行为走向技术。行动归根结底则更多铭写为在一位见证者面前发生的东西：那里总有至少三个人。

- 存在对行动的确认；
- 存在让行动获得承认的要求。

如果我正确理解了雅克·拉康思想的某些方面，那么他曾说“性行动不是一项行动”，并非偶然。大致说来，他说那是一种行为。但人们不会说，自己做了一次婚姻行为；婚姻是一项行动。

“干一炮”不是一项行动，因为行动是一项承诺与承认，而这按定义包含重复。人们在市长或神父那里登记某种东西；或者可以附带说，在大他者那里登记。

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争议，就可以把它重新拿出来。一项行动总能重新显现。

按定义，它必须返回。但一种行为不可能返回。不是说“不能”，而是说返回与它无关；返回并不构成行为的本质。

我想谈一下拉康所说的东西。的确，在巴甫洛夫的故事中，巴甫洛夫一方存在一种无意识的结构图像。但拉康第一次以开头几句话接近它时，处在另一种语境中；他恰恰谈的是行为，一种刺激—反应。如果我理解正确，运动机能归根结底同发生行动毫无关系。他正是从刺激—反应的角度引入巴甫洛夫问题。

您给出的版本也是真的；不过在我看来，它可能使我们无法把握，为何那天一开始就提出巴甫洛夫问题。

雅克·鲁德劳夫

我觉得，在确定出发点、稍微界定我们所谓行动时，还有第三个维度今天没有提到，却一直存在于心中，也明显存在于“无意识在行动中的实现”这一转移公式中：相对于潜在者，把行动界定为现实者或现实化。

一种是同活动对立的行动，另一种是作为民事身份文件、具有重复性质的行动。

不过，相对于潜在者的现实化概念同样根本。

泽维尔·奥杜阿尔

我倾向于认为，恰恰同托斯凯勒先生所说的相反，行动概念丝毫不包含承认概念。正好相反：一项行动只要包含承认概念，就与其说是主体的行动实现，不如说是使主体受到条件制约。巴甫洛夫意义上的条件作用，在我看来包含了主体对自身的这种反思和表象；运动机能正是凭借它接受改变自己对象的位置，依据某种返回给它的东西，而这

东西由大他者返回——因为按照拉康的说法，大他者在这里在场——也就是依据大他者对主体的映照，依据镜像维度。

正是在这个名义下，主体能够接受以对象的移位让自己获得安慰。

主体的行动实现则在我看来把我们送回起源。我有一种印象……

拉康也这样认为，因为他把行动概念赋予我们，视为纯粹开端的概念……行动概念把主体送回自己的起源，也就是那个他无法映照自身之处；在那里，他恰恰是纯粹开端，也就是纯主体的纯粹行动。我认为，让行动得到承认也许是一个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

我认为，如果要净化行动概念，它反而把我们送回一种原初经验：主体在短暂一瞬接受不在自身行动中认出自己。他会在自己给出的行动表象中认出自己，也就是在行动可能获得的后果中认出自己。这已经是一种可以同强迫性系列并列的机制；然而，只要主体接受成为行动，他就无法同时接受成为自己正在行动的表象。换言之，我认为：

- 想象界位于条件化一侧；
- 象征性生命位于行动实现一侧。

这是我向托斯凯勒提出的问题。依我看，他反而坚持了行动的想象性与主体间性方面；这些方面也许包含在行动中，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它们并不天然地属于行动。

伊雷娜·鲁布列夫

我不想现在就把自己要说的一切都说出来，因为那涉及拉康的整个研讨班；不过，它确实落在托斯凯勒所说的范围内，也就是行动与行为的差别。

况且，我想拉康说的是“行动”与“做”，两者共同规定精神分析行动。

我想谈的是精神分析行动同 acting out〔行动化〕以及“付诸行动”的关系。

相关知识卡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依拉康的视角，我想托斯凯勒所谈的是他所谓 acting out，也就是某种把自身展示出来、确实希望获得承认的东西。

不过，我想等我们看完所有研讨班以后再谈。

欧仁妮·勒穆瓦纳

您说，现实先于知识，而且我想您认为这点不能受到质疑；但在我看来，它恰恰是唯一的问题。

现实与知识之间存在对立吗？差别在哪里？

夏尔·梅尔曼

现实先于认识。但拉康说，知识究竟如何？

欧仁妮·勒穆瓦纳——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关系中。这是个大问题。

弗朗索瓦·托斯凯勒

这种误解并不太令我吃惊。我会说，我之所以带着口音讲话，就是为了方便误解。不过，真正阻碍人们以如下方式转动问题的，我不认为是口音……例如，按照我呈现事情的方式，为了理解行动是什么，我使用了这些图像：

- 结婚行为；
- 洗礼行为；
- 公证行为，等等。

这恰恰是为了表明，它是一项象征性行动，而不是想象性行动。去结婚并不是想象性的。

有人把“铭写”说成了“书写”……我本来更接近弗洛伊德的说法，他不断谈到铭写等等。我的意图恰恰是说，行动是一种奠基之物。因此，再用性行动这个夸张图像来说，具有奠基性的，是婚姻而不是干一炮。

夏尔·梅尔曼——婚姻究竟是不是一项行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弗朗索瓦·托斯凯勒

每一种文明都有这种“认定行动”的方式；它们由某种特定习俗赋予效力，实施方式各不相同。但我还想就此说一点，以便更清楚地区分行动、活动和行为的问题。

人们不会说我们的行为跟随着我们，却会说“我们的行动跟随着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再次提出重复、记忆等问题。行为可能跟随

我们，也可能不跟随；我们的行动则必然跟随我们，这是绝对确定的。

造成更多混乱的问题，也许在行动与活动之间，而不是行动与行为之间。因为在活动中，反而存在这种承认与参与的问题，甚至在我们的金融股份中也是如此。

如果你购买一份金融股份，你购买的不是一项行动，而是一份股份；你参与经济，参与收益与损失。恰恰是这些股份可以交易、可以转让。工人在工厂里的劳动不能转让，也不能交易；可以交易的是股份。在我看来，这就提出了问题。

夏尔・梅尔曼——托斯凯勒先生，我想您已经很好地重新说明了自己想说的意思。

保罗・勒穆瓦纳

我只想问托斯凯勒：一场未经圆房的婚姻，是一项行动还是一种行为？

弗朗索瓦・托斯凯勒

教会说，不存在未经圆房的婚姻。婚姻若未经圆房，就是无效的。一项无效行动。

保罗・勒穆瓦纳——那么，婚姻行动中的性行为是什么？

夏尔・梅尔曼

无论如何，我想马上说一句。就我而言，我有点担心我们会让“行动”这个词发生膨胀，把大量也许只同它具有同名关系的要素全都塞进去。

我认为，今年研讨班的问题恰恰是设法分离出行动本身的特异性，也就是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确定无疑地把它同关于活动、行为、民事登记行为的一切犹疑区分开来的东西。

我认为——拉康也强调这一点——正是从精神分析领域出发，行动问题才得到安置、唤醒和唤起；与此同时，这个领域或许也允许一些发展，使我们能够给行动定位。所以，这也许是第一项提醒：我们存在一种风险，最终会把本来仍完全正当地属于我们所有质询的问题统统吞进这个词里。

因此，把它们吞进去是正当的；不过，也许现在就指出这一点同样正当。

泽维尔·奥杜阿尔

我只想问托斯凯勒：例如，他认为语言的起源是一项行动吗？

只有两种可能：他认为是，或者认为不是。

如果他认为是，那么他会同意我的说法：语言不能承认自身起源，除非在那些我们此刻无意批评的理性主义哲学中。但如果语言无法承认自身起源，而语言的起源仍是一项行动，那么行动就逃脱了承认。

或者，他不认为语言的起源是一项行动；那么，我请他告诉我，它究竟是什么。

特穆拉兹·阿卜杜谢利

我怀疑，你以逐场研讨班的方式引入讨论，是否最有利于避免你刚才所说的陷入泥潭。

夏尔·梅尔曼——我们是否正在陷入泥潭，完全不能确定。

特穆拉兹·阿卜杜谢利

是你刚才谈到这件事。为了避免围绕一个也许是细节、实际却显得十分重要的点开始讨论，我在想：既然你决定这样开头，是否应该快速概览全部研讨班或所有重要问题，而不是逐场进行？

夏尔·梅尔曼

你是否已经看出，其他研讨班中的哪些问题能使我们在这里摆脱纠缠？

特穆拉兹·阿卜杜谢利

是的，我确实有一个问题要提；但实际上，它不属于任何一场特定研讨班。

夏尔·梅尔曼——完全没关系。

特穆拉兹·阿卜杜谢利

这是一个非常旁支的问题，主要具有实践影响，的确把我们带得离行动讨论相当远。我的问题如下：我一直在想，拉康近来坚持提出对象(a)，是否会对我们的治疗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影响。我的意思是，我

们大多数患者都是神经症患者；作为神经症患者，正如拉康说得非常好，他们的欲望就是我们的要求。

而现在，人们会知道，而且我想会越来越知道：那里要求、索取一个对象(a)，当然也就是欲望之因对象。然而，这个可以说将受到要求的对象，会不会从此每一次、而且比以前更甚地变成肛门对象，从而使我们不断拥有越来越多的肛门对象？

我们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浑身粪便，就像马尔罗先生发起整治运动以前的鸽子一样；我担心，这一大堆粪便会让我们有些看不清楚。

所以，从实践层面来看，这里似乎有某种值得思考的东西；我想在这里提问：这类影响是否已经可能在我们的治疗中显现？

夏尔·梅尔曼

有一位著名患者，你很熟悉；他恰恰有某种难以看清的问题。这个著名患者“眼前蒙着一层帷幕”，使他无法接触现实——他所谓的现实。

这类症状并不少见，远非少见。问题确实必然在于，这个对象(a)同那层“眼前的帷幕”具有何种关系。现在，也许正如你所说，我们能够沿途看到，这套辩证法中的什么东西可能让人看清或不能看清；换言之，为了让这位患者不再“眼前蒙着帷幕”，究竟必须或不必承担怎样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也许我们会如你所愿，沿着质询向这里前进。

请注意……你的提问方式在某一点上同勒穆瓦纳刚才的问题会合：有些患者身上的某种东西无法得到裁断；问题在于为什么，以及必须做什么？

特穆拉兹·阿卜杜谢利

为了让大家清楚理解我的问题：我担心某种已经存在、而且存在得过于频繁的东西……

也就是主体的欲望同他认为分析家可能提出的要求之间的这类联系……会在这里碰上一个实在结构：拉康派分析家实际上正在要求某种东西。

夏尔·梅尔曼——刚才说到“眼前的帷幕”时，我指的是狼人。

克洛德·孔泰

阿卜杜谢利向我们提出这个思考主题以后，立刻引出若干评论和问题；我想就此稍作说明。

例如，您刚才准确地问他：拉康的教学在什么意义上会把我们带到……

患者在其幻觉中把我们定位为提出要求的人……拉康的教学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会使我们要求对象(a)，对象(a)又为何会成为我们要求的实在对象。在我看来，你这里跨过了一步。

特穆拉兹·阿卜杜谢利——当然。

克洛德·孔泰

另一个问题走得稍远一些。毕竟，如果患者以要求的形式这样接近我们，那么可以说，这是一项开局就已经存在的给定；还可以说，分析家的逻辑——拉康说过这一点——总会被整合进“受分析者”或“分析者”围绕治疗构造的幻想之中。

从这个角度看，我看不出我们相对于拉康教学的位置给情境带来了什么真正新颖的东西。我甚至会说，如果拉康构造的这套逻辑恰好更接近事情的现实或具体辩证法，我很难看出它怎么会在这里阻塞治疗中的某种东西。

特穆拉兹·阿卜杜谢利

我不是说拉康的逻辑会阻塞治疗；我说的是外界对这套逻辑的了解，而且这种了解会越来越普遍；问题是这种了解会怎样干扰治疗。

我提出的是一个实践问题。

夏尔·梅尔曼

也许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拉康派分析家是否要求某种东西，还是某种东西由一个结构安置起来，而分析家和受分析者——孔泰试图强调的正是这一点——都以紧密依存方式受到结构约束。我的意思是，无论一位分析家是不是拉康派，无论他是否表述出对象(a)这个概念，对象(a)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会必然、强制地在场。

只须翻开其他学派精神分析家的大量文章，就会发现，对象(a)以及怎样以最不坏的方式避免误用它的问题不断得到提出；即便它没有获得

一种能实际达到勒穆瓦纳刚才所希望之结果的表述。因此，在我看来，若用这种形式提出受分析者与拉康派分析家的关系问题，就是强扭或偏转了措辞。

对象(a)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会提出；唯一的问题是怎样使用它，以及使用中要承担什么风险。问题就在这里。换言之，极端来说也可以说，分析家——不论是不是拉康派，都无所谓——先验地不要求任何东西；无论如何，对象(a)都会进入流通。

让·艾姆

就刚才的对话而言，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孔泰的发言也把它说得更准确：无论拉康派还是其他分析家，他究竟是一位要求者，还是“被假定提出要求的主体”？问题正是这个。也许值得庆幸的是，对对象(a)的这种强调可以揭露一种在精神分析协会中很少得到展开的东西：精神分析家的社会经济地位。毕竟，这项实践——他正是从自身位置界定它——发生在所谓自由职业领域；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职业是一种商业实践。如果不尝试揭露这个维度，真正的要求者与被假定提出要求的主体之间，就可能有某种东西无法得到正确分节。

我还想就 11 月 15 日的研讨班发言：

- 刚才有人追问，为什么巴甫洛夫会在那一天出现；
- 与此同时，今年研讨班以《精神分析行动》为题，对于那个以在语言领域中操持言语为功能的人来说，是一种挑衅；这里可以参照各民族智慧的说法：“言语随风消散，文字留存下来。”

回到这个维度：在我看来，拉康似乎标出了支撑行动与活动之争的一种问题，也就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这个古老哲学问题。

我想，巴甫洛夫那天出现的原因就在这里。你没有提醒我们那句我记下的话：“有语言之处，就完全没有必要援引一个精神实体。”我认为，重提这句话并非无用，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节这个问题。

夏尔·梅尔曼

不过，回到迄今各个问题提出的内容，仍有如下这一点：拉康一开始便提出一个悖论——行动问题竟能够在精神分析领域中提出，而在这个领域里，迄今只有作为失误、作为失败的行动才被承认为行动。这毕竟已经是第一个问题。此外，在这个领域中，规则恰恰要求人们在治疗进程中禁绝一切可能属于行动的东西。也正是从精神分析家对精神分析行动的某种遮蔽出发，拉康为自己的质询找到起源，或者说恢复了质询的涌现。

在我看来，勒穆瓦纳已经很好地从临床层面重新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层面恰恰就是精神分析的终结，以及行动在那一刻究竟如何。我再提醒一次，这不属于第一场研讨班，但我的确说过：没关系……拉康在那里清楚地定位了精神分析行动同精神分析家之关系的困难；换言之，这涉及他们面对自己以之为职业的行动会遭遇何种命运。

还有一点……

简要回顾托斯凯勒与奥杜阿尔的讨论……它涉及行动是否包含承认、乃至登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里可以同时唤起两件事情：

- 一方面，是奥杜阿尔——如果我没有记错——虽然没有引用这个术语却提出和接近的 Verleugnung〔否认〕功能；也就是相对于行动，存在某种会使主体被带去否认它的东西。

- 另一方面，谈到登记的承认，也许还可以从行动所开创的领域、所开创的新领域一侧定位某种东西。

换言之，如果必须使用“承认”或“铭写”这个词，这里的分节也许相当微妙；不过无论如何，行动层面上的某种东西……

人们至少正试图以这种方式规定它……会标明一个新领域的开始与打开。

诺耶先生

我觉得，此刻应当引入一个词；况且您刚才以“失误”这一重音引入了它。我想知道，精神分析行动的特异性……

以及它同活动或其他行动、尤其同医疗行动的区别……是否在于，精神分析行动从一开始就使匮乏的维度呈现出来，而这正是治疗的基础。

我的问题是：如果不仅不引入匮乏概念，而且也不引入切断概念，我们能否真正认识精神分析行动的特异性？因为在我看来，研讨班结尾把行动概念同切断概念放在了一起。能够思考行动而不思考切断吗？

吉内特・米肖

我正想说大致相同的事情。讨论一开始毕竟是要把转移同发生行动分节起来。

可是，如果没有切断，就不可能有转移；而在我看来，由切断作出分节并非精神分析行动所特有。相对于行为而言，一切行动的特性恰恰都是以一次切断闭合，并且能够重新闭合——不是闭合成一个封闭系统，而是可以说同时走向闭合与切断——以便进入流通。一项行动要跟随你，就会受到标记和界定；人们不再回到它。需要回来时，人们会回到它，但它已经闭合。

可以说，要有转移、转送以及一切属于转移动力机制的东西，某种东西就必须被切断；必须从某个时刻起出现断裂。甚至可以把大他者的形成同第一能指的切断分节起来；由此才可能发生置换和嬗变。

我们不能谈一个而不谈另一个；也可以类比物物交换与货币系统：从某种价值被盖印，并能够作为交换价值进入流通的时刻起，事情才成立。

吕西安・梅莱兹

刚才围绕在精神分析圈子中引入 (a) 流通的讨论，让我有些吃惊。

它当然以前就在其中；但研讨班的行动毕竟形成了一次切断，给它盖上了认识的印记。某种东西由此使如下两者确实不同：援引一个没有被命名、因此就那样在文本中流通而不从中脱出的 (a)，以及援引一个连同自身结构一起出现的 (a) 结构。

两者不是一回事。

让·乌里

我想给这张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再加一个问题。你引用了第二句话："进入精神分析"，随后又说"开始以精神分析家身份执业"。这已经是一个问题，因为必须把"进入精神分析"同"开始以精神分析家身份执业"分节起来。

这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训练分析问题。或许值得考察，在进入精神分析的行动与前往某个精神分析家协会、申请成为分析家的行动之间，是否应当作出某种程度精细的区别；后一个行动毕竟也进入一种严格的分析视角。

换言之，人们前往一个已经正式组成的协会，逐一拜访其中某些人物；这个行动似乎毕竟具有行动性质，而且对成为分析家有一定重要性。它同个人进入分析的行动怎样分节？

我觉得，这个问题肯定无法立即解决；不过，训练分析问题正透过这项虚假的对立被提出来。

换言之，进入训练分析同进入分析是一回事吗？

克洛德·多尔热耶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从研讨班中记下了如下公式："开始一场分析确实是一项行动。"

但拉康又补充：“是谁做出它？”随后他说，不能把行动结构归给那个投身其中的人。

夏尔·梅尔曼

是的。可以肯定，你们的问题和研讨班的问题有不少涉及分析家同知识的关系，尤其是同治疗打开以后得到安置之物的关系，也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呈现；与此同时，也无疑涉及分析家同这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可以说治疗的推动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里确实存在一种高度实践性的情境，其效应无疑可以追踪得很远，甚至延伸到精神分析协会的组织问题；这些问题虽属边缘，但也只是在极限上才边缘。严格说来，某种占据核心位置的东西确实就在这里。

费利克斯·伽塔利

拉康创立这个学派时，同精神分析运动的一整套悠久传统、同它面对自身责任所采取的某种回避行为发生决裂和切断。可以说，他做出了一项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行动；而且我觉得，它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中压得尤其沉重，使人不得不用几句话说点什么，这一面多少令人沮丧……究竟说什么？

这恰恰是在回应拉康的一项要求。要求什么？要我们投桃报李吗？要某种回返，要我们回应他提出的那个问题吗？当时他说：“我创立——一如既往，独自一人……”

我不记得他的原话了。

我也在思考勒穆瓦纳的问题。拉康为某种源出部分对象的东西命名时，把它命名为对象(a)。

他取用了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这立刻赋予它某种铭写和字母性质，也就是字母的审级。某种原已存在于精神分析运动中的东西，由此被带入特定命名；这项创造名称的行动，使他承担了一次理性重分类的父职。可以说，这把我们学派中的所有人置于一种相当特殊的转移位置，因为必须承认：在弗洛伊德之后，拉康以某种方式重新奠定了精神分析，重新将它实现为行动。但我认为，在这种条件下，学派自身的运作显露出整体性的犹疑。两年前的一场大会上已经谈过这些事；我不知道后来是否真正重新讨论过，也不知道当时的意见和建议是否真正受到考虑。

无论如何，精神分析协会、弗洛伊德学派怎样构成对这项重启弗洛伊德主义之行动的回应？我认为，这正是今天会议的某种陷阱：一项行动以后，怎样还可能说话？拉康承担了切断和重新奠定精神分析的责任以后，怎样还可能说话？

说实话，我认为今天这场会议把问题退还给我们，至少应当推动我们走得比单纯的行动问题更远，并围绕这项更像抑制、更像一种无法越过澄清工作的行动转动。

夏尔·梅尔曼——您自己的质询中，有什么令您感到“沮丧”？

费利克斯·伽塔利

这件事在于，我认为，多年来弗洛伊德学派内部发展出来的一切，无非是对拉康公式的严格仿照；或者在某些情况下，虽有一定原创性，

却极不确定地加以主张。我认为，拉康进入了一个自己长期预先准备、长期贯穿整个精神分析历史加以构造的领域；而我感觉这里存在一种抑制——况且，这是群体机制中的经典现象。我们大多数人——我想从我自己开始——都在分析意义上难以在特定领域中使自己在行动中实现；这些领域恰恰并非拉康特有，也并不特别处在拉康的尾流中。

于是，人们很难谈论自己如何投入精神分析，或者只愿意在拉康给我们留下一个极小接缝、一点极小余隙的地方说话，却也不太知道自己能说什么……我十分真诚地怀疑，我们从这场会议开始以来究竟正在说些什么。

莫拉利先生

我想重新提出一个也许同刚才相同的问题：从这场讨论和这次研讨班开始以来，我们究竟是在一般性的语言结构领域中质询精神分析吗？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追问，精神分析中的什么东西配得上用语言所谓“行动”来指称；还是采取相反的假设？也就是说，我们会不会要求精神分析真正教会我们行动是什么，并在必要时逆着语言教会我们？

您刚才的评论或许恰恰指向这一点：我们从精神分析中知道，行动作为失误之物、作为必须避免之物显现；因此，准确地说，它是相对于语言、相对于语言会诱使我们理解为行动之物的切断。

如果采取第二种假设，我们事实上怎样才能知道：精神分析家不是正在利用语言，同时逃避行动和行动的真理？

而我们现在所做的，是否同时就是对语言为抵御行动及行动真理提供的这个退避所、这层保护的体验与享乐？

夏尔·梅尔曼

有两点我会谈谈自己的看法；不过，还有其他意见想要表达吗？

X 女士

听拉康最近几场研讨班谈对象(a)时，我有一种印象：问题是让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在精神分析终点变成对象(a)。这样一来，它也许并不具有刚才人们理解的那种重要性和意义；但精神分析的目标正是让它最终变成对象(a)。

夏尔·梅尔曼

是的。我想说两件事情。

第一件涉及伽塔利的评论；我必须说，我很难理解并定位它。

问题恰恰不在于拉康期待一场工作会议产生什么，也不在于他是否期待我们投桃报李。问题是我们自己想就此说什么。首先是这个：我们有话，或者没话。有话，就可以考虑讨论和谈论。

我看不出这里存在丝毫问题，我是说，丝毫阴影。

费利克斯·伽塔利——这已经持续多年了。

夏尔·梅尔曼

另一方面，即便我们确实受到某个领域及其起源之物牵连，仍然不妨碍我们交谈、说话；极端来说，问题甚至在于促进这些事情。至于原创性问题，它绝对令人着迷，也让许多人感兴趣。我必须说，这无疑需要思考，而且很微妙。尤其是，人们相对于这里正在实现的东西——也就是一个结构的建立——提出原创性问题。那么，在一项涉及结构组织的研究工作中，例如在数学中，具有原创性究竟是什么？

一位数学家作出一项令人振奋、确实处在最前沿的发现。他发表成果；八天以后——根本用不了更久——另一位读过论文的数学家就给出一个更一般的公式。

是谁作出了发现？两位数学家的原创性分别在哪里？

这个问题似乎值得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不能停留在围绕原创性的那种模糊、朦胧和光晕层面——而模糊、朦胧和光晕也让我们感兴趣。必须尝试澄清原创性究竟是什么。

拉康在一篇较早的文本中谈过独一性的激情。这项质询由……开启：

帕里索女士曾在《拉康读解》中讨论独一性的激情。也许还可以考察某种归根结底应当加上引号、无论如何值得思考的东西，也就是所谓“原创性的激情”。

问题不是赋予它价值，评判它值得还是不值得承认，而是尝试知道那里有什么，它是什么意思、意指什么。无论如何，就例如今天提出的这些问题而言，我完全不觉得其中存在任何属于抑制的东西。必须说，从临床角度看，我并没有特别遇见抑制。

第二点涉及莫拉利先生关于行动与语言的发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无论如何，现在谈不上回答；极端来说，我甚至不打算此刻在这里重提。也许随后有人愿意接着谈？

我只提醒一点：拉康恰恰强调行动中他所谓能指的维度。

可以从以下两个例子来把握：

- 《约翰福音》的“太初有圣言”；
- 歌德的“太初有行动”。

拉康可以说不断强调这两个领域的勾连。换言之，这种勾连不容任何地方发生闪避或回避；在拉康那里，它恰恰把行动同一个逃脱运动机能、刺激—反应、行为—做等等辩证法的领域相连。这个东西可能为那里真正的行动赋予地位。

无论如何，我很难在这项工作中看到一种闪避。

泽维尔·奥杜阿尔

我想顺便凸显几次发言中清楚显现的行动与原始场景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为了告诉伽塔利：归根结底，我并未受到抑制，完全敢作出拉康没有作出的这个联系。事实上，长期以来，我一直根据个人经验思考我们所有分析家都会遇到的这种奇特经验：在这里讲话的先生或女士谈起原始场景，仿佛自己曾亲眼在场。主体当时不在那里，却完全有根据谈论它；也就是说，他试图在自身言语的开创行动中，重新接过自己生命的开创行动。

这个模型中有某种东西，在我看来界定了、或者至少照亮了行动的根本：行动即便希望得到承认，仍是一种无法得到承认的东西；正因为不能得到承认，它总会通过把我们的匮乏推在前方，使我们投入恢复它、重复它的努力。我甚至要说，这同该行动所开创的内容或打开的领域无关，而是作为纯粹行动发生；这个纯粹行动企图把自己呈现为意识。

此时，使自己成为行动并相信自己就是行动的意识恰恰陷入迷途，为了回到什么？回到行动中某种不可能纯粹的东西；也就是说，意识此时让自己作为意识坠落，以恢复一个并非意识的主体。这个主体变成什么？变成行动。

我认为，这套辩证法没有理由在随后停止；不存在最终承认。

夏尔·梅尔曼

关于可能举行的下一场闭门研讨班，我向你们提议：如果你们中有人希望根据自己的领域、工作和思考展开某些要点，请主动表示；我们会非常欢迎……〔让·乌里、伊雷娜·鲁布列夫表示愿意〕

我们基本停留在我所提到的第一场研讨班主题中。但有一个主题在我看来非常重要，值得重新讨论、把事情说得更精确：那就是去年围绕……所做的工作。

《幻想的逻辑》，今年又以十分明确、但处在另一层面的方式重提它。

你们中有人愿意准备一份对《幻想的逻辑》的回顾吗？

雅克·纳西夫——我愿意试试。这取决于能用多少时间。

夏尔·梅尔曼——用一个不妨碍我们随后讨论的时间长度。

第9课 · 1968年2月7日

时隔两周，我继续今年在你们面前围绕精神分析行动推进的这条路线；与此同时，我也在一个由精神分析家组成的圈子中提出了若干——使用准确术语——命题。

对这些命题的回应……

况且并不限于那些明确以回应为题的内容，随后还有若干其他成果；可以这样说，因为本月底将出版一份学派的刊物……这一切带来若干回应或表现；对我在这里讲话的对象而言，它们绝非毫无意义。[注1]

> [注1] 指《Scilicet》杂志创刊号，巴黎，Seuil 出版社，1968 年。

很清楚，其中某些回应和反应恰好出现在最敏锐之点；在那里，我的命题同我在你们面前围绕精神分析行动提出的内容一以贯之。它们无疑充满意义，可以通过一场堪称关键性的检验，界定精神分析家的地位究竟如何。

事实上，上次我最后向你们指出了一项逻辑参照。走到我们目前所在之处……

也就是行动以其刃口界定那道过渡，而精神分析家在过渡中得到建立和设立之处……非常清楚，我们只能重新经过逻辑质询为我们构成的检验模式。若采取亚里士多德的开创性参照，这会是怎样一种质询？正如我提到的，在他迈出决定性步伐、使逻辑范畴以形式物种得到确立的时刻，这种质询是什么？

这是一种意在证明的进路，还是一种辩证进路？你们会看到，这个问题是次要的。为什么次要？因为相关之物由话语本身建立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围绕分析者与精神分析家表述的一切，都将围绕……旋转。

我想，接下来这样说不会使你们惊讶；我已作过足够准备，现在这件事应当显得已经说过……处在话语情境中的分析者，怎么可能不是位于主体的位置？

无论使用何种参照来定位他——自然首先是语言学参照——他根本上都是“讲话的人”，也是言语效应“在他身上受到检验的人”。这个“在他身上受到检验”是什么意思？

这个公式有意保持歧义。我的意思是，他的话语按照分析规则受到调节和建立，正是为了检验：作为主体，他已经怎样由言语效应构成。

然而，同样可以如实地说：这番话语将作为任务继续并得到支撑；它的裁定、结算和结果，是话语效应，首先就是其自身这番话语的效应，无论分析家通过解释以何种方式插入其中。

反过来，我们必须察觉，那个始终现实、甚至有时炽热的问题一旦指向精神分析家，最谨慎、最低限度的说法是：因为“精神分析家”一词被置于资格规定的位置。谁或什么能够被说成——作为谓词——“精神分析家”？

即便这个开场显得稍快，稍后回头也会使它得到证明。为了直达要害，我现在先宣布，今天的话语要放在什么招牌、什么标题之下。你们可以相信，我并非没有重新着陆——可以这样说——去接触逻辑史

本身能够提供的照明。在我们的时代，人们操持逻辑一词所指之物的方式发生了如此翻转；这不会总让我们的工作更困难，却会让我们自己面对亚里士多德的出发点时越来越迷失方向。

必须回到他的文本，具体说就是《工具论》，例如《范畴篇》《前分析篇》或《论题篇》第一卷，才能看出他所陈述的主体主题多么贴近我们的问题。[注2] 从最初的陈述起，再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照亮主体层面上那个依其本性最会逃脱之物；而在逻辑的开端，也再没有什么比这一点得到更坚定的肯定：它不同于那个被人——无疑极不充分地——译成"实体"的东西，即 οὐσία〔ousia，所是〕。

> [注2]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巴黎，Vrin 出版社，1966—1987 年新版，Tricot 译；包括《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和《论题篇》。

把它译作"实体"，恰恰表明历经时代发生了一次滥用性的滑移：在亚里士多德最初几步中，主体功能逐渐滑向了别处，以至"实体"一词如此轻易地被推到前台，同主体所包含的假定发生歧义。

在 οὐσία〔ousia〕中，在"所是"——对亚里士多德而言，也就是个别者——之中，没有任何东西依其本性能够：

- 被置于主体中；
- 或得到肯定，也就是被归属于主体。

还有什么更能让我们立即纵身进入我认为可以严格用一个公式来见证的问题？这是逻辑史上真正关键、真正中心的点：主体因不断增厚的歧义而模糊以后，在现代逻辑的步伐中重新找到另一面；一种转折可以说使其视角翻转。在数理逻辑中，这个转折倾向于把主体缩减为函

数的变量，也就是随后进入量词的全部辩证法之物；而这种辩证法唯一的效应，就是让主体从此不可能再以它在命题中显现的方式得到追回。

我认为，自己给出的这个公式相当准确地固定了“转折”一词：主体恰恰就是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所代表的东西。这个公式的优点，是重新打开数理逻辑命题所省略的问题：提出任意一个能指、把它作为代表主体之物引入时，究竟有什么原初和开创性的东西？因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本质就在那里；也只有它使我们能够把以下两项差别放回正确位置：

- 第一重二分，即普遍与特殊的区别；
- 第二重二分，即肯定与否定的区别。

你们知道，两重二分交叉以后依次产生四分：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否定和特称肯定。[注3] 两重二分绝不等价。

> [注3] 亚里士多德由此形成四类命题：全称肯定命题 A（所有人都会死）、全称否定命题 E（不存在不会死的人）、特称肯定命题 I（有些人是画家）、特称否定命题 O（有些人不是画家）。中世纪逻辑方阵用 AffIrmo, nEgO（我肯定、我否定）帮助记忆 A、E、I、O。

主体的引入——只要普遍与特殊的二分正位于其层面——究竟意味着什么？

如果像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那样，从一个恰好位于传统逻辑与数理逻辑接缝的历史点来考察，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说在他的笔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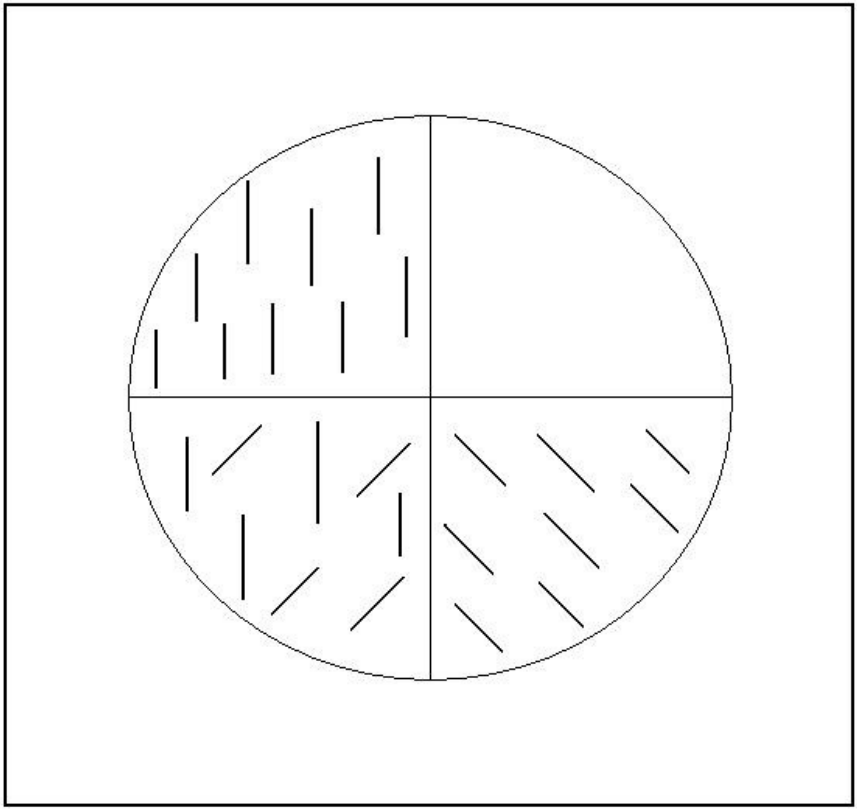
看到一个摆动时刻，其中逐渐勾勒出打开新道路的转折。[注4] 没有人比他……

> [注4] 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皮尔士论文集》第二卷《逻辑要素》，第三编第一章《亚里士多德三段论》，马萨诸塞州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 年，第 273—283 页；另见《哲学著作》第二、三卷《剑桥讲座》，Cerf 出版社，2003 年。

我在 1960 年需要谈《认同》主题时已经援引过他的见证……更好、更优雅地强调过这个基础的本质：普遍与特殊的区分从中产生，而普遍者同主体项的联系也从中产生。[注5]

> [注5] 参见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1962 年 1 月 17 日、3 月 7 日和 5 月 23 日各课。

他借助一幅示范性小图做到这一点。追随我已有一段时间的人很熟悉它，不过重画一次也并非没有意义。当然，他很方便地用主体真正所是的东西来支撑主体，也就是无；在这里就是线条。为了例示主体与谓词的关系功能，我们将使用这些线条；其中每一条都已经由我们围绕命题陈述运转的谓词得到规定，也就是：



- 垂直这一谓词〔左上〕；
- 在这里〔左下〕，我们放入一些符合谓词的线条，即一些垂直线，也放入另一些不垂直的线条；
- 在这里〔右下〕，没有一条是垂直的；
- 在这里〔右上〕，没有线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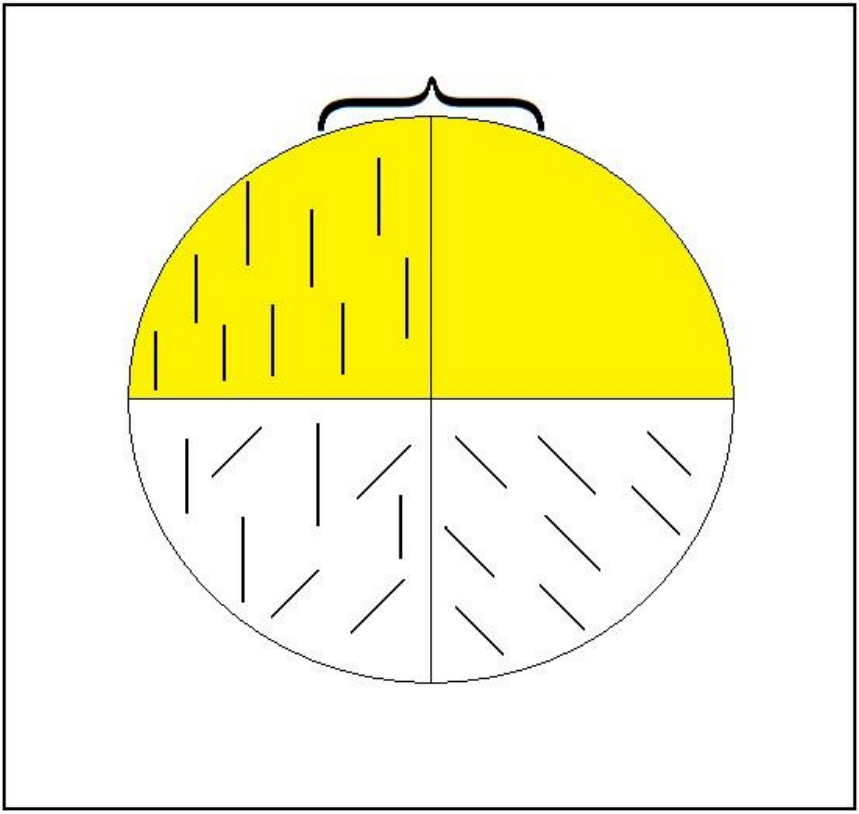
主体就在这里，因为这里没有线条。在其他各处，线条都由谓词的在场或缺席加以标记。但为了让人充分把握，“无线条”何以具有根本意义，可以采取几种方法；例如把全称肯定命题建立为：“没有一条线不是垂直的。”

于是你们会看到：

- 让“不”作用于“垂直”，或者撤除这个“不”，就能形成肯定与否定的二分；

- 但撤除“线条”前面的“无”，留下垂直或不垂直的线条，才会进入特殊者；也就是主体完全受制于“垂直”或“不垂直”变化的时刻：有些是，有些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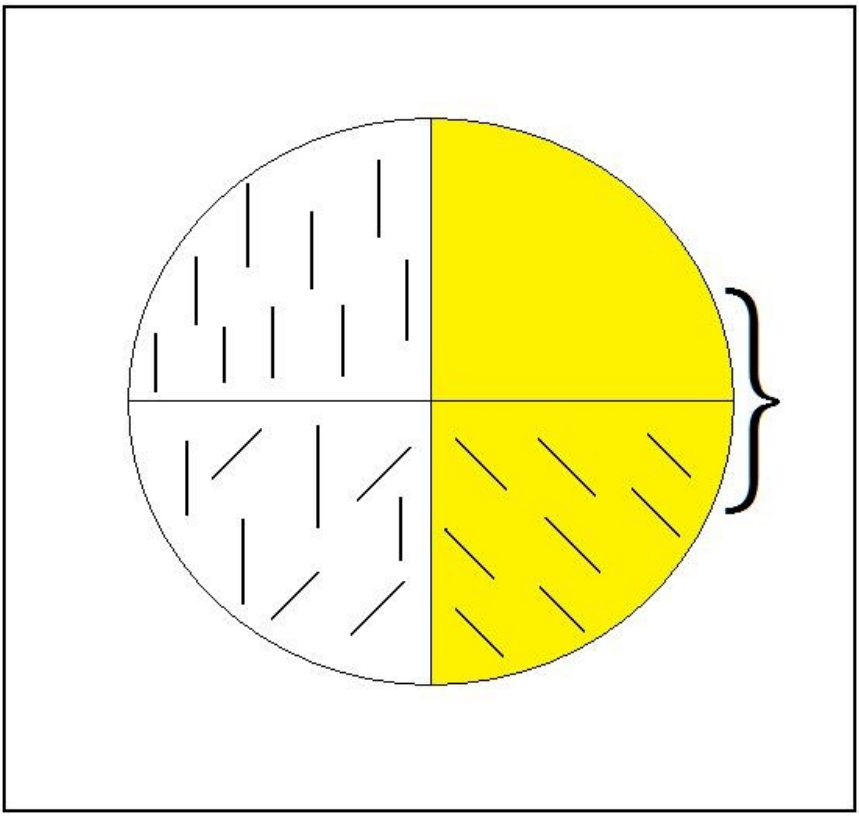
而普遍性的地位，只能例如在这里〔上方括号〕得到建立：



它由两个格子的合并建立：一个格子里只有垂直线，另一个格子里根本没有线条。因为“所有线条都是垂直的”这个全称陈述，只有依靠这两个格子及其合并，才能正当地得到支撑。

在空格层面，它同样为真，而且更根本地为真：“只有垂直线”意味着，在没有垂直线之处，就“没有线条”。这就是主体可以接受的定义：在一切谓词性陈述之下，主体根本上都是某种只由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的东西。

我只快速提一句，因为我们不能把整场讨论都用来详说皮尔士图式中可以提取什么。很清楚，“没有一条线是垂直的”这个陈述同样以这两个格子〔右侧括号〕的合并为支撑。这正是我必须强调它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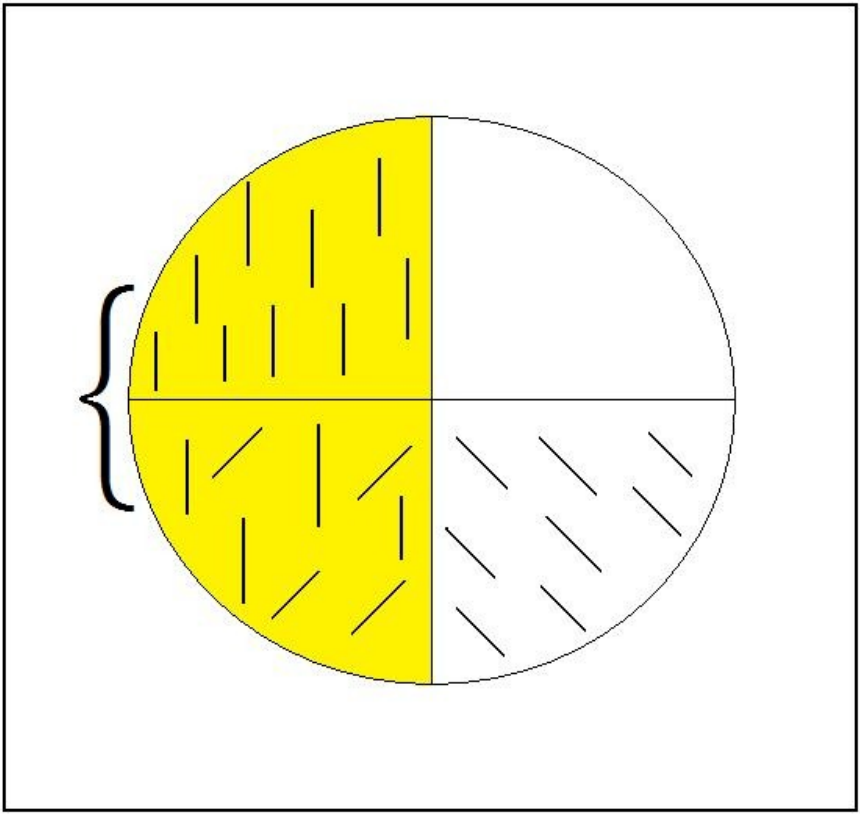


这证明了一个人们本来已经知道的事实；当然，前提是以恰当方式阅读亚里士多德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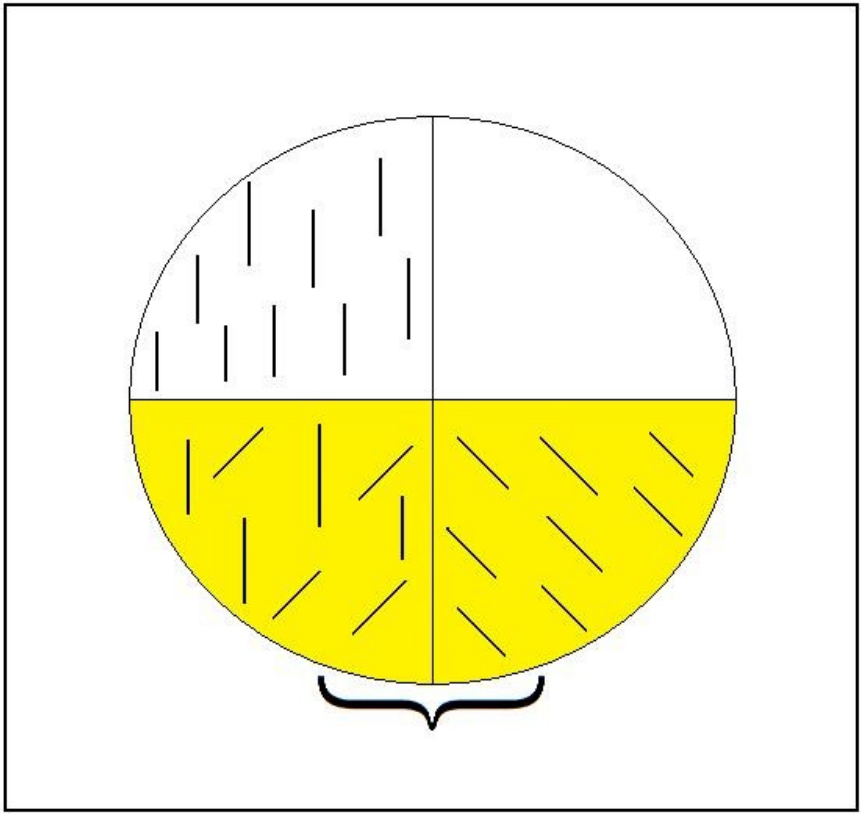
- 全称肯定与全称否定绝不矛盾；只要我们处在右上方这个格子中，两者都同样可以接受；
- 在这个格子层面，无论说“所有线条都是垂直的”，还是说“没有一条线是垂直的”，都同样为真；两者同时为真，而亚里士多德奇怪地误认了这一点。

在这个关键划分的其他点上，你们看到特称命题得到建立。

这两个格子〔左侧括号〕中有垂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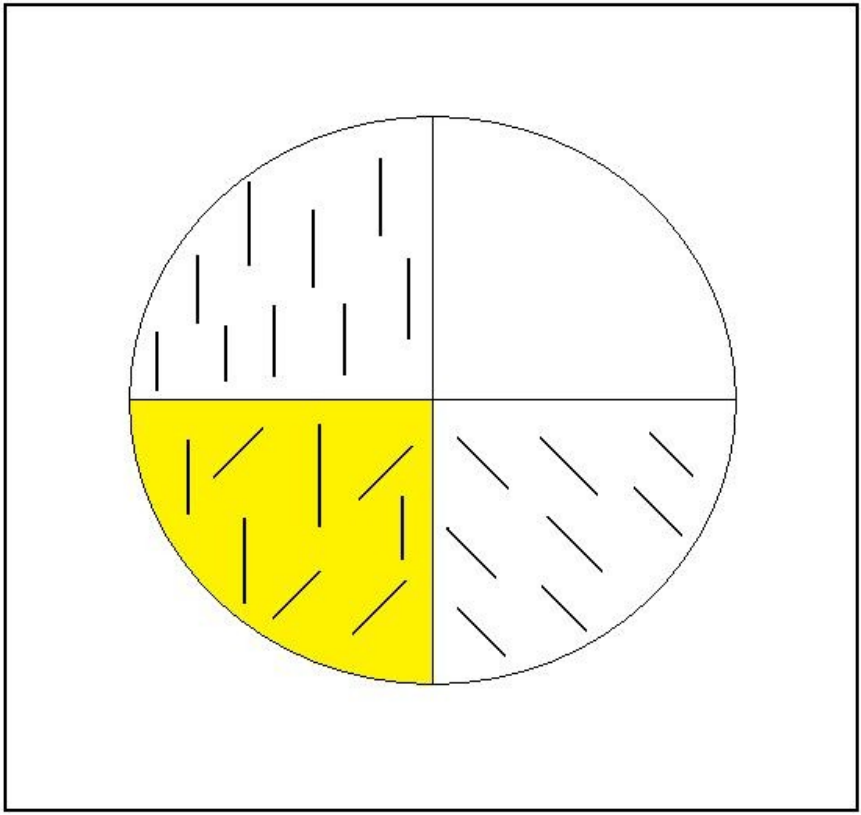
而在下面两个格子的连接处〔下方括号〕，有——也只有——不垂直的线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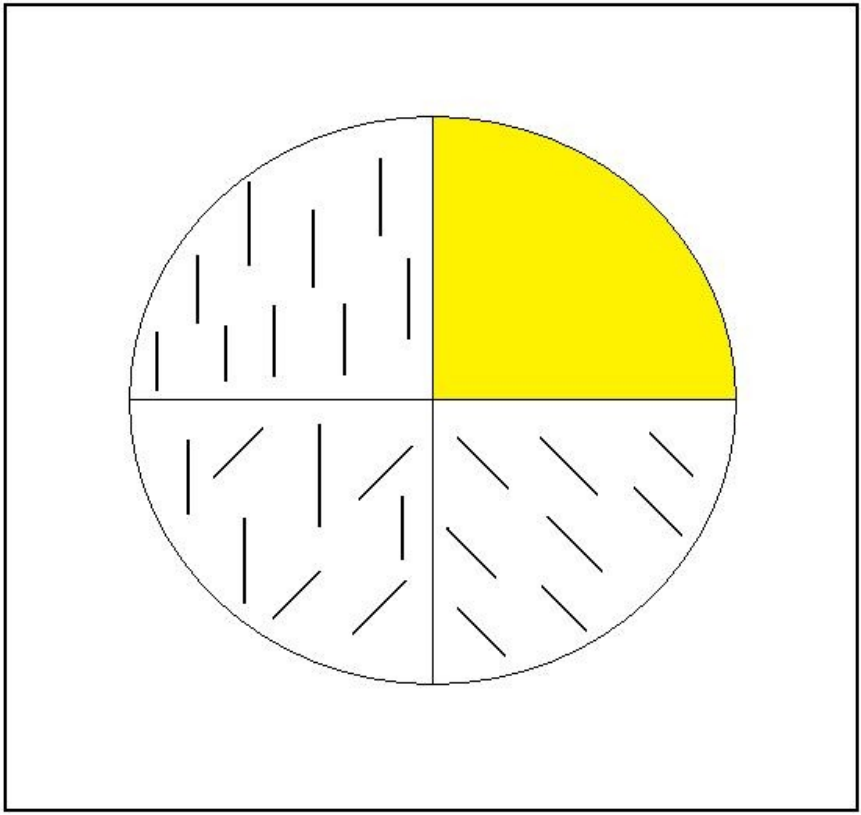


所以你们看到：

- 在普遍基础层面，事情的安排可以说包含一次排除，恰恰排除这种多样性〔左下格〕；

- 同样，在特殊分化层面也有一次排除，排除的是右上格。这就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特称命题是一项存在肯定。





只要在“某个”的层面讲话——例如“某个人具有黄色肤色”——人们就会因为这项事实以特称形式得到陈述，而认为这个陈述本身也对特殊者的存在作出了肯定，容我这样表达。

关于特称命题逻辑地位的无数争论，正是围绕这一点旋转；这也无疑构成其中的可笑之处。一个命题在特殊者层面得到陈述，完全不足以以任何方式蕴含主体的存在；除非以一种能指安排为名，也就是说，把它作为话语效应。

精神分析的意义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为这些逻辑问题带来……

那个构成逻辑史上所有歧义之原则的东西：人们在主体中蕴含一个οὐσία〔ousia〕、一种存在……而精神分析带来的是，主体能够以“不在”的方式发挥功能。

严格说来，这正是我从今年年初起、乃至去年一整年都在分节并坚持的东西；它为我们带来一个照明性的入口，使逻辑发展史的考察可以重新开启。

这项任务仍然敞开——谁知道呢，也许这样表述会唤起一种志业——它能够向我们展示，如此多的迂回、我甚至要说如此多的困窘真正意味着什么……

它们有时在历史进程中以如此奇特而悖谬的方式显现……历代逻辑争论都带着它们的印记；它们也使如下事情如此难以理解：

- 从某个时代——至少从我们这个时代——来看，这些争论有时耗费的时间；
- 以及长期以来在我们看来构成的停滞，乃至围绕停滞形成的激情；只要没有看到背后真正押上了什么，我们就很难感受其效力。

那里押上的无非是欲望的地位。欲望同例如政治之间的联系虽属隐秘，却在某些转折中完全可感；例如，某种唯名论在一种哲学——具体说就是英国哲学——中的确立。若不察觉逻辑本身所蕴含的主体地位，以及它对欲望在政治关系中之现实效力的参照，就不可能理解这套逻辑同一种政治之间的连贯性。

对我们来说，这种主体地位由一些问题来说明。我再次指出，这一切发生在一个非常有限、甚至十分狭小的环境中；其中的讨论具有强制性和炽热性质，而这些性质可以说参与了那些古老的潜在基础。我们在这个场合取作范例并能够分节的东西，正因如此——你们会看到——可能对远为广阔的领域产生影响；因为这个问题绝不只在围绕欲望功能——按照精神分析的发现——运转的实践中得到押注。

这样，我们已把分析者和精神分析家分别放在各自不同的位置上。

一个由这番话语界定的主体，会具有怎样的地位？上次我告诉你们，这番话语由规则建立；其特殊之处在于，规则要求主体在其中退位，这正是规则的目标。极端来说，主体任自己在语言中漂流，试图通过某种对其纯粹效应的间接经验——正如刚才所说——重新会合语言已经确立的效应。

这样的主体，被界定为话语效应的主体——以至他要体验在其中迷失、再从中找回自己——其活动可以说就是经受自身辞职的检验。关于他，我们能说什么？谓词会施用于什么？换言之，我们能否陈述某种属于普遍范畴的东西？

如果普遍者还没有通过自身结构向我们表明，它的动力与基础就在主体那里，只要主体只能由自身缺席来代表，也就是说，主体永远只是受到代表，那么我们当然有权提出问题：例如，是否可以陈述任何属于以下秩序的东西：

“所有分析者都会抵抗。”

不过，我还不打算裁断：是否可以就分析者提出任何普遍命题。

尽管表面如此，我们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把分析者设为这样的主体，就是设为那个可以说选择让自己比别人更加异化的主体；他委身于一番没有由自己选择的话语的种种迂回。这同图式开端处的东西最为对立：那里当然也有一种选择，但那是一项被遮蔽、省略的选择，因为它在先……

人们选择用线条代表主体，而这条线一旦得到规定就不再可见……表面上，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同于分析者借以构成自身的东西；后者毕竟也是一种选择，是我刚才所谓"退位"的选择：选择让自己经受语言效应的检验。

而我们恰恰会在那里重新找到自己。事实上，如果追随三段论用法向我们提示的线索和经纬，必然抵达的是把这个主体同这里作为谓词提出的东西——精神分析家——联结起来。假如存在一位精神分析家……

然而遗憾的是，支撑这项逻辑分节所缺少的正是这一点……那么一切就都有了保证：还可以有成堆的其他分析家。但眼下，我们的问题是分析者怎样过渡为精神分析家，为什么这个资格只有依靠分析者完成的任务，才能以最有根据的方式得到支撑。

我们看到，这里打开了另一个维度，也就是我已经尝试在你们面前勾勒的行动与任务之结合：两者怎样结合？我们在这里面对那个问题的另一种形式；它最终在中世纪得到分节——这并非没有缘故——即inventio medii〔中项的发现〕。亚里士多德在《前分析篇》中以令人赞叹的轻快步伐谈到它：第一格中项。这个中项被置为谓词以后，如

他所解释，将使我们能够以理性方式把这个消隐的主体同某个谓词联结起来；借助中项，这种结合成为可能。

谜在哪里？为什么看起来存在某种中项，而且它在第一格中作为小前提的谓词出现？主体作为小前提的主项在那里等待我们，而这个中项会使我们挂接上相关的谓词。这个谓词究竟能不能归属于主体？

随着时代后退，这件事情染上过不同色彩；到十六世纪之交，它看起来最终只是一项纯属徒劳的练习——作者的笔下无疑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察觉了其中真正涉及的东西，也就重新赋予它身体。

所涉及的是我所谓对象(a)。对我们而言，它在这里是真正的中项；它以无可比拟的严肃性出现，因为它一方面是分析者话语的效应，另一方面又……

正如我在那张新图中所陈述的——两年来，你们一直看着我在这里使用它……不是精神分析家将要变成的东西，而是：

- 整套操作从开端就已经蕴含的东西；
- 应当成为分析者操作结余的东西；
- 在精神分析终点，使一项根本真理得到释放的东西。

这项真理就是：主体同对自身性现实的一切可能主体化都不相等。要让这项真理显现，精神分析家必须已经成为对那个遮蔽、堵塞并封住真理之物的代表；这个东西就叫对象(a)。

请仔细注意，我在这里分节的核心——稍后还会大量回到它——并不是像某些人从提出的问题中表现出的想象那样：在精神分析终点，精神分析家会“为他者”变成对象(a)。

这里的“为他者”奇特地取得了“为自身”的价值，因为作为主体，除了那个整番话语都被留给他的他者以外，并无其他主体。这个 (a) 既不居于“为他者”，也不居于精神分析家层面根本不存在的“为自身”；它确实属于精神分析家的“自在”。

只要——正如精神分析家自己高声宣告的，况且只须打开文献，随时都能看到见证——

- 他们实在就是马拉美那句“哦，我的母亲，智性”中的乳房；[注6]

> [注6] 这句诗实际出自保罗·瓦莱里的《诗》，收入《魅力集》，巴黎，Gallimard“诗歌”丛书，1958 年，第 56 页。拉康在 1966—1967 年《幻想的逻辑》研讨班 1966 年 11 月 16 日一课中也曾引用：“惊讶将它攫住，/ 一张嘴正在啜饮 / 诗歌的乳房，/ 忽把绒羽从中分离：/ ——哦，我的母亲，智性，/ 甜美曾从你流淌，/ 这是何等疏忽，/ 竟任乳汁干涸！……”

- 他们自己就是主持任务操作的废弃物；
- 他们就是凝视；
- 他们就是声音……只要他们自在地成为这个对象(a)的支撑，整套操作才成为可能。

他们只漏掉了一件事：这绝非隐喻，程度有多么深。

现在，我们试着重新讨论分析者究竟如何。

这个分析者投身于一项特殊任务，我把这项任务界定为由他的退位所支撑；我们难道不会在这里感觉到，其中至少有某种照明性的东西吗？

他能否被纳入普遍功能，我们不知道。

另一件也许会使我们吃惊的事情是，我们并非无意地把他设为主体。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主体层面分节“分析者”一词时，正是他玩转这一切染上的色彩，如同富有罗马人盘中的海鳝；但一旦把它用作属性，这个词就只有改变意义才能投入使用。

证据是，人们把它用作属性时，用得像“受分析者”一词一样愚蠢。

人们不会说这些人或那些人、所有这些人或所有那些人“是分析者”。

你们注意到，我没有使用单称项。那会更加令人反感。

不过，我们把单称放到一边；在这个转折处，我们感到同亚里士多德不在其三段论中使用单称项一样的排斥。如果你们不能立即感觉到，通过检验“分析者”一词作为主项或属性的用法，我究竟瞄准什么，我现在就让你们感觉到。

看看“劳动者”一词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视角中的用法：它处在一种意识形态层面，揭示并强调劳动者根本的异化，强调把他们设为劳动者的构成性剥削。再把它同家长主义口吻中的同一个词对照；后者把一群人形容为勤劳：“这个地方的人天生勤劳……”这些是属性，是“好劳动者”。

这个例子、这项区别也许会把你们带向某种东西，使我们提出问题：归根结底，正是在这项如此特殊的操作中，精神分析行动的主体——如我所说——得到支撑；而建立精神分析的行动同样不从别处出发。这是否也许正是为了让我们察觉，这里也存在一种异化？

况且，你们不会感到惊讶，因为它已经出现在我的第一张图中。我正是从必要异化、从“不可能在‘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之间作出选择”出发，推导出精神分析行动最初的全部表述。

那么，我从侧面以这种启发式方式把你们引进来以后，你们或许可以问——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答案当然已经在那里——这项分析者任务生产什么？

我们已经有对象(a)作为引导。就我们的问题——即精神分析行动——而言，这个对象(a)无疑从来就在；但在完成的精神分析终点，它毕竟只在操作结束时才从另一个来源重新显现在实在中，也就是作为被分析者排除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的中项发挥功能，而且我们发现它负载着完全不同的重音。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相关的 (a) 就是精神分析家。他从一开始就在，并不表示到了终点，从分析者任务的角度看，受到生产的不是他。我的意思是，由此可以追问精神分析家的资格究竟是什么。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确定：没有分析者，就没有精神分析家。我还要再进一步：有一种如此特殊的东西进入了我们的世界——存在若干人，我们远不能确定是否可以把他们的地位建立为主体；但他们毕竟是为了这场精神分析而工作的人。

“工作”一词从未有哪怕一刻被排除。从精神分析起源开始，Durcharbeiten、working-through〔通盘加工〕就是我们必须参照的特征，以承认这项工作的贫瘠、干涩、迂回，乃至边界有时具有的不确定性。

但如果我们置身于一种全体性层面，在那里，所有主体都通过不再存在、通过成为右上格而坦率地肯定自身的普遍性，并以此奠定普遍者，那么我们会看到：确实有某种东西是它的产物，严格说来就是它的生产。

在这里，我已经能够钉住这个 genus、这个物种——精神分析家——究竟如何：把它界定为生产。

我会说，如果没有分析者，就没有精神分析家；这里仿照并倒置了一句不知出自哪种古典幽默的话：“如果没有波兰人，就没有波兰。”[注7]

> [注7] 原句是“如果没有波兰，就不会有波兰人”，出自阿尔弗雷德·雅里的《乌布王》最后一句，见《作品全集》第一卷，巴黎，Gallimard“七星文库”，1983年。拉康在《无意识的形成》1957 年 11 月 27 日一课、《认同》1962 年 5 月 30 日一课和《康德同萨德》中也曾引用。

在生产这个层面，精神分析家由以下几点界定：

- 他是这样一种主体：能够以如此纯粹的方式接近话语的后果，把话语层面同那个人的层面之间的关系分离出来；他以自身行动为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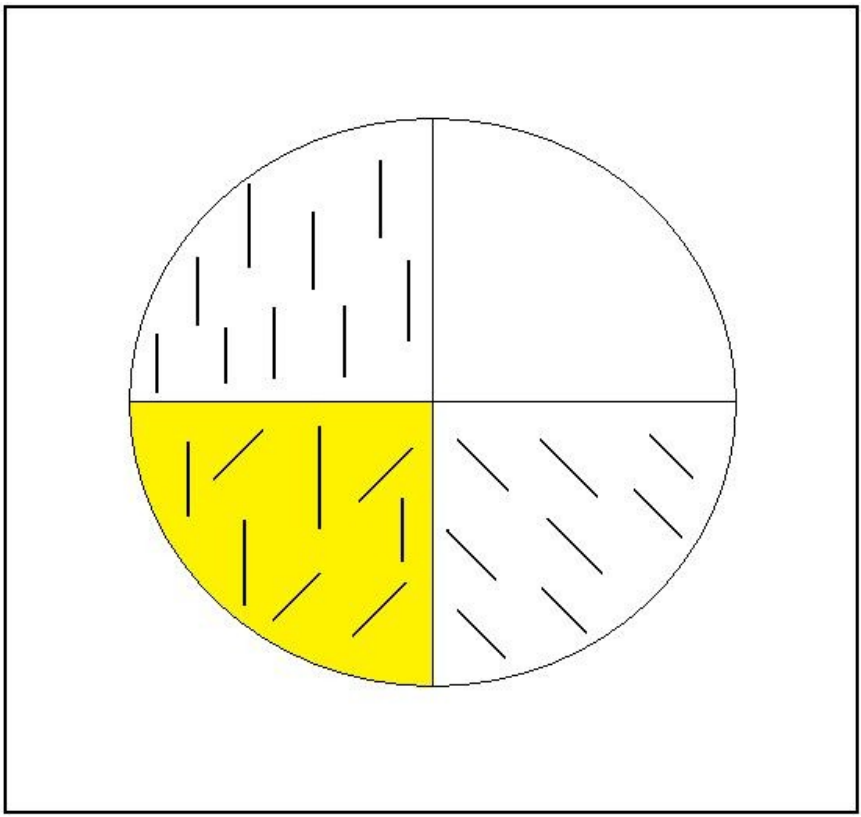
建立任务及任务程序，并在支撑任务的全部过程中，只在其中看到我操持这整套代数时所指的关系：S、(a)，乃至 A 和 i(a)……

- 他能够守在这个层面；也就是说，只看主体在任务中走到哪里，而任务终点就是对象(a)最终掉落、坠下的时刻；

- 他属于这个物种；这意味着，在同一个处于治疗位置的人发生关系时，他能够不受人类在任何功能中同同类交流所凭借的一切影响。

这件事有一个名字；它不只是我一向揭发的自恋，以及自恋走到极端时所谓的爱。人类之间并非只有自恋，幸而也并非只有爱；就用人们的称呼来说，还有某种被一个善于谈爱的人幸运地区分出的东西：有品味，也有敬重。品味在一侧，敬重也许不在同一侧，但两者结合得极好。

根本上存在一种叫作“你合我意”的东西；它完全由某种配比构成，以准确而不可替代的比例组成。你们可以把它放入左下格：



……主体从 (a) 取得的关系与支撑，同那个奠定自恋关系的 i(a) 发生共鸣；对你而言，它恰好达到使你中意的程度。人与人的关系之所以发生相遇，就因为这一点。

这一点构成有史以来在所谓人际关系秩序中得到分节的一切之骨肉；如今人们以“人际关系”之名，以滑稽方式尝试将它数学化。分析家恰恰同它区分开来：在精神分析内部的关系中，他从不诉诸这种不可表达之物，不诉诸那个唯一为他人的现实提供支撑的词：“你合我意”或“你不合我意”。

把这个维度抽离并使它缺席；而且恰恰存在一种“存在”——精神分析家之存在——能够通过自己处于 (a) 的位置，使分析者主体的命运所涉及的一切、即他同真理的关系运转起来，使它纯粹围绕这套代数的各项运转，而不涉及此刻在场、躺在长沙发上呼吸的事物中大量存在且完全可以接受的维度、大量给定和大量实体性要素。这里存在一种生产，完全可以同流通于我们科学世界中的这台或那台机器相比；严格说来，它就是分析者的生产。

这才是一件原创之物！

这毕竟是一件相当可以感觉到的东西！

这件事并没有多么新鲜，尽管如此分节也许会让你们印象深刻。因为，人们要求精神分析家不要在分析中使所谓“反转移”发挥作用，这是什么意思？除了下面这一点，我不认为还能给它其他意义：按照我刚才的界定，其中既没有“你合我意”，也没有“你不合我意”。

可是，这就把我们带到问题脚下：我可以说，已经把对象(a)改造成流水线上生产的精神分析家——一个像奥斯汀汽车那样的 (a) 产品——那么，如果精神分析行动毕竟是由精神分析家做出的，这项行动又可能意味着什么？

这显然意味着，精神分析家并非“全然”是对象(a)：他作为对象(a)进行“操作”。至于相关行动，我想，迄今已作过足够有力的分节，可以不加评论地重提：这项行动在于准许分析者任务，并包含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作出信任。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只要我还没有揭明这种信任无法维持，事情就很简单；而精神分析家是第一个、迄今也是唯一能够凭借我的教学衡量这一点的人——不过他尚未做到。

他必须知道：

- 第一，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恰恰就是他过去依赖的东西，也就是被视作天赐之物的转移；

- 但从转移被证明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那一刻起，唯有他——精神分析家——能够质疑这一点：这种假定固然有助于投入分析者任务，也就是假定有某一个——随你们怎样称呼，可以叫全知者、大他者——已经知道这一切，知道将要发生的一切；当然不是分析家知道，但总有某一个知道，于是人们可以上路……然而，分析家自己不知道是否存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他甚至知道，由于无意识的存在，精神分析中所涉及的一切恰恰在于从地图上划掉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个功能。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所以，这是一项奇特的信仰行动：它肯定自己恰恰信任受到质疑的东西。因为只要让分析者投入任务，就宣告了这项信仰行动，也就是说，人们拯救了他。

你们难道没有看到，这奇特地覆盖了一场古老争论吗？这类事情已经有些失去鲜明轮廓，如今所有人都毫不在乎了……据说，在最近一次路德百年纪念时，教皇寄来一张明信片：“罗马问候。”

究竟是信仰使人得救，还是功业使人得救？你们也许在这里看到一张图式，把两者结合起来：从分析者的功业到精神分析的信仰，有某种东西打成结；它也许能使你们回过头照亮两条救赎公式各自的有效性，以及它们提出时的不对称秩序。

不过，我希望，你们会对这番话结尾处逐渐显现的东西更感兴趣；我必须说，连我自己也很惊讶会在那里找到它。

如果在精神分析行动领域中，分析者所生产的是精神分析家；而如果你们思考我刚才顺带援引的劳动者之本质与普遍意识——严格说来，是作为人剥削人的主体的劳动者——那么，把关于经济剥削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劳动产品的异化上，是否……

- 遮蔽了构成经济剥削的异化中的某种东西？
- 遮蔽了它的一面，而且也许不是毫无动机地遮蔽了最残酷的一面；政治中的若干事实也许使这一面显得颇为可信？

我们为什么不提出这个问题：当生产组织达到某种程度，劳动者的产品会不会恰恰从某些方面表现为资本家在今天采取的特殊形式与形象？我的意思是，沿着这条线索继续，并由此考察资本主义信仰的功能。请从我围绕精神分析行动提供的提示中取用几个小参照，把它们暂时留在心中一旁，伴随我接下来继续的话语。

我会在两周以后继续……中学生都放假，我也以同一个名义给自己放假；我们两周后再见。

第10课 · 1968年2月21日

这几天将出版一份小刊物，我并不负责在这里向你们介绍。[注1] 再过几天，你们会在自然界——圣日耳曼德佩的自然界——找到它。你们会看到若干属于它自己的特点，其中首先是：除我的文章以外，出于我所说明的理由，其中的文章都不署名。

> [注1] 《Scilicet》第 1 期，巴黎，Seuil 出版社，1968 年。

这件事自然令人吃惊，也引起一些议论；主要恰恰发生在本应几乎立即理解它的地方。我指那些迄今唯一预先知道文章会以这种形式——即不署名——发表的人；他们不只是精神分析家，甚至更进一步，是本学派成员，照理说，他们的耳朵也许应该稍微留意这里说了什么。

总之，我希望，经过今天接下来属于我教学秩序的内容以后，这条已获采纳的原则——文章不署名——其解释和动力也许会对你们更清楚。看来，很少有人能预先迈出这一小步，尽管可以说，此前的整个进程已经指向它。

有趣之处当然在于：这份小型通讯已经明确说明，不署名并不表示作者身份不会为人所知；其中明确写道，每年年末会以名单形式公布作者。可是，某些耳朵——像会吐出东西的海螺一样的耳朵——立刻奇特地把“不署名文章”听成了匿名的功能。围绕这件事冒出来的一切，我就不再转述了。因为我向某些人通报这件事，只是出于某种教育目的：展示一件事怎样能被改造成另一件事。显然，再没有比第一次就不愿听更严重的耳聋。

还有人走得更远，在大量私人通信中告诉我：使用匿名制表明我把合作者当作雇员利用。

据说，有些杂志确实这样做；而它们并未因此办得更差、地位更低。

不过，从外面看，人们就是这样任意描述一种事实：例如，在某些评论刊物中，评论者通常不署名；据说，他们因此只不过是编辑部的雇员。

按照这种说法，谁知道“雇员”概念会延伸到哪里！总之，正如人们所说，我已经听尽一切可以听到的说法。每当我需要人们对一项创新作出回应时，总是如此；而这项创新涉及一个极其重要、今天继……以后恰恰开始来到前台的问题。

《精神分析行动》：也就是这项行动所造成的所谓精神分析家之主体位置，确切地说，只要这个谓词必须赋予他，即精神分析家的授任。

这一点……

如果我们例如在刚才引用的案例中看到的后果——表现为理解能力十分明显的萎缩——能够以某种方式被证明已经包含在前提中……

也就是严格作为行动以谓词形式铭写进我所谓授任以后产生的后果……那么，这无疑会大大减轻我们理解这种被我称作萎缩的奇特效应时的负担；当然，我不想进一步评论当事人本身。

例如，人们偶尔会使用“幼稚”一词，仿佛谈到这类效应时，真正应当参照的是孩子。诚然，正如某些非常出色的研究所证明，孩子有时会

由于成人的作用而陷入智力迟钝。不过，在眼前这个案例——精神分析家的案例——中，我们毕竟不应当援引这类解释。

那么，让我们重新讨论精神分析行动；并且明确提出，今天要试着沿精神分析行动的方向前进。不要忘记，我们最初围绕其解释迈出的几步：它本质上铭写在一种语言效应中。当然，借此我们也已察觉、或至少重新想起，一切行动都是如此；但这并不是精神分析行动的特异性。

我们已经展开相关的语言效应如何组织：可以说，它有两个层次。

它恰恰把精神分析本身预设为一种语言效应。换言之，最低限度也只有把精神分析行动纳入其中，并把它界定为精神分析本身的完成，才能界定它。

我们已经在这里表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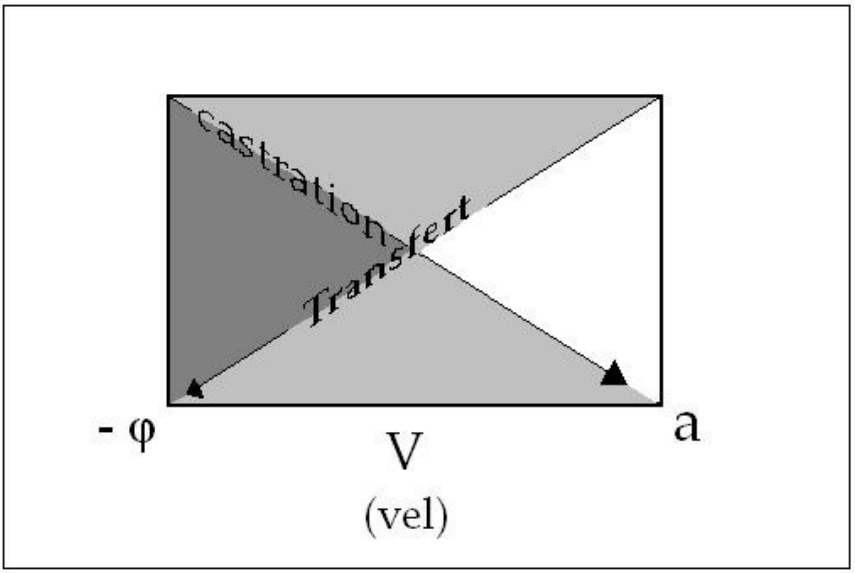
可以说，我们必须再次把划分加倍……精神分析恰恰不可能在没有一项行动时得到建立；必须有那个授权其可能性之人的行动，也就是精神分析家的行动。而在精神分析这项行动内部，分析者任务又铭写在其中。你们已经看到第一种包裹结构逐渐显现。

然而，所涉及的是……

我强调行动本身内部的这项区别，况且已经不是第一次……那项行动使一个主体赋予这项特殊行动最奇特的后果：由他自己来设立那个行动所建立的人；换言之，他把自己设为精神分析家。

这必然要以很高代价留住我们的注意，因为问题恰恰是：他取得这个位置，重复这项行动，而且非常清楚行动后续会怎样；他成为自己已经知道其终点之物的担纲者。也就是说，他把自己放在分析家的位置，最终会以 (a) 的形式成为那个被排除的对象；精神分析的整个运动都在这个对象中得到规定。它在终点来到精神分析家的位置，因为主体在那里决定性地分离出来，并承认自己由这个对象造成。

在哪个意义上被造成？在主体分裂中被造成；因为精神分析结束以后，他仍带着属于自己的那道裂隙，而这道裂隙在精神分析中以阉割一词界定。至少，图式如下：



当然，我曾通过评论、而不只是像现在这样概括，说明精神分析的结果和效应究竟如何。我在黑板上把它标成精神分析双重运动终点发生的事情：这条线由转移标记，那一条则明确由所谓阉割标记；最终，

它抵达 V 形的析取，即 −φ 与 (a) 的 vel〔或〕。(a) 在这里，并来到分析终点由分析者操作使精神分析家抵达的位置。这项操作可以说由分析家授权，他知道其终点；而我已经告诉你们，尽管他知道这个终点究竟如何，他仍通过这项操作把自己设为它的最终结果。

这里仍敞开一道裂口：这次——我们该怎样称呼？——“跳跃”怎样发生？我曾在一篇严格说属于“命题”的文本中探索这次“跳跃”如何，并把它更简单地称作“通行”。[注2] 在我们更仔细地考察以前，除了下面这点以外，没有更多可说：正是这次跳跃——当然是这次跳跃……在精神分析的制度安排中，人们做了很多事情，甚至可以说做尽了一切，以掩盖这是一场“跳跃”。

> [注2] 雅克·拉康：《1967 年 10 月 9 日关于学派精神分析家的命题》，载《Scilicet》第 1 期。

人们什么都会做——偶尔甚至真会跳一下——条件只是在必须跨越的地方拉起一层遮盖，让人看不出这是“跳跃”。这还算最好的情况。

这毕竟比架起一座方便的小桥更好；一有小桥，它就完全不再是“跳跃”。

然而，只要这件事尚未在分析中真正受到质询和追问……

何必再绕圈子，我的论点恰恰是：刚才所谓精神分析中所做、所存在的一切制度安排，都是为了让这项探索和质询不发生……只要它没有真正发生，我们就无法说出更多；而那种更多之物没有在任何地方得到言说，因为说实话，我们无法独自谈论它。

相反，我们很容易指出若干点和若干事情；从一切表象来看，它们都是把这次“跳跃”置于括号内的后果。例如，考察一下授任的效应——我不说官方的，而说职务性的：授任作为职务——考察一个主体在这次被认为已经完成的“跳跃”以前与以后分别是什么。

这毕竟同样值得提出，而且会使问题更加迫切。

我的意思是，它不只值得一问，而且是回答的前奏，可以说是问题的坚持。

例如，如果随着我所谓“在职务中的授任”持续时间增长，某种涉及精神分析行动必要前提的根本东西竟逐渐变得晦暗。

也就是我上次最后谈到的东西；我把它指为一种以自身方式构成的“信仰行动”。

我说，这是一项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的信仰行动；而做出它的，恰恰是一个刚刚获知被假定知道的主体究竟如何的主体——至少，他已经在精神分析这项示范性操作中获知。精神分析远不可能像迄今一切科学陈述那样安稳坐定；我是指科学成果进入可教学、也就是教授式阶段的那个时刻。科学陈述从来不质疑：在知识涌现以前，谁知道它？

我必须说，这个问题甚至从未进入任何人的脑海，因为人们太理所当然地认为，此前已有一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原则上最无神论的科学陈述，在这一点上却如此坚定地有神论——因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还会是别的什么吗？——以至在精神分析本身向我们提出问题以前，我实在不知道这个范围内曾有任何严肃说法。

严格说来，那个无法维持的说法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先于其操作而存在；但这项操作恰恰在两个伙伴之间分配其中发生之物，也就是我在《幻想的逻辑》中教你们分节并分离的 S 与 (a)。在精神分析——姑且称作“有终”分析——的理想终点……

请清楚，我在这里暂时把“有穷”一词在数学、即集合论中的重音放到括号里：从处理有穷集合的层面跨出一步，以在无穷集合上使用经过检验、最初在有穷集合层面开创的方法。不过，目前还是只谈有终的精神分析……可以说，在终点：

- 我们不会说分析者是完整的主体，因为他正因分裂而“并非全体”。这甚至不表示我们因此可以说他是两个；他只是主体，而这个分裂的主体并非……他并非没有……

相关知识卡 Pas sans：并非没有与“第三种否定”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按照我在《焦虑》研讨班时期让少数听众习惯使用的公式〔1962—1963〕……他并非没有那个最终遭到排除的对象；精神分析家的在场为它预备了位置，使它能够在主体分裂之因的关系中得到定位。

相关知识卡 Pas sans：并非没有与“第三种否定” · 焦虑并非没有对象：缺失之缺失与对象a

- 另一方面，我们同样不会说分析家是完整对象；尽管在终点，他只剩下那个被排除的对象。这里恰恰栖居着所有实践者都十分熟悉的一种谜，也就是在所谓人际关系层面最终建立起来的东西……

在终结以后，它建立在那个走完精神分析道路的人与在道路上充当其向导的人之间。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只经由他自己确信的道路而获得承认……

也就是不只被自己承认有资格执行这项操作……这个问题毕竟并非精神分析特有。通常，它同在精神分析中一样，通过选举或某种选择形式解决。

从我们试图确立的视角来看，选举也好、选择也好，归根结底大致属于同一个秩序，因为它们总是假定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完好无损、未受质疑。贵族声称最愚蠢的选举形式，也就是民主选举；但看不出它为什么比其他形式更愚蠢，只不过它假定所谓“基层”、选民或要素知道一些东西。

它不可能建立在别的东西上。人们把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放在这个层面。你们看到，只要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在那里，事情总是非常简单；尤其在它受到质疑以后，因为即便对它提出质疑，人们仍在若干操作中维持它，于是究竟把它放在哪里就没那么重要；事实上，也看不出为何不把它放在所有人的层面。

正因如此，教会长期以来就是最民主的制度：一切都通过选举进行，因为教会拥有圣灵。圣灵概念比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概念聪明得多。

在这个层面，只有一个差别有利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总体而言，人们没有察觉它始终在那里；所以，维持它并不构成过错。

只有从它可能受到质疑的时刻起，才可以提出我刚才为了搔弄你们耳朵而用一个——当然绝不足够——词语概括的范畴：愚蠢。

一个人顽固，并不表示他愚蠢；有时只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办。

说到圣灵，请注意，这是一个复杂得多的功能；今天我不会为它建立理论。不过，只要稍微思考过——至少尝试过——基督教三位一体的功能，任何人都可以找到同精神分析使我们能够阐发的功能十分准确的对应项；尤其是我在某篇文章中凸显的功能……

就是《对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先决问题》〔《著作集》，第 531 页〕中以 Φ 表示的功能；只不过，Φ 恰恰只有在精神病范畴中才是一种不太能维持的位置。

让这条颇有意义的迂回暂且显露在这里；我们回到转移，再一次——而且今天在这里十分必要——分节说明：既然我已经把精神分析行动作为转移的构成项引入，精神分析行动对于转移本身的配置究竟多么根本。当然，如果不引入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转移就会始终保持全部晦暗；但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作为根本概念、以及它在精神分析中经受的断裂得到揭示的那一刻起，转移就获得一种特殊照明。

于是，回头看才会取得全部价值；我们能够察觉，例如每当谈到转移，那些出色、诚实的作者……

而且我必须说，这一类作者很多，他们确实竭尽所能……都会提到，我们的理论之所以能够拉开距离并建立转移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那个确切时刻。你们知道，一位女患者在一次大获成功的催眠治疗结束时——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突然双臂抱住他的脖子。[注3] 这是什么？

> [注3] 参见 1967 年 11 月 22 日一课；另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84 年，第 47 页。

当然，人们会停下来赞叹：弗洛伊德没有因此动情，“她把我当成了另一个人。”

弗洛伊德本人的表达方式有人这样转译：“我并没有那么unwiderstehlich〔不可抗拒〕，这里还有别的东西。”人们对此赞叹，仿佛这里——我是说这个层面——有什么值得赞叹。问题也许不在于弗洛伊德像他特有的幽默说法那样，不相信自己是那个相关对象。问题不在于一个人是否相信自己是对象；而在于，当所涉及的是爱时，人总会相信自己身在其中。

换言之，人会有一种自得，哪怕程度很轻，也会使你粘进那团所谓爱的糖浆。

因为眼下，人们围绕应当怎样理解转移，摆出各种操作和花式图案。

我们看见有人鼓起勇气说：“可是，怎么能把转移全都推给‘受分析者’——人们这样称呼——我们也对它负有一部分责任。”

确实如此！我们当然负有一部分责任！分析情境当然也负有一部分责任！

由此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分析情境决定一切；分析情境之外不存在转移。

总之，你们熟悉这里的所有变奏、音阶和轮舞；人人都争着表现自己比别人思想更自由一点。

还有些十分奇怪的事情。最近一次大会讨论了这里闭门会议质询过的问题；会上有人想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把精神分析行动同“付诸行动”

以及 acting out〔行动化〕接起来。当然，我会这样做！说实话，把这个问题分节得最好的人，恰好是一个例外地记得我在 1963 年 1 月 23 日已经就此说过什么的人〔1962—1963 年《焦虑》研讨班〕。[注4]

> [注4] 指伊雷娜·鲁布列夫；她在 1968 年 1 月 31 日闭门研讨中提出过 acting out 问题。

相关知识卡 **行动化与付诸行动：展示、舞台与坠落**

刚才我已经开始介绍的那位作者，是奥利维耶·弗卢努瓦。[注5] 他在谈 acting out 时……

> [注5] 参见 1967 年 11 月 22 日一课。

严格说来，没有人请他围绕这个主题讲一小堂转移课……却讲起一堂转移课，遵循如今越来越流行的一类文章写法：文章对转移分节的那些东西，若不存在拉康的话语，甚至根本不可能得到设想。

况且，这篇文章专门论证，例如拉康在《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领域》报告中提出的某条公式〔《著作集》，第 237 页〕：无意识是一种在话语中缺少的东西，必须在历史中以某种方式补足、完成；历史恢复完整以后，症状才会——等等、等等——得到解除。随后，作者自然讥笑起来：

- “如果真是这样，该有多美！人人都知道，癔症患者不会只因回忆起来就万事大吉。”

况且，这要视案例而定，但无所谓！作者接着说明，分析话语所涉及的事情远为复杂；其中必须区分的，不只是——据说如此，或有人以为这样就能武装自己反对我——陈述的结构，还必须知道它有什么用，也就是人是否说出真理。有时，撒谎严格说来正是主体宣告自身

欲望真理的方式，因为除了以谎言来宣告以外，根本没有其他迂回路径。

你们看到，这些不久前才写下的东西，严格说来只说了我曾最明确地分节过的内容。我刚才之所以提到 1963 年 1 月 23 日那场研讨班，是因为我在那里说的恰恰就是某类无意识陈述的功能：其中蕴含的言说行为严格说来就是谎言。弗洛伊德本人已经在女性同性恋案例中以手指点出了这个点。[注6]

> [注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女性同性恋案例的心理发生》，载《神经症、精神病与性倒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 年，第 264 页。

欲望正是以这种方式表达和定位；关于精神分析解释之原创性发挥作用的语域，人们在那里提出的也正是：

- 严格的解释性干预所揭示的东西，绝不可能被设为一种本可事先知道的在先之物；

- 这使转移完全不同于一种已经在那里、已经以某种方式铭写进它将产生的一切中的对象；转移并非某个在先之物只等待在那里表达自身的纯粹重复，而是其逆向效应的产物。

简言之，这都是我三年来一直说的内容。当然，不能以为它不会通过浸润缓慢地走出一条小路：人们在第二个时刻发现它，只记得例如我十年前说过的东西，再用第二部分反对第一部分。

总之，人们偶尔——而且很轻易，这发生得过于频繁——会拿我在构造并走过一定层次以后陈述的东西武装起来，反对我的陈述；而这些构造原本是为了让你们能够在分析经验中定位自己。

人们把我后来某个日期说的话——仿佛是自己刚刚发明的——拿来反对我起初所说的内容……

当然，后者可以被看成部分性的，尤其当它被抽离语境时……但况且……

就某些可以说纯粹补足性的解释对癔症患者一段历史所产生的效应而言……我实际上已经明确说过，它的效力十分有限；而且从我当时作出分节时起，它就完全不符合那种把历史过度对象化的概念。历史的功能只能被理解为从当前关切出发构成的历史，也就是一切实际存在的历史。

更准确地说，在那篇被称作“罗马报告”的讲话中，我已经极为坚持、开门见山地说明：若没有历史的历史——即历史学家从什么出发进行构造——任何历史功能都无法得到分节和理解。

我之所以作这项评论——针对一种显得贫乏的陈述——只为指出某种东西；它毕竟同我刚才所说的结构并非毫无关系：精神分析家必须迈出一步，而我正试图帮助他们跨过它。这一步就是质疑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以后产生的东西。

所谓“产生的东西”，是指问题的运作方式，是对一种逻辑的表述；这套逻辑会依据一项必要修订，使某种东西变得可操持。修订所针对的是那项先决条件、预设和预先确立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至少在某个领域中，它不能再保持原样。这个领域涉及我们怎样操持知识，发生在领域中的一个精确点上；那里涉及的不是知识，而是某种对我们而言名为真理的东西。

我的问题在这里最令人不适，因为整套分析制度恰恰是为了遮蔽那个问题而构造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功能必须怎样修订。在这一点上得到这样一种精确回应：任何只要会阅读的人都能看出，它纯属虚构地把我话语的两个时刻拆开，使二者仅仅彼此对立……

况且，在大多数案例中完全不可能找到这种对立；它只来自一项虚构：仿佛发言的作者亲自发现了第二部分，而我一直停留并局限于第一部分……这就产生一种相当可笑的东西；归根结底，它同某种可以说的事情并非毫无关系……

这里也一样，因为必须承认事情在现实中插入何处……即问题本身的根底究竟如何。

因为刚才把转移带回其简单、可怜的起源时，我做了什么？我之所以如此贬低地谈爱，难道不是因为转移本身所构成之质询的骨骼正在这里：

- 既不在于转移就是爱，如某些人所说；
- 也不在于转移不是爱，如另一些人乐于声称；
- 而在于它可以说把爱推上被告席，而且以这种可笑方式做到。它使我们已经能够在癔症患者脱离催眠捕获时的那个动作中看出问题所在。受到触及的确实就是根底，而且一开始就受到触及；我正是由此界定那种丰富、富有教益得多，而且说实话对世界而言全新的东西——精神分析。

癔症患者立刻命中目标：她抱着啃的弗洛伊德，就是对象(a)。人人都知道，这正是癔症患者所需要的，尤其在刚脱离催眠、事情已经可以说被清理出来的时刻。

当然，关于弗洛伊德，问题恰恰是：他从哪里获得能力，以这种彻底方式悬置爱？只要严格定位分析操作究竟如何，我们也许能够猜到。

不过，问题不在那里。悬置爱使他能够从这次原初短路建立一种东西；他的确知道怎样扩展它，直至赋予它整个分析操作中如此不成比例的位置。而在这项操作中发现什么？

发现欲望的整场人类戏剧；而最终呢？当然，这不是微不足道的收获：有如此庞大的成果，有围绕主体化所打开的整个新领域；但最终呢？

仍是那个在短暂瞬间已经达到的结果，也就是：

- 一边是 S，由涌现时刻、从催眠睡眠中醒来时两个世界之间的闪电时刻所象征；
- 另一边是突然被癔症患者紧紧抱住的 (a)。

如果 (a) 如此适合她，恰恰因为所有捕捉它的爱情装束，核心都在于它；我想，我已经充分分节，甚至偶尔举例说明：支撑爱的全部自恋性披覆，正是围绕这个对象(a)安置并建立起来的。

这正是癔症患者所需要的；我是说，它使那句“我要、我不要”成为必要。这句话同时来自这个对象的特异性及其无法承受的赤裸。因此，顺便想到如下事情颇为有趣……

想到它会帮助我们，因为它会把若干事情放回原位……弗洛伊德构造了整个精神分析，却直到生命终点仍在追问：

> “女人想要什么？”而没有找到答案。答案恰恰就是他做出的这个东西：
>
> “一位精神分析家！”

至少在癔症患者层面，这完全是真的。如果精神分析家在精神分析终点确实被缩减为对象(a)，那么他最终变成的东西，恰恰就是癔症患者想要的。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在精神分析中，癔症患者什么都能治好，唯独治不好自己的癔症！当然，这只是一项侧面评论；如果赋予它超出其准确铭写之处的效力，你们就错了。

不过，必须看见某种东西；为了让一些最近才开始在这里听这些内容的人感觉到，我最终也得说出来：在对象(a)的这种排出中，难道没有某种东西使我们联想到……

既然“电视”也向我们展示这些东西，人们很容易养成一种小倾向……把我们所操作的东西，同生物学中某种层次深得多的莫名事物类比。因为生物学家喜欢用讯息的措辞表达染色体要素，于是就会有人……

我最近就听见过；每当有某种蠢话可以说，人们可从不会错过！……作出如下发现：这样一来，总的说来也可以说，“语言像无意识一样被结构化”。

这可真让人高兴！有些人原以为必须从已知走向未知；但在这里，来吧！让我们从未知走向已知。事实上，人们也经常这样做，名字叫神

秘学。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对 mystische Element〔神秘要素〕的爱好。癔症患者双臂抱住他脖子时，他恰恰作出了这项反思。

他在那一刻明确谈到 mystische Element。[注7] 弗洛伊德所做之事的全部意义，恰恰在于以一种逆着神秘要素、而非从神秘要素出发的方式前进。

> [注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自传》，前引书，第 47 页。

弗洛伊德反对那种反对——因为他做的正是这个——是在人们围绕他声称梦会撒谎而发出抗议的那一天。他当时再次说：如果这些人对无意识竟能撒谎感到反感，是因为无论我怎样谈梦都没有用，他们仍会想把神秘要素维持在梦中，也就是坚持无意识不可能撒谎。

不过，这不妨碍我们借用自己的小隐喻。分析结束时有待排出的对象(a)会来到分析家的位置；它是否像某种东西？比如减数分裂中极体的排出，也就是性细胞成熟时摆脱出去的东西。

这会很优雅！事情总的说来就是如此。那么，让这个比较继续下去：阉割在其中会变成什么？

阉割恰恰就是这个，是结果，可以说就是缩减后的细胞。从这里开始，主体化已经完成，使他们能够像人们所说的、像上帝创造他们时那样存在：男性与女性。阉割真正成了两种享乐相结合的准备。

精神分析边缘不时会出现这类说法；当然，它们没有任何严肃性，不过有些人就这样做梦，而且这种梦曾经算数，也确实有人这样说过。

只有一个小小的不幸：我们处在男人与女人功能的主体化层面；而在主体化层面，被召唤成为性伴侣的人会作为对象(a)——这个被排出的对象(a)——显现在实在中。配子结合与男人、女人的主体实现之间，差别就在这里。当然，世上所有疯女人都可能在这个层面蜂拥而来。

不过谢天谢地，在我们的领域中没有太多人会跑去寻找那些所谓女性性欲障碍的参照，说它们来自对插入的恐惧，又说这种恐惧诞生在精子闯破卵细胞包膜的层面。

你们看到，并不是我第一次在你们面前挥舞……

不过，是为了同它们区别开来，把差异清楚地标出来……这些所谓生物学幻想。当我说，性伴侣以后始终且必然会在对象(a)中重新找到时，古老真理就在这里涌现；它早已铭写在《创世记》的印记下：伴侣——天知道，这并没有让他承担什么——在神话中表现为亚当的肋骨，也就是 (a)。

正因如此，从那时起事情就一直如此糟糕；人们却把某种完满想象成两种享乐的结合。说实话，正是从这项初步而简单的承认中，产生了媒介的必要性，即幻想构成的狭道所充当的中介：欲望的无限复杂性与丰富性，以及它的所有倾向、所有区域、能够绘出的整张地图，还有这些坡道层面的全部效应——我们称之为神经症性、精神病性或倒错性。它们恰恰插入两种享乐之间永远确立的距离。

因此，奇怪的是，在教会那个层面——他们毕竟没有那么蠢——人们理应察觉，弗洛伊德在这里说的，同他们被认为早已知道是真理的东西一模一样；毕竟，他们长期教导性这一侧出了毛病。否则，那套使人愚钝的技术网络有什么用？

但完全不是这样；在这个角落，他们明确偏爱荣格，而荣格的立场显然恰恰相反：我们进入灵知领域，进入阴与阳强制互补的领域，进入所有这些彼此旋转、仿佛永远注定要结合的符号；animus 与 anima，男性与女性的完整本质。

你们信不信由你，教会人士更喜欢这一套！我提出一个问题：这会不会恰恰因为如此——如果他们像自己一样处在真理中，他们的训导权还能放在哪里？眼下我不是在作无谓的语言夸张，不是只为了不合时宜地游逛于所谓 aggiornamento〔现代化革新〕的领域；因为走到今天这个点，我甚至可以把这些评论带到圣职部去。我不久前去过，并向你们保证，我在那里说的话让他们非常感兴趣。

我没有把问题一直逼到对他们说："难道恰恰因为这是真理，所以你们才不喜欢它吗？

你们知道是真理的那个真理。"

我给他们留了适应的时间。为什么在这里向你们谈这件事？是为了告诉你们，那种如此令人不适的东西……

也许在权力层面，在某些毕竟比我们更有历练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同那座名为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奇怪真理小公国——摩纳哥——中发生的事情，也许属于同一种秩序。那里可能出现同类效应。

要准确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并不总是那么方便。何况，说到底，也许我们可以把若干事情说得一清二楚：分析历险虽然使人们把一些东西分节到很远，尤其是所谓无意识和人的欲望，但它也许正在带来某

种东西，使一条逐渐令人痴呆的坡道重新萌发真理；这条坡道伴随一种观念而来，即科学身后拖着的必然进步。

这次真理的新生位于何处，还须考察。我的意思是：如果分析经验由建立这些狭道、建立这项惊人生产来界定，那么它安置在哪里？安置在一道完全不是由阉割本身构成的裂隙中；阉割当然是裂隙的符号，我甚至会说，是最准确的调节方式、最优雅的解决办法。但仍有一件事不变：我们非常清楚，享乐仍留在外面。关于女性享乐究竟如何，我们并没有多知道一个字。

不过，这并不是昨天才有的问题。例如，过去已有某位朱庇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不知道这件事。他去问提瑞西阿斯。不可思议的是，提瑞西阿斯多知道一点！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就是把它说了出来。你们知道，他因此失去视力。你们看到，这些事情早已铭写在现实中，铭写在某种人类传统的边缘。不过，为了正确理解，也许我们应当察觉另一点；而且，把逻辑介入精神分析行动的问题之所以正当，恰恰也在于必须把我们的泡沫包裹起来。

把它称作泡沫，绝不是把它化为乌有；因为一切有意义、可理解乃至无意义的事情都发生在那里。不过，我们仍应知道事情位于何处。例如谈到女性享乐，它显然完全被留在领域之外。

为什么我先谈女性享乐？也许是为了先把某件事说准确：不要误解这里所说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天知道，混淆无所不在，有些人也许会以为，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那一侧，我们知道怎样走向享乐。

我要向所有精神分析家求证——至少向那些毕竟知道我们在谈什么、知道我们能够瞄准和达到什么的人求证。我们清理门前的场地；至于门本身，我认为我们很不胜任。

经过一次很好的分析，姑且说，一个女人可以获得性快感。不过，即便取得这点小小收益，也恰恰只发生在这样一种程度和案例中：就在此前，她还把自己当作刚才那个　　Φ——也就是说，彻底性冷淡。不过，事情不止于此。

你们是否也察觉到：弗洛伊德谈到自己所界定的力比多时，已经清楚指出……

也就是分析所涉及的领域，力比多即欲望……他说，力比多只有男性的。这应当让我们警觉，并准确地向我们显示我已经强调的东西：所涉及的是对性这件事的主体化关系；而只要这种主体化抵达由 S◇a 在逻辑上界定的关系，在这里所有人都平等。

至于力比多，尽可以随意把它形容为男性或女性。令人以为它更偏男性的明显原因是：在享乐这一侧，谈到男人，问题退得更远。女性享乐偶尔仍在你们所知之物的可及范围内；但谈到男性享乐，至少从分析经验来看，奇怪的是，似乎从来没有人察觉，它恰恰被缩减为俄狄浦斯神话。

然而，我不厌其烦地说了这么久“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化”，仍然没人察觉：原初神话，也就是《图腾与禁忌》的神话——归根结底就是俄狄浦斯——也许确实是一场原初戏剧，但它是一场失语的戏剧。[注8]　父亲享有所有女人：在弗洛伊德笔下，这就是俄狄浦斯神话的本

质。随后，有些人对此不满；他们宰掉父亲，把他吃掉。这同任何戏剧都毫无关系。

> [注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93年。

如果精神分析家更严肃一些，就不会把时间全花在《阿伽门农》或《俄狄浦斯》中翻找，以便总是抽出某种同样的东西；他们会先作出这项评论：真正需要解释的，恰恰是它如何进入一场悲剧。但还有一件重要得多的事情需要解释：为什么精神分析家从未明确表述，俄狄浦斯只是一则神话；他们可以说凭借这则神话安置自身操作的界限。说清这一点极其重要！

这使我们能够把精神分析治疗中发生的事情放回位置，放在这个神话框架内部；框架旨在把某种外部容纳在内，而我由之出发的、已经实现的划分可以安置在其中。也就是说，在分析行动终点，舞台上有……

这个舞台具有结构作用，但只在这个层面如此……(a) 来到一个极端点；我们知道，在悲剧中，它处在英雄命运的终点，英雄只剩下这个对象。而一切属于主体秩序的东西，则处于某种带有分裂性质的东西的层面，也就是观众与歌队之间的分裂。

俄狄浦斯有一天走上舞台，并不构成看不见以下事情的理由；这正是必须仔细考察的：它在精神分析中的经济功能位于别处，即把享乐的

敌对两极——男性享乐与女性享乐——悬置起来。在这项我们已经观察到、但依我看从未真正得到凸显的奇特区分中，差别在于：

- 俄狄浦斯神话的功能，即原始群体父亲的神话；你们看到，它根本无权被称作俄狄浦斯；
- 以及相关舞台层面的形象性使用：弗洛伊德认出它、移置它并让它运作，无论是在索福克勒斯的舞台还是莎士比亚的舞台上……正是这一差别，使我们能够拉开“精神分析中实际进行的东西”与“其中没有进行的东西”之间的距离。

为了完整起见，在继续以前，我顺便补充：你们会注意到，弗洛伊德文本中还有第三项，即《摩西与一神教》。[注9]　　弗洛伊德毫不犹豫……

> [注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摩西与一神教》，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67年。

在第三个案例中同在前两个彼此毫不相似的案例中一样……声称始终以同一种方式让父亲及其谋杀发挥作用。

仅仅提出这些问题，尤其指出弗洛伊德理论中被概括为俄狄浦斯功能的这种极其明显的三分，而在相关问题的真正层面甚至还没有最微小的阐发开端——况且我自己也没有作出——难道不应当开始在你们心中唤起一些小小提示吗？不过，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没做。

这正是我为《父之名》研讨班准备的内容。[注10] 当时发生的一切已经表明，如果我开始进入这个领域……姑且说，在我看来，他们还太脆弱，不适合进入那里。我说的是对此感兴趣的人；他们已经要费尽全

力应付自己的精神分析领域。这个领域在这里被界定为：它绝不是能够以任何方式声称重新接管舞台、悲剧或俄狄浦斯回路的东西。

> [注10] 这场研讨班在拉康被逐出圣安娜医院后中断，此后未再继续，只有 1963 年 11 月 20 日的第一课。

我们在分析中做什么？我们察觉失误与差异。相对于什么的差异？相对于我们毫不认识的某种东西：

- 相对于一则神话；
- 仅仅相对于某种使我们能够整理观察的东西。

我们不会说，自己正在精神分析中做任何类似使所谓前生殖期成熟的事情；恰恰相反，因为我们正通过退行进入这些早熟领域。

这恰恰就是……

事情显而易见；任何没有完全粘在我们不得不处理之物上的人都能看见……那些女人恰恰看到了的东西……

她们无疑是精神分析中最有效、而且在某些案例中最不愚蠢的人……女人，例如梅兰妮·克莱因。我们做什么？我们察觉什么？

恰恰在前生殖期层面，我们必须辨认俄狄浦斯的功能。精神分析的核心就在这里。因此，精神分析中不存在任何俄狄浦斯经验。俄狄浦斯是我们能够用来调节“游戏”的框架——我有意说“游戏”。问题是知道我们在玩什么游戏；正因如此，我尝试在这里引入一点逻辑。通常，人们不会开始打扑克，随后突然说：“啊，对不起！过去五分钟我玩的一直是马尼拉牌戏。”至少在数学中不会这样做。

正因如此，我不时尝试从数学中取一些参照。

今天我不再让你们久留，何况我感觉，在这个地方没有什么迫在眉睫。

我看不出更应在这里还是那里切断；我只按照时间来切。

我尚未用接下来将要采用的明确措辞——逻辑措辞——接近这个问题。

为什么采用逻辑措辞？因为在全部科学中——我给你们这条新定义——逻辑被界定为一种严格以在自身内部消纳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问题为目的的东西，而且只在逻辑中如此，至少在现代逻辑中如此。下次我们提出逻辑问题时，就会从现代逻辑出发，也就是从一些字母图形出发；凭借它们，我们可以在这些问题中前进，并以字母、逻辑代数的措辞表现：用量化措辞提出“存在一位精神分析家”意味着什么。

迄今，人们只会做出一些如此晦暗、如此荒谬的资格认可，重复我刚才提到的别处早已做过的一切；然而在这里，由于遵循一项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具有格外严重意义的经验，这种重复取得一种面貌、重音、形式和价值，危险地加剧了后果。仅仅让这些后果由现代逻辑的线条、图形和组合来支撑，我们就能以不可宽赦、可以说可以触摸的方式表现它们。我说的就是引入量词的那些构造；在研讨班某次中断以前，我已经简单预告并说出这个词。

这会对我们有帮助吗？请知道，帮助恰恰来自我刚才提出的定义。当然，没有任何逻辑学家给出过这个定义，因为他们正因是逻辑学家，这个维度对他们才永远已经被消纳和变走。他们没有察觉——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盲点——逻辑的功能恰恰就是让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问题得到适当消纳和变走。在逻辑中，这个问题不会提出。

毫无疑问，现代逻辑诞生以前，绝对没有任何人对此怀有哪怕最微小的观念；而在逻辑内部……

今天不是证明它的时候，不过证明起来很容易；无论如何，我提出这个问题，留下它的踪迹与提示。一位逻辑学家可以据此完成一项非常优雅、比我自己能做的更优雅的工作……奠定、证明并推动逻辑存在的，是这样一个微小的点：界定一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在其中什么也不是的领域。恰恰因为它在那里什么也不是，而在别处又具有欺骗性，所以我们这些处在两者之间的人，一边依靠逻辑，一边依靠自己的经验，至少能够引入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否……并不确定。

> “最坏的事情——克洛岱尔说——并不总是确定无疑。”[注11]……它未必会永远对精神分析家毫无效应。

[注11] “最坏的事情并不总是确定无疑”是保罗·克洛岱尔《缎子鞋》的副标题，见《戏剧》第二卷，巴黎，Gallimard“七星文库”，1956 年，第 647 页。

第11课 · 1968年2月28日（闭门研讨班）

纳西夫

拉康

有一位上次已经受到夏尔·梅尔曼先生提醒的人……

上次一月底闭门研讨班时，梅尔曼先生欣然在这里代我主持……他向此人提出邀请，而且理由格外充分，因为相关的雅克·纳西夫曾欣然为《弗洛伊德学派通讯》撰写我去年研讨班《幻想的逻辑》的摘要。

他欣然回应这项召唤；人们问他，是否有某种东西可以陈述、质询或呈现，让大家看到他如何理解我们今年已经走到的点。

我十分感谢他作出回应，也就是准备了一些将为今天的讨论充当导言的内容。

我已经可以说，这在什么意义上使我满意：

- 首先，因为他实实在在地准备了这项工作，而且准备得很胜任；他完全熟悉我去年说过的内容……
- 其次，他从这项工作中提取出来的东西——我是说，相对于我去年所说内容，他凸显并分离出来的东西——严格说来就是逻辑网络，尤其是它在也许可以界定并指出为我话语之方向的东西中的重要性、重音和意义；归根结底，就是我话语的目标和目的。

在这项阐发中，我们恰恰走到这里：我围绕分析行动提出的问题，对于在座每一位以分析家身份听我讲话的人都具有深刻牵涉。就在这个点上，我将进一步加强迄今已经赋予的重音，恰恰不是只为了……

停留在某种可以这样听取的东西上："凡事都有其逻辑。"……没人真正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说某件事情有内在逻辑，说人们只是在寻找事情的逻辑，会使"逻辑"一词以某种隐喻方式得到使用。

不，我们走向的并不完全是这个。上次讲话结尾，我以一项无疑相当大胆的断言作过提示。我并不预期它会预先在某些听众耳中找到回声和共鸣——至少希望得到同情；这些听众今天以逻辑学家的身份在场。

总之，我指出的是：必定存在……

当然，我希望自己能够沿这个方向提出一些论据……某种关系，乃至某种把逻辑本身界定出来的可能性……

这里是严格意义上的逻辑，也就是那门经过阐发、精确化和界定的科学……而说"界定"，并不表示它从第一步、第一次就界定了自己。

我们至少可以说，也许它的特性就在于：严格说来，只有一项已经高度分节的定义才能建立它。

正因如此，严格说来，只有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人们才区分出逻辑；而且一开始就感觉到，它立刻被推向某种完满。当然，这不排除后来出现过非常严重的错位乃至脱节；它们反而使我们能够深化相关问题。

前几天我提出，也许存在一个迄今从未有人想到过的定义；我们将尝试把它表述得十分精确。这个定义可以围绕如下内容分节：人们通过逻辑试图……

这里这个“人们”同样值得保留，可以加上括号标记，作为后续有待澄清之点……试图针对我们分析家在自身实践中标示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物，作出属于什么秩序的事情？掌控，还是摆脱？两者有时是一回事。逻辑会是这样一个科学领域，它的目的恰恰在于……

在这里说“对象”甚至也不为过，因为“对象”一词的全部歧义来自它内在于操作本身……让我们立即说出来：从某种不仅可以分节、而且已经分节的东西中，排除作为这种东西的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只有从我们目前所在的点出发，才可能产生这样界定逻辑的观念……

至少我们已经走到这里……我已经使你们足够习惯这样提出问题：察觉精神分析中唯一的活点、唯一的结、唯一的困难……那个既区分精神分析、又从根本上质疑它作为科学之地位的点，恰恰就是某种从未严格受到批判、从未以此方式受到勾住的东西：知识所构造的东西——而这绝非理所当然——此前已有某个人知道。

奇怪的是，这个问题在科学的所有其他地方似乎都是多余的。很清楚，这同科学本身如何产生有关。稍后纳西夫先生将告诉你们一些内容；其中准确定位了一个点，可以说，科学确实就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

不过，若追随我的分节，精神分析恰恰并未以这种方式得到建立。精神分析自身的问题，那个构成晦暗之点、或至少这个晦暗之点围绕建立的问题，就是精神分析行动；今年我们正试图给予它某种照明。

换言之，对于这项行动本身，不可能取得哪怕最小的推进或进展。因为所涉及的就是行动；这正是这番话语的严肃之处：它不是关于行动的思想，而是一番建立在行动内部的话语。可以说，这番话语必须如此组织，以至不容怀疑它不会以其他方式得到分节。

这正是最困难、最危险之处；它完全不能像通常接待哲学家话语那样受到接待。人们以一种很熟悉的方式听哲学家：可以围绕它谱出怎样的音乐！

毕竟，到了考试那天，仍得把哲学家放回他们所在之处，也就是学校长凳上；人们要求你们的，不过是围绕教授的话语谱曲。但我不是教授，恰恰因为我质疑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教授从不质疑它，因为教授作为教授，根本上就是它的代表。我不是在谈学者，而是在谈学者开始成为教授的时刻。

况且，我的分析话语从未停止处在这个位置；它恰恰构成其不稳、危险及其一连串后果。我记得，自己曾让亲爱的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真正感到惊骇。我向他说明，我处在说出某些事情的位置上；这些事情如今当然已经变成了音乐，但我当时这样说时，毕竟始终沿着这条偏斜路径说出。即便我尚未像现在这样提出问题，那些内容实际上也已经以这种方式建立。

我说，分析材料的本性始终如此：它恰恰要穿过一道劈裂与缝隙；这赋予这番话语如此令人不满足的性质，因为人们看不到事情在实证主义构造中整齐排列、层层上升并汇成尖顶——

- 那样当然很令人安心；
- 也符合某种科学分类；这种分类仍支配着那些进入医学、心理学和其他职业者的头脑。但一旦进入精神分析实践，它显然就无法维持。

于是，由于这类话语不是教授话语，它始终会产生某种不适；这种不适在边缘引起沙沙声、低语和评论，最终形成如下这种天真公式……

更令人困惑的是，它们出自本应最不天真的人之口……一位著名的编辑委员会常客，照理说应当相当清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却发出我曾在某处复述的孩子般叫喊：“他为什么不说出关于真理的真理？”[注1]

> [注1] 参见 1967 年 11 月 29 日一课注 22。

这显然相当滑稽；它也稍微展示了我可能收到的各种反应之尺度：有的经受考验、饱受折磨，甚至惊慌失措；有的则带着讽刺……

我当时正是用这些措辞向梅洛-庞蒂表达……就在我讲话当天的下午。

在这里，我享有一种特权，能够从听众中抽取样本：有人会来到我的长沙发上，把这番话语给他们的第一下冲击传给我。我刚才所谓惊骇在我的谈话对象——当时就是梅洛-庞蒂——身上立即显现；单凭这一

点就足以标明，我在这番话语中的位置同教授位置有何差别。全部差别恰恰就在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提出质疑，因为一切都在那里。

我的意思是，即便采取最彻底、最唯心主义、最现象学化的立场，仍有一件事不会受到质疑……

即便你们越过所谓设定性意识，置身非设定性意识，从现实面前后退一步，看似采取了完全颠覆性的行动；简言之，即便迈出存在主义的一步……仍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受到质疑：你们说的东西此前是否为真。

这恰恰是精神分析家的问题；最厉害的是，任何精神分析家——我会说哪怕最不善反思的——都能至少感觉到它，甚至会表达出来。例如，我上次提到过一篇讲话：那个“人物”当然不在我的尾流中，因为他自以为必须通过反对我的说法来表达自己。实在滑稽，因为若没有我此前的全部话语，他甚至无法开始表达。我谈到的那篇文章属于罗曼语精神分析家的一场大会；会议录尚未在《法国精神分析评论》出版，不过总有一天大概会发表。[注2]

> [注2] 指第 28 届罗曼语精神分析家大会，1967 年 11 月 22 日一课已经提到。听众笔记显示，这里的“人物”可能是维德曼。

作过这番导言以后，你们将看到，纳西夫的报告——我会适当补充——会在预定位置汇集我去年作为《幻想的逻辑》所分节内容的本质。今年我的话语正走到逻辑的这种在场——不是逻辑阐发，而是逻辑作为示范性审级的在场；只要它被明确构造为摆脱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也许……

我会在今年后续话语中尝试向你们展示……它可以给我们画出、指出一条仿佛为我们预定的小径。逻辑也许早已预示这条小径，因为逻辑本身的变化、振动和搏动，尤其自从某个时代以来……

与科学的时代相关，这并非没有缘故……它自己开始振动，无法继续安坐于亚里士多德式底座之上。如果我们应当以这种方式理解所谓数理逻辑或逻辑演算在精确化过程中的困难，那么，这种困难正表明逻辑如何无法摆脱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一种轨迹，说明分析行动的问题怎样向我们提出。恰恰就在这个点——分析家必须定位自身之处；我不只是说，在行动中认出自己，而是定位自己——逻辑能够向我们提供帮助，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它至少照亮哪些点不能陷落，不能在界定精神分析家地位时被某种混淆捕获。

雅克・纳西夫的报告[注3]

> [注3] 参见《Scilicet》第 2/3 期，巴黎，Seuil 出版社，1970 年，其中《为一种幻想的逻辑》一文。

相关知识卡 Pas sans：并非没有与“第三种否定” ・ 经典逻辑中的量词否定

首先请原谅；你们大概没有想到——其实我也没有——要听一位抄写员讲话，而这显然可能使他结结巴巴。

最终，我自己准备得相当匆忙；一个匆忙的抄写员更可能让人听不明白。因此，我接下来要说的东西也许写作痕迹太重；但它之所以写下

来，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得不重复你们也许全都已经听过的内容，可它们仍有可能显得只是暗示。

总之，我不由自主地陷入对拉康话语的这种释述。作为开端，我想留下从埃德蒙·雅贝斯那里摘出的两段题词。[注4] 他让自己笔下某些想象的拉比在相隔几页处说出下面两句话：

> [注4] 埃德蒙·雅贝斯：《问题之书》，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63 年初版，或 1990 年版，第 23、125 页。

> “小时候，我第一次写下自己的名字时，意识到自己开始写一本书。”

几页以后：

> “我的名字是一个问题，我的自由就在我对问题的偏爱中。”

我认为，如果存在一番关于精神分析的可能话语，它就处在对名字的这两次质疑之间：

- 问题不是写一本书；
- 也不只是成为一个问题。

我认为，去年的研讨班之所以题为《幻想的逻辑》，是因为它尝试产生一种新的否定，使我们能够听懂并定位弗洛伊德的公式：“无意识不认识矛盾。”

必须立刻指出，这个公式被关于思想与实在之关系的一项预先观念所捕获；正是它使弗洛伊德以为，自己所分节的内容必须被置于一切逻辑分节以前的舞台。

而弗洛伊德用来声称思想不应用逻辑法则的那种逻辑，以适应现实的图式为基础。因此必须撼动“矛盾”一词；这也使拉康提出另一条公式：“不存在性行动。”这就要求产生一种新的否定，并把它同重复对质，以便向我们提供行动概念。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我的第一部分可以恰当地题为：否定的主题。

为了分离“无意识不认识矛盾”中“矛盾”一词覆盖的不同否定，首先必须分开那些事实上彼此重叠、却只有形式逻辑才能区分的领域：语法与逻辑。最通常意义上的否定在语法层面运作。它同“存在一个话语宇宙”这一肯定相连，恰恰用来从中排除据说无法无矛盾地维持之物。因此，它以界限的图像被交给直觉，并由一种动作支撑：用一个谓词——例如“黑色”——刻画一个类，随后把不黑的东西指定为不与该谓词相连。

如果建立在这一定义之上的东西——拉康称之为“补集否定”——把我们留在语法层面，那是因为人们不说出口便擅自赋予自己一种元语言，使否定可以作为概念和直觉运作。但还有更严重的事情：一整套传统嫁接到这种否定用法上；据某些人所说，弗洛伊德的自我概念继

承了它。这套传统把经验最初几步同一个相对于经验的自主实体之运作与涌现连接起来：

- 被接纳或认同的东西，会被称作自我；
- 被排除或拒绝的东西，可以被称作非我。

事情完全不是如此，因为语言绝不允许这种互补性；而这里被当作否定的东西，无非是误认中发挥作用之物，主体据此在想象界和自恋中异化。误认的第二种否定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被扭曲的逻辑秩序；它准确地产生拉康所谓“幻想作为欲望的织物”，因而再次把我们留在语法分节的层面。

稍后会更准确地考察这一点。不过，误认的这种否定仍同补集否定有别，因为它同主体被建立为匮乏的指涉项相关。

这种否定在弗洛伊德式否定中加倍——这里可以把后者界定为对误认的误认——以后，象征界层面确实能够浮现，主体的逻辑功能也能够作为主体逻辑功能来运作。请允许我重提定义：主体是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所代表之物，或者是在对象(a)的形态下指涉匮乏之物。

不过，我在这里使之涌现的主体逻辑功能，不能以其本身的身份涌现……

它会重新质疑语法可以说分泌出的这个“话语宇宙”……因为语法没有顾及陈述主体与言说行为主体的双重性。

所以，只有在书写本身得到主题化时，这种主体逻辑功能才可能涌现。

我的第二部分题为：逻辑与书写。

这里不是哲学传统中被描述为“能指的能指”的那种纯工具性和技术性书写，而是重复的游戏；它把自己设为“我”，使逻辑之物摆脱包裹它的语法硬壳。主体确实是弗洛伊德那里重复功能的根，而书写就是这项重复在行动中的实现；重复恰恰试图重复那个逃脱之物，即不可能加倍、必然滑出可及范围的第一道标记。

这个书写概念确实使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比任何可能奠定集合论的逻辑更具原则性的幻想逻辑，究竟质询什么。集合论唯一的支撑是：一切能够说出的集合要素之间的差异，都被排除在写下的“我”之外。换言之，除了使我能够重复同一项操作的差异以外，不存在其他差异；这项操作就是把一道一元特征施用于三个随你们怎样异质的对象。

然而，这道一元特征必然被遮蔽在任何话语宇宙中，因为后者只会混淆可计数的 1 与起统一作用的一。为此，它将提供一种可能性：把逻辑与书写之间的根本关系公理化；主体的涌现使这种关系能够建立。公理是：

“没有任何能指能够意指自身。”

这是罗素的规格公理。因此，一个能指面对自身重复时代表什么的问题，要经过书写。这项公理实际上把一种数学用法形式化：如果我们写下字母“α”，随后再次使用它，就仿佛它第二次仍是同一个。

这项表述中有否定介入：“没有任何能指能够意指自身”；但它实际指明的是排他性的“或”。必须理解：一个能指——字母“α”——在重复呈现中只在以下情况之一意指：

- 它作为第一次运作；
- 或者作为第二次运作。

我们会看到，事情正围绕析取与某种否定概念之间的关系打结，而行动的主题化也由此成为必不可少。

不过，这项分析已经使人看到：书写被界定为所有标记的重复领域，能够同以闭合为特征的话语宇宙区分开来；然而也只有通过书写，一个话语宇宙才能运作，并排除某种被设为无法以书写维持的东西。“逻辑”这个概念……

尽管它也许同样背负一段相当沉重的哲学过去……却没有书写概念所带的这种歧义。但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谈“幻想的逻辑”，就必须澄清这个概念同真理概念的关系。

所以，我的第三部分是：逻辑与真理，“并非没有”。

问题由此确实成为：是否可以在能指中铭写逻辑上可操持的真与假，例如借助真值表。在经典逻辑层面……

它无非是一个话语宇宙的语法……斯多葛派发明的解决办法仍具悖论性。它追问命题应当怎样相对于真与假连接起来，并建立一种含有两个命题时刻——前件和后件——的蕴涵关系。由此可以确立，真不能

蕴涵假；但这并不妨碍从假既可推出假，也可推出真。这就是格言：ex falso sequitur quod libet〔从假可推出任何命题〕。

强调蕴涵的这项悖论，实际上就是澄清其中运作的否定。只须倒转“p 蕴涵 q”这一命题的顺序，就会出现：“如果非 p，则无 q”，并由此出现一项否定。这项否定同补集否定毫无关系，因为它不是在谓词层面，而是在亚里士多德所谓“固有属性”的层面运作。[注5]

> [注5] 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第五部《论题篇》，巴黎，Vrin 出版社，1974年，第一、五卷。《论题篇》第一卷对“固有属性”的定义是：它虽不表达事物的本质，却只属于该事物，并能同它互换述谓；见第一卷第五章开头，102a20。

我提醒你们这项区别。例如，我可以把“男人是男性与女性”作为人的界定；这是一项固有属性。应当给出的定义则是：“人是理性动物。”“男性与女性”是一项固有属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它不足以作出定义。相反，我认为现代科学只通过固有属性给出定义。

拉康把第三种否定称作“并非没有”（pas sans）[注]。它的模型是这条公式：“不存在不带假的真。”

> [注] Pas sans 字面是“并非没有”；展开成 il n’y a pas de X sans Y 时，整项 X sans Y 落在否定之下，故应译“没有不带 Y 的 X”，不能拆成“没有 X，就并非没有 Y”。Staferla 底本与 Valas 本的两个例句均为 il n’y a pas de vrai sans faux、il n’y a pas d’homme sans femme。

相关知识卡 Pas sans：并非没有与“第三种否定” · 经典逻辑中的量词否定

因为它实际为二值原则留出位置；而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拒绝通过固有属性给出定义，无论如何都同产生外延话语的必要性相关；二值原则恰恰不会在这种话语中受到质疑。我们还会看到，第三种否定能

够完美框定行动问题；它表现在一句简单的话中："不存在没有女人的男人。"

相关知识卡 经典逻辑中的量词否定

此外，可以用比"误认"更严格的措辞，重新表达幻想语法层面发生的事情；它涉及支撑各种形式认同过程的某些推论现象。但最重要的是，"并非没有"使我们能够理解：自由联想的模式——解释领域通过它得到预设——使人面对的不是现实维度，而是真理维度。

事实上，当人们反对弗洛伊德，说按照他的做法，总能找到一个所指在两个能指之间架桥时，他只回答：联想路线会在一些选择性的出发点上交叉，而它们实际勾勒出对我们而言构成网络的结构。因此，蕴涵那条跛足逻辑由重复的真理接替。关键并不那么在于某个事件是否实际发生，而在于发现主体怎样把它分节为能指，也就是通过一项症状来核实场景；在那里，这个"并非没有"那个，真理也同逻辑休戚相关。

相关知识卡 Pas sans：并非没有与"第三种否定"

在这个点上，可以借助稍微潜藏在前两部分之下的重复概念，在逻辑与真理之间架桥；这会立即引向行动的主题化。不过，我将遵循拉康采用的顺序；他首先给出一个空模型，以说明笛卡尔 cogito 中真正的拒斥，而科学正从这项拒斥开始成为空的。

这样，我来到第四部分：异化的空模型——S(A)。

这个模型把异化表示为在"我不思"与"我不在"之间不可能的选择；它尤其会使我们展示最根本的否定，即同析取相连的否定，正如德·摩根

公式所指明："非(a 且 b)"等价于"非 a 或非 b"〔即：¬(a ∧ b) = ¬a ∨ ¬b〕。[注6]

> [注6] 拉康在 1966—1967 年《幻想的逻辑》研讨班 1967 年 1 月 11 日一课中已经评论过德·摩根律。

一旦设定 a 和 b 指"我思"与"我在"，而等价符号两侧运作的是同一种否定，就必须承认：这项根本否定使大他者涌现，是 cogito 建立的对存在问题之拒绝所造成的后果；恰如被象征界排除的东西会重新显现在实在中。

不过还必须承认，建立科学的这项原初 Verwerfung〔拒斥〕，在以下两者之间建立了一项排他性析取：

- 完整的语法秩序，由此成为幻想的支撑；
- 以及从中受到排除、并成为效应与物表象的意义秩序。我要慢慢重新说明这一点。

所以，以下两者等价："并非（我思且我在）"与"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

现在，我想考察这项等价的第一项，因为它会使我们严格提出陈述主体与言说行为主体的区别。事实上，如果"所以我在"必须能够在"我思"之后加上引号，首先是因为第三者的功能对 cogito 至关重要。

我同一位第三者展开论证；在《第一沉思》中，我使他逐一放弃通往知识的所有道路，直到在一个转折处出其不意地让他承认：必须有我存在，才能使他走过这条道路。[注7] 因此，他交给我的"我在"最终无非是空集，因为它由不包含任何要素而构成。"我思"事实上只是把"我

在”的集合清空的操作；它由此变成“我写”，唯有它能够逐步撤除主体所能接近的一切知识。

> [注7] 勒内・笛卡尔：《形而上学沉思》，巴黎，Vrin 出版社，1978 年，吕讷公爵译。

主体——这一点对行动的概念化完全根本——不只处于“我思”的行动者位置，还处于由相关行动本身规定的主体位置。拉丁语的中间语态表达了这一点，例如 loquor。[注8] 只要一种语言中的中间语态指明陈述主体与言说行为主体之间的裂口，一切行动都可以用这些措辞表达。

> [注8] “语态”源自希腊语，指动词的配置方式：主动、被动或中间语态。Loquor 属中间语态，意为“我说话”；其中“我”是纯语法主体，既非主动也非被动，有陈述主体却没有言说行为主体，接近“下雨了”或“它在说”。

相关知识卡 中间语态：主体处在行动过程之内 ・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不过，笛卡尔使用的不是 meditor——况且它是 medeo 的反复动词——而是 cogito；而且，这个 cogito 必须能在经验的每一个点、每逢必要时得到重复——笛卡尔对此十分坚持。这样一来，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很可能是一切行动的负片。

事实上，cogito 一方面是构成主体的这种重复起源之处；另一方面也是诉诸大他者的地方，而大他者本身被误认捕获，因为人们假定这个大他者不受标记影响，也就是说，假定上帝不书写。的确，如果 cogito 不由 sum ergo deus est〔我在，故上帝存在〕补足，不由“虚无没有属性”这一相关公设补足，它就无法维持。因此，笛卡尔把建立科学的这一步所产生的决定性后果，交给一个不受标记的“大他者”承担。

这些后果立即出现：

- 一方面，牛顿的发现远非蕴含一个 partes extra partes〔各部分彼此外在〕的空间；它赋予广延的本质是：每个点都通过自身质量同所有其他点相连；

- 至于思维之物，它远非一个统一点，反而带着碎裂的标记；现代逻辑的整个发展以某种方式证明这一点，最终把 res cogitans〔思维之物〕变成的不是主体，而是一套记号组合学。

所以，让否定——我正尝试使之涌现的这项否定——作用于“我思”与“我在”的合并，就是承认这些后果，并通过写下“不存在大他者”来转译它们。

符号 S(A) 确实等于确认：没有任何地点能够保障由言语构成的真理，也没有任何位置可以证明用词语质疑仅仅是词语之物具有正当性；欲望的全部辩证法及其形成的标记网络，都在陈述与言说行为之间的间隙中凿开。因此，一切只建立在诉诸大他者之上的东西都失去效力；只有采取递归推理形式的东西能够留存。

在数学领域中，大他者不存在，确实对应于对符号使用的限制性用法，即规格公理，以及在已确立之物与已分节之物之间往返的可能性。

因此，大他者是一个带着同主体本身一样有限性标记的领域。使主体依赖能指效应之物，同时也使保障真理需要的地点本身断裂为陈述与言说行为两个阶段。正因如此，“我思”与“我在”的合并尽管必要，仍必须在原则上受到这项根本否定。

你们不应当漏掉：这项否定目前只给我们提供一个空模型，但实际上由人们经验和运作的性引发。

这样，我来到第五部分：拒斥与否认。

事实上，可以把一般而言受到经验并发挥作用的性，呈现为一种抵御：拒绝接续“不存在大他者”这项真理。因为这个模型实际上以对象(a)的真理为支点；而对象(a)最终要同阉割相连，因为阳具作为阉割的符号，恰恰代表对象匮乏的示范性可能。

当孩子惊恐地发现母亲受到阉割时，这项匮乏对他而言具有开创性；而母亲所指的无非是那个在一切逻辑操作起源处受到质疑的大他者。因此，哲学……

以及一切试图重新赋予话语宇宙以正当性的努力……一旦通过书写给自己设置一道标记，就会在大他者中把它涂掉，把这个大他者呈现为不受标记影响。然而，使这种排除能够在象征界中发生的标记，实际只是那道铭写在身体本身上的痕迹——阉割——的替代者。因此，可以在这里把大他者标记的拒斥呈现为一种有动机、不断重启的对构成行动之物的拒绝。

但你们大概猜得到，这项行动本身受否定——这项根本否定——所支配的逻辑捕获，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肯定性。事实上，只能从另一项名为“否认”的逻辑操作中推论它。否认固然把妥协的现实及其奠定的语法置于括号中，却仍收获大他者被划杠所造成的另一项后果：身体与享乐之间的析取。

事实上，如果哲学家把对象(a)拒斥在标记之中，倒错者则把它认定为享乐的地点；但此时它恰恰显现为一个无法指定之总体的一部分，因为不存在大他者。

倒错者同哲学家一样，认为自己不得不发明一个显然有神论的形象；例如萨德笔下的绝对恶意，而施虐者只不过是它的仆人。

之所以不存在大他者，恰恰因为两个位置都无法维持：

- 在一个案例中被肯定化的“男人—女人”这对；
- 在另一个案例、也就是哲学家的案例中被肯定化的“(a)—大他者”这对……是以平行方式拒绝性行动的两种做法；
- 有时把它思考为实在而不可能；
- 有时把它思考为可能而非实在。

无疑还剩下第三种形式，即“付诸行动”。不要以为这次跳跃会让我们脱离刚才描述的异化；相反，它会使我们更加严格地分节异化的各项。

为此，我要转到“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这项等价的第二部分；第六部分题为：

语法与逻辑

“我思”与“我在”不在大他者中合并，简单地转译成两个非主体之间的析取：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

所以，也许仍有必要暂时留在空模型中，不再多谈行动。这会使我们能够建立一种主体否定的理论——大他者的否定预设这种主体否定——并通过固定语法的地位，更好地分节语法与逻辑之间的析取。

逻辑让我们思考到，我们没有选择，准确地说原因在这里：从“我”被选择为存在之建立的时刻起，我们必须走向“我不思”；因为思想恰恰构成对非存在的质询，而 cogito 以“我”作为知识主体的开创终结了这种质询。因此，在异化中被交给思想的否定，不再是拒绝存在问题时发挥作用的否定；它作用于从中涌现的大他者，也作用于从大他者中减除自身的“我”。

同“我不思”的选择相连，有某种以“不是我”为本质的东西涌现。

这个“非我”就是本我；它可以由话语中不是“我”的一切界定，也就是由语法结构的所有其余部分界定。事实上，cogito 的效力可以缩减为：“我思”产生意义，但其方式恰同任何无意义一样，只要它具有语法上正确的形式。语法不再是……

在这套由轮流作用于大他者与主体的否定所支配的逻辑中……语法只成为主体付诸行动时所陷入之二择一的一支。如果语法由话语中“不是我”的一切来界定，原因恰恰是主体为其效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幻想无非是一项语法装配；驱力的命运按照种种倒转在其中得到组织。由此，一方面，除了让“我”通过这种语法结构以外，没有其他方式使它在同世界的关系中运作；另一方面，作为“我”的主体被排除在幻想之外。这一点见于《一个孩子正在被打》：

主体只有在第二阶段才作为被打的主体出现，而这个第二阶段是解释进行的能指重构。[注9]

> [注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一个孩子正在被打——对性倒错发生的贡献》，前引文献；参见 1968 年 1 月 17 日一课注 51。

这一点值得注意：

- 正如现实——我们已经就此达成一致的重大妥协——是空的；
- 幻想同样闭合于自身；付诸行动的主体已在自己的主体本质中翻转为思想留下的分节，也就是句子的语法分节。

不过，“纯语法”这个概念……

远非像胡塞尔那里那样同矛盾逻辑分节，而矛盾逻辑又同真理逻辑分节……只要我在这里让逻辑与语法这些概念以这种方式运作，只要这种“纯语法”使人能够正确定位幻想和作为幻想母体的自我，“语法”概念就必须以相反方式运作：它使人能够确认，存在某种非语法性的东西——也就是胡塞尔会排除的东西——却仍然属于逻辑；而幻想那种构造良好的语言无法阻止诙谐语、失败行动或梦这些真理显现。面对它们，主体只能把自己定位在“我不在”一侧。

事实上，无意识中的相关之物必须同本我区分开来；它不属于语法留给我们的那种无意义，因为它以惊讶为特征，而惊讶确实是一项意义效应。一切真正解释都会立即使这种惊讶涌现；它的维度和基础就是“我不在”的维度。

逻辑正是在这个“我不在”之处，以非语法的纯粹形态出现；主体在那里再次异化为一种“物—思想”。弗洛伊德把它分节为物表象：无意识由物表象构成，并以把词当作物来处理为特征。

事实上，弗洛伊德之所以谈梦的思想，是因为这些非语法序列背后存在一种有待界定其地位的思想。它既不能说“所以我在”，也不能说“所以我不在”。弗洛伊德说梦本质上是“自我主义的”，恰恰分节了这一点：这意味着梦者的 Ich〔我〕位于梦的所有能指中，并彻底散布其中；而无意识思想剩余的地位，就是作为物而存在。

然而，这些物彼此相遇，并被一个构成转指功能的逻辑“我”捕获；这个“我”恰恰通过相对于语法“我”的错位得到阅读。语法“我”的用途就在这里；正如画谜要相对于一种已经构成的语言来阅读和分节。

无论如何，精神分析家依靠的就是这个非语法的“我”；每当他使某种类似 Bedeutung〔指称〕的东西运作时，他就仿佛表象属于物本身，并由此使“我不在”之“我”中的孔洞涌现；有关对象(a)的东西正显现在这些孔洞中。因为归根结底，幻想的整套逻辑所补足的，是思想对性的不相称，或者说对性进行主体化的不可能。

这就是“我不在”的真理。事实上，语言把性极性缩减为拥有或不拥有阳具涵义；当必须分节我正在澄清的这项否定——最终也就是在阉割中运作的否定——时，它在数学上失效。然而，正是语言把主体本身结构化；在梦的思想中，词语被当作物来处理，而我们会在这个点上直接面对叙述中的一处缺漏、一次晕厥。

因此，语法本我之“非我”围绕那个核心对象旋转，我们可以在其中重新找到阉割的审级；无意识的“非我”则只是被表示为一块空白、一个

空洞，Bedeutung 的整个逻辑“我”都以它为参照。恰恰在这个点上，把逻辑折回语法的必要性变得可感；借助重复，必须分节一种真理效应的可能性。在这种真理效应中，Bedeutung 无法分节性，因而使 －φ 显现。

使我们能够把主体思考为语法的产物、或逻辑所指涉的缺席之物的，是重复概念；弗洛伊德以 Wiederholungszwang〔重复强迫〕一词分节它。这迫使我们把异化的空模型引入一种时间性要素，而只有行动概念能够框定这种时间性。

我的第七部分：异化与行动。

只要对象(a)可以被思考为实在，也就是被思考为物，就能够通过重复同一元特征的关系，澄清主体同时间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仍处在时间性与痕迹结合的逻辑要素中；它尝试以一种考古学形式把匮乏结构化，而重复与错位在其中相继出现。

事实上，即使在弗洛伊德那里，重复也同记忆毫无关系；在记忆中，痕迹的效应恰恰是不重复。一个具有记忆的微生物，第二次不会像第一次那样对刺激物作出反应。这就是记忆的原子。

相反，例如在一种重复的失败情境中，痕迹具有完全不同的功能。第一种情境没有带上重复的标志；如果它后来成为被重复的情境，就必须说，痕迹指涉的是某种由于重复而丧失的东西；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对象(a)。因此，在重复本身中表现为错位的东西，同相似或差异毫无关系；而我们在主体领域中重新找到一元特征作为象征性坐标。提

醒一下，它可以把尽可能异质的对象加以认同，甚至把它们最明显的本性差异也视作无效，以便把它们列举为一个集合的要素。

不过，必须下降到时间中，才能一方面确认：由此获得的真理……

它无非就是数学家所谓有效性，一种模型由此能够解释某个领域……这项真理对实在毫无抓力。另一方面，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异化模型；它可以用一句“既不相同，也非不相同”来形象表示。这无非是双环图；长期以来，拉康一直用它表示一种定向效应同逆向效应之间的连带关系。

这项第三关系确实再次出现，使我们能够使一元特征涌现：当人们从 1 过渡到构成 1 之重复的 2 时，会出现一种逆向效应；1 在其中作为不可计数之物、作为多出的 1 或过量的 1 返回。

一切能指操作也同样如此：标记中被重复之物依靠的特征，会作为重复者返回到它所重复的东西上，只要计数的主体必须把自己也数入链条。恰恰是在付诸行动中，这件事发生了。以下两者之间确实对应：

- 异化，作为“我不思”这一无可避免的选择；
- 重复，作为“付诸行动”这一无可避免的选择。

事实上，另一个不可能选择的项，是同“我不在”相关的 acting out〔行动化〕。行动远不能被界定为从运动释放到猴子绕路拿香蕉的某种运动表现；它只能相对于双环来界定：重复在双环中最终奠定主体，而这一次主体是切断的效应。

我在这里提醒几个拓扑坐标：莫比乌斯带可以被取作主体的象征，双环则构成它唯一的极。沿中线切分这条带，会使带本身消失，却生成一个可以贴合到环面上的曲面。产生这种切分的切口沿着双环轨迹；因此可以说，行动本身就是能指的双环。

行动确实表现为一道单一特征中的重复悖论；这种拓扑效应使人能够呈现：行动中的主体同其能指相同，或者说，一切行动内在的重复借助逆向效应在逻辑结构内部进行。

因此，行动是能指看似、乃至实际发挥自我意指功能的唯一地点；行动中的主体被表示为重复者与被重复者之间的划分效应，尽管两者彼此相同。为了清楚看到这种行动结构化怎样填充异化的空模型，我们还须迈出最后一步。

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建立了重复与满足之间的基本结合；它是一切幻想逻辑的基础。[注10]　重复强迫在这里包容快乐原则的运作：生命聚合起来的无生命材料，没有任何东西不被生命送回无生命领域；但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生命只以自己的方式把它送回。这个方式就是重新走过生命已经走过的道路；满足恰恰被界定为重新走过同一条道路。

> [注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载《精神分析论文集》，巴黎，Payot 出版社，1968 年；德文全集第 13 卷。

然而，我们刚刚看到，只要重复把主体生成为切断效应或能指效应，它就同对象(a)不可避免的坠落相连；所以，道路隐喻从根本上并不适合。

此外，弗洛伊德向我们提出的满足模型无疑不是有机模型，例如饮水或睡眠那种需要的充盈；在这类模型中，满足恰恰被界定为未由主体审级加以转化……

我们并不面对主动效应与逆向效应的这种连带……而是恰恰面对满足对主体撕裂最深之点，即性行动的满足；结构内部的其他一切满足都必须依赖这项满足。

环路正是在这个点闭合。

按照我向你们提出的读法，性满足与重复的结合仍作为一条无情公理发挥功能；因为任何偏离它的人都会受到不亚于一条泥河的威胁。

这是因为，我们再次面对的只是 S(A) 的一种新转译；此前已经给出它的不同等价形式。它在这里以已经获得的满足与持续追求的重复之间的时间性析取，重述身体与享乐之间的析取。

现在可以更好地理解：如果这项满足经过某种呈现为行动的东西，那么只有依据其效应无可避免的歧义，它才能被思考为行动。如果行动表现为切断，那是因为这次切断落在主体拓扑曲面上以后，可能改变其结构，也可能反而使其保持相同。由此，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行动同 Verleugnung〔否认〕语域之间的结构联系。

事实上，这个概念要思考的是一座迷宫：主体要承认一些自己无法承认的效应，因为他作为主体已经完全被自身行动改变。因此，相对于重复，付诸行动只是一种得到承认的 Verleugnung；acting out 则是一种遭到否认的 Verleugnung。我把这种加倍——遭否认的 Verleugnung

——呈现为主体层面上的对应项，对应于我用来界定弗洛伊德式否定的误认加倍。

这种异化的二择一，再次必须准确联系到性行动主体必然成为的 (α)；因为主体作为产品进入其中，并且只能在其中重复俄狄浦斯场景，也就是重复一项不可能的行动。

如果你们一直跟上，而且无须重提这里围绕无法给“男人”与“女人”两个能指赋予可指定涵义所说的一切，那么现在已经显而易见：“无意识不认识矛盾”这条公式，严格等同于那条同样诱人却更为恰当的公式：“不存在性行动。”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掌声〕

拉康

我很高兴，掌声证明这篇报告合你们的品味。这很好。

况且，即使它不合你们品味，仍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也就是它十分出色……我还要再进一步说。

我倒不太希望把它留给作者再作修订和完善。

我的意思是，它以目前的样子就有其意义；对所有参加今天会议的人而言，能够在我后续谈论的一切中重新参照它，无疑会非常重要。

现在，按照我刚才界定的位置，我的功能恰恰是不排除这种或那种在我刚才所谓“品味”层面上对兴趣的召唤；因此，我只补充几句评论。

我要明确强调：除已经受邀、此刻已经持有卡片的人以外，如果有人不在八天内寄给我一个问题，就不会被邀请参加最后两场闭门研讨班。我完全无须说明自己会怎样判断它是否切题；说实话，只要寄给我，我就假定它只能是切题的！

我要作如下评论。刚才这里谈到一种新的否定。

接下来的研讨班确实只会讨论否定的用法，更准确地说，是逻辑通过引入一种人们以最粗暴、最不恰当的方式称作“量词”的东西所迈出的一步——我敢这样说，而且我想任何敏锐的逻辑学家都不会反驳。

同这个词看似指示的内容相反，量词用法根本上并不涉及数量。相反，我从下次起就要向你们展示，这种用法至少以十分有启发性的方式具有怎样的重要性：它同使量词功能在双重否定中显现的转折相连。我们触手可及的一点恰恰在这里——最奇特的是，它在语法层面最为可感：绝不可能把双重否定解释为一项自我抵消、带我们回到纯粹肯定的操作，从而就此了事。

事实上，这一点即便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层面也已经在场，而且完全可感。亚里士多德逻辑让我们面对由普遍、特殊、肯定和否定构成的四极；它清楚表明，还存在普遍与特殊的另一种位置。普遍与特殊的对立能够通过一项否定的使用显现，或者说，特殊者可以被界定为“并非所有”。这确实就在我们手边，也直接切合我们的关切。

走到我们关于精神分析行动的当前陈述时刻，下面两种说法是一回事吗？

“并非每个人都是精神分析家”——这是那些以精神分析为名的协会之建制原则——还是说：

“每个人都是非精神分析家”？

两者绝不是一回事。差别恰恰位于“并非所有”：它把我们悬置、推回普遍者这一事实传递出来，并在这个场合引入特殊者的定义。

今天我不会把相关问题推进得更远。不过很清楚，这正是我已经指出过的东西；我的话语已有若干条线索为你们开启它。例如，我曾坚持：在语法中，没有什么比一种语法家不懂的 ne 用法更能让言说行为主体变得可感；当然，语法家都是逻辑学家，正是这一点毁了他们。这也让我们保留希望：逻辑学家也许对语法略有一点观念。

我们在这里恰恰把全部希望放在这一点上，也就是它会把我们带回精神分析领域。简言之，语法家把这个 ne 称作“赘词”；它在例如以下表达中呈现得很清楚：“我会在那里……”或“我不会在那里……”“……在他到来以前（avant qu’il ne vienne）”。这里的用法被认为同“在他到来以前（avant qu’il vienne）”意义完全相同，因为它只在这里取得意义。

正是 avant qu’il ne vienne 中的 ne，在这里引入了我作为言说行为主体的在场，也就是事情同我有关；而且它在这里不可或缺，因为我关心他来还是不来。

不要以为这个 ne 只能在法语语法这个奇怪点上得到把握：人们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于是干脆称它为“赘词”；这无非意味着，不用它，意思归根结底也相同。

然而，一切恰恰都在这里：不用它，意思不会相同。同样，有一种分节量化的方式，把量化的特征分开；为了把这一点标得更醒目，甚至只用书写符号表达量化：以 ∀ 表示普遍，以 ∃ 表示特殊。

这预设我们把它施用于一个置于括号中的公式，而这个公式通常可以用所谓函数来符号化。

当我们试图构造同谓词命题对应的函数时——逻辑中的事情正是以此方式被引入，因为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最初陈述就建立在它上面——我们会被带去引入这个函数。至少可以说，从历史上看，它被引入受到量词支配的括号内部；确切地说，皮尔士在第一篇文本中把如下公式归给米切尔〔奥斯卡·霍华德·米切尔〕并推到前台，不过米切尔其实没有完全这样说。为了说“所有人都有智慧”——人人都知道这是显然之事——我们写下量词 ∀……

当时它尚未被接受为算法，不过无所谓……我们在括号中放入 +、……也就是合并而非混同，它同认同相反；我把它写成你们更熟悉的形式：V。因此得到：

$$\overset{\mathrm{V}}{(\mathrm{h}+\mathrm{s})}$$

它的意思是：对每个对象 i 而言，它要么不是人，要么有智慧。

“量化”秩序就是以这种有意义的方式，在历史上正式引入。在某种天启降临、让我找到别的词以前，我始终只会带着引号说“量化”。就像

给我的小刊物起标题时降临的天启一样，也许它会使逻辑学家接受某种比“量化”醒目得多、可以取而代之的名称。

但说实话，我在这方面只能让自己保持等待、处在分娩中：它要么会自己来到，要么永远不会来到。

无论如何，你们在这里重新找到我已经强调的点；当时皮尔士可以说同样处在“量化”的分娩中，而我曾围绕他那个时期的一张图式引入这点。前几天我画出四分图式，分节“所有线条都是垂直的”；我让你们注意，普遍与特殊、肯定与否定的全部对立，都恰恰建立在“无线条”这个事实之上——至少在皮尔士图式中如此。我很久以前就把这张图推到前台，用来围绕“无主体”、围绕消除亚里士多德那里主体分节的歧义，建立若干分节。

尽管如此，阅读亚里士多德时，你们会看到毫无疑问：主体的同一种悬置已经在那里得到强调；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基底〕绝不等同于 οὐσία〔ousia，所是〕。

围绕对主体本身的这项质疑，也就是这种作用于主体的否定同作用于谓词的否定之间保留的根本差异，我们能够使一些对我们至关重要的问题之要点运转；相关问题就在以下两种说法的区别中：

> “并非所有人都是精神分析家（non licet omnibus ‘psychanalystas’ esse），
>
> 或者，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精神分析家。”

有些人也许觉得我们进入了一片不属于自己的森林；不过，谈到这项关系、我们朋友雅克·纳西夫刚才打成的这个大结和环，我仍要指出

一点。他把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弗洛伊德说“无意识不认识矛盾”这一令人困扰的事实；以及他敢于把一道拱、一座桥抛向幻想逻辑的核心点，而我去年话语正以“不存在性行动”结束。

这里确实存在一种最紧密的关系：一边是话语在表现性关系时面对的裂隙；另一边则是逻辑自身纯粹进展所界定的单纯裂隙。因为一项纯逻辑过程能够证明……

我会顺便提醒那些毫无概念的人……不存在话语宇宙。

当然，对话语——可怜的家伙！——而言，它不可能察觉不存在宇宙；但正是逻辑使我们能够极其容易、严格而简单地证明：不可能存在话语宇宙。

所以，无意识不认识矛盾，并不授权精神分析家对矛盾洗手不管；况且我必须说，矛盾只以十分遥远的方式涉及他。

我的意思是，对他而言，这似乎是一枚印章、一张空白支票、一项授权：准许他以自己喜欢的一切方式，用自身权威掩盖彻底的混淆。我的话语所蕴含的那类语言效应，正围绕这个动力旋转。

我来举例。无意识不认识矛盾，并不表示……

这并不奇怪；我们能直接触到它怎样发生，而且它并非随便发生：我立即从这里触到，因为性行动问题最初几种表述的原则本身就已经铭写这一点……人们告诉我们，无意识就是这个：俄狄浦斯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隐喻化。

我们在无意识层面、在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中找到的就是这个；俄狄浦斯情结首先就是这种隐喻。但这绝不构成精神分析家不去区分两种呈现模式的理由。他明明就是为此在那里，而且是明确地在那里：让分析者听见这种隐喻呈现的转喻效应。

他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借这个或那个对象确认一切转喻内在的矛盾动力：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整体不过是部分的幽灵，而部分则作为实在。伴侣不是一个整体，就像孩子不是母亲的一部分。这正是精神分析实践使人可感的东西；但如果以问题恰恰在于此为名，反过来肯定相反之物，也就是在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中指认别处——人们原本预期发现它的地方——并不存在的东西，即性交中的融合统一，就会从根本上扭曲精神分析实践。

用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来表现这种统一更是错误，因为在孩子与母亲的层面，它甚至更不存在。我已经充分强调过：想象孩子在其中如此安适，纯粹是精神分析诱饵式幻想。你们怎么知道？

有一件事确定：母亲在那里未必极其自在；甚至会发生若干我无须强调的事情，所谓母胎不相容。这已充分表明，完全不能确定生物学基础天然就是应当被表现为至福统一之点的东西。

此外，我需要趁这个机会——也许是最后一次——提醒你们日本版画；在我们知道的制成和书写的艺术作品中，几乎只有它们尝试向我们表现……

绝不要以为我贬低它……交媾的狂怒。这并非人人都能做到。必须处在某种文明秩序中；这个文明从未进入某种我有一天会顺便为你们更准确界定为基督教式的辩证法。每当你们看到这些人物以真正惊人方

式彼此紧抱时，都十分奇特；它同我们绘画中对这个层面所发生之事的惯常表现所带的那种真正令人作呕的唯美主义毫无关系。

奇怪的是，版画的一个小角落里常常——几乎总是——还有一个第三小人物；有时看起来像孩子，也许艺术家甚至只是为了开个玩笑……因为你们很快会看到，第三人物怎样被表现根本不重要。我们猜得到，相关之物恰恰支撑我所谓对象(a)，而且采用一种真正实体性的形式。它使人与人的交媾中存在某种不可还原之物，恰恰同交媾永远无法达到完满相连；它简单地叫作凝视。

正因如此，这个小人物有时是孩子，有时却以对戴着眼镜打量它的我们而言完全奇怪、谜一般的方式，只是一个完整的小男人；他具有同那个正在行动的男性完全相同的身体比例，只不过整体缩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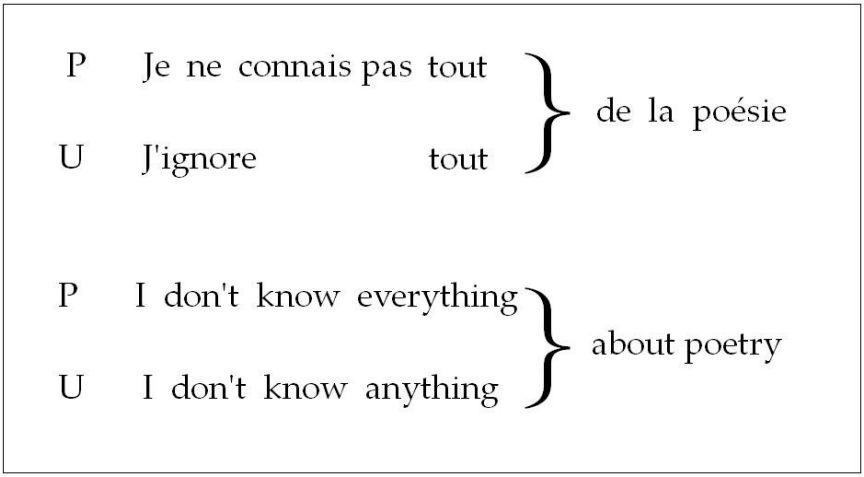
这为一种真正平常、却迫使我们至少在这个相关领域中修订无矛盾原则的事情，提供了可感的例证。它是思想起源处的一个根本点；借用一句熟悉的俗语，可以表达为："有二必有三。"你们不假思索地说这句话，以为它只表示：如果已经碰上两件倒霉事，必然还会来第三件。不！它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它的意思是：要构成二，就必须有第三项。你们从没这样想过！

然而，我们的操作恰恰必须引入某种顾及这个插入要素的东西。当然，我们能够通过逻辑分节把握它；因为如果你们期待在现实的某个角落直接抓住它，就总会受骗。人人都知道，现实建立在你们的"我"、认识主体之上；它恰恰就是为了使你们永远找不到这个要素而构造的。

但我们作为分析家，这正是我们的职责。我们拥有通达它的资源。

第12课 · 1968年3月6日



我写下“我并非全都认识”（je ne connais pas）和“我一无所知”（j’ignore）。我要把这两种说法同某种将充当基础的东西——诗歌——对质。为了更严格，我设定 je ne connais pas 等价于 j’ignore；我承认并采取这样一种假定：否定已经包含在 j’ignore 这个词中。

当然，另一次我可以回到 ignosco，回到它在这个词由之而来的拉丁语中准确指明的内容；但在逻辑上，我今天设定两个词等价。接下来的内容将从这项假定取得价值。我把“全部”一词写了两次；这两个“全部”确实等价。那么会产生什么？

在这两个层面两次引入同一个词以后，我得到两个价值根本不同的命题。“诗歌并非全都在我的认识范围内”和“关于诗歌我一无所知”并不是一回事。

两者之间存在一段距离。为了照亮问题，我立即说出自己要走向哪里，因为这很有必要：我要走向一项能指区别……

我是说，只要它能够由能指程序规定……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全称命题与特称命题的区别；后来全部逻辑同样沿用了这种说法。如果这些能指逐项等价，谜究竟在哪里？

姑且说，我们在这里按约定作出设定。我再说一次，这只是围绕 j'ignore 词源的一点谨慎。

在这个场合，j'ignore 的确就是它通常的意思：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它怎样产生两个命题？其中一个显然指向诗歌领域中的某个特殊部分："这里面有些东西我不认识；诗歌并非全都在我的认识范围内。"

另一个则确实是全称命题，尽管它是否定的："诗歌领域中的一切，我一样也不认识；我对它一窍不通。"

一般情形正是如此。我们会停在这里吗？这会立刻把我们带进一种实证语言的特异性，带进法语的特殊存在。如一些极有学问的人当年向我们说明，法语呈现一种双重性，也就是支撑否定的词项具有双重性：ne 看似是否定功能充分的支撑——人们所谓 affonctif〔系附词〕——既必要又充分；但表面上它又由另一个词项的加入得到支撑和加强，也许最终反而变得更复杂。这个附加项有什么用，只有语言用法让我们看见。[注1]

> [注1] 雅克·达穆雷特、爱德华·皮雄：《从词语到思想：法语语法论（1911—1927）》，巴黎，Arthrey 出版社；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重版，共 7 卷，第一卷第七章《否定》，第 130 页；Vrin 出版社 2000 年重版，共 8 卷。

关于这一点，我不能不顺便引用一位同行：精神分析家兼杰出语法学家皮雄。他同舅父达穆雷特共同构思了一部法语语法著作，并依照自身方法与程序提出一些十分漂亮的考量，涉及他所谓：

- ne 更偏“离异性”的功能；
- 以及 pas 更偏“拒斥性”的功能。[注2]

> [注2] 达穆雷特、皮雄，前引书；另见二人《论法语中否定的心理意义》，载《正常与病理心理学杂志》，巴黎，1928 年；后收入《语法与无意识》，《L’unebévue》第 2 期增刊，巴黎，EPEL 出版社，1993 年。

他围绕这点说过一些十分精微、例证丰富的话；例子从各个层面取来，而且选得极好。不过我认为，它们至少没有落在对我们真正重要的轴线上。

这种重要性对我们而言怎样得到规定，我希望接下来能让你们听见。

眼下，我只是以法语的这种特异性为参照，并想借助一种既然发生在我们的语言中、在别处也必定会发生的东西。例如，可以提出：如果这个陈述的结果来自我们能够把 pas tout〔并非全部〕组合在一起，那么句子意义会重新出现；ne 会变得某种意义上多余，并像日常交谈中那样可以省略——我不是说删除，而是省略、把 ne 吞回喉咙：“j’connais pas tout”。当 pas tout 结合为一体时，包含在 j’ignore 中的否定便不可分离；如果这就是动力，人人都会满意。

如果只须解开这个小谜，我看不出为何不能满足于这种解释。它很有趣，不过也许没有看起来那么深远。不！它确实更深远；我们将参照另一种语言——例如英语——来尝试证明。

试着从意义对应于第一句话的表达出发：

> “I don’t know everything about poetry.”〔关于诗歌，我并非什么都知道。〕另一句话则是：
>
>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poetry.”〔关于诗歌，我什么也不知道。〕

考察另一种语言中的表达以后，我们会发现：为了产生同最初两个意义之距离等价的两种意义，刚才关于两个能指结合成块的解释必然要倒转。因为第一个例子中 pas 与 tout 的结合，在这里却于能指层面实现在第二种分节、也就是我们界定为全称的第二个命题中。

人人都知道，anything 在这里实际同 something 等价；后者只要以否定身份介入，就转化为 anything。所以，我们最初的解释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因为事情通过完全相反的做法发生：结合出现在第二句话中，而这句话在本例中实现全称。况且，这种结合和切分同样含混；don’t 并未因此消失，句子才取得“我对诗歌一窍不通”的意义。相反，everything 同 I don’t know 结合时，才实现第一种意义。

这足以使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我已经摊牌说过，它所涉及的不亚于普遍与特殊之关系的谜。稍后我们会尝试说明，把这种区别引入历史的人——亚里士多德——根本关切的是什么。

人人都知道，关于怎样从侧面把握这两种陈述语域，思想中发生过一场小革命；我已经多次用量词的引入来标出它。

我乐于假定，这里有些人听到它时不只是耳朵发痒。

不过，大概也有许多人只是记得我宣布过某个时候会谈它。天知道我得怎样谈！我必须从同我们有关的点、我已经走到的点、我认为它能够为我们所用的点来谈；也就是说，我无法向你们讲完整的历史和全部前因，讲它怎样涌现、浮现并得到完善，乃至——归根结底，我必须局限在这里——使用它的人怎样思考它。怎么知道？

因为，他们使用它，并不保证他们思考它。我的意思是，他们未必以任何方式定位自己的用法在思想层面蕴含什么。所以，我不得不从自己如何思考它出发，从我认为同你们有关的层面出发，也就是从它能够为我们提供某种用途的层面出发。

在亚里士多德层面，一切都建立在某种以符号指明的东西上。他认为自己可以这样做，也就这样操作：如果他说过：

“所有人都是动物”，那么只要他认为有用，就可以从中提取：

“有些人是动物。”

这就是我们将称作“从属操作”的东西——虽然不完全是亚里士多德本人的用词——因为这里涉及全称与特称之间被界定为从属的关系。我大概还会不止一次顺便评论：逻辑学家阐发内容时举出的例子和说明，总拿“人”来灌我们的耳朵；这无疑并非没有症状价值。

相关知识卡 阿普列乌斯、命题数量与逻辑方阵

我们可以开始怀疑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注意到：也许我们并没有那么清楚“人”是什么。不过，这会把我们带远……如今所谓两个集合能否拥有共同之物，是一个严肃问题，正在引发对数学理论的全面修订。

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完全可以不作徒劳动作——容我这样说——例如我们的朋友米歇尔·福柯为一种早已死去很久、漂流而下且无人知道漂到哪里的“人道主义”施行赦仪，仿佛它仍构成问题，仿佛这就是结构主义问题的核心。[注3][注4] 先放下它……我们只从逻辑上保留唯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说出以下两句话时——我是指逻辑上——谈的是不是同一件事：

> [注3] 这里可能暗指米歇尔·福柯在《词与物》（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66年）出版后，于 1966—1968 年间发表的若干文字；对福柯而言，人道主义终结是当时极为迫切的问题。另见福柯《言与文》第一卷，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94 年。

> [注4] Absoute〔赦仪〕：亡者礼仪结束时在棺木或灵柩台周围举行、主要由祈祷构成的仪式。

“所有人都是动物”，或者例如：

“所有人都会说话。”

我再说一次，两个集合能否拥有共同要素的问题，正在受到非常严肃的提出；因为它会带出这个问题：要素本身究竟是什么？如果要素本身——这正是集合论的基础——也只能是某种你们可以像对一个集合那样加以推演的东西，问题就开始显露。不过先放下它……

你们知道，祖国同时是最美好的现实；当然，下面这句话理所当然：

“所有法国人都应为祖国而死。”

可是，一旦你们实行从属操作，想知道是否：

“有些法国人应为祖国而死”，就应当察觉，从属操作呈现一些困难，因为：

“所有法国人都应为祖国而死”与

“有些法国人应为祖国而死”，绝不是一回事！人们每天都能察觉这种事。

正是在这里，人们察觉逻辑拖带着多少本体论……

也就是某种超出亚里士多德构造逻辑、形式逻辑之目标的东西……逻辑仍拖带着多少本体论。

我向你们保证，我正避开许多岔题，希望你们不要丢掉我的线索。现在，我会通过一种显然稍显尖锐的对置程序，直接引入问题。我很高兴——也许是错误地高兴——平常有一位杰出逻辑学家坐在第一排；我总用眼角看他，等待他什么时候会开始尖叫。他今天不在，我似乎没看见他；这既让我安心，另一方面又让我遗憾：我本想知道他会怎样评论。

通常结束时，他会同我握手，说自己完全赞同；这总让我大受安慰。

当然，并非我需要他这样说才知道自己走向哪里；不过人人都知道，当人们冒险进入并非严格属于自己的地盘时，总可能遭到……砰！砰！

当然，我关心的并不是侵入不属于自己的地盘，而是在逻辑层面找到某种能为你们提供例证、线索和示范性引导的东西，以应对我们遭遇的困难。“我们”既是我代表讲话的人，也是我向之讲话的人——这项

歧义在这里完全根本——即精神分析家；我们面对的是一项行动，而这项行动所关涉的不多不少，恰恰就是我试图为你们界定的主体。

主体并不是“人”。如果有人不知道“人”是什么，那恰恰就是精神分析家。

他们的全部功劳，甚至就在于彻底质疑人；我是指，只要“人”这个词对任何人还带着一点意义的外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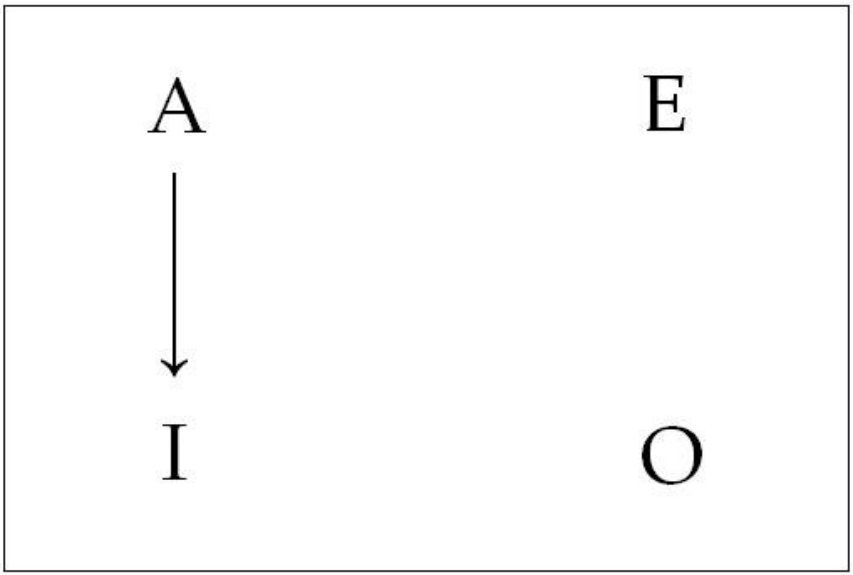
那么，我转到量词逻辑层面，并以自己不时使用的推土机方式指出：在量词逻辑层面，使普遍与特殊相对立的方式中，根本差异在于……

当然，等你们打开相关书籍，会发现我说的东西；也会看到它可以通过一千种其他方式接近。但关键是，至少就我们关心的问题而言，你们应当看到这条主线……全称——至少全称肯定——必须这样陈述：“没有一个人不是智慧的。”

就是这样……

至少暂时相信我；重要的是你们能够追随线索，看见我要走向哪里……这给出全称肯定命题的公式，也就是亚里士多德那里会被分节为“所有人都有智慧”的东西。这个令人安心的陈述在本例中毫无重要性；我们关心的是，把它换一种方式分节能够提供什么优点。你们可以立即注意到，这个全称肯定命题为了获得支撑，会让不亚于两项否定投入运作。

你们必须看到事情会以何种顺序呈现。先把亚里士多德形式放在这里：



在亚里士多德后世传统中，全称肯定与全称否定分别以字母 A 和 E 表示；字母 I 和 O 则是特称命题，其中 I 是特称肯定。

“所有人都有智慧”（A）；

“有些人有智慧”（I）。

在我们的量化分节中，“有些人有智慧”怎样表达？我起初说：“没有一个人不是智慧的。”现在则分节为：“存在有智慧的人”或“有智慧之人”；但这个“人”仿佛会悬在空中，我们适当地用“存在”来支撑它，正如：

“没有一个人不是智慧的”就是“并不存在一个不是智慧的人”。

不过，你们也看到，在“不是智慧的”层面还有一个 ne；必须如此，句子才能取得“是智慧的”的意义。或者，如果还要这样分节：“存在这样一个人，他是智慧的”，这里的“这样”毫不滥用；因为你们也可以在全称层面使用它：“不存在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智慧的。”

因此，为了构造同亚里士多德从属关系等价的东西，我们不得不擦除两项否定。

这很有意义。首先可以看到，双重否定的某种用法完全不是为了消解为一项肯定，而是恰恰为了使……成为可能。

按照这种双重否定的使用方向，无论添加还是撤除它……保障从普遍到特殊的过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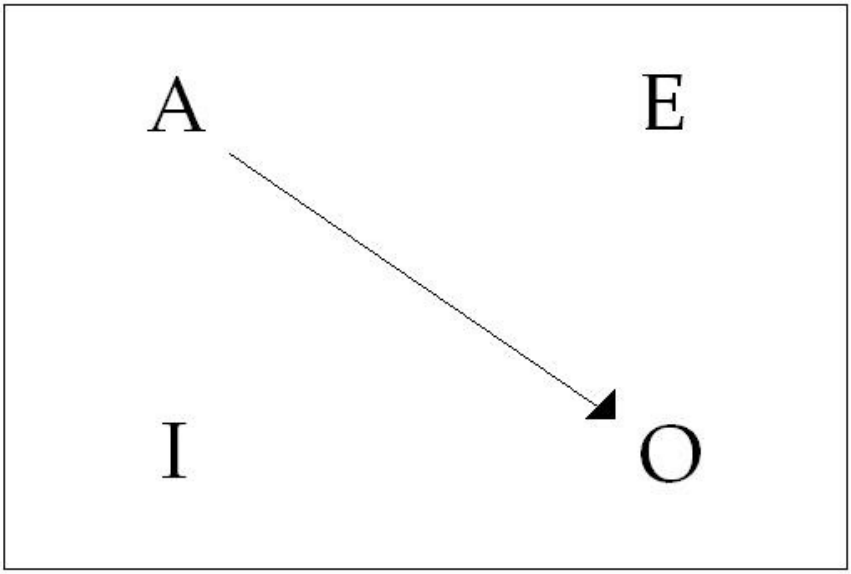
这一点相当醒目，并会促使我们追问：为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把双重否定等同于归零，即回到开端已有的肯定；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却产生这个结果？

不过，我们继续考察：作为我们出发点的这一运作——我们已经把它标示为……——究竟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性质。

因为这是恰当的，因为量词运算所回应的正是这一点……我们只撤去一项否定，即第一项：“存在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智慧的。”

这里我同样作了特称化，而且其方式对应于特称否定命题。这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有的人不是智慧的。”事实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个“不是智慧的”不再处于从属关系，而是处于相反方向的从属关

系，即对角线上的关系：A 与 O 的对立——“所有人都是智慧的”与“有的人不是智慧的”之间的对立——被他称作“矛盾关系”。



“矛盾”一词的用法尤其令我们这些分析家感兴趣，因为——正如纳西夫先生在上一次封闭研讨班上提醒大家的——弗洛伊德曾向分析家们提出一个无疑是首要的真理：无意识不知道矛盾。这一点对精神分析家而言至关重要。

唯一的麻烦是……

你们永远不知道，一项被你们宣称为真理、尤其是首要真理的命题，会结出什么果实……其后果是，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家们便以为自己在矛盾面前可以放假了——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并且以为这也让他们自己可以对矛盾一无所知，也就是丝毫不必关心它。这显然是一种滥用性的推论。即使无意识不知道矛盾这一点是真的，也不等于精神

分析家不必知道矛盾；哪怕只是为了知道，例如，它〔无意识〕为什么不知道矛盾！

总之，我们要注意，“矛盾”值得接受更细致的检验——逻辑学家自然早已做过这种检验——而且，在非矛盾律的层面谈“矛盾”，完全是另一回事……

也就是说，A 不可能在同一方面、同一位置上既是 A 又是非 A……而我们的特称否定命题在这里被称为“矛盾命题”，则是另一回事。它确实如此，它确实与全称肯定命题相矛盾。

但是你们看到，在“存在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智慧的”这一切入方式中，我并没有把这种矛盾关系带到……

相对于作为我们出发点、建立在双重否定之上的公式……我只是把它带到例外的位置。当然，例外并不证明规则，尽管人们通常这样说，而且这样说让所有人都省事。例外只是把规则缩减为一种不具有必然价值的规则；换言之，就是把它缩减为规则的价值——这甚至正是规则的定义。

这样，你们开始看到这些事情对我们会具有怎样的意义。我在这里向我的精神分析听众发出召唤，好让他们稍微不至于感到无聊。你们看到，这些分节使我们能够细化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情；例如，说……并不是一回事。

正因如此，我才在矛盾关系的层面作出这一区分……“男人是非女人”……

在这里，当然会有人对我们说，无意识不知道矛盾……但下面这种说法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 全称命题：“没有一个男人——这里说的当然是主体——不排除女性位置、女人。”
- 或者，处在例外、而不再是矛盾关系的位置：“存在这样一个男人，他并不排除女人。”

不过，这可以向你们表明，这些逻辑研究何以更便于操作，也何以有意展示其意义；哪怕是在精神分析家自以为……的层面上也是如此。

随着时间过去，这倒很配被称作“服从派别”……被迫把目光固定在前语言的地平线上。

而我们则继续走自己的这条小路，做一个实验。我刚才说：“存在这样一个人，他不是智慧的。”

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用 pas。让我们试试看，加入它会产生什么效果。

“存在这样一个人，他——比如说——是‘不智慧的’。”这没有什么不妥，意思还是一样：总有一些人并不智慧。但要小心：这个“不智慧的”很可能会充当一道通路，把我们带向某种略显出人意料的东西。

如果把 ne 放回去，也仍说得通："存在这样一个人，他不智慧。"这还可以成立。[注]

> [注] 前一段的口语式 soit pas sage 省去了 ne；这里 remet le ne 只是把它恢复为完整的 ne…pas，两句都是否定"智慧"，并未变成"并非不智慧"。中文无法用常规否定词自然显示这一法语形式差别，故在注中说明。

现在让我们取"不智慧的"，沿对角线回到 A。亚里士多德的全称肯定命题在量词表达中是：

"没有一个人不是'不智慧的'。"[注]

> [注] Staferla 底本、ELP 校勘本和 Valas 本都保留 Pas d'homme tel qu'il ne soit pas sage；按普通法语表面句法，它会导向"所有人都智慧"，但下一句又明确说 ils sont tous pas sages〔他们全都不智慧〕。译文依拉康在此演示的操作，把 pas sage 当作已经成组的谓词"不智慧的"，再让 ne 与外层 Pas d'homme 起作用，从而保留他明说的逻辑结果，而不暗改法文。

这一下突然产生了一个古怪的意义：它成了全称否定命题——他们全都不智慧。

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被加上的 pas 在特称否定命题的层面完全可以容纳；可一旦我们把它放到先前那个全称肯定命题的层面……

它看起来也完全适合容纳这个 pas……结果，它却转成了黑色。我不知道兰波那首十四行诗里的字母"e"是什么颜色[注5]，但在亚里士多德的层面，它是黑色：这是全称否定命题——他们全都不智慧。

> [注5] 参见阿蒂尔·兰波：《元音》，巴黎，Garnier 出版社，1961 年，第 110 页。在这首十四行诗中，字母"e"是白色的。

我马上告诉你们，我们将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显然，它使我们切实触及两个 ne 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存在于经过量化的全称肯定命题的基本结构中，

也就是这个公式：“没有任何东西不……”……它自身便足以成立。证据就在于这个 pas 一经释放——它在别处原本无伤大雅——便突然使一种全称命题转变成了另一种。

这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断言：当量词运算被置于它的主导功能、即逻辑运算的起源功能之上时，它同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区别就在于，它作出了一项替换……

在 οὐσία〔ousia，所是〕、本质和本体论尚未被排除的位置，在语法主体的位置上……它放入了我们所关切的、作为分裂主体的主体，也就是：

- 主体作为说话者本身那纯粹而简单的分裂，
- 以及言说行为主体，因为它有别于陈述主体。

相关知识卡 言说行为与陈述：主体不能同陈述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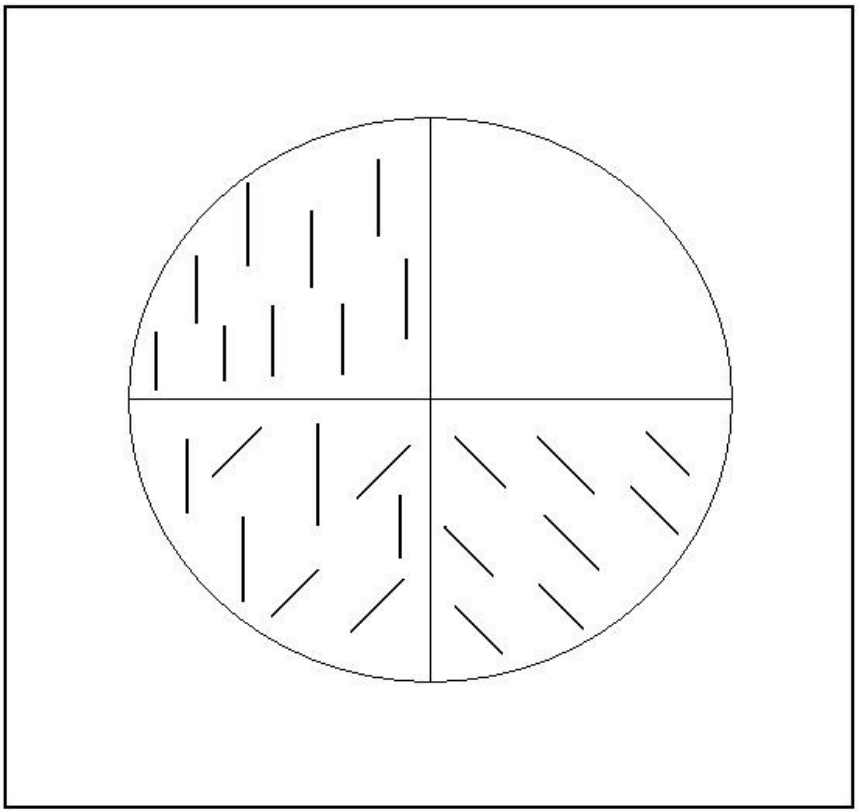
分裂主体的这种在场以何种统一性呈现出来？它无非就是两项否定的这一结合。也正是这一点使我为了向你们呈现它、在你们面前分节它——无论你们是否注意到，现在也该注意到了——不得不使用虚拟式：“没有任何东西不是……”……是“智慧的”还是“不智慧的”，并不重要；正是这个“是”〔soit〕标示了这种滑移的维度，标示了两个 ne 之间

所发生之事；而言说行为与陈述之间始终存留的距离，恰恰就在这里起作用。

相关知识卡 言说行为与陈述：主体不能同陈述重合

因此，几次课以前，当我第一次举出皮尔士表述法的例子时，我确实向你们指出：在我向你们展示的这个例示中，那些经过精心选择的小线条分布在四个方格里，其构成之处在于：[注6]

[注6] 参见 1968 年 2 月 7 日一课。



任何全称命题的真正主体，本质上都是这样一种主体：它本质而根本地就是这个“没有主体”；这一点在我们引入它的方式中已经得到分节：“没有一个人不是智慧的。”

要停留在这道刃口上并不容易。确切地说，理论当然就是为了消除它而建立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所关切的是：如果我们把量词理论分节出来，它就迫使我们在这里辨认出一种不可还原的凸起和逸失。正是它使我们不知道，那个真正具有创制作用的核心究竟滑向何处：它乍看只是重复的否定，实际上却是创造性的否定，因为唯一真正值得在知识中加以分节的东西——全称肯定命题，即始终有效之物——正是由它建立起来的；而无论如何，只有这一点令我们感兴趣。

因此，你们会在量化逻辑学家的笔下看到这样的表述：我们可以为由 ∀ 表达的东西建立一个等价式，也就是写作 ∀x Fx 的命题所具有的全称值。我们必须用符号逻辑的代数化语言来写它：这个全称真值中的 ∀ 意味着“对于每一个 x”，x 都在函数 Fx 中起作用；例如在这里，就是“是智慧的”这一函数，而“人”将是一个在这一函数中始终占据其位置的 x。

量词理论认为可以接受的变换，可以这样表示：……

其中这个符号在量化中为我们指明一个 x、一个 x 的值的存在，并且这个值满足函数 Fx……人们会告诉我们，∀x Fx 可以由一个



来转译；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这样一个 x，使函数 Fx 被掀翻、成为假的：



。

简言之，这两个“负号”的结合——它确实覆盖了我此前以语言中经过细致区分的形式向你们提出的结构——足以把同一件事符号化。然而这并不是真的，因为很清楚：尽管它们都是负号，这两个“负号”在逻辑符号化中并不具有相同的价值。我刚才不得不对你们说：不存在一个 x 会把函数 Fx 掀翻，也就是使它成为假。我以此标示出，这两个词项——不存在，以及最终使函数为假的



——不属于同一层次。但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这里所做的是遮蔽某种东西：那是一道极细的裂隙，而对我们来说，确定并把它固定在其平面上至关重要；它就是言说行为主体与陈述主体之间的距离。例如，当其他作者用另一种方式给函数提供一个更便于在其严格谓词性应用层面操作的图像时，我还会再次让你们注意这一点。因为说到底，Fx 可以指称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你们能够应用于其中的各类数学公式；它是最一般的公式。

相反，如果你们想停留在我的“所有人都是智慧的”这一层面，公式就是（ h ∨ s ），其中使用我上次已经写在黑板上的析取符号“∨”。按照那些引入量化的逻辑学家，只需在这一公式上加上来自 πᾶν〔pan，全体〕的 Π，或者加上 Σ，就可以分别得到一个全称命题或特称命题：Π(h ∨ s)。这等于说，我们面对的是“非人”与这个 s 的析

取。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取“非人”的反面，即“人”，那么析取的另一项便是“他是智慧的”——或者在所有情形下，或者在某些特殊情形下。

如果我们取“智慧的”的否定，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放弃“智慧的”，我们便来到析取的另一边，即“非人”这一边；到这里还说得过去。但是，这绝不要求“非人”的东西必定“非智慧”。而公式并没有标出这一点。为此，析取必须例如这样加以标记：

$$\Pi\,(\overline{\hbar \vee s})$$

也就是一个与平方根符号“相反”的符号。它意在向我们表明，在蕴涵关系上……如果我们在全称层面有“人蕴涵智慧”这一关系，那么“非智慧”当然并不蕴涵“人”；而“智慧”同样完全可以与“非人”相容。换言之，可能有某种不是人的东西也是智慧的。在直接把公式呈现为一个被否定的主体与一个未被否定的谓词之间的析取时，这一点被省略了。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某种东西得到证明：在所谓双重否定系统中，如果采用米切尔的这种书写法[注7]，总会让某种东西逸失。这一次，它非但没有缝合裂隙，反而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让裂隙敞开；这再次证实，问题始终就在裂隙。换句话说，就形式逻辑而言，问题始终是：要知道从一项陈述中能够推导出什么、又能推到多远，也就是要得到一项可靠的陈述。亚里士多德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 [注7] 奥斯卡·霍华德·米切尔：《一种新的逻辑代数》，1883 年，收入 C. S. 皮尔士编《逻辑研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成员论文集》，波士顿：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3 年由阿姆斯特丹 / 费城 John Benjamins 重印，收入“符号学基础”丛书第 1 种，第 72—106 页。

当然，我们不要说亚里士多德处在思想的黎明，因为思想的特点恰恰是从来没有过黎明；在那时它已经非常古老，而亚里士多德对此有所认识。他尤其知道：如果没有语言，甚至根本谈不上知识。当然，这并不足以说明知识只依赖语言；但由于思想并非始于昨日，他所在意的恰恰是要知道，一次言说行为中的什么能够构成一件必然之事——在这一点上绝无退让的余地。

第一个 ἀνάγκη〔anankē，必然〕，就是话语的必然。

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迈出了第一步：要知道，在陈述层面上真正被区别并作为这种区别本身而把握的什么，可以被表述为给言说行为提供其必然性的一项来源——这当然不是说它是唯一来源——也就是说，在这里没有后退的余地。当时 ἐπιστήμη〔epistēmē，知识〕一词的意义，也就是一种可靠的言说。ἐπιστήμη 与 δόξα〔doxa，意见〕之间的区别，无非是位于话语层面的一项区别。

这就是它与我们所谓科学的差别……尽管科学朝着同一方向前进，也就是朝向一项严格可靠的陈述……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在陈述方面作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产物，而且这些产物恰恰出现在数学中。

这些陈述法则虽然已经变得十分可靠，却也日益变得更为苛刻，并因而不断显示出自己的界限。我的意思是，我们之所以在逻辑中迈出了若干步——我此刻向你们重现的当然也是其中一步，而且是我们所关切的原初一步——原因何在？因为我们分析家所处的位置，在那种试图用陈述的网络捕捉言说行为的努力之前。但别处的工作能推进得如此之远，实在是一种幸运；如果借此能够向我们提供一些规则，帮助我们准确定位这道裂隙的话。

当我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时，这并不意味着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给这句话补上的，恰恰是这个“人们”〔on〕——我对此加以强调，而它使全体精神分析家感到眩晕——即“人们对此一无所知”。这个“人们”，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就是那个为了让我们安心而必须始终在场的主体。

所以，我说出它，并不是因为我知道它，而是因为我的话语确实把无意识组织起来。我说，我们关于无意识所拥有的唯一话语——弗洛伊德的话语——确实“生成意义”；但重要的不在这里，因为它“生成意义”，正如船会“进水”一样：处处都漏。任何东西都能生成意义，我已经向你们展示过这一点。[注8] “无色的绿色观念狂怒地沉睡”同样生成意义。它甚至是对全部精神分析文献所能作出的最佳刻画。

> [注8] 参见 1964—1965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4 年 12 月 2 日一课。

如果弗洛伊德话语中的这种意义，相对于所涉及的无意识而言如此充实、如此富有回响；换句话说，如果它有别于他事先作为神秘主义而排除的一切，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并且感到这不是梅斯梅尔那一套……

正因如此，尽管精神分析话语含有无意义之物，它仍然存续……这是一个我们只能间接解释的奇迹，即通过弗洛伊德所受的科学训练来解释。

重要的不是这种话语的意义；首先必须有这番话语存在，我所提出的“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才会拥有其指称、其 Bedeutung，因为正是在这里，人们发现这个指称就是语言。换句话说，我的话语就弗

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话语所分节出来的一切，都通向一些同构的公式：只要把语言当作对象，这些公式便会强制出现。

无意识相对于关于语言的话语，强加给我的话语的这种同构关系，正是问题所在。它也使每一个精神分析家都必须被纳入这番话语，只要他投身于弗洛伊德为无意识界定的场域。从这里出发，在我们分别之前，我们大概只能提出几个标示点，以免你们在这件事里失去方向。

我希望，我刚才最后就“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这一公式所说的话，仍能对那些早已听到它的人、也对那些拒绝听取它的人保留一个转折点的价值。当然，我们的科学并不只由这些坐标来界定——这些坐标表明，不通过语言便没有知识。

不过，科学本身仍然只能依靠对一种纯粹语言性知识的储备来维持；也就是说，它依靠一种对自身工具的发展而言严格内在而且必需的逻辑，因为这一工具是数学的。人人都可以切实看到：数学工具自身的进步，在接纳事实发现的每一个新领域、同时也被这些领域接纳之际，会不断把科学置于严格属于语言的困境中；而这些困境正是现代科学极为关键的动力。

因此，仍然存在一个完整的层面，在那里，知识属于语言；把这个场域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同义反复，并不是徒劳的。科学之所以出发，恰恰源于在话语中测量以这种方式界定的分裂，源于一种名叫 cogito〔我思〕的逻辑苦修。

我能够充分展开这种苦修，并在其上奠定幻想的逻辑，这本身就是一个迹象。上一次封闭研讨班中，一位在我的话语场域里工作的人把这套逻辑的分节相当出色地分离了出来。我必须说，问题并不像他所说

的那样，是我会制造出一种“新的否定”；不过，从他试图带来对这番话语的回应这一角度看，他这样说是正当的。

但愿上天保佑我，不要让我再以引进新事物的方式，给任何人一个机会去回避真正的问题。问题恰恰不是某种被堵上的东西，而是某种根本无从堵塞的东西。

但愿我不要再给精神分析家更新一种托辞，好让他逃避自己必须在精神分析话语中所是的东西：也就是在严格而且亚里士多德式的意义上，成为这番话语的 ὑποκείμενον〔 hypokeimenon，基底〕、它的主体性支撑；当然，是在他自己承担这种分裂的条件下。

第13课 · 1968年3月13日

成为精神分析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今年试图在“精神分析行动”这一标题下对你们讲述的内容，正朝着这个目标前进。

奇怪的是，在人们寄给我的某些反馈中……

既然这是我提出的请求，我也感谢那些愿意这样做的人……有时竟会冒出这样一种看法：我在这里所做的，接近某种哲学反思。然而，至少像上一次那样的一课——它当然不会不对你们当中最能跟上我的话语者发生作用——也足以提醒你们，这里涉及的是另一回事。

经验……

经验总是某种我们最近还能听到回声的东西……证明了：某类所谓哲学研究所产生的心境，很难容纳那门叫作逻辑学的科学所具有的任何精确分节。

我甚至从这种回声中标出并记下了一项颇具幽默意味的评价：若试图把严格说来已经建构成逻辑学的东西纳入课程，纳入哲学的 cursus〔修业进程〕或 gradus〔等级进阶〕所规定的内容，这种企图会近似于一种技术官僚的野心。“技术官僚”正是一切听觉抵抗最后采用的口号，用来指控那些总体上试图带来更精确话语的人；我的话语作为结构主义的一部分，也被归入其中。归根结底，这种话语的共同特征，是把某种并非以通常科学对象的名义构成的东西作为对象……

也就是说，并非某种我们已经同它保持足够距离，从而能够在实在中把它孤立为一个特殊种类的东西……而是严格处理作为语言效应而构成的东西。

把语言效应当作对象，确实可以被视为结构主义的共同因素。毫无疑问，思想恰恰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切入方式、坡向和逃逸途径：它以遐想的形式，从某种正在这里努力取得形体的东西那里逃开，并企图在那里恢复什么呢？

恢复那些古老的主题。它们一直以各种名义在一切话语周围繁生，因为话语正是哲学的棱线：哲学站在话语运用产生某些效应的尖端；而话语又恰恰通过这些效应，不可避免地落入某种平庸和无效。结果，唯一被留在外面、遭到排除的，恰好就是这一效应本身。

然而，不难看出，精神分析为这种反思提供了一块特许场地。

那么，精神分析究竟是什么？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顺带写过一段话；那篇文章以《标准治疗的变体》为题收入我的《文集》。今天早晨，我特意又把它找了出来。那是对“精神分析是什么”的追问……

因为问题恰恰是要说明这些变体如何得到界定、如何被设立；这预设了某种“标准”之物的存在。而我写这篇文章，恰好是为了纠正一种把

“标准”一词同精神分析效能相联系的方式……因此，我当时顺带说道：

- “这条标准很少被说出，因为它被当作同义反复——那还是很久以前……十多年前——我们把它写出来：一种精神分析，无论是否标准，都是人们期待由一位精神分析家实施的治疗。”〔第 329 页〕

“很少被说出”……因为人们确实会在某种东西面前退缩：它不只像我写的那样是一句同义反复，而且要么本身就是、要么唤起了某种我说不清的未知、晦暗而不可还原之物；它恰恰就在于精神分析家的资格。

不过请注意：当你们想核实某人是否有充分理由声称自己经历过一次精神分析时，实际情形确实如此：

- 他找的是谁？

- 那个人是不是精神分析家？

这将决定问题。如果出于某种理由……

而这些理由，恰恰是我们必须在这里用一个大大的问号打开的东西……那个人物没有资格自称精神分析家，那么至少会令人怀疑：主体据以授权自己的那项经验，究竟是不是一次精神分析。

事实上，没有别的标准。但要界定的恰恰就是这条标准，尤其是在必须把精神分析同某种范围更广、边界仍不确定而被称作“心理治疗”的东西区分开时。让我们拆开“心理治疗”这个词：我们会看到，它由某

种“心理的”、即心理学的东西来界定；而对这种材料至少可以说，它的定义始终会受到某种争议。

我的意思是，没有什么比人们曾称作“心理学的统一性”的东西更不显明。[注1] 心理学只能通过一系列参照获得地位，其中一些参照自以为最能凭借那些与心理学最为异质的东西来保证自身，例如被拿来与它对立的“器质性”；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设立一系列严格限制来保证自身。但这些限制又会使某些实验条件、某种实验室框架下得到的结果，在实践中显得多少不充分，甚至无法应用；尤其当问题转向那个更加混乱、被称作“治疗”的东西时。

> [注1] 丹尼尔·拉加什：《心理学的统一性》，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49年。

“治疗”会唤起何等多样的方式与回响，人人都知道。其中心由“暗示”一词给出；至少在一切涉及活动的事物中，它居于中心：一个存在者对另一个存在者施加活动，所循的途径当然还不能声称已经得到充分界定。

在这类实践的地平线和极限处，我们会遇到通常所谓、而且已经得到相当准确定位的“身体技术”这一一般概念。我指的是在许多文明中显现出来、而在我们这里以漂移形式传播的东西；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乐于把它标作印度技术，或称作各种形式的瑜伽。

在另一个极端，则是撒玛利亚式的援助；它含混地迷失在灵魂升华的场域和道路中，甚至迷失在……

奇怪的是，人们又在宣告精神分析操练的终点会产生什么时重新提起它……那就是一种被称作践行某种善意的奇异情感流溢。

那么，让我们从目前唯一稳固的一点出发：精神分析是借助一位精神分析家来实践的。

这里必须在工具性的意义上理解“借助”〔avec〕；至少我建议你们这样理解。

为什么会有某种只能通过“借助”一位精神分析家来定位的东西？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他向我们保证，不应说“灵魂思考”，而应说“人借助其灵魂思考”[注2]；他明确指出，“借助”一词应当取这种含义，即同一个工具性的意义。

> [注2] 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第一卷第 4 章，408b，14—15；A. Jannone 校订原文，E. Barbotin 翻译并作注，巴黎，Les Belles Lettres 出版社，1966 年。该书法译文为：“无疑，最好不要说灵魂怜悯、学习或思考，而应说人通过其灵魂怜悯、学习或思考。”

奇怪的是，我曾在某处提到这项亚里士多德式参照；读者似乎反而因此感到混乱，大概是因为没有认出这一参照。

精神分析正是“借助”一位精神分析家，才进入这里所涉及的东西。如果无意识存在，而且如果我们按照看起来应当采用的方式来界定它——至少经过我们多年来在这一场域中的漫长行进，事情应当如此——那么，进入无意识场域，严格说来就是来到最适合被界定为语言效应的层面。这里第一次得到分节的是：这种效应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从主体那里分离出来；存在着知识，因为这正是语言的典型效应；存在着具身的知识，而持有话语的主体却没有意识到它。这里，“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意味着与知识所包含的东西处在同一维度，意味着成为这种知识的共谋者。

这无疑开启了一种可能，使语言效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被作为对象提供给我们；这种方式把它排除在某种辩证法之外。那种辩证法形成于传统哲学追问的终点，它试图为我们铺出一条道路：把主体——作为宣告这一真理、并声称对话语作出最终裁定者——可能穷尽地、彻底地还原。其公式是：

- “自在”在本性上注定要被还原为“自为”；
- “自为”将在绝对知识的终点包裹“自在”的一切。

但事情并非如此。精神分析教给我们的恰恰是：由于能指效应本身，主体只能被设立为分裂的，而且这种分裂不可还原。正因如此，我们必须研究作为语言效应的主体，研究它如何可以被触及，以及精神分析家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为这一点奠定基础无疑至关重要。

事实上，如果知识总会留下一个剩余——一个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其地位的剩余——那么第一个问题难道不应指向那位伙伴、那个在那里使某种东西得以运作的人吗？对于分析者的任务而言，我不说他是“援助”，而说他是“工具”。

在这一任务终点，主体——可以这样说——获知了这种构成性的分裂。此后，某种只能称作“付诸行动”的东西向他开启；我们姑且说，这是一种被照亮的付诸行动。照亮它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在每一个行动中，总有某种作为主体的东西从他那里逃脱，却会在行动中产生作用；而在行动终点，他必须完成的行动作为其自身实现，其实现目前至少仍是被遮蔽的。

作为分析者任务之终点的这一点，却把任务完成之后精神分析家的情形完全搁置在一旁。在一种朴素的追问中，我们似乎可以说：只要排除在这项被当作苦修的任务中“自为”那完整而单纯的实现，它的终点便可以被设想成一种至少为他者而实现的知识；也就是为作为这项运作之伙伴的人而实现的知识，因为正是他设立了框架，并授权这项进程展开。

事情真是如此吗？可以说，精神分析家在主持这项任务时确实学到了很多。但这是否意味着，在这项运作中，他能够以任何方式自诩为一种已实现认识的真正主体？

恰恰有一点对此提出反驳：精神分析明确反对知识能够被穷尽，而且是在主体本身的层面上反对这一点，因为在精神分析任务中，被置于运作中的正是主体。

精神分析所涉及的并不是一句 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gnōthi seauton，“认识你自己”〕，而恰恰是把握这句“认识你自己”的界限；因为这道界限严格说来属于逻辑本身的本性，而且语言效应中已经写明，它总会把某一部分留在自身之外……

因而，就语言效应使主体得以作为主体构成自身而言……它留下了这块被排除的部分；这使主体依其本性：

- 要么只能通过忘记最初决定他进入这项辨认运作的东西，才能辨认自己；

- 要么，即使在这一决定作用中把握自己，也仍否认它[注]；我的意思是，主体只能在一种根本性的 Verneinung〔否定〕中让它出现，同时又误认它。

> [注] 原文先用动词 dénie〔否认〕，随后才以 Verneinung 命名“否定”；两者在这里不能压成同一个中文词。Staferla 底本与 Valas 本均保留这一先后关系。

换句话说，我们来到两种基本形式的基底图式：一是明确说来的癔症结构，二是强迫症结构；分析经验正是由此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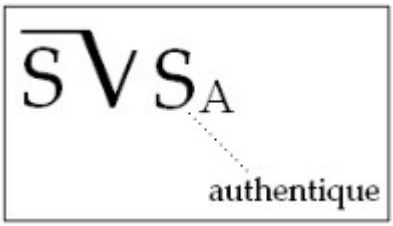
它们在这里无非是例子、图示和展开；而且这是在神经症本质上由欲望对要求的参照构成的限度内……与它们相对的，是我上次向你们提出的逻辑图式本身。我通过量化的棱线展示了它；量化把我们能够给出的、经过加工的主体与谓词的进路联结起来。它可以写成被压抑的能指 $\overline{S}$；这一能指向另一个能指 S_A 代表主体，而后一个能指带有系数 A，因为主体既必须在其中辨认自己，也必然在其中误认自己；主体被写入其中，并在大他者场域的某处被固定。公式如下：

$$\frac{S}{S_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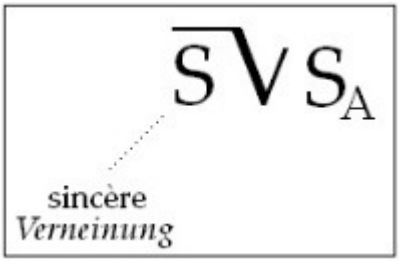
它适用于依其本性分裂的每一个主体。其方式同我们表述“所有人都是智慧的”完全一样：我们在“非人”与“是智慧的”之间作出析取选择：

$$\Pi\left(\overline{h\vee s}\right)$$

我们在根本上得到的是：正如最初的分析经验所教给我们的，癔症者在她最后的分节和本质结构中，确实“真正地”支撑于一项能指肯定——如果“真正”意味着“只在自身中找到自己的法则”。对我们来说，这项肯定显得像戏剧、像喜剧；而事实上，它正是对我们才这样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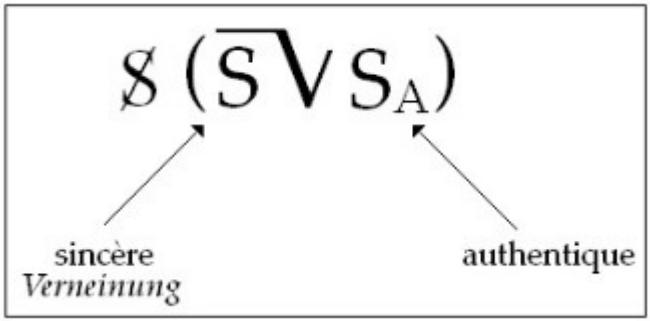


如果不把这个能指中表达的地位视为主体最稳固、最自主的地位，就没有人能够把握癔症者的真实结构；条件是第一个能指、那个决定主体的能指，不只留在遗忘中，而且主体还不知道它已经被遗忘。



相反，在所谓“强迫症结构”的层面，主体十分真诚地推出那个作为其真理的相关能指，却给它配上根本性的 Verneinung〔否定〕；主体借此宣布，自己并不是那个恰恰由他分节、承认和表述的东西。于是，

他只能在谓词层面设立自己，并维持自己是另一种东西的主张；他只能在某种误认中表述自己，而这种误认由他用来支撑它的否定本身指示出来，由伴随误认的否定形式指示出来。



因此，这里涉及一种同源关系、一种平行关系：一方面，是逐渐被设立于书写中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话语的进展自身所强制要求的东西。数学的进步把各种变体和概念变化强加给我们，话语必须与之相称，由此得到丰富；问题就在于这些书写形式之间的同源关系。

例如，我在这里指的是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注3]。它作为概念的书写，承载着我们同弗雷格一道进行的尝试：开始在这种书写中记入谓词形式。它们不只在历史上如此，而且因为贯穿历史而持续存在，已经被写入所谓的谓词逻辑、一级逻辑；也就是说，它没有在谓词层面引入任何量化。

> [注3] 戈特洛布·弗雷格：《概念文字：一种模仿算术语言、用于纯粹思维的公式语言》，哈雷，1879 年；后收入《概念文字及其他论文》，希尔德斯海姆，I. Angelleli 编，1964 年。另见弗雷格：《算术基础》，克洛德·安贝尔译并导论，巴黎，Seuil 出版社，1969 年；《逻辑与哲学论著》，克洛德·安贝尔译并导论，巴黎，Seuil 出版社，1971 年，Points Seuil 版 1994 年；《戈特洛布·弗雷格

> —伯特兰·罗素通信集》，《L'Unebévue》第 5 期增刊，巴黎，EPEL 出版社，1994 年 11 月，卡特琳·韦伯恩翻译、注释并导论。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概念文字》：函数、论元与量化 · 阿普列乌斯、命题数量与逻辑方阵

仍取我们的例子。我上次颇带幽默地使用了全称肯定命题"所有人都是智慧的"；弗雷格会在他的《概念文字》中把它写成如下形式：



- 横线上放置的只是命题内容，即能指彼此拼接在一起的方式；在这一阶段，除了句法正确之外，不要求任何东西。

- 他在左侧加上的竖线，标示所谓蕴涵，也就是判断的在场：从写入这条线开始，命题所含的内容便得到肯定，或者说进入所谓断定式的阶段。

人们把它译成"它是真的，确实如此"。对我们来说，"它是真的"位于一种逻辑的层面……

从技术上说，这种逻辑绝不能叫作"初级逻辑"，因为该术语已经在逻辑构造中另有所指：它专指只对真值进行组合的逻辑。正因如此，倘若"初级逻辑"一词没有被占用，我们本可以这样称呼的东西，现在将被我们叫作"亚逻辑"〔sublogique〕；这并不意味着低等逻辑，而是作为主体构成因素的逻辑……这个"它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恰好位于我们将放入某种不同于断定式位置之物的层面；也正是在这里，真理对我们成为问题。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概念文字》：函数、论元与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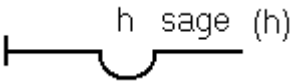
这个小凹口、这个内凹之处、这个仿佛挖空的位置……



弗雷格把它保留在这里，用来标明我们马上会看到的东西；他认为，为了保证《概念文字》具有正确地位，这一点不可或缺。某个在这里作为内容写入的命题中起作用的东西，将被放入这个凹口。这个命题就是“所有人都是智慧的”。例如，我们可以这样写：把“是智慧的”放在函数的位置[注4]，把“人”放在这里，作为他所谓函数的自变量。

> [注4] 这里的函数显然是“是智慧的”。参见弗雷格《逻辑与哲学论著》中的《函数与概念》，巴黎，Seuil 出版社，1971 年，第 91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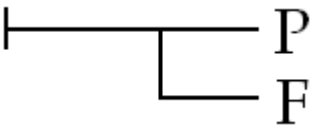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概念文字》：函数、论元与量化**



在此后对这种《概念文字》、即概念书写的全部操作中，对弗雷格来说，唯一正确的办法就是在凹口里，以明确指示相关函数的形式，写入同一个表示所讨论之“人”的 h；由此表明，“对于每一个 h”，“人是智慧的”这一公式都是真的。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概念文字》：函数、论元与量化**

我无须在这里为你们展开这种做法的必要性，因为那会迫使我给出它的全部后续，也就是它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你们只需知道：如果我们要把这样一个命题同另一个在某种意义上作为其条件的命题联结起来，这种关系在《概念文字》中写作：



也就是说，一个命题 F 同一个命题 P 具有某种关系。一旦这种关系按照所谓斐洛式蕴涵的模型得到界定——我是对那些能理解这些词的人说的[注5]——它就意味着：如果这一项是真的，另一项就不可能是假的。换句话说，要给一段话语以秩序和连贯性，只需排除、而且只排除这一点：假不能以真为条件。

> [注5]　此处指公元前四世纪的麦加拉学派斐洛。他对两个命题之间蕴涵关系的界定，与现代逻辑的“实质蕴涵”完全相同。斯多葛派逻辑建立在麦加拉学派的教导上。参见克洛德·安贝尔：《逻辑史论》，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 年。

其他所有组合都被允许，包括“假决定真”。我只是在旁边指出：把事情这样写下来，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蕴涵形式：

- 一种情形是，条件关系的作用在《概念文字》的这一部分接合进来：



也就是在命题被设定为断定式的层面；另一种情形则相反，条件关系在命题本身的层面接合进来。



也就是说，下面两种说法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某件事是真的，我们便说“人是智慧的”；或者，如果另一件事是真的，那么“所有人都是智慧的”是真的。两者之间有天壤之别。

这也只是在旁边向你们作个提示，并让你们看到这个凹口的必要性回应了什么：在某处，那个从逻辑上……的词项值得被单独分离出来。

在逻辑已经充分发展到我们目前所在位置的条件下……这个词项赋予“所有”以形体，使它成为一项原则、一块基础；只需在其上施行不同形式的否定运算，就能表述亚里士多德所界定、所提出的全部基本命题。例如：

- 在这里用这道竖线写入否定，就得到“对于每一个人，‘人不是智慧的’都是真的”；也就是说，我们使全称否定命题获得了形体。



- 相反，若这样说，我们说的是：“并非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宣告‘人不是智慧的’是真的。”通过这两项否定，我们得到特称肯定命题的呈现；因为，如果并非对每一个人都能说“人不是智慧的”，那就意味着总有那么一个落在角落里的人是智慧的。



- 反过来，如果撤掉这一项否定而保留另一项，我们说的就是：“并非对每一个人，‘人是智慧的’都是真的”；也就是有些人并不智慧，即特称否定命题。



这样分节时，你们会在其中感到某种人为之处；例如，你们会觉得最后那个所谓特称否定命题的出现，在这一层面上带有人为构造的痕迹。

这凸显出：

- 在亚里士多德的原初逻辑中，某种东西被遮蔽了：无论从外延还是内涵上把握这些主体，逻辑都恰恰把它们作为一个集合牵涉进来；

- 主体的本性不应在某种本体论的东西中寻找；主体仿佛自身充当某种第一谓词，但主体并不是谓词。

主体在逻辑运作中显现出来时的本质，完全从第一种书写出发；这种书写把主体设定为依其本性如此肯定自身：“对于每一个人，‘人是智慧的’这一公式都是真的。”

存在正是由此显露出来，其推导方向在某种意义上同我上次向你们凸显的方向相反；这里说的是唯一令我们关心的存在，即由特称肯定命

题支撑的存在："存在一个智慧的人。"它通过双重否定而悬系于全称命题的肯定。

上一次，我向你们呈现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因为始终涉及量词。我把双重否定施加于存在，并由此向你们表明，函数 ∀x Fx 可以转译、反转为：



，即不存在一个 x 会使函数 Fx 为假。

双重否定的这种在场，正是对我们构成问题之处；因为说到底，它同"所有"这一功能之间的接合仍然十分费解。当然，语言的细微差异已经显示：希腊语 πᾶν〔pan〕或 πᾶντες〔pantes〕的功能，同 ὅλος〔holos〕的功能相对立，正如拉丁语 omnis 同 totus 相对立。

然而，亚里士多德自己谈到全称肯定命题时，把它说成是 καθ'ὅλον〔kath'holon，就整体而言〕地设定的，这绝非偶然。[注6] 法语中的歧义仍然完整保留，因为两个能指在那个根本上与之相关的东西——"所有"的功能——上发生了混淆。

> [注6] 希腊原文为"kata holou eipōn aretēs peri ho ti estin"，逐字意为："着眼于整体，说出有关 aretē〔德性〕的'它是什么'。"关于 ho ti estin 一语，参见《美诺篇》71b3—4 的注17及74c5—6的注18。这里的表述引入了另一个后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影响深远的说法：kata holou。这是全部对话录中这一表达唯一的一次使用。略有差异、以 kata 加宾格 holon 而非这里属格 holou 的形式，还见于《理想国》III，392d9（苏格拉底说，为了更好说明他对诗人的批评，他不会 kata holon、"按照整体"、即"一般地"处理问题，而会"取一个部分"、即采用例子）；《巴门尼德篇》138e6—7（kata holon）及144e9（kata to holon），见巴门尼德对"一"与整体、部分概念之关系的讨论；《蒂迈欧篇》40a7（宇宙被创造为"kosmon... kath'holon"，即"在其整体上有秩序"）和55e7（谈到一种基本三角

> 形“kata merē kai kath’ holon”更稳定，即“就部分与整体而言”）。但这些用法都没有这里近乎“技术性”的含义；它预示了该表达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合写成 katholou 后获得的意义，即用来表示同特殊相对的“普遍”。本注转引自 Bernard Suzanne 对《美诺篇》77a5—80d1 的注释。

很清楚，主体……

即使随着逻辑的完善，我们能够把主体还原为我上次所说的“没有……不……”……主体仍然会在其可以说是天生的主张中，把自己设定为依其本性能够把握某种“所有”的东西。主体的地位、同时也是其幻象，就在于它能够把自己思考为知识主体，也就是把自己单独当作某种“所有”之物可能的支撑。

我今天这番尽可能简短的话，正要把你们带到这一指示上……

我一向如此：先十分认真地为你们准备好各级台阶，再根据听众的注意力或我自己的状态来决定……像一切经过分节的话语一样，我不得不……

尤其当所谈的是关于话语的话语、是逻辑运算时……在必要的时刻走一条岔路。我已经向你们指出，主体最初的分裂如何在重复功能中建立；这里本质上涉及的是：主体〔S〕只能在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它时才被设立，即 $S_1 \rightarrow S_2$。在两者之间、在原初重复的层面，发生了这项丧失（$S_1 \rightarrow S_2$）→（$a_{\downarrow}$）：失落对象的功能。能指最初的运作尝试，即建立在基本重复中的尝试，恰恰围绕它旋转。

它在这里占据了弗雷格陈述中那个被称为“自变量”的因素，在全称肯定命题的设立中所得到的位置。谓词函数始终可以被接纳，而且“所有”的功能能够找到其基础、原初转折点，也可以说找到自身幻象得以

建立的原则，原因就在失落对象的定位，就在对象(a)处于以下两者之间的中介功能：

- 原初能指，因为它是被压抑的能指；
- 以及在重复自身所设立的、同样原初的替换中代表它的那个能指。

精神分析本身通过某种关键之物向我们说明了这一点：它可以说以最鲜明的方式，体现了“所有”这一功能在某种经济中的情形。我不说“无意识经济”，而说分析知识的经济；因为这种知识恰恰试图把自己的经验总体化。

这也正是分析思想自身落入的切入角度、坡向和陷阱。面对主体，分析思想无法在终点把握自身那本质上实施分割的运作，于是它把一种理想融合的观念设为首要，并把它投射为原初状态。这一观念围绕全称肯定命题运作——而精神分析原本恰恰应当把这种命题问题化——它大致表述如下：

- 没有母亲就没有无意识；
- 没有这样一种被放在起源处的东西，就没有经济、没有情感动力：人之所以认识“所有”，是因为他曾与母亲处于原初融合。

这个在某种意义上寄生的神话并非弗洛伊德式的，而是奥托·兰克通过“出生创伤”这个令人费解的角度引入的，你们知道。[注7] 从创伤的角度纳入出生，就是赋予出生以能指功能；因此，这件事本身原不至于从根本上败坏一种思想的运作。只要是分析思想，它就只能让真正的问题保持不动：在认同的分节最终碰壁的平面上，男人与女人之间

的裂口仍然敞开；因此，在主体的构成中，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引入男性与女性在世上彼此补足的存在。

> [注7] 奥托·兰克：《出生创伤》（1924），S. Jankélévitch 译，巴黎，Payot 出版社，1968 年。

那么，奥托·兰克通过创伤这一角度引入对出生的参照，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

它使此后的分析思想受到深刻败坏，因为人们至少主张：主体曾有过这个“所有”、这种融合，因而曾有同构成“所有”的东西结合的原初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可以重新夺回；那就是子宫阶段、出生之前的阶段中母亲与孩子、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我们在这里切实触及了偏差与错误所在。

但这一错误将具有示范性，因为正是它向我们揭示了，“所有”的功能在主体那里从何处起源；这里的主体落入无意识宿命的切入角度，也就是说：

- 要么，他只能通过遗忘自己，才真正辨认出自己；
- 要么，他只能通过误认自己，才真诚地辨认出自己。[注8]

> [注8] 参见本课上文关于癔症者与强迫症者的讨论。

这里的动力其实非常简单：一旦我们在语言功能的层面把握事情，就会发现没有一项要求不是向母亲提出的。我们可以在儿童的发展中看到这一点：儿童起初是 infans〔尚不能言者〕，而他最初必须在母亲的场域中分节自己的要求。

在这项要求的层面，我们看到什么出现？

这里只有分析向我们指明的东西：乳房的功能。

分析让一切围绕某项事实旋转，仿佛这里涉及一种认识过程：母亲的实在性最初只能通过所谓“部分对象”的功能被触及和指示。

我当然同意把它叫作“部分对象”，但有一点除外：我们必须看到，恰恰是它构成“所有”之想象的原则。如果孩子与母亲之间的某种关系被设想为一个总体，那是因为在要求之中——也就是在尚未得到分节之物与最终被分节成要求之物之间的裂口中——最初要求所围绕而出现的对象，是唯一给新生的小存在者带来这一补足、这一不可还原的丧失的对象；而这个补足和丧失正是小存在者唯一的支撑。这个乳房以如此独特的方式被安置在这里，服务于一种本质上属于逻辑的用法：它就是对象(a)，也就是弗雷格所谓的变量。我的意思是，在任意函数 Fx 的设立中，一个变量一旦被量化，就会因被量化为全称而进入另一种地位。

这并不只是说“任意一个”，而是说，它在自身的一贯性中根本上是一个常项。因此，对那个开始通过要求分节其欲望地位的孩子来说，如果有一个对象能够获得这种特许、暂时填补这个常项功能，那就是乳房。

同样令人奇怪的是，当人们围绕分析渴望援引的生物学词项进行思辨时，竟没有立刻看到一件仿佛不言自明的事：“每个孩子都有母亲”；人们甚至还着重指出，仿佛要为我们引路：至于父亲，我们则处在信仰的秩序中。

但如果孩子不是人类、也就是说不是哺乳动物，而是一只昆虫，那么他仍一定有一位母亲吗？

昆虫与它的母亲有什么关系？

如果我们不断容许自己在受孕与出生这两种参照之间游移——这种游移也呈现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就会看到两者之间的距离，也会看到“母亲之所以是母亲”只依赖一种纯粹器质性的必然：我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只有她会把自己的卵产在自己的子宫里。不过，既然现在已经有人工授精，将来也许还会有卵细胞植入。

在我们从分析经验中把握母亲的层面上，母亲并不是某种由性别词项来指称的东西。我们总在谈所谓“性关系”，那么也谈谈那个被称作“关系”的“性”。所谓“关系”的性，被下面这件事完全遮蔽了：对于人类，我们可以说，如果他们没有语言，甚至又会怎样知道自己终有一死？

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人类不是哺乳动物，他们就不会想象自己是被生出来的。我们在这种建构起来的知识中进行运作；而我们让一切围绕出生旋转，又使这种知识败坏了分析运作的全部辩证法。可是，存在者的涌现难道不是另一回事吗？在柏拉图那里，它以一种在我看来更为合理的面貌呈现出来；请看厄尔神话。[注9]

> [注9] 参见“潘菲利亚人厄尔的神话”，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614b—621d，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七星文库”第 1 卷，1971 年，第 1231 页，Léon Robin 译。

灵魂离开身体之后的这番漂泊，究竟是什么？

在进入某处重新安身以前，它们待在一个超空间里；是依照自己的喜好还是依照偶然，并不重要。

这究竟是什么？对于我们分析家来说，它难道不更有意义吗？这个漂泊的灵魂究竟是什么，如果不是我所谈的东西：主体分裂的剩余？

在逻辑上，这种灵魂转生在我看来，比那种把分析者动力中所发生的一切的“此前”，都归结为居住在母亲腹中的做法更少犯错。如果我们把这种居住想象成哺乳动物谱系开端时的情形，也就是住在有袋动物的育儿袋里，它就不会如此打动我们了。

令我们产生幻觉的，是胎盘的功能。

而胎盘的功能，在最初的哺乳动物那里并不存在。

胎盘看来恰好应当被放在这个附着对象的层面：某种在生物进化的一个层面上……

我们无须判断这是否是一种完善……呈现为属于他者层面的东西，就像附着在胸前的乳房；而对象(a)的一次示范性出现所涉及的一切，正是围绕这个乳房旋转。

对象(a)正是“所有”这一功能得以锻造时所围绕的标志；而“所有”是神话性的，它恰恰同分析经验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对主体地位的全部研究相对立、相矛盾。我们必须认出这一点；只有这样，才能赋予对象(a)以枢轴和转折点的功能。对象(a)的其他形式都可以推导出来，但始终指向同一个参照：对象(a)是“所有”之幻象的原则。

在我下次再见到你们、并试着围绕其他支撑——废弃物、凝视、声音——使它活起来以前，请你们先作一番尝试。你们会看到：只要把握这个(a)的关系——恰恰是它使我们能够解除“所有”这一词项的功能——我便可以在这项追问内部重新接续行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就此说什么；但当然，这项行动牵涉功能、地位与资格。

如果精神分析家并不围绕某种我们能够追问的东西——也就是一个主体——来定位自己的地位，那么他是否能以任何方式被(a)这个词项标示、获得规定？

(a)能够成为一个谓词吗？

这就是我今天留给你们的问题。我也已经向你们指明答案：它绝不可能以谓词方式被设立，最确切的理由就在于——否定绝不可能施加于(a)本身。

第14课 · 1968年3月20日

“每个人都是动物，除非他把自己‘称作人’〔se n’homme〕。”

我把这句话写在黑板上，是为了让你们进入状态，因为实际上我自己不大在状态。

这个小公式并不自称是思想。不过，它仍可能成为你们当中某些人的一个钩挂点、一个枢轴；例如，他们也许对我今天要说的话什么都听不懂，这并非不可设想。他们什么都听不懂，却不妨碍他们围绕某种东西遐想。我并不是在辱骂你们，我也不认为一般情形都是这样；不过我们就把它说成一个平均值吧！

任何一种自称具有思想性、或被当作具有思想性的陈述，总会产生遐想的一面；我们必须始终把它考虑进去，而且——为什么不呢？——给它一个小小的钩挂点。

例如，假设我的教导，也就是那些可能被当成已经思考过的东西，并没有……

正如许多远比我重要的人已经遭遇过的那样……留下任何后续。仍会剩下这样一些小东西。随后，它们周围就会发生某些事情。

动物界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动物群：昆虫纲的这些小动物，带鞘翅的生物。其中很多以尸体为食；法医学把它们叫作“死亡小队”。

大约有十个世代前来吃掉人类残骸所剩的东西。我说“世代”，是指不同物种在不同阶段到来。围绕思想残余开展的若干大学活动，大致就像这种东西：死亡小队。

已经有人开始忙活了，例如……

既不等我死去，也不等人们看见这些年来我在你们面前所说之事会产生什么结果……他们就开始测定：在我尽力用扫帚聚拢、以《文集》为题收集起来的东西中，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谈语言学；又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说的东西同雅各布森说过的东西重合。你们会看到，这一行当还会发展。

不过，我完全不认为这种运作应当归功于我的才华。我认为，这是一项颇有指向性的运作，来自那些被我所说的话直接触动、并且希望以此为业的人马上围绕我的陈述中能够以“思想”之名留下的东西大量繁殖的人。这样，他们就能提前尝到自己所期待的结果：我所说的东西——它未必是思想——对他们不会产生后果。瞧，这就是饲料！

不过，你们会看到，这同我今天要说的话确实具有某种关系。

我们当然仍在谈精神分析行动。归根结底，我为什么要谈精神分析行动？

这是对精神分析家说的。真正被卷入其中的只有他们。全部问题也正在这里。

今天，我进入一块显然并不适合如此广大听众的场地：精神分析行动如何能够运作，以实现我们将称作精神分析家之认同的东西。

这是把握问题的一种方式，它至少有一点值得注意：它是新的。我的意思是，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就什么使精神分析家取得这一资格，提出任何既有意义又稳固的分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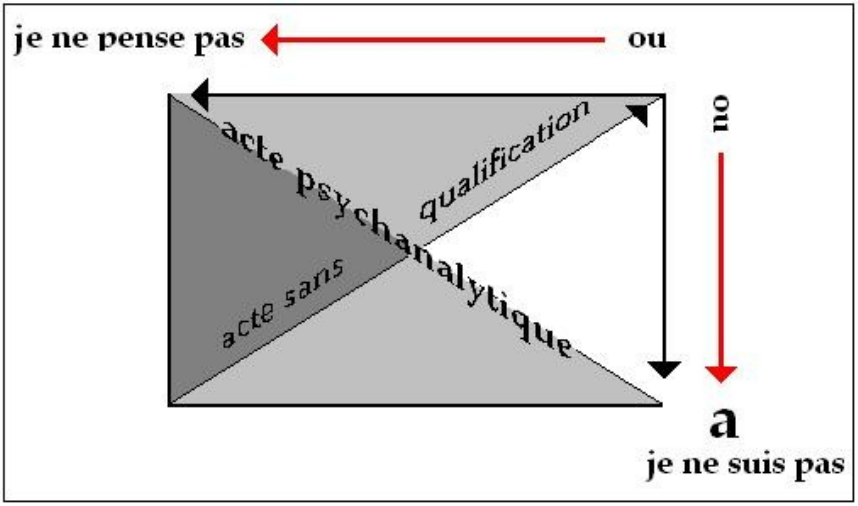
人们当然会谈规则、程序和准入方式，但这些仍然没有说出精神分析家是什么。

我谈精神分析行动这一事实……

我希望精神分析家所谓“资格”的问题，最终能够凭借它向前迈出一步……我竟被引到这样一群只有部分人同它相关的听众面前谈精神分析行动，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完全不是无解的；因为我又一次要标明的，是使这件事得到正当理由的东西，而不是制约它的东西……

制约它的是一系列位置效应；而我们今天的话语内部能够推进的内容，也许会使我们进一步明确它们……不过，无论制约条件如何，在比精神分析行动所真正关涉的精神分析家更广的听众面前谈论它，之所以正当，显然是因为：精神分析行动具有一种特殊性。

我还可以在黑板上多画几笔，说明那个著名四边形的情形。它从“要么我不思，要么我不在”出发，其中包含位于这里的“我不思”和位于那里的“我不在”。



你们知道，精神分析行动沿着这条轴线展开……

其终点是(a)的这一排出；它归根结底落到精神分析家身上，成为他的负担。正是精神分析家设定、容许并授权了行动的条件，而代价是他自己必须承担对象(a)的功能。

……精神分析行动显然就是给予这种支撑、授权将作为分析者任务而实现之物的东西；正是在精神分析家向这一行动给予授权的限度内，精神分析行动才得到实现。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群体效应、主体效应与分析家的去主体化

然而，这种行动极为独特：它的行程在某种意义上必须由另一个人走完。至少有一个被预设的结果：如果我们要追问行动究竟是什么，那么严格说来属于行动的东西，显然既不在这一条件中，也不在这条完全非典型的行程中——这条行程至少应当画在四边形上——而是在另

一条行程上。也就是说，当分析者主体抵达阉割的实现，即 -φ 之后，他将通过一次完成而返回到起始点：

- 事实上，他从未离开过这个点；
- 这是规定其地位的点，是选择的点：在“要么我不在，要么我不思”之间作出的被迫选择、异化选择……他本应通过自己的行动，完成那项最终由他实现的东西，即那个使他作为主体而分裂的东西。换句话说，他要在明知其理由的情况下完成一个行动，知道为什么这一行动永远不会把他自身充分实现为主体。

因此，精神分析行动以这种方式呈现。它引入行动的另一个维度——可以说，这种行动并不自行起作用——因而能够让我们稍微照亮另一种行动，也就是我刚才横着画出的、不加限定的行动；我毕竟不会把它叫作“人类行动”。

我不会出于种种理由把它叫作“人类行动”。开头那句用来钩挂你们的小短语已经可以让你们有所察觉：相关行动——那个不加修饰、我不予命名而且并不经常发生的行动——每次发生时，都会从原则上奠立人，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新奠立、重新熔铸人。

当然，我已经尝试给行动下过几个定义，好让人们知道自己在谈什么。尤其是：行动是一项能指事实……

当我们刚开始围绕它含混发声时，正是从这里出发……它是一项能指事实；所谓“主体效应”从言语中产生——当然是在语言中产生——并借此返回，而这种“主体效应”的返回具有彻底实施分割的作用。

这就是精神分析发现以挑战方式带来的新东西：它把主体效应本质上设定为分裂效应。这项分裂效应一经实现，某种东西便可能作为它的返回而发生，可能出现“再行动”〔ré-acte〕；正因此，我们才能谈行动。然而，精神分析行动却以极其独特的方式被设定，它同上述行动完全不同：精神分析使主体来到能够行动的位置以后，并没有什么会强制精神分析行动发生；也没有什么意味着这个如今已经被孤立出来的(a)……

这是在引导主体完成其精神分析的另一个人之活动下被孤立出来的；这次精神分析的行动使任务得以完成……没有什么能够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一跃迁……

也就是：分析者为何会承担那项使实现性的任务、即分析者任务得以进行的行动的什么？承担它的程序。

说到行动……

我先在这里插入一个简短而重要的反思性括号；它也关联到我开头谈一切思想之未来时所说的话……一切有秩序的思想都处在一处分岔路上，或从一处分岔路出发，而这条分岔在今天尤其清楚：它要么排除我所说的主体效应，又一次把它在一个自称原初的时刻同自身系在一起。Cogito〔我思〕在历史上的意义正是如此；cogito 是它的模型，而且可以说是诚实的模型：它之所以诚实，是因为它把自己设定为起源。

如果你们看到某人开始谈“起源幻想”[注1]，就可以知道他并不诚实。

> [注1] 此处可能暗指让·拉普朗什与让-贝特朗·蓬塔利斯：《原初幻想、关于起源的幻想、幻想的起源》，载《现代》杂志第 215 期，巴黎，1964 年 4 月。

只有 hic et nunc、此时此地的幻想才可以被把握：这就是幻想的起源。

等我们在那里找到幻想、与它同在之后，再来谈它。

至于 cogito，它并没有把自己设定为起源。笛卡尔从未在任何地方告诉我们："在起源处，思考者使存在涌现。"

他说："我思故我在。"从这里开始，一件好事已经办妥，不必再管它了。他彻底放开了科学的入口；此后，科学绝不会再关心主体——当然，只有在那个无法避免的极限上例外：过了一段时间，当科学必须发现自己究竟用什么进行运作，也就是数学装置以及随之而来的逻辑装置时，它会重新遇见主体。

因此，科学会在这套逻辑装置中竭尽全力把它系统化，同时避免同主体打交道；不过，这并不容易。

事实上，主体效应只会在科学的逻辑边界上继续令人感到自身、使自身在场，并给科学制造一些困难。但除此之外，由于 cogito 的这项最初步骤，可以说一切都已经交给了科学，而且总体上是正当地交给了它；一片取得巨大成功的场域已经完全落入它手中。

但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是：科学对于行动主体完全无话可说。它不强制任何行动；它使人能够做许多事情，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做一切。科学能做它能够做的；它不能做的，便做不到。

不过，科学能够做很多。它能够做很多，却不为任何事情提供动机；更准确地说，它不给出采取任何行动的明确理由。它只以"去做"的诱惑呈现——诚然，这种诱惑不可抗拒。

我们凭借科学三百年来取得的成果所能做的一切，绝非无足轻重；我们也不会克制自己不去做。但完全不能保证会有任何行动与之相称。在涉及行动、涉及作出决定、涉及明知其理由地使用这些成果去实现看似有动机的目的之处，所涉及的是完全另一种思维方式。

这就是分岔路的另一支：思想在这里投身于行动的维度；为此，它只需触及主体效应。

举例来说，有一项教义提出了根本性观察——我想，你们不难认出它：主体在制约其劳动的生产秩序中认不出自己，也就是发生异化；这是由于一种名叫“剥削”的主体效应……

不必再加上“人对人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里对“人”必须稍加提防；而且人人都知道，这种说法已经被转成几个有趣的俏皮话……因此，正是由于构成剥削基础的这一主体效应，行动的后果才会发生：人们把它叫作革命。

在这些行动后果中，思想极难辨认自己。我想，自你们存在以来，这一点已经得到证明……

对你们中一些人来说，它甚至在你们出生前已经开始……所谓知识界同共产主义秩序之间曾有、并且仍然有的困难，就是证明。

因此，凡属触及主体效应这一类别的思想，都参与行动。把它表述出来，也就可以说指明了行动及其参照。只是，在行动尚未发动时，这种参照当然很难维持，因为人人都知道，它只有到终点才被孤立出来。过去一切曾经形成学派的思想……

例如斯多葛学派，就像这样被钉在大学植物标本集里的东西……都以行动为目的。有时，它会半途而止……

我的意思是，例如在我刚才提到的循环中……我们时代以“革命”一词标示的行动，结果尚未出现。

这种对行动的参照尚未被孤立出来，也无法孤立。不过，至于我刚才提到的斯多葛派，事实是它半途而止了：到某个时候，除了已经从那些投身这条思想道路的人那里得到的东西，人们再也提取不出什么。此后，我刚才所说的食尸活动便可以开始。谢天谢地，它也无法永远继续下去，因为斯多葛思想留下的残骸和碎片并没有那么多。但不管怎样，它仍使一批人有事可做！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精神分析行动，重新取用黑板上这个小小的十字形。我已经多次提醒：

- 你们不应赋予其中的对角线以特权价值；
- 为了形成正确观念，你们更应把它看作某种透视中的四面体。

这会帮助你们看到，对角线在其中不享有任何特权。精神分析行动本质上存在于这样一种主体效应中：它可以说通过分配那个将为它提供支撑的东西来运作，也就是分裂主体 S；因为这正是分析者任务终点处主体效应的所得。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行动：授权分析者任务与主体变异 · 群体效应、主体效应与分析家的去主体化

这是真理由主体赢得之处——无论他是谁，又以何种缘由投身其中。例如，对那个为了得到缓解而来的最普通主体来说：“这就是我的症

状；现在，我得到了它的真理。”我的意思是：正因为它完全不是“我原先以为的自己”，正因为主体的这个位置中存在某种不可还原之物……

这种不可还原之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字：不可能知道全部……我才在这里。谢天谢地，症状揭示了知识所回响的主体效应中仍被遮蔽的东西；这个遮蔽物为我揭开了，但当然没有完全揭开。

这项知识中仍然留下某种不可还原的界限。

其代价——既然我谈到了分配——就在于：全部经验都围绕对象(a)旋转，而分析家把自己变成了它的支撑。对象(a)是主体分裂的成因：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并在结构上始终如此。

对象(a)的存在正是在分析者任务中得到证明……

怎样证明？你们全都知道：在转移效应中！……伙伴之所以填补了由行动设立的结构之功能，是因为主体从一开始就作为主体效应起作用，被卷入要求并设立欲望，而且由那些被分析标示为滋养对象——乳房、排泄对象——粪块、凝视功能与声音功能的功能所决定。在分析关系中，这些功能被分配给那个作为伙伴、枢轴，归根结底作为支撑的人——正如我上次说的，作为工具。正是围绕这些功能，S 的功能之本质、即知识的不可能，才得以实现。

我是否应当在这里唤起这种分配同悲剧行动之间的类比维度？因为我们清楚地感到，悲剧中存在某种类似的东西。悲剧虚构通过神话学得到表达；而我们完全不排除在神话中看到一些真正具有历史性、经历过、实在发生过的作用。我的意思是，英雄……

任何在行动中独自投身的人……都注定最终只成为自己事业的废弃物。我不必给出例子；仅凭我称作虚构或神话的层面，就足以充分指明这一结构。

但无论如何不要忘记：我们不能把悲剧虚构……

我指的是俄狄浦斯、安提戈涅等神话……同真正构成悲剧的一种含义混淆；后者也是唯一有效、有根据的含义，即“大写之物”的再现。

在再现中，我们显然更接近分析者任务所支撑的这种分裂。在精神分析终点，分析者主体实现了分裂；我们可以用最纯粹悲剧再现得以上演的场域中那项分裂来支撑它。我们可以把分析者认同为由“观众”与“歌队”组成的、既分裂又相互关联的一对；与此同时，英雄……

不需要有三十六个英雄，从来都只有一个……英雄就是舞台上那个无非作为废弃物形象的人；任何名副其实的悲剧都在这幅形象上闭合。

这种结构类比如此显而易见地笼罩着一切，正因如此，它可以说大规模来到弗洛伊德笔下，也正因如此，这项类比萦绕着全部分析意识形态。然而，它产生了一种近乎荒诞的过度效应；所谓“分析”文献也由此显露出彻底无能：它们围绕这项神话参照，除了进行一种极其贫瘠的原地重复，再做不出别的事情。即便偶尔感觉到这里存在某种分裂，却仍看不见使我们无法与之相称的根本不足究竟在哪里。

有些人被这一点打动；被打动的还不算最糟的人。但结果真的不会比吠叫走得更远。不要忘记俄狄浦斯，不要忘记俄狄浦斯是什么，也不要忘记它如何“内在地”、完整地同我们全部经验的结构相连。作出这番提醒以后，也就不必再走远了。

也正因如此，我曾发誓不再重提父之名的主题，并不认为这会损害任何人。我一度被某种说不清的眩晕攫住——所幸很快退了下去——竟对自己说，要用整整一学年的研讨班来走完它的回路。在这一层面把握事物是毫无希望的；而关于主体效应，我们另有一条可靠得多、并且关联于逻辑的道路可以勾画。

如果我把你们带到这个严格属于逻辑的效应之交叉口——现代逻辑以量词功能这一术语极好地界定了它——显然是出于一个同我宣布的今日问题十分接近的理由：精神分析行动同某种谓述秩序之间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究竟是什么——我们能说什么——定位了精神分析家？

不要忘记，如果某种叫作精神分析家的东西能够在一次主体分裂的经验终点被设立，我们就不能依赖一项单纯的词项认同，也就是构成能指定义之原则的那种认同：“每一个能指都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

问题恰恰在于：无论哪个能指，都不可能是代表主体的全部。

恰恰因为——正如我上次向你们展示的——在我们标示的功能中，一切都源自一个无非就是对象(a)的成因。这个对象(a)落入间隔，可以说使那种互补性发生异化——我上次已经提醒过你们——即由能指代表的主体 S，同无论哪个能够在大他者场域中被设立的 S、谓词之间的互补性。

因此，由于这一效应，陈述中的“所有”所关涉的，完全不同于认同不会走向的那个方向，即来自大他者的辨认。因为问题正在于：我们在大他者场域中能够写下的关于自身的一切，都无法使我们辨认自己。

在这项对辨认的呼唤中，代表我们的“所有”原本可能同这个空、这个凹口、这个缺失有关。然而事情并非如此。每当我们说出任何全称命题时，都必须设立这个“所有”；在其设立原则上，除了它所遮蔽的那项不可能——即使自己得到辨认的不可能——还有另一种东西。

这一点已经在分析经验中得到证实。我会把它简洁地分节出来，因为它具有示范性：性并非全部，因为这正是精神分析的发现。人们尽可以不断推出各种文集，派人收集一些关于那个受到如此奇异保护和保留的著名场域——精神分析——的文本。

人们给一位名叫布朗的先生发研究津贴；他早先写过一本不算太差的《爱欲与死亡》。[注2] 他借此就路德先生说过一些颇有道理的话；既然这一切是为了卫斯理大学的利益，倒也相当说得过去。

> [注2] 诺曼·O. 布朗：《爱欲与死亡》，巴黎，Julliard 出版社，1960 年；Love's Body，纽约，Random House，1966 年；法译本《爱的身体》，巴黎，Denoël 出版社“Les lettres nouvelles”丛书，1967 年。

但是，这种汇编运作后来完全失去了尺度；他出版了一本名叫……的书。

《爱的身体》，而有人在介绍它的短评里向我们谈起弗洛伊德的泛性论。[注3] 然而，问题恰恰在于……

> [注3] 该书封底文字摘录如下：“本书由一系列并置的短篇思考构成，作者的根本追求从中逐渐显现：一种泛性论式的世界乌托邦愿景，它调和弗洛伊德与尼采、人与自然、理智与本能。”

如果弗洛伊德说过的话有什么意义，那当然在于它提及了人们期待由性结合产生的东西，即一种联合、一个“全部”……但经验终点处强制

显现的恰恰是：在我向你们指出并让你们听见回响的意义上，性并非“全部”。

“全部”来到性的位置，但这完全不意味着这个位置就是“全部”的位置。

“全部”篡夺了这个位置，可以说让人误以为“全部”本身来自性。

真理功能就这样改变了价值——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而且这同逻辑场域中的某些发现贴合得相当好，颇令人鼓舞。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它让我们切实看到，“全部”、作为“全部”的功能、量词“所有”、全称功能，都必须被设想成部分的移位。

正因为只有对象(a)为“所有”之功能本身提供动因并使之涌现，我们才会在逻辑中受制于“所有”这一范畴；与此同时，也由此可以解释若干使它在全部逻辑运作中被单独分离的奇异性——我是指量词装置占统治地位的场域——这些奇异性使特殊困难与古怪悖论在其中出现。

当然，让你们中尽可能多的人具备一定的逻辑素养，是十分有益的。我这样说既针对每一个人，也针对全体。我的意思是：

- 在这里，没有任何人会因为前往那些地方，围绕当代逻辑进展已经构成的场域接受训练而有所损失；
- 为了听懂我正在尝试的事情，你们前往那里接受非常具体的训练不会有任何损失；我试图勾画一种在中间区域运作的逻辑，因为这一区域尚未得到恰当处理。

当我说量词逻辑虽然已经取得自身严格而且真正完全严密的地位时，如果你们能把握我所指之事，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的意思是，它看来已经把主体完全排除出去，可以只凭字母操作的纯粹规则来运用……然而，如果你们把量词逻辑的用法同逻辑中以不同术语界定的其他部门、区段比较，就会发现它非常独特：对所有其他逻辑装置，你们总能给出若干种解释……

例如几何的、经济的、概念的解释；我的意思是，每一种逻辑装置的运用在解释上都完全是多价的……相反，量词逻辑无论最终被推进到多么严密的程度，都无法从中减去某种写在语法结构、也就是日常语言中的东西；这个东西使“所有”与“某些”的功能介入。这一点极其醒目。

这件事具有一些后果，而只有在逻辑学家那里，其中的任何一项才能得到凸显——我是指懂得使用推导的地方。也就是说，凡是我们维持一个涉及量词用法的系统或装置，就无法创造这样一种算法：只要预先规定好一条固定的计算规则，所有问题就能单纯服从这条规则。一旦进入这一场域，我们总能让不可判定之物从中涌现。

相关知识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条件与边界 · 奇完全数问题与“不可判定”的区别

这是一项奇怪的特权。这里若有人从未听说过不可判定性，我会用一个小例子说明我的意思。不可判定是什么意思？对于那些会觉得我下面说的只是老生常谈的人，我先表示歉意。

相关知识卡 奇完全数问题与“不可判定”的区别

我举一个例子；这样的例子很多。你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什么叫完全数：一个数若等于其全部真因数之和，就是完全数。

相关知识卡 奇完全数问题与“不可判定”的区别

例如，6 的真因数是 1、2、3，而 1 + 2 + 3 = 6。28 也是如此。

相关知识卡 奇完全数问题与“不可判定”的区别

这里说的不是素数，而是因数；也就是说，给定一个数，可以用哪些数把它等分？28 的真因数是 14、7、4、2、1，加起来正好是 28。

相关知识卡 奇完全数问题与“不可判定”的区别

你们看到，这两个数都是偶数。这样的数我们知道很多，却不知道任何一个奇数完全数。这并不意味着奇数完全数不存在；关键在于，我们无法证明它不可能存在。这就是不可判定之物。它同量词结构及其逻辑功能之间的联系，不是我在这里负责让你们切实掌握的内容；勉强说来，可以把它留给封闭研讨班。我会请一位比我更以此为业的人同我一起讲解。

相关知识卡 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条件与边界 · 奇完全数问题与“不可判定”的区别

不过，量词功能的这一特权同我们关系极为密切，你们马上就会看到。这项特权……

我提出——暂且称它为一项假设……这条死路其实是一条富有成果的死路，请注意这一点；如果我们还抱有一丝希望，以为一切都能服从某种普遍算法，以为对任何命题都能判定其真伪，那反倒是一种封闭……我提出的假设是：量化功能的这一特权，来自“所有”的本质及其同对象(a)之在场的关系。

有某种东西在起作用，使得：

- 每个主体都相信自己是“全部”；
- 主体相信自己是“全部的”主体；
- 并因此相信自己是“全部”之主体；
- 从而自认为有权谈论一切。

然而，分析经验给出的是：没有任何主体的总体性不是幻觉，因为这种总体性属于遭到省略的对象(a)。

现在，我们要努力说明这一点，并展示它为何以最直接的方式关系到我们。若不说“并非一切知识都是有意识的”，我们还能怎样正确表达严格属于分析的维度？

由“对于所有……”〔∀〕与“存在……”〔∃〕引入的歧义、问题性和根本分裂在于：它承认、却也同时质疑这样一点——如果我们说：“并非对于所有……后续命题……事情都以某种方式成立”，这就意味着，在这个“所有”中存在某些“不……”的东西；因为，如果“对于所有”并不为真，那么“有些”就“不……”。

换句话说，仅仅因为否定施加于全称，某个特殊者的存在就会涌现。

同样，因为“并非全部”受到“不”的作用——而且这是更强的一步——便得到人们所谓的“有些……”，从双重否定中使某个肯定的特殊存在涌现：一个从“所有”那里被撤去的真理，因为并非如此，竟会让一个特殊存在出现。

可是，仅仅因为尚未证明“所有……某物”，就足以断定存在某种“不……”的东西吗？

你们清楚地感觉到，这里有一块礁石。这个问题本身就足以使否定的这种用法变得十分可疑：仿佛仅凭否定，就足以保证全称与特殊两种相互对应的功能之间的联结和连贯性。

就知识而言，既然“并非一切知识都是有意识的”，我们便再也不能把“知识知道自身”视为根本原则；但这是否意味着，说“有无意识存在”就是正确的？

我收入《文集》、题为《无意识的位置》的文章，正是试图让人感到这个问题。我在那里使用了当时所能使用的手段，也就是一个小寓言；它不过是用一种形象来表现问题，而且如果我没记错，我还把这种形象叫作……

因为我很喜欢拿“人”这个词做游戏……“人薄片”〔l’hommelette〕，而它无非就是对象(a)。

当然，未来的某位学究可以借此想象：我写《无意识的位置》时对逻辑连一点影子都不知道。仿佛我的话语秩序并不恰恰在于使它们适合某一听众——而这种适合还不完全，因为我们很清楚，在特定时刻，精神分析家的耳朵能够接纳什么、又不能接纳什么。

至于资格问题，围绕 ἐπιστήμη〔epistēmē，知识〕展开的建构性反思，早已在一切知识问题上质疑实践者的地位。在柏拉图那里，每当需要保证一项知识的地位时，占优先地位的都是对工匠的参照；而且，似乎没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宣告：一切人类实践……

我说“实践”，因为我们使行动占据优先地位，完全不意味着要排除对实践的参照……如果我们要在 ἐπιστήμη 的问题上向前推进，那么每一个实践者都预设某种知识。一切木工知识，将为我们界定木匠。

这暗中意味着，木工术作为技艺知道自身——当然，我不是说作为材料……对我们分析家来说，这会延伸为：一切治疗知识都赋予治疗者以资格；而这又以一种更为可疑的方式意味着，治疗术自己知道自己，或者自己完成自己。

然而，如果有什么是精神分析家最——原谅我，我还是说出来吧！——本能地排斥的，那就是“一切精神分析知识都赋予精神分析家以资格”。这种排斥并非没有理由。它当然没有因此让我们更多知道精神分析家是什么；但精神分析的全部知识都悬置在经验对对象(a)的参照上，而对象(a)在终点被彻底排除于主体的任何存续之外。因此，精神分析家绝无权利把自己设定为那项经验的总结者；严格说来，他无非是经验的枢轴与工具。

在这里，一切依赖对象(a)之功能的知识当然都不保证任何东西。它只能通过对这一工具作用的参照，为自己的总体性作出回答；这固然意味着，不可能有任何东西作为这种知识的“全部”呈现。但这种缺席、这种缺失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可以由此推导出精神分析存在，或推导出精神分析不存在。

否定在“所有”层面的反射与回弹，并不在特殊者层面蕴涵任何后果。精神分析家本身的地位，只建立在这一点上：他主动承担在某种知识进程中，支撑要求对象与欲望成因的角色。因此，获得的知识只能按其本来面目来把握：一种同幻想揭示相接的能指实现。

如果我们放入“并非一切知识都是有意识的”中的“并非一切”，代表“全部知识”并未构成——而这正发生在知识自身成为必需的层面——那么，并不能因此断定必然存在无意识知识，更不能随意套用任何逻辑模型，把它定理化。

分析者在其任务终点之所以成为他所是的，是为了精神分析家吗？有一整套理论陈述方式由于蕴涵着一种思考方式，把这个作为寄生物介入的因素放进了精神分析活动。

精神分析家掌握着应当如何看待整件事的最终答案，也就是说：

- 是他拥有关于整件事的思想；
- 分析者到最后会被调整到规范状态。这意味着，他把某种主体结合设定为“存在”，再次安歇在一个得到更新的“我不思”之上，只不过这个“我不思”已经从受限形式过渡到普遍形式。

事情真是如此吗？从来不是！

精神分析家明明凭经验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点，却会开始以这种“科幻小说”——这里正适合这个词——的形式设想自己从经验中得到的果实；这并非只是一个谜。

那么，分析者的行程是在“自为”的秩序中结束的吗？

无意识原则本身同样反驳了这一点。主体不仅注定保持被一种思想所分裂——这种思想不能由任何“我在”来承担，它思考并设定“我思”的一个“自在”，而这个自在无法被还原为任何为自身思考它的东西——而且，恰恰到精神分析终点，主体才实现自己是由这项分裂构成的。在

这项分裂中，每一个能指因为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都包含一种可能：它在实施这种代表时可能无效，可能作为代表者而失灵。

不存在“受分析者”；只存在“曾经作为分析者的人”，而结果只是一个“得到警示的主体”：他已经获知，自己不可能把自身思考为自己一切活动的构成者。对于这个“得到警示的主体”应当是什么，我们尚无任何现成类型；只能依据一项有待建构的行动来判断他：

- 在这项行动中，阉割通过重演自身而被设立为付诸行动；
- 与它互补的分析任务本身，则通过在升华中取消自身而重演。

但这仍没有告诉我们精神分析家的地位；因为说到底，如果他的本质是承担对象(a)在这项运作中所处的位置，那么，一个把自己放进这一位置的主体能够具有怎样的地位？

处于这一位置的精神分析家，可能对我刚才展开的一切——也就是制约这一位置的东西——毫无概念；例如，他可能对科学毫无概念，这甚至很常见。

事实上，考虑到他所占据的场域以及必须在其中履行的功能，甚至没有人要求他具备这种概念。

相反，他倒有许多东西可以从科学的逻辑支撑中学习。

不过，如果我在谈到他时援引了各种实践者的地位，那么是否可以排除：在这些地位中的某一种里……

自古以来，它们就在对科学的反思中被我们唤起，而且至今仍存在于若干场域……某种只有借助精神分析之光才能得到界定的东西，是否对他具有某种作用、某种价值？也就是说，在某项实践功能中，它能否被界定为“挖空”，能否凸显对象(a)的在场？

为什么我在关于《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的那一学年末尾，如此强调透视法的功能？[注4]

> [注4] 实际上是在 1965—1966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中，拉康围绕委拉斯开兹的《宫娥》长篇讨论透视法；参见 1966 年 5 月 4 日、11 日、18 日、25 日及 6 月 15 日各课。

它看起来只是一套理论、一项仅与建筑师有关的运作；但它其实是为了表明……

即使建筑师自己并非从来就把它单独分离出来——我是指从那个我们不太知道如何说明其主导理想的时代开始，例如维特鲁威留给我们的那些语法式规则[注5]……真正涉及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东西，并不是建造等实用功能。考虑到那些理想的在场，若把它还原为实用功能，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 [注5] 马库斯·维特鲁威·波利奥（约公元前 50 年）：《建筑十书》，这是古代唯一的建筑理论著作，曾被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广泛使用和解释。全书共十卷，由克洛德·佩罗译为法文；1673 年初版，1965 年由 Balland 与 Les libraires associés 重印，并附 André Delmas 的重要序言。

占主导地位的是另一项参照：我曾在透视法随笛沙格而抵达自身结构的层面时，试图向你们说明它同主体效应的关系；也就是当透视法设立另一种名为射影几何的空间定义时。[注6]

> [注6] 吉拉尔·笛沙格（1593—1662），法国工程师、数学家，以关于透视法与圆锥曲线射影几何的研究闻名。

视觉场域本身由此受到质疑。乍看之下，它似乎完全可以由一种网格化运作来支撑；然而，其中反倒出现了一种闭合结构。我正是从这一结构出发，试图为你们从其他功能中单独分离并界定……

因为它是精神分析功能中最受忽视的一种……那个名叫凝视的对象(a)之功能。

同一学年结束时，我围绕《宫娥》这幅画向你们作过一番无疑艰难的阐述；它应当被当作寓言、例子和精神分析家的行动指引。这难道毫无缘由吗?

因为，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之幻觉，始终围绕着整个视觉场域中那些极易得到承认的东西。

相反，我曾试图围绕《宫娥》这一示范性作品，向你们展示其中写入的凝视功能，以及它必须怎样以极其微妙的方式运作——既在场又被遮蔽。正如我曾提醒你们的，这项功能质疑的是我们这些观众的存在本身：相对于画面场域中建立起来的一种再现秩序，我们的存在可以说被还原成了一道影子；而这种再现秩序严格说来同任何主体能够向自己再现的东西毫无关系。

这难道不是一种范例与模型，使一项关乎精神分析家最切身位置的训练得以展开吗？

在我刚才试图向你们描述的那种奇特虚构再现中，精神分析家最终面对自己所谓的临床经验停了下来；这难道不正是他屈服的陷阱？

他难道不能在这里找到一种提醒和标志的模型：他无法设立自己经验世界中的任何东西，而不必在其中使自己凝视的功能本身作为这种功能而在场？

当然，这只是一项提示；但正如我经常在某次话语结尾所做的，这是一项远为超前的提示。它源于这一点：如果在精神分析中……

我指的是在精神分析得以实行的诊室四壁之内所进行的运作……对象(a)的一切都被置于运作之中，那么对于凝视而言，却带着一种非常独特、绝非偶然的保留。

今天分别以前，我想在这里指出：

- 对象(a)在这里取得的独特重音；
- 它对否定具有的某种免疫性。这或许可以解释，精神分析终点处为何会作出通向精神分析行动之设立的选择；也就是对象(a)中那种不可否认的东西。

请注意这种否定的差别。在谓词逻辑中，当否定作用于“非人”时，情形仿佛“非人”存在；但它至少可以被想象、得到支撑。

- “我看不见”——否定可以成立；某种不清楚的东西——无论是我的视力有缺陷，还是照明不足——为否定提供了动因。

- 但是，“我不凝视”这句话，难道仅凭自身就会比任何其他言说行为产生更多互补对象吗？

我的意思是，不论我凝视这个还是那个：“我不凝视”，恰恰表明那里有某种不可否认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凝视它。

对象(a)的另外四种形态也是如此；它们会体现为：

- 对乳房而言，是一句“我不摄取”；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这个召唤如何在神经性厌食的层面实现乳房；

- 是一句“我不放手”；我们知道，在欲望那具有构成作用的吝啬层面，这意味着什么。

- 在我今天要说的话结束时，是否还要唤起我们从“我不说”中听到的东西？人们通常把它听作：“我不说不。”你们自己也是这样听“我不说”的吗？

第15课 · 1968年3月27日

这次研讨班在我看来完全没有处于不利条件〔原文如此〕。人数减少，肯定有利于我想做的事情：让这里交流几个问题，也许还有一些回答或澄清。人数少大概出于各种原因，包括假期将近、考试季到来以及许多其他因素。只能遗憾的是，我的学派中一些参加研讨班的资深成员今天不在；我希望他们还会露面，因为我想让他们投入行动。但如果他们不来，我们也可以没有他们。

怎样进行呢？我曾请大家提出问题，现在已经收到若干封回信。

我们可以读其中一些；我收到的相当多，所以必须选择。苏里先生在吗？

我先读他的信。

- “您把能指的效应同某种后果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这确实是在引用我的一句话——我不知道大家当时是否都记住了。我没有时间核查自己是在什么时候、针对什么情形说出它的，不过这不太重要。

我大概是在一次讲演开头强调了“后果”一词——也许是在回应某个已经隐约出现的反驳——并且为了赋予它一幅传记性的图像而强调：我们作为自身经验之见证所提出的东西，其本质就在于，“事件会在其中产生后果”。

可以肯定，我当时提出“后果”这个词时，必定也带上了它从一切反思所获得的含义，以及它为我们使之在场的东西：只要我们被教导去反思，就会发现，我们能够把握的“后果”概念本身，同逻辑续接的功能相连。

首先会产生后果的，是一段话语的分节，以及它所包含的续接与蕴涵。

可以说，我们最初把握到“必然”的场域，就是逻辑必然性的场域。

我们一旦说出某件事，就会牵出后果；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在某个措辞转折、落点、结论、收尾和作结方式上抓住我们。这内含于话语本身。

你对我说：

- “不，‘后果’也可以用于时间上的相继、用于决定论对象……我不太明白你所谓‘决定论对象’是什么……还可以用于动物生命……”

你随即举例来分节自己的意思：

- “撞击的后果，是粒子获得了动量……”

是的……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后果”一词最好的用法。我们会尽可能把撞击效应，即动量传递，翻译成尽量少牵出“后果”的公式；“后果”会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出现，我们会谈到它。至于撞击传递定律，即活动与反活动的效应，我们更会说：从必须谈论这一切的时刻开始，它才会牵出后果。

换句话说，在受到分析、可以分析的经验中，真正牵出后果的东西，完全不在只能由动力功能来设想的效应层面，而在另一种效应维度：问题在一个能够定位为语言后果的层面被提出。

换句话说，正因为一个主体从未以任何方式分节出某种首要之物，他后来才努力赋予它——我甚至不说意指或意义，而说严格意义上的分节。这种分节不在别处完成，只在一条能指序列中完成；而从序列中建立起切分的时刻开始，它才取得更精确的形式与“后果”的重音。

分析经验整体正是在这一维度中移动。它所关注的当然是各种会在完全不同于纯粹话语的层域中产生效应的东西；但只有当产生效应的运动被纳入这种语言分节时，它才令我们感兴趣、向我们提出问题，并使我们能够在可分析场域中把握它。

根据这些分节的持续时间、持久性，以及它们附着于这种分节努力中持续并维持之物的效应，我们确实可以间接测量另一个场域——也就是实在力量的场域——中发生了怎样的移位。但我们总是通过某个后果之结、某个能指后果和能指分节之结，才把握到相关之物。

当然，这完全不能自称已经足够。不过，既然你似乎没有被我当时只想用一道闪光在这一层面照亮的东西触动，我就说明一下：“后果”一词正是在逻辑层面取得其真正范围、回响与日常用法；正因为这里涉及重新接续一项逻辑工作、一项逻辑加工，我们才面对某种可分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

当然，只有因为我们能够把事情推进得更远，为我称作主体效应的这些效应给出一项几乎真正赋予其地位的表述，以上说法才能成立。但

这只是一番提醒。我这样说，是为了重新唤起注意力，让耳朵适应一段话语的火力。

接着，你仿佛把下面这句话当成有说服力的分节：“一个孩子是一次交配的后果。”

从逻辑上看，“后果”一词的这种用法值得怀疑。谈到这件事时，你会提醒某人：无论如何，必须对自己行动的后果稍有预见。你之所以这样说，恰恰因为你已经进入伦理层面。在产科医生的层面，你不会把妊娠说成交配的后果；这样说显得多余。

随后，你又加上几条不再同我的课程有关、而属于你个人的评论。

我还是把它们读出来；毕竟，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提。

- “数学被挪用成蒙昧主义，因为在能指操作中的严格性，大概成了能指使用中缺乏严格性的托辞，例如社会分类、工资指数、考试分数和统计。定义与证明的内部链条被转化成讲演——一场讲演的泛滥。现代数学及其结构使人能够表述上述的不严格之处，但这种可能性没有得到使用。”

你这是什么意思？

皮埃尔·苏里：

我的意思是，当代数学能够表述数字使用中的滥用。若要说明这种蒙昧主义用法，一个例子就是课堂上的零分，它取代了从前的“笨蛋帽”。现代学校不再给人戴“笨蛋帽”，而是打零分。零来自数字，因而分享了数字的威望以及数字严格性的威望。

源于这项传统的零，怎样变成教师手中的一种侮辱、一个用来羞辱学生的标签？令人惊讶的转变就在于：数字，尤其是零，本来是一项严格性的创造，怎么会变成对学生的侮辱，变成一种比真的戴上“笨蛋帽”还更受尊重的“笨蛋帽”？

拉康：

你认为，我们必须引入现代数学，才能反对零分的使用，或围绕它提出几个问题吗？你的话里让我感到有趣、也给我启发的，是一些人们确实不会想到的历史小问题：课堂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零分？

我们需要这方面的历史证据。很明显，只有从零开始在数学中发挥作用以后，课堂上才可能打零分；而人人都知道，这只能发生在阿拉伯数字被采用以后。也就是说，在罗马学究的时代，人们不会打零分，因为零并不存在。

人们从何时开始采用零到二十分的评分制，或许很有意思。不过，你把自己对零分作为武器的反感，扩展到某种数学使用中内在的东西，在我看来有问题。

皮埃尔·苏里：不是内在的。

拉康：

但你毕竟提到了现代数学的维度。其实，我以为你的评论更接近我曾提示过的另一点：不是说这些结构使我们能够表述不严格之处，而是说，在这种数学的逻辑中，我们看到数学自身的发展迫使它加工自己的逻辑。我们面对的是逻辑自身内在的结；而对我们来说，它们可能

回响着另一个东西：在我们的场域、即分析场域中，我们必须加工出一种逻辑、一种必然不同的层域，因为它应用于完全不同的秩序……总之，不要在这里耗费太久。

我再取其他问题。鲁德劳夫，你愿意从写给我的内容中作个简短选择吗？

雅克·鲁德劳夫：

其实，我重新取用了您的一个公式。我记得——至少我是这样经历的——您曾批评有人把“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这个公式作了某种倒置。有人说：“为什么不能说语言像无意识一样被结构起来？”您明确回答，逻辑要求我们从已知走向未知，而不能从未知走向已知。对我来说，这种倒置提出了如何理解公式本身的问题：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就是预设语言为已知，而无意识为未知。

可是，我们看见无意识仿照这种语言——而且是哪一种语言？——被结构起来；这种语言真的已经被如此彻底地认识了吗？我们援引的无意识又真的如此彻底地未知吗？

在后来一次研讨班里，您说过一些在我看来……您说：“我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并不意味着我知道这一点。”这显然提出了分析家的知识问题，或通过逻辑分节、借助逻辑分节而取得的认识问题。

但所有面对分析问题的人，也都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发生了什么？病人知道什么？病人与我们自己从这个名叫无意识的 X 中学到什么？

归根结底，为什么把它叫作 X？为什么我在这里通过 X，也就是通过数学语言或数学图形，来结构化无意识？

拉康：

X 本身并不是同“未知”相等价的表述。只有小说语言才把某个“身份不明者”叫作 X 先生或 Y 先生。数学中 X 的用法，完全不是用来表示“未知者”。

X 表示所谓变量。这不是同一回事。

雅克·鲁德劳夫：在一道给定的问题中，X 等于未知数——小学生的语言就是这样说的。

拉康：

好吧，把 X 放在一旁。我认为自己从来没有用 X 指称无意识。你说得很好：无意识若不完全是未知的，那么至少对最初的我们来说，它作为无意识的功能显然比语言远为不熟悉；这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我并没有因此把它等同于数学中字母通常承担的功能。

相反，你把两件显然完全可以并置的事情放到了一起：我首先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与“语言像无意识一样被结构起来”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因为第二句话完全没有任何后续。有人——而且离我相当近——曾用一种尖锐得多、更会牵出后果的方式来表述：无意识的秩序可以构成语言之可能性的基础。这种说法比前一种要求更大，也可以说更加危险。它并不因此少一些薄弱，却更具渗透性。

另一方面，当我说，我可以把自己立场中那一整块并非知识的部分，纳入我的教导所处的维度与进程时，这是一项纠正。它不只是一项纠正，而是试图纳入这一点：当涉及分析家时，可以存在一种不以如下原则为支撑的教导——仿佛某处有某种东西能彻底裁定问题，也就是存在一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我说，我们确实可以从这个公式出发，在这项教导中前进，而不意味着我们自己也必须进入我严格称作“教授式”的位置。那个位置始终省略一点：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仿佛就在那里，真理仿佛已经位于某处。

既然你已经作出这个我表示接受的并置，那么你的评论最终指向哪里？

雅克·鲁德劳夫：

如果按我写下的文字重新表述，我想指出的是：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乍听之下就把无意识表现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场域。按照您的另一个公式，它存在于——谁知道它以前？这又把我们引向其他可逆公式，并让我们追问：无意识是像什么一样被结构起来的？

我们可以说：

- 无意识像症状一样被结构起来，因为我们在寻找症状的精神分析意义；
- 无意识像梦一样被结构起来；当然，我们可以说梦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
- 无意识像儿童的一幅画一样被结构起来……

拉康：

若只质疑“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走不了多远。我向你保证，人们有更多理由质疑“梦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梦之所以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恰恰因为梦是通往无意识的王道；但梦本身并不等于无意识。它是一个还具有许多其他维度的现象，并不只作为通往无意识的王道而存在；我们可以用不同于谈无意识的方式来谈梦。

甚至令人遗憾的是，人们从梦中分离并提取出它同无意识的关系以后，没有更多关注梦这一现象。梦还有各种值得解释的维度。

当我看见某个人物……

所幸他写在一份默默无闻的刊物上，免得我不得不花太多力气同这种实在可悲的反驳方式作战……这个人物列出若干特征，并以如下方式赋予它们一贯性：他所谓梦的工作所产生的一项效应，是对某种东西施加暴力；然而到头来，他完全不否认给定材料属于语言。他所说的是变形，并以极为粗略的方式把变形联系到作为梦之特征的欲望作用。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在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中东找西找，为自己的评论找到支撑。但不能说，他触及了问题的根本。

我完全不否认，在梦中，语言……

哪怕只是出于 Rücksicht auf Darstellbarkeit〔对可表现性的顾及〕[注1]，出于再现之必要性必须得到的顾及，以及其他许多东西……会承受极为重要的变形、建构和扭曲。我非但不否认，试问谁会想到否认？

> [注1] 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法兰克福：S. Fischer，1987 年，《全集》第二 / 三卷第六章“梦的工作”，第 344 页；双语版见《La Transa》通讯第 2 期，1983

> 年 4 月，第 8—41 页；法译本《梦的解释》，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3 年，“对可表现性的顾及”，第 384—394 页。

如果梦令我感兴趣，是因为隐喻与转喻的机制首先在梦中显现——我这样确认它们，因为它们强制显现；而这恰好发生在梦作为通往无意识之王道的限度内。没有别的意思。

这并不是要穷尽梦的实质，所以看到其他东西介入梦中，并不构成反驳。我们不要在这篇文章上停留太久；只需指出，从哲学角度看，把“遭受的暴力”同“工作”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至少十分古怪。

把梦的工作同暴力混为一谈，会形成某种再现。我并不否认，它到头来仍是某种近似语言的东西；但它的全部趣味，在于以扭曲方式向我们呈现某种非常独特的东西。很明显，这只能来自某个工作的地方——如果不是暴力的地方——那里首要的目标，就是扭曲我所说的话。

不过我不明白，如果人们手中的材料不正是我所说的话，又怎么可能企图扭曲任何东西。确切说来，我指的是利科先生的课程。

雅克·鲁德劳夫：

我认为，梦作为通往无意识的王道，确实同弗洛伊德的这项发现直接相连：梦会说话，梦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要理解梦、解释梦，就必须翻译它的语言，把从前看起来只是一系列图像的东西，转化成一条在语言上有秩序的能指序列。

我以为自己提出的问题……

我很难重新概括这个问题……是：语言既是我们试图抵达无意识所走的道路，同时又是我们寻找的对象；那么，这种语言是什么？它属于谁？

这把我们带回主体的问题：主体作为一项语言事实；也带回语言的问题：语言对我们揭示主体，是主体的行动。问题大致就在这一层面提出。

拉康：

语言完全不是主体的行动。话语有时可以是主体的行动。但语言恰恰把我们放到某种东西面前；若在这一点上作出裁决，就是一次跳跃，而且是一次滥用性的跳跃——我也没有说我们能作出相反裁决。我曾提到一些维度，尤其是一个叫作不可判定性的维度。为什么不在这里使用它？

我并不是说，我们能够证明语言不是主体的行动。无法证明这一点，显然不能裁决任何事情；但同样也绝不容许我们肯定语言是主体的行动。任何所谓寻找语言起源的立场，无论是哪一种，显然都蕴涵这种肯定；它们试图想象……

迄今没有任何人能以令人满意的方式想象出来……究竟怎么会有一天出现了一些说话者。

我只是看到语言学史上的一项事实：正是从若干人聚集起来，以名誉彼此担保绝不提出这个问题的那一天起，语言学才得以开始。

这只是一项历史事实。它并不比另一项事实牵出更多后果：有一天，一个名叫拉瓦锡的人对自己说，在所有这些化学家的小操作里，应当称量事情开始和结束时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化学中的一切都是天平问题，远非如此；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但这里属于同一种秩序。开端处有一项决定性的行动：我们恰恰要克制自己，不去思考那些可能把语言解释成主体行动的东西。从那一刻开始，非同寻常的是，语言学领域确实出现了一些有效发现，而在此以前毫无踪迹。此前已经有人能说出一些还不错的话，但它们完全不构成语言科学的哪怕一点开端。

语言学从某个时刻诞生；同一切科学诞生的时刻一样，这是属于实践秩序的时刻。有人开始摆弄材料，同时给自己强加若干排除性法则，把自己限制在若干项操作之内。从那一刻起，某种东西才成为可能；这本身并不更具有证明性。它恰好从我们开始追问所谓主体效应——也就是对若干层域的禁止——时，才开始具有证明性。

排除这些层域，便能更准确地确定什么在作为主体效应运作；这种主体完全不必同我们在语言的日常、普通用法中面对的主体同质。

但我们恰恰禁止自己去做那件事。仔细看，那件事等于限制语言，却完全不是要超越语言，也不是要写下任何所谓元语言或元语；相反，是为了孤立语言的某些场域。随后就会产生主体效应，而且这些主体效应并不必然是说话主体。

我认为，用“主体”一词指示一门科学的场域，并不一定选得不当。我刚才谈到化学和语言学；存在化学的主体、语言学的主体，正如存在现代逻辑的主体：

- 它或多或少已经建立；
- 它推进得或远或近；
- 它或多或少仍在浮动。

采用这种参照，对我们知道自己谈论主体地位时究竟在说什么极其关键。很明显，我们在分析中面对的主体地位，不是这些主体中的任何一个，也不是当前已构成科学的场域中能够定位的任何其他主体。

雅克·鲁德劳夫：

我想说明，当我说“语言是主体的行动”时，我的意思是：您给予我们的语言、您的话语行动，是您的行动。但既然语言不是主体的行动，我想，就必须把它界定为大他者之行动的场所。

拉康：

是的，我本可以把这个问题转给我们亲爱的纳西夫[注2]；但纳西夫曾围绕这一点，把我去年所做的一切压缩成一项工作，并加上一条我们以后还能充分利用的注释。

> [注2] 此处指一篇未署名、标为“1968 年圣诞节—复活节”的文章，后以《为了一种幻想的逻辑》为题刊于 Scilicet 第 2 / 3 期，巴黎，Seuil 出版社，1970 年，第 7 页。

我不想在这里滥用他，也不想让你们受累，请他回答这个问题。

无论如何，你刚才说的话十分大胆；不只是大胆，而且值得批评。

遗憾的是时间有限，我无法充分展开这一切。不过，我总有点顾虑，不愿让你们特意赶来却不带任何东西回去；所以，我想利用今天这个小范围聚会。

我仍要强调，有些平时持续关注我今年在研讨班所推进内容的人今天缺席了；这件事主要可能使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掉价。

他们为什么不在？是不是因为我也许会请他们代替我回答这里说出的问题？谁知道？没人知道，也许正是如此。

也可能他们对时间经济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他们以为能从我在这里说的话中啃到一点草料，可一旦只剩下工作的努力，就会觉得收益不够。谁知道？这也是一种可能……总之，我对此表示遗憾。

另一方面，我很高兴所有愿意来听一点东西的人都到场了。正因为他们在这里，也因为我们人数很少，我想让大家感到一些事情……

这里还有许多并非分析家、但我很乐意接纳的人……让大家感到赌注有多大，也让大家明白为什么我不能在任何听众面前随便说任何话。我的意思是，面对不如今天这样可以通过你们每张面孔来辨认的听众，我无法这样说。

我们在黑板上写：“所有男人都爱女人。所有精神分析家都欲求知道。我不思。我不在。”

既然谈的是主体，这些主体显然更难操作；所幸语言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方向。很明显，借助我们的这些话语——不是借助我的语言，而是借助我的话语——我们已经稍有方向。乍看之下，这里的主体就是希腊语所指的、通常所谓语法主体，即句子的主体。

有时，只须作极小改动，就完全可以把这种主体引入命题逻辑，并重新得到亚里士多德的谓词逻辑公式。例如："所有男人都是爱女人者，所有精神分析家都是欲求知道者。"

有意思的是，由于"所有"的在场，这些命题落入我今年有充分理由引入的所谓量化逻辑的作用之下。

很明显，写"所有男人"或"所有精神分析家"，同下面另外两个分节中标示出来的方式不同。它们牵涉什么？

牵涉我始终质疑并严格加以区分的东西：把言说行为主体牵涉进陈述。

量化逻辑令我们感兴趣之处显然正在这里：全称命题的层面。

一旦引入全称，真正有意思并赋予它凸起的，就是我在这里以较为随意的方式向你们陈述的这些事情。我的意思是，从证明角度看，它并不绝对严密。分别以前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允许自己相对于某些严格性要求有所松弛；那些要求并非徒劳，而且在面对广大公众的话语中，我绝对必须服从它们。

在朋友相聚的场合，我可以说出自己刚才所说的这类话。例如，你们应当感觉到，"所有人都是会死的"这样的公式令我们感兴趣，正因为

它使我们注意到某种始终遭到深度省略的东西。它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那些作为例证给出的、极其愚蠢的三段论所具有的隐秘魅力、黏着性，以及我们竟会如此认同并关心它们的原因。

如果问题真的只在于知道："所有人都会死，而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那么只按字面听取它的人，始终都会提出如下意见：

- "这算什么？这是预设结论！既然你刚说苏格拉底是人，又怎么可能否认苏格拉底会死，除非质疑你在开头设定的东西？"

洛克认为这是一种预设结论。这完全是胡说，其中没有任何预设结论。

真正的趣味完全在别处。它显然藏在魔术师的袖子里：在这里谈苏格拉底绝非徒劳，因为苏格拉底并不像"所有其他人"那样会死；而这恰恰是最终留住我们、甚至使我们兴奋的东西。

这不只是由例子的特殊性偶然带来的一项侧面作用，而是因为逻辑从根本上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怎样摆脱这个该死的言说行为主体。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量化逻辑的层面尤其困难，因为它在那里格外顽强。

因此，量化主体同另一个令人不安得多的主体并不完全相同。后一个主体明确取得限定、得到指称，并且可以说以揭露的方式被明确标为言说行为主体。语言学家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于是把"我"称作说话者的 shifter〔转换词〕，换言之就是指示词："我"在每一段话语中都是变量，持有这段话语的人由它指称。由此产生各种后果，尤其是，以"我"为主体的一整系列陈述都非常令人不安。

历代以来，人们在“我说谎”上停留了很久。

我又给它加上“我不思”和“我不在”，当然有其意义；你们都能看到这项意义的全部展开。“我不在”所包含的不可能，显然比那句如此不言自明、以至于人们其实无法真正说出的“我说谎”更值得停留。

这个“我不在”值得我们稍加停留，尤其当我们能够就相关之物——即无意识主体——赋予它一个完全明确的支撑时。因为，一旦人们发现了这一点……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到这里，但你们可能会想到……人们便发现，绝不可能说“它不在”；因为“它在”恰恰成立，“它在”的正是“我不在”。

这一点对你们和对我同样为真。从你们发现它的时刻开始，“我在”不是变得无法说出——它始终可以说出——而只是变得荒唐。如果这些事情看起来连贯，而且是从无意识存在与否所提出的问题场域中严密连贯地引入的，那么实现对它们的把握会极有意义。

无论如何，当然要问：为什么我今年一方面处理精神分析行动，另一方面处理精神分析家，同时始终围绕这项行动——今天我们仍使用随意语言；我再说一遍，“围绕……为中心”并没有多大意义。

“所有男人都爱女人”显然是假的。如今我们已经有足够经验；事实上，人们向来都知道这一点。我们姑且宽泛地说，在社会的一半中它不是真的，是假的；但它是假的，并没有解决任何事情。重要的完全不是知道它粗略说来是假的，而是看到：我们之所以能够直接承认它“不为真”，是因为有些人犯了错。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充分意识到，这看起来就是精神分析的假设。我们甚至可以说得更准确些：我不是说精神分析主张，在所有情形下，人们之所以偏好别的对象，都是因为“有些人犯了错”。精神分析完全可以——这里我是在柔软的地毯上活动——采取各种谨慎态度；它可以说，在某些男性同性恋者那里，这是由器质、腺体或其他这类东西造成的。它可以说这种话，毫无代价。

值得注意的，正是有多少事情对精神分析毫无代价；可一旦需要付出代价，它就远没有那么精确。至少对于它必须介入的那些人，它似乎从未追问这个假设包含什么：如果该命题“不为真”，就是因为有些人——概括地说——犯了错。分析理论中有同它等价的说法，而问题就在这里。

我想在这里指出：我们需要知道，“所有男人都爱女人”这一命题——我们还可以为它赋予更细致的形体——是否是精神分析家视为真的东西。请注意，我写的是定冠词单数的“女人”〔la femme〕，也就是异性的实体。精神分析家绝不可能把它视为真；因为精神分析所知道的是，所有男人爱的并不是女人，而是母亲。

这当然会产生各种后果，甚至在极端情形下，男人可能无法同自己所爱的女人性交，因为她就是他的母亲；另一方面，他可以同一个女人性交，条件是她是一位“被贬低的母亲”，也就是妓女。我们仍留在这套系统里。

我想提出下面的问题：在一个男人能够同自己所爱的女人性交的情形中……

这种情形也会发生；他面对女人时毕竟不总是阳痿！……我想知道一件事，它蕴涵下面这个对我所写全称命题的轻微修改：“所有男人都爱女人”……“所有男人都欲求一个女人”是真的吗？这里不再是“女人”这一实体，而是当一个女人被提供给他们时、即作为触手可及的对象。让我们假设没有阳痿者，也没有“爱情生活的贬低”。

我提出的问题清楚显示了所谓自然主义基础与所谓器质主义保留之间的区别。说在精神分析处理的病例中“有器质因素”，同我们是否据此提出以下问题完全不是一回事：事情是不是不言自明？……你们马上会看到，我们不得不添加一些东西，这已经足以显出我提出之情境的人为性；我的意思是，把女人从她先前的承诺、关系及其他全部语境中抽离出来……这里是否存在这样一种自然原则：在这一类情境中——小说家竟不得不绞尽脑汁去发明它们，这一点已经很值得注意——也就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命名、几乎无法思考的“山间木屋情境”中：一个身体构造正常的男人和一个女人彼此隔绝，正如人们所说，身处自然……

在这种场合，人们总要把自然搬出来！……他们发生性交是“自然的”吗？问题就在这里。这里涉及可欲之物的自然主义。

这就是我提出的问题。为什么要问？

完全不是为了告诉你们某些随后会传遍巴黎、被当作拉康教导的东西：仿佛男人与女人彼此毫无关系。我没有教导这一点——这是真的！按字面说，他们彼此没有任何关系。麻烦在于，我一旦教导它就会造成丑闻；所以我不教了，我收回。

正因为他们彼此“无所见”〔rien à voir，亦即毫无关系〕，精神分析家才同——把它写到黑板上——“这桩事”〔staferla / cette affaire-là〕有所牵连[注]。

> [注] 此处先以 rien à voir / quelque chose à voir 对举“毫无关系 / 有所牵连”，又把 cette affaire-là〔这桩事〕按声音压写为黑板上的 staferla。Staferla 底本与 ELP 校勘本保留这一连写；Valas 本在正文保留 cette affaire-là，并另录黑板拼写异文。汉语无法同时复现 voir 的双义与连写音效，故正文保留法文；另参见讨论这一语音写法的 《Littoral》第 36 期文章。

人也必须懂得以某种方式使用书写。当然，我并不教导这一点。为什么？

因为，即使精神分析教给我们的一切严格强制导出这一点：女人从来不是由于 quia genus femina——我说 femina，甚至不是 mulier[注3]——即作为“女人”而被欲求；欲求必须建立在一整套机制上，其中无意识绝对占主导地位，因而整个主体辩证法都会介入。

> [注3] 参见克劳狄乌斯・盖伦：《灵魂及其激情》，巴黎，Les Belles Lettres 出版社，1995 年。文中引句：“Post coitum omne animal triste est, sive gallus et mulier。”〔交媾后所有动物都悲伤，女人与公鸡除外。〕

用这种古怪方式宣告“男人和女人归根结底彼此毫无关系”，只是标示一项悖论；它并没有更多效力，却同我曾在你们面前谈到的逻辑悖论属于同一秩序，同“我说谎”或罗素的“所有不包含自身的目录之目录”悖论属于同一种依存关系。显然，不应把这种说法当作唯一会使事情不只构成悖论、甚至造成丑闻的点来提出；也就是不应仿佛这里存在一项自然主义参照。

当某人在一条小注释或别处写道，在拉康重新解释弗洛伊德的方式中——据说这是一个“弗洛伊德—拉康”——某种原本值得保留的东西，

即自然主义参照，遭到了省略；我反倒要问：在弗洛伊德经验与学说所分节的一切得到陈述以后，关于性行动的自然主义参照此刻还能剩下什么？

恰恰因为给“男人与女人”这些词项赋予自然主义基底，人们才会说出一些事实上显得疯狂的话。所以我不把它们说出来。

但我今天确实要说的是……

今天在场的精神分析家少得出奇……下面这个问题：“出于本能”，临床家怎么想？

你们当然明白，像这样的词绝不可能偶然从我口中冒出……面对“山间木屋”情境，临床家以自己的临床家本能——“临床家本能”究竟是什么，仍有待界定！——会怎么想？

你们只须参照自己的经验，也参照内心直觉。某人来告诉你：他曾同一个漂亮姑娘待在山间木屋里，没有任何理由“不下手”，但他就是“没有欲望”。你会说：“哦！这里有问题，事情不对……”你首先会查问，他是不是经常发生这种停顿；总之，你会投入一整套思辨，而它预设事情本该发生。

这只是在向你们表明，问题涉及分析家心智层面的连贯性与恒常性。因为，如果分析家“出于本能”——出于临床家的本能——这样反应，甚至不必引入自然主义回响之类的说法，不必说“男人和女人天生就该在一起”。

我没有对你们说相反的话。我说的是：他们可以在一起，却彼此毫无关系；我说他们彼此毫无关系。

如果临床家、临床家的本质以某种方式介入，使他感到事情不对，就必须知道这是什么。也许——为什么不呢？这种东西确实存在——它只属于常识秩序；我并不反对常识。但也可能涉及另一回事：分析家是否凭借自己充分的理由，容许自己假定，这个女人……

我再说一次，对精神分析家而言，当雄性动物是一个说话存在时，这个女人完全不会自动被他欲求……这个女人之所以相信自己可欲，是因为在某种困窘中，这是她最适合做的事情。

随后，事情还会再走远一点。我们知道，对这个伙伴来说，她相信自己爱他；这甚至占据主导。需要知道它为什么占据主导——人们会说，这是出于她的本性。

我们也很清楚，实际占据主导的是她欲求他：正因如此，她才相信自己爱他。至于男人，当然，我们太熟悉这套曲子，已经听到耳朵起茧：当他碰巧欲求她时，他相信自己欲求她，但此时他面对的是自己的母亲，所以他爱她。他向她献出什么？献出同这场戏剧相连的阉割果实。他把自己已经不再拥有的东西给她。这一切我们都知道。

这违背常识。可是，当小说家已经竭力把这一切从山间木屋的地平线上清除以后，若事情仍然没有发生，分析家凭临床家本能认为“这里有问题”，难道只是常识在作祟吗？

我主张，这不只是出于常识。我主张，某种东西恰恰使精神分析家在某种意义上被安置、设立于连贯性中。理由非常明确：“所有精神分析

家都欲求知道”同上面的命题一样是假的，而我们必须知道它为什么是假的。当然，它并不是仅仅由于“事实上为假”才为假，因为我们始终可以把它写出来，即使人人都知道它为假。在两种情形中，都有某处发错了牌。

我已经以一种非常大胆的方式界定精神分析行动，甚至把像对象(a)一样被排斥这一含义放在中心。这是非同小可的，是新的，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

当然，从我说出它的时刻起，它就变得可以触及，而且确实可以触及。人们本可以试着反驳我，说出相反意见，带来别的东西，提出异议。奇怪的是，自从我说出它以来……

我把它提到首要位置其实没有多久……竟没有任何人开始吭声反对。可这从根本上说非同小可，人们原本可以大声抗议：

- “这是什么说法？

从来没有人这样向我们解释分析！这个像一坨屎一样被抛弃的分析家，究竟算什么？”

“屎”会极大地困扰许多人。对象(a)中并不只有屎，但分析家经常正是以屎的名义被抛弃。这只取决于分析者：必须知道，对他而言，问题真正涉及的是不是屎。

然而，非常醒目的是，我可以不断讲出这一切，展开并分节这番话语；在人们开始围绕它转动许多东西以后，仍没有任何人想到提出哪怕一点抗议，或就分析终结给出另一种指示、另一套理论。

奇怪，真奇怪！这种克制十分古怪，因为总体而言，这项说法包含各种令人不安的后果。它原本可以在反驳中激发一点创造力。结果却是：零！

所以，如果没有人提出丝毫反驳，是因为大家毕竟非常清楚地感觉并知道：无论第一还是第二个命题，发错牌之处都围绕这里旋转。精神分析家只有亲自加入这场芭蕾，才有资格在其中“撒一撮盐”——这是一个比喻，意思是才有发言权。我说的是精神分析家。

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观念出发，就肯定会迷路：以为精神分析家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以为对性行动及其造成的地位这一整件事，他能够退后一步，因而掌握关于它的知识。

问题完全不在这里。也正因如此，他不必就什么自然、什么不自然、何时自然、何时不自然选边站。他只是设立一项经验，并且必须以第三项功能——对象(a)——的名义在其中“撒一撮盐”。对象(a)在欲望的决定中具有关键功能；正是它使女人能够面对这样一种困窘：她在同相关行动的关系中运用自己的享乐，而这种享乐又把她留在困窘里……我还可以走得很远，说“那项行动强加给她的东西”……

不过，我在这里仿佛提出了一项女性主义诉求；请不要这样认为。问题远比这宽广，它存在于结构中……在性行动的主体化戏剧中，正是这一点指示女人，并把对象(a)的功能强加给她；而对象(a)遮蔽了真正的问题，即一个凹口、一个空、中心处缺失的东西。我曾试图把它符号化；人们可以说，看起来男人与女人之间……

请记住我选择的措辞……彼此“无所见”，毫无关系。

换句话说，她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对象(a)的这一功能；但在她的享乐、以及这种享乐同相关行动的关系被悬置之际，她只是发现了欺骗的力量。这不是她自己的欺骗，而是另一种东西，恰恰由此时男性欲望的设立所强加。

男人在自己一边发现的，无非是自己除了以什么为目标之外，不能以任何其他东西为目标的那种无能？当然，是知识。如果我们想作些发展论式的空想，那么无疑在某处、从起源开始就存在关于性的某种知识。但问题不在这里，也不在于所有男孩女孩都有一些自己并非完全无法掌握、而且多少能够加以引导的感觉。必须抵达的“一种性别的知识”，恰恰意味着：人从来不拥有关于另一性别的知识。至于一种性别关于自身的知识，在男性一边，情形比女性一边糟得多。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不要以为，我说“不存在性行动”就是在说，一切都归到“彻底失败”这个标题下。我们姑且说，从精神分析经验的层面把握事情——你们看到，我在这里有所保留——经验向我们证明：男性关于一种性别、也就是关于自身性别的知识，会通向阉割经验，即通向某种真理：他的无能，他无法完成某种充实的东西，也就是性行动。你们看到，这一切可以走得相当远，形成这种漂亮的文学对仗：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 一边是谎言的力量；
- 另一边是无能的真理。

两者彼此交叉。你们看到，这一切多么容易滑向某种智慧，甚至所谓性学，仿佛它可以通过意见调查来解决。我想让你们注意的是：为了

明确精神分析家的情形，他必须看到，自己无权在任何层面把知识与真理之间的这种辩证法分节成一个总和、结算或总体化，仿佛记录了某种失败；因为问题根本不在这里。

没有人处在能够掌控问题的位置。这里涉及的无非是主体功能对这项行动的干扰；在我们——我是说分析——经验中，我们甚至无法指出这项行动的参照在哪里可以触及。不要说它的“自然”参照，因为自然参照恰恰在这里消散；但就连它的生物学参照也无法指出。

相关知识卡 不存在性行动：从行动的失败到关系的不可写

我目前所说的是：要使分析家摆脱那种容易令他摇摆并滑向某种伦理教导的状态，规则就是让他看到，问题的核心正位于制约这种根本摇摆之物的位置，即对象(a)。与其在多年经验以后把自己看作临床家——即面对每个病例都能算出整件事体积的人——他不如给自己……

我在上一次话语末端、面对我所谓更广大听众时，已经向他指出……我从前一学年的话语中借来的一项参照；我不会把它叫作寓言……

因为我从不讲寓言；我向你们展示的是分析家之现实，它在其他例子中得到形象化，而这些例子取自艺术等领域并不奇怪……这样，他才能拥有另一种知识，不同于那种属于他、并使他瘫痪的虚构知识……

- 当他追问一个病例时；
- 当他为病例作病史回溯时；
- 当他准备病例时；
- 当他开始接近病例时……而一旦进入分析，他便要在病例、在主体的历史中寻找……

正如委拉斯开兹身处《宫娥》这幅画中一样……他这个分析家自己在主体历史的某个时刻、某个点上早已处于什么位置。

这样做会有一个好处：他将知道转移究竟是什么。转移的中心、枢轴，根本不经过他这个人；它是某种早已在那里之物。这会使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近病例的多样性。

也许从那时起，他将能够找到一种不同于古典精神病学的新临床分类。迄今，他从未能够触动或动摇古典精神病学，理由很充分：他除了跟在它后面走，什么都没有做到。

我想把问题再为你们形象化一些，并试着在我给自己留下、也感谢你们给予的几分钟里完成。

人们谈“私人生活”。

我总是惊讶，“私人生活”这个说法从未引起任何人的兴趣，尤其没有引起分析家的兴趣；他们原本应当格外关心它。

生活究竟被“剥夺”了什么，才叫作“私人生活”〔vie privée〕？

我们可以围绕它作一些修辞发挥：

- 私人生活是什么？
- 这种生活为什么如此“私有 / 被剥夺”〔privée〕？

这原本应当令你们感兴趣。

一旦开始分析，就不再有私人生活。必须说，当妻子因为丈夫接受分析而勃然大怒时，她们是对的。这会让我们这些分析家不舒服，但必须承认她们是对的，因为私人生活已经不复存在。这不意味着生活变成公共生活；中间还有一道船闸：它成为受分析的生活，或分析者的生活。那不是私人生活。

这一点足以促使我们思考。归根结底，这种私人生活为什么如此值得尊重？

我来告诉你们：因为私人生活使人能够维持那些著名规范完好无损，而我刚才围绕山间木屋正在把它们彻底掀翻。“私人”意味着：就性行动这一微妙问题及其在存在者配对中的全部后果而言，“你是我的女人，我是你的男人”以及其他关键说法，都被保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另一个层域中——虚构的层域。

私人生活使这一切得以维持在一个场域中；而我们分析家在其中引入的相对性秩序，正如你们看到的，完全不容易掌控。只有一个条件能使它得到掌控：我们能够辨认自己作为分析家在其中占据的位置；不是作为“知识主体的分析家”，而是作为“这项揭示之工具的分析家”。

由此又提出分析家的私人生活问题。我只是顺带提一句。自然，有些广泛流传的著作，其中最成功的一本说，要界定并标示什么是好分析家，最低要求就是他拥有幸福的私人生活。真可爱！而且人人都知道作者是谁；我不想开始猜测……总之……但分析家若要维持我刚才界定为私人生活地位的东西，那会是……恰恰因为分析家不再有私人生活，他最好确实把许多事情保护起来。也就是说，如果他必须知道自己早已在病人的生活中占据什么位置，反过来却完全没有必要。

不过，“私人生活”这件事还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平面起作用，恰恰就是我刚提出的话语一贯性平面。正因为分析家至今丝毫不知道如何支撑自己位置的话语，他才会把自己变成任何其他东西。什么都对他有用。

他进行一种同所有教导一样的教导，尽管他的教导原本不应同其他教导有任何相似之处。他教什么？教那些受教者本来已经知道、而他认为他们需要的东西：

- 也就是在相关主题上，把他们已经知道的一切再教给他们；
- 而这些恰恰都是最偏离问题的东西。

任何参照对他都有用：他会教一切、随便什么，唯独不教精神分析。

换句话说，我特意从最贴近地面的层面开始，也就是从看起来最不令人反感的东西出发，并向我们表明精神分析恰恰对它提出异议：除非作为挑战，否则不可能写出黑板上的头两行。

真正构成分析家地位的，是一种配得上“私人生活”之名的生活；也就是说，他赋予自己的地位，严格说来使他能够维持……

分析的授权、授职、等级制度以及 gradus〔等级〕的攀升，正是为此而建构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维持：在他的功能会对他产生后果的层面上……

他所承担的一切功能中最危险的一项，就是占据对象(a)的位置……这套地位却仍使他能够稳定、永久地保存那些同把他设立为事实的根本话语经验最不相容的虚构。

这就是我今天最后要对你们说的内容。你们会明白，我为什么把它留给较小范围的听众；这里的人不必从中收割一堆丑闻、闲话或废话。

第16课 · 1968年5月8日

拉康响应法国全国高等教育工会〔S.N.E.Sup.〕的罢工号召，5 月 8 日和 15 日没有举行研讨班，但本人到场。

第17课 · 1968年5月15日

我今天同八天前一样来到这里，因为预料会有一些人到场，以便保持联系。

同八天前一样，我不会进行自己通常在这里以课程或研讨班之名所做的事情；因为我遵守法国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罢工号召，而我想，这项号召此刻仍然有效。

这只是一个纪律问题，却不等于——如果可以这样说，而这原本是可取的——能够同事件相称。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容易。

至于我自己，我只须处理……

我很久以来始终强调这一点，现在当然不会否认自己一向特意重复的话……精神分析家；我只向精神分析家讲话；多年来，我自认为为精神分析家维持着一项并不轻省的工作。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这次恰好让我察觉工作的分量：只因无须准备一场研讨——上一次已经准备好了——我就感到自己轻松了多少。

当然，这会向各种事情敞开大门。

同时，我也能发现某种努力与工作始终遮蔽的东西，也就是我的不满。

它或许也让我有机会读一些文章；平常只要看见署名，我必然就把它们略过去。即使预先知道能从作者那里期待什么，也必须读他们的文章。于是，我有时会大吃一惊——我说的当然是同事们的文章！

眼下，若要同事件相称，我会说：精神分析家固然对那些卷入相当激烈冲突的人表达同情；而在这些冲突中，需要——这一点必须强调——极大、极大的勇气。我们精神分析家有时会听到当事人吐露自己在那种时刻的感受；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衡量这种勇气代表什么。从外面看，人们当然会赞叹，却不总能意识到：那些小伙子有时真正被某种东西带走，感到自己同伙伴绝对焊接在一起——无论他们如何表达——这种功绩丝毫不小。在挨警棍时唱《国际歌》令人激昂，这只是表面。

当然，《国际歌》是一首非常优美的歌。但如果他们不是被一种绝对共同体的感觉托住——在那里，在行动中，同那些与自己并肩的人共同体——我不认为他们会有那种完全无法遏制的感觉：自己不可能身处别处。人们常说要“深入”探索它，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它确实值得探索。

我的意思是——回到我们的精神分析家——就这件事签名，即使同样是肩并肩、但毕竟性质不完全相同，也不等于同事件相称。人们可以凑到七十五人——据说这是昨晚提到的数字——在一份抗议政权及其执行者、我是指警察执行者的文本上签名。

这当然值得赞许，也不应劝阻任何人在这类抗议书下签名；但它稍有错位，恰恰还不够。如果来自各种出身、各个领域的人都签名：很好！但以精神分析家的名义签名……

而且很快又向心理学家开放……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相当轻松地完成我刚才所说之事的方式：以为自己已经对事件尽到了责任。

当发生这种秩序、如此具有地震性质的事情时，如果一个人自己曾负有责任，或许可以追问一下。精神分析家毕竟对……不能说是大学教学，因为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严格身处大学，我只在边缘、在外围。但在教育层面负有责任的并不只有大学。也许精神分析家可以对自己说：对于那些虽属集体关系、却同样直接落在他们自己的某个范畴、场域和结之下的东西，他们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而这些东西原本很容易得到标示。

让我们试着给它命名，但不要过分强调：归根结底，我们自己已经指出过它。在我们的《文集》某处，有一篇题为《科学与真理》的文章；它并非完全不合时宜，至少能使人想到：不能把正在发生的事情还原成四处出现的所谓“湍流效应”。

有一个人……

我不能说自己不尊重他；他是我的同学，我们坐过同一排长凳，彼此有联系，也非常熟悉……他是一位朋友：雷蒙·阿隆先生。他今天早晨在一份反映体面人士思想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说：这种事到处都在发生。

可他这样说，恰恰意味着：各处的人都有些躁动，每个地方都应按照当地出问题之处把他们安抚下来。据说每个地方总有某种事情不对，所以他们才躁动。

你们知道，事情当然从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也就是纽约正中心；我最近才得到非常准确的消息。随后一直到华沙；我不必绘制地图。

人们至少不愿追问，或者说，他们断然排除了……

这篇语调十分得体的文章正是如此……这里可能存在一种远为结构性的现象。既然我已经提到那个角落、那个结和那个场域，对我来说很清楚：欲望与知识的关系正在受到质疑。精神分析也使我们能够把它系到一种欠缺、不充分的层面；而这种欠缺恰恰受到知识传递关系的激发与唤起。

各种潮流、因素以及人们所谓的力量，一整套动力学，都在其中产生回响。这里我要再次提到自己最近读到的文章。有人强调，某种教导——直接说吧，我的教导——忽视了能量维度。我十分佩服这些能量论者竟完全没有发现这里潜伏的能量移位。也许这种能量在理论唤起上确有意义；但在人人大谈对话的时刻，把事情系到逻辑甚至逻辑学家的参照层面，也可能颇有意义。

无论如何，我认为事件已经证实我的判断：真正可以操作、可以分节的东西就在这里，所以我尽可能强调它并没有错。在那些省略它、甚至自认为必须省略它、乐于谈所谓“理智化”——你们知道，这是那个响亮词语——的地方，人们既没有对正在发生之事表现出特别好的方向感，也没有正确估量其中各种分量以及事情真正而真实的能量学。

我顺带标出一条简短信息：昨晚，在那个叫作我的“学派”的集会上，这场起义的一位领头者到场了——他绝不是一个脑袋不灵的人。无论如何，他不会轻易受骗，也不会说蠢话；他很懂得立即回敬。有人向

他提出一个必须说颇为动人的问题：“亲爱的朋友，请从你所处的位置告诉我们，你会期待精神分析家做什么？”

这种提问方式实在荒唐透顶！我正拼命地说，精神分析家应当从起义中期待某种东西；结果却有人反问：“起义会期待我们做什么？”

起义回答他们：“眼下我们期待你们的，是必要时帮我们扔铺路石！”

为了稍微缓和气氛，我当时谨慎指出：在对话层面，铺路石正好填补了一个预定功能，也就是我所谓对象(a)。我已经指出，对象(a)具有一定的多样性。铺路石这个对象(a)回应了另一个对象；后者对任何从某一层面出发的未来对话意识形态来说，都真正至关重要：它叫作催泪弹！

先不说这个。但我们确实从一位权威人士口中得知——他显然立刻压倒了原本可能以别的方式展开的讨论——最初在某一场域、尤其在楠泰尔发生的全部骚动，真正的消息是：赖希的观念……

你们愿意相信我就信；这里许多人愿意相信，因为是我转告他们。我也很惊讶，但事实如此……对他们具有开路作用；而这围绕某座大学城中出现的非常具体的冲突展开。

这毕竟很有意思。例如，对精神分析家就很有意思；他们可以认为——这也是我的立场——赖希的观念不只是不完整，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被证明是假的。

只要我们愿意真正把全部分析经验分节出来……

而不是把它看作某种旋涡与混乱力量的场所，看作“生本能”与“死本能”彼此紧抱的一套能量学……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在一项语言经验中对象化的东西稍加整理，就会看到，赖希的理论受到我们日常经验的形式性反驳。

但精神分析家完全没有就真正可能令所有人感兴趣的事情作证，尤其没有就两性关系作证；因此，这一领域完全敞开，任何人都可以随便说任何话，而且在所有层面都是如此。

昨天我读到——既然现在留给我时间阅读——一份名叫 Concilium 的小刊物；那是教士们的领域。里面有两篇相当出色的文章，讨论女性进入司铎职务的问题，并调动了男人与女人之关系的若干范畴。

当然，情形就仿佛精神分析家从未就此说过任何话。

这当然不是因为作者不读精神分析文献——他们什么都读——而是因为，即使读了，也绝对找不到任何相比那种始终围绕以下混乱概念的争论更新的东西：在男人与女人中，谁相对于任何你们想说的东西——例如大写的存在……

……更优越、更有尊严，等等。

归根结底，十分醒目的是：精神分析家在经验层面标示出来的东西，竟被他们自己淹没得如此彻底；到头来，就仿佛精神分析家从未存在过。

当然，你们也许会认为这一切多少属于我个人的观点。

很明显，我曾认为必须以某种语调，在属于我的一份刊物开头写下一则说明，并用我称作“失败”的标示强调它。大意是：我试图分节出来的几乎一切——我必须说，只须稍微拉开一点距离，人们就会发现它不但已经得到分节，而且以一定力量得到分节——都会这样留在那里，作为某种东西的见证；人们能够凭它重新定位，其中有东南西北。也许要等到精神分析家不再在那里，仅凭他们对这些东西的所作所为使其彻底失效以后，人们才会发现这一点。

与此同时，人们签署声援学生的宣言，就像也会为失业者签名一样；但两者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又或者，他们会为任何一个在冲突中可能挨打的人签名。

总之，某种东西毕竟正在实现，而且人们可以发现它早已被写好。我曾说过，无论如何，即使精神分析家不惜一切代价拒绝同自己承担之事相称，他们所承担的东西仍然存在，而且无论如何仍会通过其效应让人感到自身——我的《提议》第一部分，我们已经来到这里——最终总得有人努力同某类效应相称；这些效应仿佛已经被提供出来、预先指定由某些人在某个框架中处理。

如果不是这些人，就必然会是另一些人；因为一旦这些效应变得稍有坚持性，人们终究总得发现它们在那里，并尝试在其场域中运作——这从来没有例外。[注]

> [注] 此句在 Staferla 底本、ELP 校勘本和 Valas 本中都保留了口语速记式的句法黏合 il n’y a pas d’exemple que quand…，但三本同样明确保留肯定的 il faut tout de même bien s’apercevoir〔终究总得发现〕。译文按论证语境疏开句法，并纠正原译误加的“不必”。

我就这样对你们说了这些，免得你们特意赶来却什么都没听到。

第18课 · 1968年6月19日

1968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讲演〔原文附法国拉康学派网页及 PDF 链接〕。

我不是耍花招的人。我不想先宣布自己会像学派通知上写的那样，说几句致辞来结束本学年，随后却给你们作一场所谓“研讨班”。

我要说的几句话，倒更属于仪式的秩序。

如果我没记错，今年我曾在某处提到传统文明中标示新年开始的开年仪式。这一次，则是为了行将结束的学年。我们仍会感到遗憾：开启了“精神分析行动”这样一个概念以后，命运却使你们只能学到我原本打算就此讲述内容的一半。

一半……说实话，还要少些。因为要进入精神分析行动这样新颖——从未被分节为一个维度——的东西，开启的程序确实花了一些时间。直说吧，事情并不保持同样的速度；它更像一个物体下落、受到同一股力作用时所发生的情形。

正如人们所说，物体在下落过程中运动会加速；因此，对精神分析行动应当讲述的东西，你们远没有听到一半。

我们就说，你们听到的略少于四分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这很遗憾；因为说实话，我没有在日后用补缀方式完成某项因任何内部或外部原因而中断之事的习惯。

不过，我的遗憾从另一个方面也伴随着某种满足。毕竟，这次话语并不是被随便什么东西打断的；打断它的东西虽在一种非常“幼稚”的层面，却仍调动了一个并非同“行动”毫无关系的维度。唉，天哪，这也不算太令人不满。

当然，这一切中有一点不协调。我计划围绕精神分析行动作的这篇“论述”，是为那些——正如人们所说——“由经验磨炼成熟”的精神分析家打造的。它首先要让他们、并同时让其他人，更准确地估量自己必须举起的重量；因为某种东西恰恰标示出一个悖论、内在二律背反和深刻矛盾的维度，由此可以设想，他们要承担这份重负有多么困难。

必须承认，在实践中最熟悉这份重负的人，并没有对我所说的话表现出最强烈的兴趣。在某个层面，他们确实以缺席而格外醒目；而这种缺席绝非偶然。

既然说到这里，我就顺带把此前提过的一则小轶事彻底讲清楚。我曾很殷勤地给其中一人写一封短信[注1]，问他的缺席是不是一项行动。他回答：

> [注1] Poulet：情书或任何一类便笺、短简。

- “您想到哪里去了！绝对不是！既不是行动，也不是失败行动。只是今年我每周三十一点半都同一位合适的医生约好，要作一项长期治疗（也就是重做整副牙齿）。”

你们看，这不是一项行动，而是一次纯粹的偶遇！

这减轻了我的遗憾：我必须传递给精神分析共同体、尤其是那个以“我的学派”为名的共同体的东西，仍有某些悬而未决。另一方面，行动还

有一个同样具有歧义的维度；它并不必然由失败行动组成，尽管当然会给那些想用传统政治术语思考事情的人制造难题。可无论如何，确实发生了某种事情：正如我刚才所说，有一天“孩子们”以行动之名把它捡了起来；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继续给一些人制造难题。

无论如何，问题是……

也正因此，我今天想向你们说几句话……我把它当作某种小小的平衡或补偿，感到自己的重负仿佛略微减轻了一点；这种感受是否有道理？

因为归根结底，如果我能够把握某个结，只是因为精神分析的问题，更准确地说，因为精神分析为我提供了支撑，而且这种支撑独一无二，在别处不可能把握它……

或者，如果你们愿意说，是一个泡，一个此前从未得到定位的独特东西……而今天很难给它贴上标签……

因为若干传统术语正在稍稍随波而去：人、认识，或“共生认识”〔connessence〕，随你们怎么说；问题不完全在这里……我也曾在那边用红铅笔，在这个泡状结上写下……

你们很熟悉它，就是我大约八年前已经构造出来的著名内八字……写下这些词项：知识、真理、主体，以及同大他者的关系。就是这样。

没有一个词能够把四者一起涵盖。但这四个词项已经对某种将来之物变得不可或缺；而这个未来可能关乎我们这些身处阶梯教室的人。我们不只是为了呼喊或索求而来，也关心知识的问题。某种教导已经显

出说不清的不能令人满足之处；这次巨大的撕裂之后，一边明显有某种东西不再运转。曾经笼罩它的词——绝非偶然——叫作“大学”〔Université〕，它从“宇宙”〔Univers〕取得权威；而问题恰恰在这里。

宇宙还能维持吗？宇宙许下过许多承诺，但未必能够兑现。

我们要知道，已经宣告并像是向“宇宙的裂口”作出一次开启的东西，是否能维持足够久，让人看清最终答案。这个问题经过我们近几个月在一个历史上以奇异方式持久存在的地点所见之事。我们看到，一项场所功能重新活跃起来。

这很奇怪，也至关重要。要不是有一个他们总会返回并在那里挨打的地点，事情也许不会如此鲜明地结晶。不要以为在这个地方开启、并作为问题而开启的东西，是我们民族肌理所独有的特权。

为了透口气，我去罗马待了两天；那里无法设想类似的事情，理由很简单：罗马没有拉丁区。这并非偶然！很可笑，但事情就是这样。

也许他们全都是“拉丁人”。我在那里看到一些很令我喜欢的事情。在那里更容易辨认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一个小团体——我没有看见很多，但即使只看见一个也足够了。

他们叫“鸟群”，Uccelli。正如我对几位熟人说过的，我在意大利竟然“广受欢迎”——必须承认，这让我惊愕；人们就是用这个词，我真惭愧！意思是，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他们当然对我写过的东西一无所知！但奇怪的是，他们知道《文集》存在。

看来他们并不需要读，因为这些 Uccelli、“鸟群”，已经能够作出这样的行动。它同拉康教导的关系，当然就像美术学院的海报同真正政治问题的关系一样；但这意味着，它们具有完全直接的关系。

当罗马大学院长在一位梵蒂冈知识界杰出代表陪同下，前去面对聚集在一起的他们……

因为那里也有全体大会，人们会对他们讲话；当然，在对自己有用的一边，大家都支持对话……这时“鸟群”带来一种巨大的东西，就像乡间餐馆圆桌中央那种硕大的遮阳伞；他们全都躲到伞下，说是为了躲避语言！

我希望你们明白，这给我留下了希望。他们还没有读《文集》，但以后会读！

既然他们已经找到了这个做法，真的还需要读吗？归根结底，不是理论家找到道路，而是理论家解释道路。解释当然有助于找到道路的下一段。但正如你们看到的，我信任他们。

如果我写过一些原本可能对精神分析家有用的小东西，那么它们会对另一些人有用；后者的位置与决定作用，由一个特定场域精确规定。这个场域由小结环绕；小结以某种方式切入一个泡，而这个泡已经被最终通向这场历险的前提极度纯化。我一直试图在你们面前把它定位为科学的生成时刻。

因此，今年谈到精神分析行动时，我本来正要向你们展示：必须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这一层域中占据位置，意味着什么……

尤其当一个人是精神分析家时；不是说分析家是唯一处在这个位置的人，而是因为他特别适合认识这项位置的彻底分裂……换句话说，精神分析行动的起始位置，在于押注某种会被你的行动否认的东西。

正因如此，多年来我一直保留、保护并搁置 Verleugnung〔否认〕这个词。弗洛伊德当然曾在主体 Spaltung〔分裂〕的某个示范性时刻提出它；而我想把它保留下来，让它在那个无疑把其悲怆推到最高点的地方活起来，也就是分析家本人这一层面。

为此，多年来我不得不忍受一批人的骚扰；他们尾随我所带来的东西，试图查看能否拼凑出一小块让我"失足"的地方。因此，当我谈 Verwerfung〔拒斥〕——这是一个极为精确、完全定位精神病问题所在的词——"人们"就提醒说，使用 Verleugnung 会聪明得多。总之，可以在一些糟糕的讲演和平庸文章中找到这一切的痕迹。

如果今年〔1963—1964 年〕我能够按计划对你们讲话，Verleugnung 一词原本会取得其真正位置与全部分量。这就是下一步。

还有其他步骤，我甚至无法指出。毫无疑问，最令我震动的事情之一……

在一段教学经验中——你们可以容许我今天回望它，尤其是在这个转折处……就是我竟容许自己把话说得如此猛烈。

例如，我在圣安娜医院两次说过，精神分析至少有这样一个特点：在它的场域中——何等特权！——无赖行径只能转成愚蠢。我连续两年这样重复，而且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所谓言论自由的文明区域，也就是说，你们说的任何话都不可能产生后果。你们可以随意谈论某个说不清的谋杀案可能出自谁手，甚至围绕它编一出戏；全美国——不过是纽约的美国——都会蜂拥而至。历史上从来无法设想这种事发生以后，盒子竟不会立刻被关上。在自由国度，一切都可以说，因为什么也不会随之发生。

颇为奇怪的是，仅仅从几块小铺路石开始飞舞的时刻起，至少在一段时间里，人人都感觉整个社会的日常舒适和未来可能受到最直接的牵动。甚至精神分析家也开始追问这个职业的前途。

在我看来，他们不该公开追问。他们最好把问题留给自己，因为那些原本在问他们完全不同之事的人，看到他们竟追问自己的职业前途，着实觉得有点可笑。总之，不能说精神分析的行情上涨了！

我怨戴高乐将军。他抢走了一个我早已准备很久的说法——当然不是为了像他那样使用——“精神分析的乱摊子”〔la chienlit psychanalytique〕。你们不知道我多少年来一直想把它用作研讨班标题。

现在算是泡汤了！不过告诉你们，我并不遗憾，因为我太累了；这件事已经足够明显，不需要我再加评论。

但有一件事我倒真的很想看到——并非人人都会喜欢，但我会喜欢：在医学院教授精神分析。你们知道，总有一些非常活跃的人物；我不知道什么虫子叮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要占据那里、那个位置。我说的是巴黎弗洛伊德学派的人。

我当然知道，医学院熟悉医学学说史；这意味着，从历史回望时，它见过许多在我们眼中属于神秘化秩序的东西来来去去。

但这并不意味着，精神分析按照官方教学场所采用的方式来教……

人们把力比多讲成某种在连通器中流动的东西；我刚开始试图稍稍改变这种局面时，一位难以置信的人物就是这样说的：一套力比多水力学……若按照人们在——直说吧——研究所里的方式教授精神分析，那会精彩极了；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所谓“受教者”毕竟开始提出一些要求。我觉得这妙不可言。

在完成这番简短环顾、向你们展示事态后续为某些人保留的好戏以后，就让大家看看，某一边能够把精神分析教成什么样。你们当然会说，相关人物始终可以开始“教拉康”！显然，那会好些！

但他还得有能力这样做，因为《分析手册》曾刊登一篇关于对象(a)的文章[注2]，而这篇文章……

> [注2]　安德烈·格林：《雅克·拉康的对象(a)、其逻辑与弗洛伊德理论》，载《分析手册》第 3 期“论精神分析的对象”，巴黎，Seuil 出版社，1966 年 5—6 月，第 15—37 页。

我很遗憾这样说；它又会震惊几位同我最亲近、最亲爱的同事……碰巧的是，在那些该死的高师学生中，它只引发了一阵持续不长却绵延不断的笑声。

连我自己也不得不在《文集》出版前不久，于某处一则低调短注中指出：无论人们多么需要经营精神分析市场，仅仅谈对象(a)，仍不足以真正切中它。

无论如何，我想从稍高处把握问题，而且我已经准备了几句话——不是刚才那些；必须承认，在这种氛围散发的热度、熟悉感和友谊中，我有点放任自己了；这里每张面孔我都认得，都曾在本学年开头见过。既然我已经谈到这四个词项，我们就回顾其主要分节；免得有些目光短浅的人看不出当前局势多么关键。

首先是知识。归根结底，古典传统一直认为，在知识一边应当成为智者；而智者位置的一部分，显然就是保持安静。如今，许多事情恰恰发生在知识传递的层面——正如人们十分正确地说，这是一个特许层面——也许值得我们稍微后退一步观看。

这里有一项功能……当然，我要向今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想看看如果有人问我“这些事件”时我会讲些什么的少数几位道歉。

我不可能在这里讲完大他者理论；而这已经使这种谈话、这种访谈变得非常困难。

首先必须解释大他者是什么。我们从它开始，因为它是钥匙。对不知道大他者是什么的人，我可以先说，我曾严格把它界定为一个场所：“言语前来取得位置的场所。”这句话不会立刻把自己交出来：“言语前来取得位置的场所。”

不过，它是一项完全不可或缺的拓扑功能，使我们能够提取出我刚才所谓结或泡、即世界中这个凹口所涉及的根本逻辑结构。围绕它，人们会唤起主体这一古老概念；但主体的古老概念已不能再还原为镜中形象，也不能还原为任何无处不在的反映。

然而，这个泡实际上仍在游荡；也正因如此，这个世界严格说来不再是一个世界。

当然，这个大他者早已在那里。人们一直没有真正把它分离出来，因为那是一个好位置，里面安置着某种至今仍留在你们大多数人那里的东西：上帝——Il vecchio con la barba〔长胡子的老头〕！

他始终在那里。

精神分析家对这个关键问题——他是否存在——真的没有增添多少东西。只要这个“或”仍被保留，他就会始终在那里。不过，借助这个泡，我们能够仿佛他不在那里一样行事。

我们能够处理他的位置。

恰恰在他的位置上，知识问题所涉及的东西从来无疑都栖居在那里。一切知识都来自大他者。

我不是在谈上帝，而是在谈大他者。始终存在一个大他者，其中有传统、积累与储备。

人们无疑已经怀疑，某些事情可能发生。人们把它叫作“发现”；也可能只是照明方式、传授教学方式发生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知识的重音与意义。正是这一点曾使教学在一段时间里仍维持得住。

你们是否曾经发现，一种教导之所以能够抓住人，也许正因为在以某种方式重新分配它时，有某种没有立刻说出的东西写进了它的图样、轨迹和结构，而被听到的恰恰就是它？

归根结底，坐在长凳上的人为什么不会觉得，最近这根弦已经有点磨损了？

我的意思是，那种“不说出来却要让人听见”的东西，至少必须值得一听，而不能只是一种虚伪。例如，火焰之所以在文学院或建筑学院燃起，也许并非没有原因。

精神分析为主体同大他者的这项关系带来了一个彻底崭新的维度。

这不只像我刚才随口所说的“一项发现”；“发现”仍保留某种轶事性。这里是全部关系的一次深刻重组。

几年前，我曾把一个词带进这里的辩证法，就是“真理”。事实上，在我某天像后来那样精确分节它以前……

收入《文集》的《科学与真理》一文带有这种分节已经完全逻辑化的印记[注3]……我曾在另一篇题为《弗洛伊德之物》的文章中[注4]，赋予这个词另一项功能；其中可以读到：

[注3] 《科学与真理》，《文集》第 855 页。

[注4] 《弗洛伊德之物》，《文集》第 401 页，或第一卷第 406 页。

> “我，真理，我说话。”〔第 409 页〕

说话的这个“我”是谁？

这一段其实是一种拟人宣告，是一种热情洋溢的文字游戏；我曾容许自己在弗洛伊德百年诞辰时、而且是在维也纳把它分节出来。它更像

一声蒙克在一幅著名版画中表现得极好的呐喊[注5]：那张扭曲的嘴，使我们看见整片风景崇高地归于虚无。

> [注5] 爱德华·蒙克（1863—1944），《呐喊》创作于 1893 年。

很久以前，我在维也纳——尤其在那里，因为“真理”这个词已经很久没有被听见——说出了真理一词。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词；除非像逻辑学论著那样阉割它以后使用。

人们早已知道，自己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真理是什么？”〔参见本丢·彼拉多。〕

这恰好是绝不能提出的问题。去年十月我在里昂讲话时，曾提到克洛岱尔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我向你们推荐。[注6] 来这里以前，我没有把页码抄下来——我并不知道自己会谈到它——但你们只要在克洛岱尔散文集的目录中仔细寻找，自然去找本丢·彼拉多，就能找到。

> [注6] 保罗·克洛岱尔：《本丢·彼拉多的观点》，收入《形象与寓言——散文作品》，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七星文库”，1965 年，第 919 页。

这篇文章描写了那位仁厚的殖民行政官，因为不合时宜地提出“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而遭遇的全部不幸。眼下有些人当然身处那种轻浮人物的区域，对他们说出精神分析真理很危险；他们却把我某页转角处收集的这句话——“我，真理，我说话”——运用得可怕。

他们跑到完全不需要真理、但真理会产生作用的地方去讲“真理”。某种曾经被人以“阶级斗争”之名如此成功地压制住的东西，很可能突然变得非常危险。当然，我们可以指望那些为了维持相关之物而始终存在的健全功能，也就是让事情停留在权力分配的场域中。

必须承认，那些稍懂真理操作的人并没有这样鲁莽。

他们拥有“真理”，但教导说：一切权力来自上帝。一切。这不容许你们说，只有符合他们心意的权力才来自上帝。对教会来说，就连反对上帝的权力也来自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清楚地看见了这一点。因为他相信真理，上帝使他怕得发青。所以他写了《宗教大法官》。[注7] 这可以说是预先设想了罗马与莫斯科的结合。我想，你们中总有几个人读过它。但我的小朋友们，这件事差不多已经实现了；你们也看到，它并没有那么可怕！一旦进入权力秩序，一切都能得到安排！正因如此，把真理藏在某处的保险箱里很有用。启示的特权就是那个保险箱。但如果你们认真对待这则拟人宣告……

> [注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

“我，真理，我说话”，那么对走上这条路的人来说，首先很遗憾地会造成极大不便。

不过，让我们看看自己这些分析家是否为此带来了某种新东西。我们的场域当然十分有限，位于这个泡的层面。这个泡如何界定？它的范围非常有限。

经过这么多年，在我已经展示这个泡本身的结构以后，如今我开始对你们谈逻辑，这不是偶然：因为很清楚，真正令我们分析家关心的知识，只是说出来的东西。

我说“无意识像语言一样被结构起来”，是因为令我们关心的无意识，是能够被说出的东西；它在被说出时生成主体。主体是这种知识的一项决定作用，是在知识之下运行的东西；但它并不能自由运行，而会在那里遭遇阻挡。我们只在这一点上、而不在任何别处，面对一项知识。主张相反意见的人，会被带上我刚才所谓神秘化的道路。

无意识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某种东西已经能够得到环绕与界定；它表明，同话语的这项关系会产生远比此前所见更复杂的后果。尤其是：主体相对于知识居于其次，因而显出他并不会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从前人们从未料到这一点；尽管人们早已怀疑，他并不知道自己所说的一切。这一点使泡得以构成；它恰恰就在于，我们由此看见真理的维度如何产生。

精神分析教给我们：真理栖居在主体拒绝知道的点上；一切被排除出象征界的东西，都会在实在界中重新出现。这就是所谓症状的钥匙。症状是真理——主体的真理——所在的实在之结。

在这些小插曲开始后的早期，我对你们说过：“他们就是真理。”“他们就是真理”并不意味着他们说出了真理。

真理并不是无须劳作便能知道的东西。正因如此，它才取得名为症状的身体；症状显示了所谓真理栖居在哪里。那么，你们前来精神分析交换中寻找的这项遭拒知识，是精神分析家的知识吗？幻觉！

精神分析家也许知道某种东西；至少关于真理的本性，他知道这一点。但接下来，谈到遭拒知识，他便所知甚少。正因如此，如果把精神分析的教导放在某种实体性内容的层面，它就会显出其本来面目：一场闹剧。

例如我刚才谈到的力比多，如果它意味着我所谓欲望，那么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是在神经症者身上发现并追踪它的；而神经症者的欲望只有借助虚构的支撑才能维持。

说“他们就是真理”，当然并没有把真理交给你们，也没有交给他们。但知道这种交换机制或许有其分量——一种奇怪的交换：主体所说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无论他是否知道，只有得到大他者承认，才成为知识。事实上，所谓审查这个极其原始、像用斧头劈出的概念，意思恰恰就在这里。在权威统治的漫长时期，始终是大他者界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

但把这一点系到某些具体配置上完全是徒劳的；经验清楚表明，既然它们可以失效，那么在运作时就已经是会失效的。只有在大他者的层面，以下事情才会以结构方式发生：

- 决定主体的东西被分节成知识；
- 言说行为——其中的主体完全不必是说话者——由大他者实施的言说行为，前来指明那个说出它的人。

最初的大他者，就是分析家作出解释时始终所是的那个大他者；他对主体说：“你——‘我’（这个‘我’就是你）——我说：就是这个。”有时，它会产生后果。这就叫作解释。

有一段时间，这个作为哲学家的大他者打造了被假定知道的主体。只须翻开柏拉图就会看到，这已经是一种欺骗；哲学家让那个可怜主体说出自己想让他说的一切。

最终，主体学会了。他学会独自说：

“我说：黑不是白。”例如。

“我说：要么真，要么假。”

但我这里所说的总体肯定为真，因为它要么真，要么假。当然，这同“三二二运动”一样“幼稚”。“要么真，要么假”并不为真；但它能够维持。主体学会用一句“我说”来承担某种东西，并宣告自己准备在一场规则预先确定的辩论中为它负责；这就叫作逻辑。

奇怪的是，科学、知识正从这条净化道路中产生：逻辑分节被单独分离，主体同自己与大他者之间可能发生的一切相脱离……

天知道其间可以发生多少事情，包括祈祷……从中出现的不是任意知识，而是一种同实在毫无关系、因而也同真理毫无关系的纯粹知识；因为科学知识相对于实在而言，就是逻辑中所谓一种语言的补集。

它在实在旁边运作，却会咬入实在。它引入这个泡，也就是某种从认识角度看，并不比一个噱头重要多少的东西。但它最终造出了唯一真正体现牛顿定律的东西：第一颗“斯普特尼克”。这无疑是我们见过的最佳“噱头”——一个把世界掀上天的 gag…arine〔“噱头”与“加加林”的文字游戏〕。因为，人能够在二十四小时内绕地球六圈，同我们在关系中把握的宇宙有什么关系？那些以为运动同努力有关的人，绝对无法理解这件事。

总之，此后这个泡还干过别的好事。不过，可以说仍留下一个剩余：说话者并不总能说“我说”；以下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精神分析家正是这一点的见证……我们这些能够告诉他说了什么的精神分析家，只在少数情形中有这种能力；尤其当他们极其配合，前来我们这里说上极多话时，我们偶尔会向他们解释出某种东西。

解释某种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从来不向他们解释世界；我们只是给他们带来一小块东西，它看起来曾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占据他们话语中的某个位置。我们分析家从哪里取出它？

今年我原本想让你们围绕一件事沉思：拉伯雷的“冻结的言语”。[注8]

> [注8]　弗朗索瓦·拉伯雷：《巨人传》第四部，收入《全集》，巴黎，“七星文库”，1955 年。《大英百科全书》法文版 1973 年第 13 卷第 906 页评论道：“在《第四部》中，声音被封存并冻结；直到翌年春天解冻，才重新发出前一年那片可怖战场上的兵器铿锵声。”

事实上，同许多事情一样，它早已写下，只是没有人注意。

我曾着重谈到爱伦·坡描写的瓦尔德马先生。[注9]　可以说，我以讽刺方式使用了它。

> [注9]　埃德加·爱伦·坡：《瓦尔德马先生病例之真相》，收入《奇异故事集》，夏尔·波德莱尔译，巴黎，Flammarion 出版社，1965 年。

我借此谈到的，无非是自己又一次在这里揭露的东西：弗洛伊德话语近乎催眠般地幸存，并且仿佛使那些死去的社团继续说话。

这个神话走得更远。解释触发的东西究竟属于生命的实在还是死亡的实在，并不总是十分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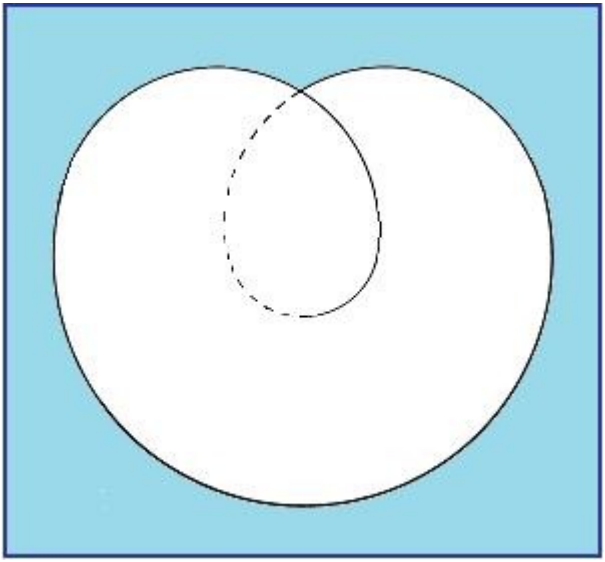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今年能够把精神分析行动讲到终点，本来会把你们带向这里：我曾对你们谈分析家的欲望，这绝非偶然；因为除了分析家的幻想，无法从任何别处提取出……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这当然会令人略感战栗，但在当前时势下，我们也不在乎多这一下……恰恰从分析家的幻想——即他的言语中最晦暗、最封闭、最自闭的东西——发出一记撞击，使分析者那里的言语解冻；重复功能也在这里坚持并增殖，我们借此可以让他把握自己被其摆布的那项知识。由此得到证实：真理通过大他者使自己成为知识。

相关知识卡 分析家的欲望与穿越根本幻想

这说明了为什么真理始终以这种方式出现。我们额外知道的是：这一切发生在同大他者的一项关系中，而这种关系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神秘或超验性质。



我在黑板上画出曲线的这个结，采用这里这个小环的形式……

只须稍作变化，你们就会看到它可以重新闭合，只显得像一个圆，并在双重环路中焊接起来……经验把它交给我们，也就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在它真正所在之处，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这个分析家，而是我们假定这个主体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是无意识的……同实践为它平行放置的东西重叠；这种实践多少有点贴地飞行，放在旁边的是“被假定要求的主体”。我不是曾看到某个人非常得意地询问“三二二运动”的一位成员——不必说出名字——问他：“你们要求我们这些分析家做什么？”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我曾在某处写过，分析家是这样一个当然颇为滑稽的特权人物：他用供给制造要求。

很明显，在这里行不通；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同这一层面正在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它意味着，他们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那又怎样！

分析家的错误恰恰是相信：我们作为分析家必须介入的是要求层面——人们不断把这一点理论化。然而，真正的问题非常准确地位于“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被假定要求的主体”之间的间隔，而且人们早已知道：主体不知道自己要求什么。

相关知识卡 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与移情

正因如此，随后他才不要求自己知道的东西。这个间隔、这个裂口、这条莫比乌斯带——要在它所在之处认出它，就看我在黑板上尽力潦草画出的这个小结；说实话，我没有画得很用心——就是所谓剩余、距离，就是大他者对我们而言完全被还原成的那个东西：对象(a)。

对象(a)的角色是缺失与距离，完全不是中介。真理作为一项发现——一种可以触及的发现，愿那些曾经触及它的人不要忘记——正是在这里被设定并强制显现：不存在对话；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在本质上不对称；对话是一场欺骗。

科学的起源是在主体作为主体得到净化的层面建立的。

在大他者的层面，从来没有什么比预言更真实。

相反，科学正是在大他者的层面总体化，也就是说，相对于主体，它完全异化。

问题是：在主体层面，某种真正属于预言秩序的东西，还能够栖居在哪里？